

叙事记述型通讯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穆青 冯健 周原

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

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多么严重的灾荒景象呵！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

困难，重重的困难，像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这位新到任的县委书记的双肩。但是，焦裕禄是带着《毛泽东选集》来的，是怀着改变兰考灾区面貌的坚定决心来的。在这个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看来，这里有36万勤劳的人民，有烈士们流血牺牲解放出来的90多万亩土地。只要加强党的领导，一时有天大的艰难，也一定能杀出条路来。

第二天，当大家知道焦裕禄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时，他已经下乡去了。

他到灾情最重的公社和大队去了。他到贫下中农的草屋里，到饲养棚里，到田边地头，去了解情况，观察灾情去了。他从这个大队到那个大队，一路走，一路和同行的干部谈论。见到沙

丘，他说：“栽上树，岂不是成了一片好树林！”见到涝洼窝，他说：“这里可以栽苇、种蒲、养鱼。”见到盐碱地，他说：“治住它，把一片白变成一片青！”转了一圈回到县委，他向大家说：“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是要干，要革命。兰考是灾区，穷，困难多，但灾区有个好处，它能锻炼人的意志，培养人的革命品格，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

焦裕禄的话，说得大家心里热呼呼的。大家议论说，新来的县委书记看问题高人一着棋，他能从困难中看到希望，能从不利条件中看到有利因素。

“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改变”

连年受灾的兰考，整个县上的工作，几乎被发统销粮、贷款、救济棉衣和烧煤所淹没了。有人说县委机关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供给部。那时候，很多群众等待救济，一部分干部被灾害压住了头，对改变兰考面貌缺少信心，少数人甚至不愿意留在灾区工作。他们害怕困难，更害怕犯错误……

焦裕禄想：“群众在灾难中两眼望着县委，县委挺不起腰杆，群众就不能充分发动起来，‘干部不领，水牛掉井’，要想改变兰考的面貌，必须首先改变县委的精神状态。”

夜，已经很深了，焦裕禄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披上棉衣，找县委一位副书记谈心去了。

在这么晚的时候，副书记听见叩门声，吃了一惊。他迎进焦裕禄，连声问：“老焦，出了啥事？”

焦裕禄说：“我想找你谈谈。你在兰考十多年了，情况比我熟，你说，改变兰考面貌的主要问题在哪里？”

副书记沉思了一下，回答说：“在于人的思想的改变。”

“对。”焦裕禄说：“但是，应该在思想前面加两个字，领导。”

眼前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改变。没有抗灾的干部，就没有抗灾的群众。”

两个人谈了很久，很深，一直说到后半夜。他们的共同结论是，除“三害”首先要除思想上的病害；特别是要对县委的干部进行抗灾的思想教育。不首先从思想上把人们武装起来，要想完成除“三害”的斗争，将是不可能的。

严冬，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在家的县委委员开会。人们到齐后，他并没有宣布议事日程，只说了一句：“走，跟我出去一趟”，就领着大家到火车站去了。

当时，兰考车站上，北风怒号，大雪纷飞，车站的屋檐下，挂着尺把长的冰柱。国家运送兰考一带灾民前往丰收地区的专车，正从这里开过。也还有一些灾民，穿着国家救济的棉衣，蜷曲在货车上，拥挤在候车室里……

焦裕禄指着他们，沉重地说：“同志们，你们看，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不能责怪他们，我们有责任。党把这个县 36 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

他没有再讲下去，所有的县委委员都沉默着低下了头。这时有人才理解，为什么焦裕禄深更半夜领着大家来看风雪严寒中的车站。

从车站回到县委，已经是半夜时分了，会议这时候才正式开始。

焦裕禄听了大家的发言，最后说：“我们经常口口声声说要为人民服务，我希望大家能牢记着今晚的情景，这样我们就会带着阶级感情，去领导群众改变兰考的面貌。”

紧接着，焦裕禄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鼓舞大家的革命干劲，勉励大家像张思德、白求恩那样工作。

以后，焦裕禄又专门召开了一次常委会，回忆兰考的革命斗争史。在残酷的武装斗争年代，兰考县的干部和人民，同敌人英勇搏斗，前仆后继。有个地区，在一个月内有9个区长为革命牺牲。烈士马福重被敌人破腹后，肠子被拉出来挂在树上。焦裕禄说：“兰考这块地方，是同志们用鲜血换来的。先烈们并没有因为兰考人穷灾大，就把它让给敌人，难道我们就不能在这里战胜灾害？”

一连串的阶级教育和思想斗争，使县委领导核心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站起来了。他们打掉了自然灾害面前束手无策、无所作为的懦夫思想，从上到下坚定地树立了自力更生、消灭“三害”的决心。不久，在焦裕禄倡议和领导下，一个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制订出来了。这个蓝图规定在三五年内，要取得治沙、治水、治碱的基本胜利，改变兰考的面貌。这个蓝图经过县委讨论通过后，报告了中共开封地委，焦裕禄在报告上，又着重加了几句：

“我们对兰考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面对着当前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有革命的胆略，坚决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的面貌。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

这几句话，深切地反映了当时县委的决心，也是兰考全党在上级党组织面前，一次庄严的宣誓。直到现在，它仍然深深地刻在县委所有同志的心上，成为鞭策他们前进的力量。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焦裕禄深深地了解，理想和规划并不等于现实，这涝、沙、碱三害，自古以来害了兰考人民多少年呵！今天，要制伏“三害”，要把它们从兰考土地上像送瘟神一样驱走，必须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付出高昂的代价。

他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管做什么工作，必须首先了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想战胜灾害，单靠一时的热情，单靠主观愿望，事情断然是办不好的。即使硬干，也要犯“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的错误。要想战胜灾害，必须详尽地掌握灾害的底细，了解灾害的来龙去脉，然后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部署。

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 1800 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摸透，亲自去掂一掂兰考的“三害”究竟有多大分量。

根据这一想法，县委先后抽调了 120 个干部、老农和技术员，组成一支三结合的“三害”调查队，在全县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的调查研究工作。焦裕禄和县委其他领导干部，都参加了这场战斗。那时候，焦裕禄正患着慢性的肝病，许多同志担心他在大风大雨中奔波，会加剧病情的发展，劝他不要参加，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同志们的劝告。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他不愿意坐在办公室里依靠别人的汇报来进行工作，说完就背着干粮，拿着雨伞，和大家一起出发了。

每当风沙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他认为这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他经常不辞劳苦地跟着调查队，追寻风沙和洪水的去向，从黄河故道开始，越过县界、省界，一直追到沙落尘埃，水入河道，方肯罢休。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焦裕禄简直变成一个满身泥水的农村“脱坯人”了，他和调查队的同志们经常在截腰深的水里吃干粮，蹲在泥水处歇息……

有一次，焦裕禄从兰考埕阳公社回县的路上，遇到了白帐子猛雨。大雨下了 7 天 7 夜，全县变成了一片汪洋。焦裕禄想：“呵，洪水呀，等还等不到哩，你自己送上门来了。”他回到县里

后，连停也没停，就带着办公室的三个同志察看洪水去了。眼前只有水，哪里有路？他们靠着各人手里的一根棍，探着，走着。这时，焦裕禄突然感到一阵阵肝痛，不时弯下身子用左手按着肝区。三个青年恳求他：“你回去休息吧。把任务交给我们，我们保证按照你的要求完成任务。”焦裕禄没有同意，继续一路走，一路工作着。

他站在洪水激流中，同志们为他张着伞，他画了一张又一张水的流向图。等他们赶到金营大队，支部书记李广志一看见焦裕禄就吃惊地问：“一片汪洋大水，您是咋来的？”焦裕禄抡着手里的棍子说：“就坐这条船来的。”李广志让他休息一下，他却拿出自己画的图来，一边指点着，一边滔滔不绝地告诉李广志，根据这里的地形和水的流势，应该从哪里到哪里开一条河，再从哪里到哪里挖一条支沟……这样，就可以把这几个大队的积水，统统排出去了。李广志听了非常感动，他没有想到，焦裕禄同志的领导工作竟这样的深入细致！到吃晚饭的时候了，他要给焦裕禄派饭，焦裕禄说：“雨天群众缺烧的，不吃啦！”说着，就又向风雨中走去。

送走了风沙滚滚的春天，又送走了暴雨涟涟的夏季，调查队在风里、雨里、沙窝里，激流里度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方圆跋涉了五千余里，终于使县委抓到了兰考“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全县有大小风口 84 个，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编了号，绘了图；全县有大小沙丘 1600 个，也一个个经过丈量，编了号，绘了图；全县的千河万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

这种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使县委基本上掌握了水、沙、碱发生、发展的规律。几个月的辛苦奔波，换来了一整套又具体又详细的资料，把全县抗灾斗争的战斗部署，放在一个更科学更扎实的基础之上。大家都觉得方向明，信心足，无形中增添了不少的

力量。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夜已经很深了，阵阵的肝痛和县委工作沉重的担子，使焦裕禄久久不能入睡。他的心在想着兰考县的 36 万人和 2574 个生产队。抗灾斗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觉悟也有高有低，怎样才能充分调动起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怎样才能更快地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抗灾斗争？……

焦裕禄在苦苦思索着。

在多年的工作中，焦裕禄善于从毛泽东同志著作中汲取营养，按照自己的说法叫做“白天到群众中调查访问，回来读毛主席著作，晚上‘过电影’，早上记笔记。”他所说的“过电影”，主要是指联系实际来思考问题。他说：“无论学习或工作，不会‘过电影’那是不行的。”

现在，全县抗灾斗争的情景，正像一幕幕的电影活动在他的脑海里。此时此刻，他觉得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方法，是基本的领导方法。

他决定发动县委领导同志再到贫下中农中间去集中群众的智慧，寻求解决困难的办法。他自己更是经常住在老贫农的草庵子里，蹲在牛棚里，跟群众一起吃饭，一起劳动。他带着高昂的革命激情和对群众的无限信任，在广大贫下中农间询问着、倾听着、观察着。他听到许多贫下中农要求“翻身”、要求革命的呼声，看到许多队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对“三害”斗争的革命精神。他在群众中学到了不少治沙、治水、治碱的办法，总结了不少可贵的经验。群众的智慧，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也更加坚定了他战胜灾害的信心。

韩村是一个只有 27 户人家的生产队。1962 年秋天遭受了毁

灭性的涝灾，每人只分了 12 两红高粱穗。在这样严重的困难面前，生产队的贫下中农提出，不向国家伸手，不要救济粮、救济款，自己割草卖草养活自己。他们说，摇钱树，人人有，全靠自己一双手。不能支援国家，心里就够难受了，决不能再拉国家后腿。就在这年冬天，他们割了 27 万斤草，养活了全体社员，养活了 8 头牲口，还修理了农具，买了 7 辆架子车。

秦寨大队的贫下中农社员，在盐碱地上刮掉一层皮，从下面深翻出好土，盖在上面。他们大干深翻地的时候，正是最困难的 1963 年夏季，他们说：“不能干一天就干半天，不能翻一亩就翻半亩，用蚕吃桑叶的办法，一口口啃，也要把这碱地啃翻个个儿。”

赵垛楼的贫下中农在秋季基本绝收以后，冒着倾盆大雨，挖河渠，挖排水沟，同暴雨内涝搏斗，1963 年秋天，这里一连 9 天暴雨，他们却夺得了好收成，卖了 8 万斤余粮。

双杨树的贫下中农在农作物基本绝收的情况下，雷打不散，社员们兑鸡蛋卖猪，买牲口买种子，坚持走集体经济自力更生的道路。社员们说：“穷，咱穷到一块儿；富，咱也富到一块儿。”

韩村、秦寨、赵垛楼、双杨树，广大贫下中农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使焦裕禄十分激动。他认为这就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贫下中农革命精神的好榜样。他在县委会议上，多次讲述了这些先进典型的重大意义，并亲自总结了他们的经验。他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应该把群众中这些可贵的东西，集中起来，再坚持下去，号召全县社队向他们学习”。

1963 年 9 月，县委在兰考冷冻厂召开了全县大小队干部的会议。这是扭转兰考局势的大会，是兰考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一次誓师大会。会上，焦裕禄为韩村、秦寨、赵垛楼、双杨树的贫下中农鸣锣开道，请他们到主席台上，拉他们到万人之前，大张旗鼓地表扬他们的革命精神。他把群众中这些革命的东

西，集中起来，总结为四句话：“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他说：这就是兰考的新道路！是毛泽东思想指导的道路！他大声疾呼，号召全县人民学习这四个样板，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在全县范围内锁住风沙，制伏洪水，向“三害”展开英勇的斗争！

这次大会在兰考抗灾斗争的道路上，是一个伟大的转折，它激发了群众的革命豪情，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斗志，有力地推动了全县抗灾斗争的发展。它使韩村等四个榜样的名字传遍了兰考；它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兰考 36 万群众的心目中，高高地升起！

从此，兰考人民的生活中多了两个东西，这就是县委和县人委发出的“奋发图强的嘉奖令”和“革命硬骨头队”的命名书。

“当群众最困难的时候， 共产党员要出现在群众面前”

就在兰考人民对涝、沙、碱三害全面出击的时候，一场比过去更加严重的灾害又向兰考袭来，1963 年秋季，兰考县一连下了 13 天雨，雨量达 250 毫米。大片大片的庄稼汪在洼窝里，渍死了。全县有 11 万亩秋粮绝收，22 万亩受灾。

焦裕禄和县委的同志们全力投入了生产救灾。

那是个冬天的黄昏。北风越刮越紧，雪越下越大。焦裕禄听见风雪声，倚在门边望着风雪发呆。过了会儿他又走回来，对办公室的同志们严肃地说：“在这大风大雪里，贫下中农住得咋样？牲口咋样？”接着他要求县委办公室立即通知各公社做好几件雪天工作。他说：“我说，你们记记：第一，所有农村干部必须深入到户，访贫问苦，安置无屋居住的人，发现断炊户，立即解决。第二，所有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必须深入牛屋检查，照顾

老弱病畜，保证不许冻坏一头牲口。第三，安排好室内副业生产。第四，对于参加运输的人畜，凡是被风雪隔在途中的，在哪个大队的范围，由哪个大队热情招待，保证吃得饱，住得暖。第五，教育全党，在大雪封门的时候，到群众中去，和他们同甘共苦。最后一条，把检查执行的情况迅速报告县委。”办公室的同志记下他的话，立即用电话向各公社发出了通知。

这天，外面的大风雪刮了一夜。焦裕禄的房子里，电灯也亮了一夜。

第二天，窗户纸刚刚透亮，他就挨门把全院的同志们叫起来开会。焦裕禄说：“同志们，你们看，这场雪越下越大，这会给群众带来很多困难，在这大雪拥门的时候，我们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烤火，应该到群众中间去，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

简短的几句话，像刀刻的一样刻在每一个同志的心上。有人眼睛湿润了，有人有多少话想说也说不出来了，他们的心飞向冰天雪地的茅屋去了。大家立即带着救济粮款，分头出发了。

风雪铺天盖地而来。北风响着尖厉的哨音，积雪有半尺厚。焦裕禄迎着大风雪，什么也没有披，火车头式帽子的耳巴在风雪中忽闪着。那时候，他的肝痛常常发作，有时疼得厉害，他就用一支钢笔硬顶着肝部，现在他全然没想到这些，带着几个年轻小伙子，踏着积雪，一边走，一边高唱《南泥湾》。

这一天，焦裕禄没烤群众一把火，没喝群众一口水。风雪中，他在9个村子，访问了几十户生活困难的老贫农。在许楼，他走进一个低矮的柴门。这里住的是一双无儿无女的老人。老大爷有病躺在床上，老大娘是个瞎子。焦裕禄一进屋，就坐在老人的床头问寒问饥。老大爷问他是谁？他说：“我是您的儿子。”老人问他大雪天来干啥？他说：“毛主席叫我来看望您老人家。”老

大娘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用颤抖的双手上上下下摸着焦裕禄。老大爷眼里噙着泪说：“解放前，大雪封门，地主来逼租，撵得我串人家的房檐，住人家的牛屋。”焦裕禄安慰老人说：“如今印把子抓在咱手里，兰考受灾受穷的面貌一定能够改过来。”

就是在这次雪天送粮当中，焦裕禄也看到和听到了许多贫下中农极其感人的故事。谁能够想到，在毁灭性的涝灾面前，竟有那么一些生产队，两次三番退回国家送给他们的救济粮、救济款。他们说：把救济粮、救济款送给比我们更困难的兄弟队吧，我们自己能想办法养活自己！

焦裕禄心里多么激动呵！他看到毛泽东思想像甘露一样滋润了兰考人民的心，党号召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硬骨头精神，已经变成千千万万群众敢于同天抗、同灾斗的物质力量了。

有了这种精神，在兰考人民面前还有什么天大的灾害不能战胜！

“县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

焦裕禄常说，县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把县委这个“班”带好，必须使这“一班人”思想齐、动作齐。而要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就必须靠毛泽东思想。

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县人委有一位从丰收地区调来的领导干部，提出了一个装潢县委和县人委领导干部办公室的计划。连桌子、椅子、茶具，都要换一套新的。为了好看，还要把城里一个污水坑填平，上面盖一排房子。县委多数同志激烈地反对这个计划。也有人问：“钱从哪里来？能不能花？”这位领导干部管财政，他说：“花钱我负责。”

但是，焦裕禄提了一个问题：

“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他接着说明了自己的意见：

“灾区面貌没有改变，还大量吃着国家的统销粮，群众生活很困难。富丽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就是连想也很危险。”

后来，焦裕禄找这位领导干部谈了几次话，帮助他认识错误。焦裕禄对他说：兰考是灾区，比不得丰收区。即使是丰收区，你提的那种计划，也是不应该做的。焦裕禄劝这位领导干部到贫下中农家里去住一住，到贫下中农中间去看一看。去看看他们想的是什么，做的是什么。焦裕禄作为县委的班长，他从来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对同志们要求非常严格，但他要求得人情入理，叫你自己从内心里生出改正错误的力量。不久以后，这位领导干部认识了错误，自己收回了那个“建设计划”。

有一位公社副书记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当时，县委开会，多数委员主张处分这位同志。但焦裕禄经过再三考虑，提出暂时不要给他处分。焦裕禄说，这位同志是我们的阶级弟兄，他犯了错误，给他处分固然是必要的；但是，处分是为了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当前改变兰考面貌，是一个艰巨的斗争，不如派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考验他，锻炼他，给他以改正错误的机会，让他为党的事业出力，这样不是更好吗？

县委同意了焦裕禄的建议，决定派这个同志到灾害严重的赵垛楼去蹲点。这位同志临走时，焦裕禄把他请来，严格地提出批评，亲切地提出希望。最后焦裕禄说：“你想想，当一个不坚强的战士，当一个忘了群众利益的共产党员，多危险，多可耻呵！先烈们为解放兰考这块地方，能付出鲜血、生命；难道我们就不能建设好这个地方？难道我们能在自然灾害面前当怕死鬼？当逃兵？”

焦裕禄的话，一字字、一句句都紧紧扣住这位同志的心。这话的分量比一个最重的处分决定还要沉重，但这话也使这位同志

充满了战斗的激情。阶级的情谊，革命的情谊，党的温暖，在这位犯错误的同志的心中激荡着，他满眼流着泪，说：“焦裕禄同志，你放心……”

这位同志到赵垛楼以后，立刻同群众一道投入了治沙治水的斗争。他发现群众的生活困难，提出要卖掉自己的自行车，帮助群众，县委制止了他，并且指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从思想上武装赵垛楼的社员群众，领导他们起来，自力更生进行顽强的抗灾斗争，一辆自行车是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的。以后，焦裕禄也到赵垛楼去了。他关怀赵垛楼的两千来个社员群众，他也关怀这位犯错误的阶级弟兄。

就在这年冬天，赵垛楼为害农田多年的 24 个沙丘，被社员群众用沙底下的黄胶泥封盖住了。社员们还挖通了河渠，治住了内涝。这个一连七季吃统销粮的大队，一季翻身，卖余粮了。

也就在赵垛楼大队“翻身”的这年冬天，那位犯错误的同志，思想上也翻了个个儿。他在抗灾斗争中，身先士卒，表现得很英勇。他没有辜负党和焦裕禄对他的期望。

焦裕禄，出生在山东淄博一个贫农家里，他的父亲在解放前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逼迫上吊自杀了。他从小逃过荒，给地主放过牛，扛过活，还被日本鬼子抓到东北挖过煤。他带着家仇、阶级恨参加了革命队伍，在部队、农村和工厂里做过基层工作。自从参加革命一直到当县委书记以后，他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他常常开襟解怀，卷着裤管，朴朴实实地在群众中间工作、劳动。贫农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有多少泥。他穿的袜子，补了又补，他爱人要给买双新的，他说：“跟贫下中农比一比，咱穿得就不错了。”夏天他连凉席也不买，只花四毛钱买一条蒲席铺。

有一次，他发现孩子很晚才回家去。一问，原来是看戏去了。他问孩子：“哪里来的票？”孩子说：“收票叔叔向我要票，我说没有，叔叔问我是谁？我说焦书记是我爸爸。叔叔没有收票

就叫我进去了。”焦裕禄听了非常生气，当即把一家人叫来“训”了一顿，命令孩子立即把票钱如数送给戏院。接着，他又建议县委起：了一个通知，不准任何干部特殊化，不准任何干部和他们的子弟“看白戏”……

“焦裕禄是我们县委的好班长、好榜样。”

“在焦裕禄领导下工作，方向明，信心大，敢于大作大为，心情舒畅，就是累死也心甘。”

焦裕禄的战友这样说，反对过他的人这样说，犯过错误的人也这样说。

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惟独没有他自己

县委一位副书记在乡下患感冒，焦裕禄几次打电话，要他回来休息；组织部一位同志有慢性病，焦裕禄不给他分配工作，要他安心疗养；财委一位同志患病，焦裕禄多次催他到医院检查……焦裕禄的心时时装着全体党员和全体人民，惟独没有他自己。

1964年春天，正当党领导着兰考人民同涝、沙、碱斗争胜利前进的时候，焦裕禄的肝病也越来越重了。很多人都发现，无论开会，作报告，他经常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他棉袄上的第二和第三个扣子是不扣的，左手经常揣在怀里。人们留心观察，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靠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坐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他对自己的病，是从来不在意的。同志们问起来，他才说他对肝痛采取了一种压迫止痛法。县委的同志们劝他疗养，他笑着说：“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他，他就不欺侮你了。”焦裕禄暗中忍受了多大痛苦，连他的亲人也不清楚。他真是全心全意投到改变兰考面貌的斗争中去

了。

焦裕禄到地委开会，地委负责同志劝他住院治疗，他说：“春天要安排一年的工作，离不开！”没有住。地委给他请来一位有名的中医诊断病情，开了药方，因为药费很贵，他不肯买。他说：“灾区群众生活很困难，花这么多钱买药，我能吃得下吗？”县委的同志背着他去买来三剂，强逼他服了，但他执意不再服第四剂。

那天，县委办公室的干部张思义和他一同骑自行车到三义寨公社去，走到半路，焦裕禄的肝痛发作，疼得骑不动，两个人只好推着自行车慢慢走。刚到公社，大家看他气色不好，就猜出是他又发病了。公社的同志说：“休息一下吧。”他说：“谈你们的情况吧，我不是来休息的。”

公社的同志一边汇报情况，一边看着焦裕禄强按着肚子作笔记。显然，他的肝痛得使手指发抖，钢笔几次从手指间掉了下来，汇报的同志看到这情形，忍住泪，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而他，看来还是神情自若的样子，说：“说，往下说吧。”

1964年的3月，兰考人民的除“三害”斗争达到了高潮，焦裕禄的肝病也到了严重关头，躺在病床上，他的思潮汹涌澎湃，奔向那正在被改造着的大地。他满腔激情地坐到桌前，想动手写一篇文章，题目是《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他铺开稿纸，拟好四个小题目：一、设想不等于现实。二、一个落后地区的改变，首先是领导思想的改变。领导思想不改变，外地的经验学不进，本地的经验总结不起来。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四、精神原子弹——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

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的焦裕禄，从兰考人民的抗灾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从兰考人民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中，已经预见到新兰考美好的未来。但是，文章只开了个头，病魔就逼他放下了手中的笔，县委决定送他到医院治病去了。

临行那一天，由于肝痛得厉害，他是弯着腰走向车站的。他是多么舍不得离开兰考呵！一年多来，全县 149 个大队，他已经跑遍了 120 多个，他把整个身心，都交给了兰考的群众，兰考的斗争。正像一位指挥员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离开炮火纷飞的前沿阵地一样，他从心底感到痛苦、内疚和不安。他不时深情地回顾着兰考城内的一切，他多么希望能很快地治好肝病，带着旺盛的精力回来和群众一块战斗呵！他几次向送行的同志们说：不久他就会回来的。在火车开动的前几分钟，他还郑重地布置了最后一项工作，要县委的同志好好准备材料，等他回来时，向他详细汇报抗灾斗争的结果。

“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 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开封医院把焦裕禄转到郑州医院，郑州医院又把他转到北京的医院。在这位钢铁般的无产阶级战士面前，医生们为他和肝痛斗争的顽强性格外感到惊异。他们带着崇敬的心情站在病床前诊察，最后很多人含着眼泪离开。

那是个多么令人悲恸的日子呵！医生们开出了最后的诊断书，上面写道：“肝癌后期，皮下扩散。”这是不治之症。送他去治病的赵文选同志，绝不相信这个诊断，人像傻了似的，一连声问道：“什么，什么？”医生怀着沉重的心情，低声说：“焦裕禄同志最多还有 20 天时间。”赵文选呆了一下，突然放声痛哭起来，他央告着说：

“医生，我求求你，我恳求你，请你把他治好，俺兰考是个灾区，俺全县人离不开他，离不开他呀！”

在场的人都含着泪，医生说：“焦裕禄同志的工作情况，在他进院时，党组织已经告诉我们，癌症现在还是一个难题，不

过，请你转告兰考县的群众，我们医务工作者，一定用焦裕禄同志同困难和灾害斗争的那种革命精神，来尽快攻克这个高地。”

焦裕禄又被转到郑州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焦裕禄病危的消息传到兰考后，县上不少同志去郑州看望他。县上有人来看他，他总是不谈自己的病，先问县里的工作情况，他问张庄沙丘封住了没有？问赵垛楼的庄稼淹了没有？问秦寨盐碱地上的麦子长得怎样？问老韩陵地里的泡桐树栽了多少？

……

有一次，他特地嘱咐一个县委办公室的干部说：

“你回去对县委的同志说，叫他们把我没写完的文章写完；还有，把秦寨盐碱地上的麦穗拿一把来，让我看看！”

5月初，焦裕禄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县委的一位副书记匆匆赶到郑州探望他。当焦裕禄用干瘦的手握着他的手，两只失神的眼睛深情地望着他时，这位副书记的泪珠禁不住一颗颗滚了下来。

焦裕禄问道：“听说豫东下了大雨，雨多大？淹了没有？”

“没有。”

“这样大的雨，咋会不淹？你不要不告诉我。”

“是没有淹！排涝工程起作用了。”副书记一面回答，一面强忍心头悲痛给他讲了一些兰考人民抗灾斗争胜利的情况，安慰他安心养病，说兰考面貌的改变也许会比原来的估计更快一些。

这时候，副书记看到焦裕禄在全力克制自己剧烈的肝痛，一粒粒黄豆大的冷汗珠时时从他额头上浸出来。他勉强擦了擦汗，半晌，问道：

“我的病咋样？为什么医生不肯告诉我？”

副书记迟迟没有回答。

焦裕禄一连追问了几次，副书记最后不得不告诉他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听了这句话，焦裕禄点了点头，镇定地说道：“呵，我明白了……”

隔了一会儿，焦裕禄从怀里掏出一张自己的照片，颤颤地交给这位副书记，然后说道：“现在有句话我不能不说了。回去对同志们说，我不行了，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地斗争下去。党相信我们，派我们去领导，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是灾区，我死了，不要多花钱。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副书记再也无法忍住自己的悲痛，他望着焦裕禄，鼻子一酸，几乎哭出声来。他带着泪告别了亲密的阶级战友……

谁也没有料到，这就是焦裕禄同兰考县人民，同兰考县党组织的最后一别。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同志不幸逝世了。那一年，他才42岁。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中共河南省委和开封地委有两位负责同志守在他的床前。他对这两位上级党组织的代表断断续续地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他死后，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他没有死，他还活着

事隔一年以后，1965年春天，兰考县几十个贫农代表和干部，专程来到焦裕禄的坟前。贫农们一看见焦裕禄的坟墓，就仿佛看见了他们的县委书记，看见了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的那个人。

一年前，他还在兰考，同贫下中农一起，日夜奔波在抗灾斗争的前线。人们怎么会忘记，在那大雪封门的日子，他带着党的温暖走进了贫农的柴门；在那洪水暴发的日子，他拄着棍子带病到各个村庄察看水情。是他高举着毛泽东思想的红灯，照亮了兰考人民自力更生的道路；是他带领兰考人民扭转了兰考的局势，激发了人们的革命精神；是他喊出了“锁住风沙，制伏洪水”的号召；是他发现了贫下中农中革命的“硬骨头”精神，使之在全县发扬光大……这一切，多么熟悉，多么亲切呵！谁能够想到，像他这样一个充满着革命活力的人，竟会在兰考人民最需要他的时候，离开了兰考的大地。

人们一个个含着泪站在他的坟前，一位老贫农泣不成声地说出了 36 万兰考人民的心声：

“我们的好书记，你是活活地为俺兰考人民，硬把你给累死的呀。困难的时候你为俺贫农操心，跟着俺们受罪，现在，俺们好过了，全兰考翻身了，你却一个人在这里……”

这是兰考人民对自己的亲人、阶级战友的痛悼，也是兰考人民对一个为他们的利益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的最高嘉奖。

焦裕禄去世后的这一年，兰考县的全体党员、全体人民，用汗水灌溉了兰考大地。三年前焦裕禄倡导制订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经过三年艰苦努力，已经变成了现实。兰考，这个豫东历史上缺粮的县份，1965 年粮食初步自给了。全县 2574 个生产队，除 300 来个队是棉花、油料产区外，其余的都陆续自给，许多队有了自己的储备粮。1965 年，兰考县连续旱了 68 天，从 1964 年冬天到 1965 年春天，刮了 72 次大风，却没有发生风沙打死庄稼的灾害，19 万亩沙区的千百条林带开始把风沙锁住了。这一年秋天，连续下了 384 毫米暴雨，全县也没有一个大队受灾。

焦裕禄生前没有写完的那篇文章，正由 36 万兰考人民在兰

考大地上奋力集体完成。在这篇文章里，兰考人民笑那起伏的沙丘“贴了膏药，扎了针”，笑那滔滔洪水乖乖地归了河道，笑那连茅草都不长的老碱窝开始出现了碧绿的庄稼，笑那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压在人们头上的大自然的暴君，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不能再任意摆布人们的命运了。

焦裕禄虽然去世了，但他在兰考土地上播下的自力更生的革命种子，正在发芽成长。他一心为革命，一心为群众的高贵品德，已成为全县干部和群众学习的榜样。这一切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已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推动着兰考人民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大道上继续奋勇前进。兰考灾区面貌的改变，还只是兰考人民征服大自然的开始，在这场伟大的向大自然进军的斗争中，他们不仅要彻底摘掉灾区的帽子，而且决心不断革命，把大部分农田逐步改造成为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建设社会主义新兰考。

焦裕禄同志，你没有辜负党的希望，你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你的任务，兰考人民将永远忘不了你。你不愧为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起来的好党员，不愧为党的好干部，不愧为人民的好儿子！你是千千万万在严重自然灾害面前，巍然屹立的共产党员英雄形象的代表。你没有死，你将永远活在千万人的心里！

（原载 1966 年 2 月 7 日《人民日报》）

评析：

让人物报道产生感染力

李宁

新闻界流传着这样一段佳话：1966 年 2 月 7 日，当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头号播音员”齐越，在朗诵《县委书记的榜样

——焦裕禄》时竟然泣不成声。这篇长达万字的人物通讯的感染力，由此可见一斑。

本文作者之一、著名记者穆青曾经说过，能够提炼反映时代特征的主题并据此表现人物是“决定人物通讯成败、优劣的关键。”人物通讯之所以有别于人物传记，就在于它具有新闻性，能反映鲜明的时代特色。本文所刻画的对象——焦裕禄，是一位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涌现的好干部。（作品一开始就交代了背景：“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他“受命于危难之际”，不顾绝症与自然顽强抗争的精神，在当时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因此，这篇作品发表之后，立即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虽然焦裕禄的事迹本身就很感人，但本文作者善于选取典型事例、善于运用个性化语言和细节描写刻画人物独特性格，则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典型事例如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将县委委员带到火车站去开会，让委员们亲眼看到被迫背井离乡的兰考人民。个性化语言则有：“如今印把子抓在咱手里，兰考受灾受穷的面貌一定能够改过来。”“这样大的雨，咋会不淹？你不要不告诉我”等等。正是这些鲜活、生动的描写，使“焦裕禄”这一模范人物永久地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至今仍被视为人物通讯中的典范之作。

生命的支柱

—— 张海迪之歌

郭梅尼 徐家良

来到张海迪的家，我们急切地想见到这个被誉为保尔式的姑娘。尽管我们读过她许多感人的故事，但她毕竟是个三分之二肢体都已失去知觉的人。这样的人怎样生活呢？我们不可想象。

完全出乎意料，她是那样活泼、开朗，谈笑风生，充满朝气。有一次，她充满幻想地对我们说：

“我做过很多美好的梦，我梦见自己正站着唱歌；我梦见自己在大道上奔跑；梦见展开双翅在天空翱翔……”飞吧，姑娘，像小燕子一样展开你理想的翅膀。

“可是，梦总是要醒的。醒来我并不沮丧。我必须面对现实。”

那可恶的轮椅，那轮椅上耷拉着的两条瘫软的腿，无情地告诉我们：张海迪因为从小患脊髓血管瘤，脊椎动过四次大手术，脊椎板被先后切除六块。现在，第二胸椎以下已失去知觉，脊椎严重弯曲变形，根本不能支撑身体，全靠胳膊支在轮椅的扶手上。我们看到，她一抬手，身体便瘫软在轮椅里。胳膊由于长年支撑着，衣服袖子磨出了一个大窟窿，轮椅扶手上的油漆也剥落了。

但是，在这个瘫软的身躯里，有一根坚强的生命支柱。这支柱，支持这个病残的青年在无情的现实中奋斗；这支柱，支持这个二十多年不会走路的姑娘，开拓出了一条广阔的生活道路；这

支柱，支持这残存的三分之一尚有活力的身躯，发射出光和热。

这根生命的支柱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它是否经历过挫折和打击？它是怎样经受这一场场考验成为一根不倒的支柱呢？

能使大多数人幸福的人，他自己 本身也是幸福的。我想做这样的人

“你们报纸刊登了我的自述后，我又收到两千多件来信。”海迪对我们说：“许多青年朋友来信问我，你为什么能拖着病残的身子，愉快地为人民做事，生活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在尚楼生活的几年谈起……”

1970年春天，海迪的父亲带领知青下乡插队，全家都随着从济南来到山东莘县十八里铺公社尚楼大队落户。尽管那是“四人帮”横行的年月，但尚楼的人民仍是淳朴善良的。刚进村那天，乡亲们热情地围上来问长问短，帮着搬家安置。这时，人群里挤出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有个小伙子揪着他的耳朵逗着说：“孟方，快叫玲玲姐姐（海迪的小名）。”玲玲一看，这孩子虽然衣服上尽是土，但却非常可爱，一双大眼睛乌黑乌黑，长长的睫毛还向上卷着，忽闪忽闪的。便情不自禁地说：“哎呀，真漂亮，像电影演员似的。”孩子羞得一溜烟钻进人群，忙着抱起小锅、小凳，帮助搬家去了。后来，这孩子常常躲在玲玲的小窗户洞上看，轻声问道：“玲玲姐，你老呆在家看书，闷吧。”一会儿，他抓来个小虫，说：“玲玲姐，它会磕头，你玩吧。”一会又摸出一个鸡蛋，说：“这是俺妈给俺煮的，你吃吧。”多么淳朴的孩子啊，玲玲和小孟方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有一次，小孟方抓来一只小燕子给玲玲姐玩，玲玲高兴地问：“您怎么抓住它的？”

“它一条腿瘸了，不能飞了。”

玲玲的心猛一沉。小燕子也失去了腿啊！它生着双翅不就是为了飞翔的吗？

玲玲给小燕子的伤腿搽上红药水，用纱布包扎好，放在窗台的小纸盒里养着。小燕子一天天恢复了活力。玲玲把它捧在手心里，怜爱地说：“飞吧，小燕子，飞吧！”小燕子艰难地展开双翅，飞向蓝天。

小孟方高兴地叫着：“玲玲姐治好了小燕子，你是个先生（医生）。”

一天，小孟方的妈抱着小孟方，慌慌忙忙地跑来，喊着：“玲玲，你快看，这孩子是怎么了？”只见孩子翻着白眼，口吐白沫，脖子向后挺着。她忙说：“大嫂，快，快送医院。”可是，医院离村子还有 20 里啊！

下午，玲玲听见惨痛的哭声，心一怔：“呀，不会是小孟方吧？……不，不会的，他还会来叫我玲玲姐，还会给我捉磕头虫的……”

“玲玲，孟方死了，孟方死了……。”

真的？这是真的！姑娘的心冰凉了！

……………

“这是我第一次，第一次体会到我们的农村是这么贫穷，这么落后，我们的人民是这么苦啊！”海迪激动地回忆着。

“小孟方为什么会死呢？为什么会死呢？”玲玲喃喃着，她问父母，她问自己，她问那颗火热的心。

“……玲玲姐治好了小燕子，你是个先生，你是个先生。”这天真稚嫩的童音又响在玲玲耳边。她自责自问：

我恨啊，我怨恨自己，我太无能了。我要是有点本事，我要真是个医生，不就能救小孟方吗？他就不会死得那么快啊！

晚上，玲玲在煤油灯下写日记。她写道：开始进村时，我曾写过，人们啊，我真愿为你们做些什么！现在，我的愿望应该落

实了。我要学医，我要为你们减少痛苦，不让村里再出现小孟方这样的悲剧……

“我学医的情况，你们报纸登过了。找我扎针看病的人很多，最使我难忘的，是耿其元大爷……”

耿其元大爷并不是尚楼人。因为患脑血栓，瘫痪三年。老伴去世后，丢下三个儿子，两个还很小，家里全靠大爷照顾。老人一瘫痪，家里惨不忍睹。玲玲急切地想帮助老人解除痛苦，她一面给大爷扎针治疗，一面从精神上鼓励他：“大爷，你会好的，你还会站起来，还能下地干活……”

一天，耿大爷让儿子用排子车拉来后，又坐在玲玲面前，把脚跷在玲玲的车上。玲玲精心地给他扎着。扎完针，又弯下身子细心地帮大爷扎好腿带，系上鞋带。耿大爷感激地不知说什么，只是笑着“哎呀……哎呀……”

“大爷，你站起来试试，试试……”

老人不敢相信，哆哆嗦嗦地想站又怕站。慢慢地，慢慢地，他站起来了！

“走，朝前走一步，走一步。”玲玲压住快要跳出来的心，鼓励着。

老人抬起了腿，朝前挪了一步，又一步，嘴里喃喃着：“那个——行！那个——行！”

他会走了！他真的会走了！

玲玲的心在颤，在抖，在唱啊！就是这小小的银针，就是这病残的身体，真的能帮助瘫痪的人站起来了。幸福，这就是幸福啊！

玲玲第一次懂得了，给别人带来幸福，就是自己最大的幸福。她在日记中写道：“有人说幸福是抽象的。那是因为他没有得到真正的幸福。而且他所谓的幸福是对最狭隘的个人而言。真正的幸福，是具体而实在的。”“记得马克思说过，能使大多数人

幸福的人，他自己本身也是幸福的。我想做这样的人。”

玲玲给耿大爷治好病的消息，在五里三乡传开了，找玲玲治病的人越来越多，一天总有五十多人，排子车、自行车在玲玲的院子门口，挤得黑压压一片。玲玲的脊柱不能支撑，她靠在扶手上给群众扎着，累得一身身冷汗。因为整天整天坐在车上，腿和屁股上长了一片片褥疮。妹妹给她洗褥疮时，看见那溃烂的疮口，难过得流下了眼泪。“姐，你光顾给人家治病，自己的身体也得注意点啊！”几个守在玲玲身边的“卫士”，心疼得忍无可忍，对来治病的人埋怨道：“你们要累死玲玲姐呀，不治了，不治了。”玲玲还是耐心地给群众治着。

玲玲真的累病了。她发着高烧，输着液，闭眼躺在床上。乡亲们焦急地守在门口。老奶奶悄声问道：“闺女睁眼了吗？唉，都是叫俺们这些人给累的。”80岁的王奶奶，轻手轻脚走到玲玲床前，用手摸摸玲玲的额头，看看还烧不烧。然后，从怀里掏出几个热呼呼的鸡蛋放在玲玲枕头边，一声不响地走了。耿其元大爷拄着棍子，从几里外赶来，在门外哭着自语道：“叫我病，叫我死吧！”

几个淘气的孩子，跑到玲玲后墙的小窗户洞口，一个踩着一个，偷偷地看一眼玲玲姐，然后从窗户洞伸进小手，放上一个大鹅蛋，还有一把刚刚红了尖的大枣……

玲玲在朦胧中看见这个镜头，热泪一下涌了出来。

这些玲玲的小“卫士”整天和玲玲生活在一起，玲玲给他们讲故事，教他们唱歌，给他们理发，使他们懂得了生活的意义。为了让玲玲高兴，他们常常推玲玲到村外去玩。一次，他们推玲玲到金线河去捉青蛙，准备拿回来作解剖试验。高高的河堤，孩子们推呀，推，小车怎么也推不上去。一个小男孩脱下自己的粗布裤子，一条裤腿捆在车上，一条裤腿搭在肩上，使劲拉，别的孩子推拥着，“一二，一二……上去了！”他们把玲玲放在小桥

上，开始做各种精彩表演。

这个说：“玲玲姐，你看，我会打扑腾。”说着，往水里一趴，扑通，扑通溅起了一串串水花。

那个说：“玲玲姐，你看，我会跳水。”只听扑通一声，笔直地从小桥上跳到水中，玲玲开心地哈哈大笑。

在这欢乐的生活里，这个失去双腿的姑娘，没有遭到白眼和歧视，更没有孤独，没有哀伤，形成了她那开朗乐观的性格。

1973年3月9日，玲玲要随父母搬到莘县城里去了。清晨，队里备了四辆大车，全村的人都围在车队两旁，送行的队伍拉得老长老长的。

玲玲坐在大车上，老奶奶、大嫂子扯着她的衣襟，千恩万谢，说不完的嘱托，表不尽的心意，真是一步一行泪啊！玲玲有满腹的话，可是啥也说不出，啥也看不见了。泪水模糊了她的眼睛，泪水哽住了她的喉咙。她的心在呼唤着：

再见了！尚楼！再见了，乡亲！爷爷奶奶们，让我再为你们做一千次一万次事吧。亲爱的姑娘们，让我再为你们裁一次衣服。我的小伙伴们啊，让我再为你们理一次发，唱一支歌……我为你们做得太少，太少了。不是你们要感谢我，相反的，是我要感谢你们。是你们哺育了我，我是吃着你们的乳汁长大的。是你们那一颗颗淳朴的心，使我这个被病痛折磨的残废青年，饱尝了人间的温暖；是你们教育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懂得了生活的意义；是你们给了我生活的力量。在你们中间，我感到自己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从15岁到17岁，是人的一生奠基的关键年华。海迪多少次地强调：“我永远也忘不了尚楼。”尚楼三年的生活，给海迪奠定了坚实的人生基石。

战胜消极悲观，你就是生活的强者

“一些青年朋友来信问我：你这样严重的病残，就没有痛苦、孤独的时候吗？”海迪坦率地说：“我也有过痛苦，孤独，甚至绝望的时候，特别是刚刚离开尚楼那一段……”

海迪离开了尚楼那欢腾紧张的生活，周围的朋友们，有的升学了，有的被招工，许多人都走了。她常常关在小屋子里，感到孤独和寂寞。

不行，必须开辟一条生活的新路。

——她开始学画画。当她画出一幅美丽的素描后，一个朋友看见了，说：“画家要一手拿调色板，一手拿画笔，你离开了胳膊的支撑坐都坐不稳，怎么能画画呢？！”此路不通。

——她又学音乐，学乐器。当她能弹出一手好琵琶时，一位阿姨摇头说：“哪见过演员坐着轮椅上台演奏的？！”又是一瓢凉水。

——她四处报名，四处写信，要求工作。但是，一次次都被回绝了。

1974年冬季的一天。海迪一早就坐上轮椅，赶到劳动局，去看看这次招工被录取了没有。劳动局门口挤满了等通知的人。海迪真想挤进去问问。她多么想听见喊：“张海迪，你录取了。”可是她又害怕听见：“没有你，这次又没有你。”

天气是那么冷呀，她在门口焦急地等着。她的脸冻紫了，手冻僵了，一直等到所有的人都走光了，还没有听见喊她。

她鼓起勇气，推着轮椅进去了。

“叔叔，给我个工作吧！”海迪几乎是乞求着：“我能行，我会干好的。我不要工资，我只要有个工作，不管干什么都行。叔叔，你……”

“那么多好胳膊好腿的人都还没工作哩……”

冷，彻骨的寒冷。海迪的心冻僵了。

为了找工作，她遭冷遇，受歧视；为了找工作，她乞求，她呼吁。她的心在呐喊：人们啊，我虽然失去了双腿，但我并不比你们低一等，在通往未来的征途上，我们是同路人，在理想的起点上，我和你们是一样的。我不是为了饭碗，我要的是工作的权力，是为社会做贡献的机会啊！可是，这一点点要求也得不到满足。这撕心裂肺的痛苦，超过任何一次大手术。

社会不需要我。如果不能给社会做贡献，还不如减少对社会的负担。乘着父母到聊城出差时，她服了大量安眠药……

“亲爱的爸爸妈妈，女儿就要离开你们了。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心里是多么难过啊……”

“我深深懂得，一个热爱生活的姑娘，活着是多么好啊！但是，疾病使我失去了这一切权利。我不愿做一个沸腾生活的旁观者，而要和别人一样，做一个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爸爸妈妈，请原谅我吧……”

海迪躺在床上，脑子里掀起了万顷波涛……

尚楼啊，我美丽的土地，我多么想再看看那绿油油的麦田，再看看那金线河潺潺的流水，看看那小磕头虫……

乡亲们，我真想再看看你们，哪怕再看一眼。耿大爷，您的腿又犯病的吗？80岁的王奶奶，你千万别再感冒了；我的小伙伴们，你们的头发又该理了吧……我可爱的乡亲们啊，你们给了我多少温暖，多少欢乐，我舍不得离开你们……

她想起了保尔在海滨公园自杀的情景……假如那扳机一扣，就不再会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了……保尔战胜了。

社会给了我那么多温暖，人民给了我那么多厚爱，我就这样离去了吗？……尚楼三年，我不是也做了一些有用的事情吗？乡亲们需要我，我还是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不，不，我不能死！我还要活着！我还有了一双手，我要用它辟开那荆棘丛生的生活道路。

“来人啊，救救我，我还年轻，我还有用，我要活着……我错了，快来救我……”海迪呼喊着。

回忆起这段往事，海迪对我们说：“这件事，我给一些报刊写过，可是，他们都删掉了。也许有人认为，这对一个先进人物是不光彩的事吧。但是，我不把它看成是我的耻辱，相反，我认为这是我的胜利。这说明我经住了考验。”喘了口气，海迪接着说：“说实在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我不知看过多少遍，它无数次地给了我生活的力量和信心。但是，对我人生道路影响最大的，还是保尔在海滨公园自杀的这一场。我认为，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能够战胜这种消极悲观因素，重新振奋起来，更深刻地认识了人生的意义，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对啊，不排除杂质，怎么能炼出纯钢呢？

稍稍平息了激动的心情，海迪又说：“在人生的道路上，谁都会遇到困难和挫折。人们遇到困难时，出现一些消极的想法和做法是很自然的。但是，就看你能不能战胜它。战胜了，你就是英雄，就是生活的强者。”

后来，海迪被分配到城关医院工作，她是多么高兴啊。因为高位截瘫，她大小便都不能控制。为了坚持工作，她白天不喝水，不吃流质食物。夏天干渴得嗓子冒烟，她也忍耐着。给病人扎针时，胳膊不能支撑，脊椎一天天变形，弯曲得更厉害了。肋间神经疼，折磨得她必须服用大量止疼片才能坚持工作。有人不解地说：“嗨，整天拖着病残的身子，这么干，一个月才挣 25 块钱，何苦呢？！”

海迪对我们说：“美国盲聋女作家海伦·凯勒说，倘若我能看见 3 天，那么，用眼睛去观察到的该是一幅多么美丽的景象啊。但是，那些视力健全的人，对此却视而不见，他们认为，世界上

的一切五彩缤纷的壮观景色，都是理所当然的。她讲得多么好啊！就像有些天天工作的人，他们习以为常，并不珍惜自己工作的权力。能为社会，为人民做点事，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幸福！”

1981年10月，海迪因为长年服用大量止疼片，药物中毒，间歇停止呼吸1小时50分，几天昏迷不醒。第五天她醒过来时，看见妈妈和妹妹坐在床边，高兴极了：我还活着。她用微弱的声音对妹妹说：“我不想死，我还有好多事要干呢！”

突然，她发现对面床上放着许多对大脑有抑制作用的药，生气地喊起来：“我不要，我不要，这都是破坏记忆力的。我的身体已经残废了，大脑再坏了，拿什么为人民做事情呢！”

一会儿，海迪又昏迷过去了。她断断续续地说着胡话：

“妈妈，我的书别弄乱了……”

“别打搅我，别说话，我已经背了几个单词了……”

第二天，海迪完全清醒了。她急忙要过纸和笔，手颤抖着，歪歪扭扭地写下了6个大字：

生命之树常青！

“太好了，我还能写字，我还能工作。我还能回到岗位上去给人民做点事情。”

在知识海洋里不断吸取生命的养料

青年们十分佩服，海迪三分之二的肢体病残了，没进过一天学校，却学得了丰富的知识，学习了英、日、德、世界语，甚至还翻译了13万字的英文小说。1981年参加高考预选，竟取得了436分的好成绩。她是怎样学习的呢？

海迪有个朋友，因考不上大学而懊丧，海迪鼓励她说：“成才不一定进有围墙的大学，社会大学的门时刻是敞开着的。”你可知道，就是这一点认识，海迪是经历了多少痛苦的磨难才得出

来的啊！

从5岁起，海迪就瘫痪在家，失去了上学读书的权利。学校、老师和书包，紧紧地吸引着这颗幼小的心灵。她爱听小朋友们讲在学校学习的故事，爱学唱老师教给的新歌，她梦见自己背着小书包和小朋友们一起走进了课堂。

但是，20多年过去了，玲玲还是没有跨进学校的大门。她以惊人的毅力，在床上自学了汉语拼音，学会了查字典，读书、看报、写文章。书，给了她知识，给了她力量，使这个寸步难行的姑娘插上了翅膀，在彩色缤纷的世界上翱翔。她在日记中写道：“大脑需要营养，除了在生理上需要血液的供应，在精神上还需要广博的知识去营养。否则，还是一个‘低能儿’。而我们青年一代如果不努力，出现‘低能儿’的可能性是有的，那便是一些不学无术的寄生虫。”

海迪不愿当“寄生虫”。像海迪这样的身体，躺着吃躺着喝，是不会受到任何谴责的，但是，海迪却要为社会作贡献，为人民做事情。她说：“要想给人民做点事，没有文化知识，没有真本领是不行的。80年代尤其是这样。”

小孟方的死，给了海迪深刻的教训，生活中无数次的遭遇一次又一次地教育了海迪。

在城关医院工作时，有位老同志拿着一瓶进口药，请她给翻译一下英文说明书。海迪笑了：“我连学校的门也没进过，怎么懂得英语呢？”

老同志失望地走了，海迪想：不懂，不懂为什么不能学呢？学会了英语，不是能做更多的事情了吗？

但是，海迪从来没接触过外语，又没有老师教，完全靠自己自学，实在太困难了。开始背单词时，她怎么也记不住。

“study 这不就是五个字母吗？为什么背了3天还是默写错了？唉，没上过学的人就是不行啊！”

她一抬头，看见墙上挂着一幅居里夫人的像，那双蓝色的眼睛仿佛在说：孩子，坚持下去！我们必须有恒心，尤其要有自信力。

“别人有学校，我有笨办法。” study study……她一连写了几百遍，终于默对了。就是从这种笨办法开始，她终于翻译出了13万字的小小说《海边诊所》。在学习的征途中，她的练习本足足有二尺高，上面密密麻麻布满了海迪磨炼的笔迹。每当她艰难地读完一本英语书时，她都要高兴地欢呼，有时把书扔上房顶：“我胜利了！”妹妹说：“别叫了，像个狂人似的。”海迪笑着说：“我付出了比别人多几倍的精力才学到这点知识，怎么能不高兴呢！”

自学容易，坚持难。对海迪这样的人，坚持就更难了。

动了第四次大手术后，海迪疼得无法忍受，她咬着被单在颤抖，朋友们心疼地说：“海迪，你哭吧，哭出声来就好受了。”但是，稍稍平静后，海迪却央求说：“让我看看书吧。”

她只能仰卧着，脖子不能朝左，也不能朝右，稍稍一动，都会揪心地疼。

“拿镜子来，放在床头柜上……替我翻开枕头边那本英语900句……”

镜子放着光。海迪通过镜子的反照，学着英语900句。周围的亲人和朋友，被感动得流下了热泪。用什么语言去赞颂她呢？还是用海迪自己的话说：

“只要心在跳动，我就要努力学习和工作，顽强地与疾病抗争，相信我是一个胜利者。用生命的火花去照亮通往未来的征程。”

回忆起这段往事，海迪低声对我们说：“我早有思想准备，将来有一天如果我全身瘫痪了，我要学保尔那样继续学习和工作。那时，英语不是可以帮助我翻译点东西，奉献给人民吗？”

讲到这里，海迪的眼里闪着光芒。她说：“一个人能发挥作用，能把学到的知识奉献给人民，这是最大的欢乐啊！”

源泉找到了。她的惊人的事业心，远比她惊人的毅力更加伟大。正是这种事业心，使她产生了正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

海迪对我们说：“我要像海伦说的那样，在知识的海洋里，不断吸取使生命之树常青的养料。”

“在生活的道路上，我也给自己树立了几个学习的榜样，他们时刻激励着我，遇到困难和问题时，我就从他们那里吸取力量。保尔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给群众治病时我常常想起白求恩；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时，我常想起居里夫人；在生活低沉阴郁的时候，我常鼓励自己要像海伦那样热爱生活。他们给了我丰富的精神养料，使我这个大半截身子失去知觉的人，充满活力，充满信心，充满希望。”

今天，张海迪的事迹正传遍祖国大地，深入青年的心。青年们将从她身上汲取精神养料，树立起自己坚强的人生支柱。

（原载 1983 年 3 月 1 日《中国青年报》）

评析：

一曲感人的生命之歌

孙喆喆

张海迪的生命之歌曾经唱遍祖国大地，张海迪的精神世界曾经激励鼓舞了一代青少年。该作着重从张海迪人生观的形成进行报道，探求这个三分之二肢体都已失去知觉的青年，是如何建立起一根坚强的生命支柱，在艰辛、曲折的生活道路上，唱出一支奋斗者之歌。

在正常人难以想象的种种困难面前，面对着一一次次挫折和打

击，海迪经受住一场场考验，一次又一次超越自己，跌倒了再站起来。通讯在追寻支持她生命的力量的过程中，真实展现了她的坚韧与不屈、她的内心和精神世界。她坚强的毅力和惊人的事业心让人为之肃然起敬，也必将激励更多的人。

这篇人物通讯的一大突破在于摒弃了先进人物高大全的模式，人物形象真实，个性鲜明。以往的通讯常常典型人物样样好，不会有缺点，不会有消极的想法和做法，给人不真实的感觉。作者并没有忽略掉海迪曾有的迷茫、软弱、消极与痛苦、甚至想要自杀的念头，而是真实描写她走过的心路历程，没有刻意地夸张和删减，所写的是一个既坚强有毅力，也有悲伤、孤独和绝望的真实人物。海迪自杀的一段文字非但不会有损海迪的光彩，反而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她经历的痛苦与挫折，感受到她克服种种困难、重新振奋起来的勇气和毅力，也更让读者感受到生命的可贵。

人的情感是永恒的，也是最感人的。通讯中，作者的情感与海迪的喜怒哀乐融为一体，字字见情，句句感人。作者记取了海迪人生历程中几个重要的转折点，感人的事迹，动心动情，让读者因她的胜利而喜悦，为她的痛苦而难过。

追 求

——记社会主义实干家、优秀知识分子栾蓓

樊云芳 丁炳昌

X光片子清晰地显示出在病人的左股骨与骨盆的衔接处，有一片发亮的物质，它侵蚀、破坏了周围的骨组织，它就是凶恶的肿瘤——骨癌。

北京某医院的一位鬓发斑白的主治大夫，放下片子摇了摇头说：太晚了，癌细胞已经扩散，按照常规，病人最多还能活两三个月。

大夫步履沉重地走到窗前，把前额贴在玻璃上，深深惋惜的目光，久久地凝视着庭园中央——这张X光片子的主人。

这个斜躺在手推车上的羸弱的病人，虽然下肢已经不能动弹了，但仍用两只手抓住椅子的扶把，艰难地、顽强地做着仰面俯卧撑。

这个病人刚从太原转来。病历卡上填着：栾蓓，52岁，太原工学院副教授、山西煤炭化工大学筹备组领导成员。大夫还清楚地记得，就在他入院的第二天，在给他作了困难的全身检查后，他们之间曾有过一次谈话。

“大夫，”栾蓓铅青色的嘴唇款动着，声音低微而清晰：“请您告诉我，我还有多少时间？”

“看你想到哪儿去了？你会好起来的。”

病人凄然一笑：“我只想知道，还有多少时间，我手头正在写作和翻译十来本科技书，还积累了30万张科技略语卡片……

出版社告诉我，这些书都是目前需要的。”

是的，“这些书都是目前需要的。”而他，更是祖国需要的。1949年，正在台湾大学读书的栾菲，怀着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热烈向往，逃脱了当局对他的迫害，从台湾回到了大陆。³¹年来，在他那既有过欢乐、也有过痛苦的生命途程上，布满了追求真理的足迹；在他那火热的胸膛里，始终跳动着一颗赤子之心。

把碧血溶进教育事业

栾菲在太原工学院化工系前后共主讲过 13 门课程，他把自己的碧血溶进一本又一本讲义，奉献给一届又一届学生。

有些课程，譬如说《物理化学》吧，本来有现成的教科书，如果照本宣科，也无可非议。但他不肯。他像一只辛勤的蜜蜂，到外国科技资料的百花园里，采集来世界各国在物理化学方面的最新的研究成果，采集来美国的、德国的、日本的、法国的几千例有代表性的习题，充实到新讲义里。他期望喝了这些蜜汁的大学生，能把他们探索的目光、攀登的标尺，定在珠穆朗玛峰的峰顶。

他亲自刻印讲义，这难道也是大学教师的事吗？不，他嫌雇来的人总是刻不好，就只有自己动手了。1960年，每天只有三个窝窝头充饥，他全身浮肿，经常饿着肚子在灯下刻了一张又一张。经他手刻印的 120 万字讲义，从第一页翻到最末一页，找不到一个漏字和涂改过的字，每一个词、每一张图表、每一个数字，都像铅印出来的一样，端正、清晰、准确！怪不得许多学生已毕业 20 年了，别的讲义都丢了，唯独舍不得丢他的讲义。他们说，不知为什么，一翻开栾先生的讲义，就会产生一种奋发上的力量。

他家的门永远朝着每一个学生、甚至每一个慕名而来求教的

不相识的人开放。不管白天晚上，也不管自己的事情多么紧迫，只要有人进来，他马上就搁下手里的事，来详尽地回答你的问题。你想编书？写论文？搞科研？好极了！他会翻箱倒柜，找出自己所收藏的有关书籍、文献。包括他利用出差机会从北京、上海等大图书馆里摘抄来的资料手稿，一并放在你的面前：“好好干，写成后，我帮你推荐出版！”这些刻意收藏的书籍，这些精心摘录的卡片，早已构成了他的血肉、他的细胞了，如今，他却慷慨地把它们分解出来，移植到别人身上去发挥活力。

坚韧的毅力 过人的精力

编译书籍，是他生命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他阅读英文、俄文、德文和日文，就像阅读中文那样流利；对于拉丁文、法文、意大利文、波兰文、荷兰文，他也略知一二。“文化大革命”中，在“牛棚”里，在“触及灵魂”又触及皮肉的批斗的间隙中，他还自学了西班牙文和世界语。后来，他又自学了丹麦文与挪威文。有人把他笔译的外文书籍、文献资料和科技影片数了一遍，有 15 个语种！

他哪来这么多时间和精力？他不也是个凡人吗？噢，从学生时代开始，他就有了夜读的习惯。这个夜读不是指读到 10 点、11 点，而是读到午夜以后，甚至通宵达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用这个古老的办法，使属于自己的生命延长了一倍。甚至反对过他的人，也承认他毅力超群，精力过人。

1958 年订“红专”规划的时候，他给自己提出了“三士”的目标：政治上的共产主义战士，常识上的博士，体质上的大力士。他是足球运动员，又是全院 5000 米长跑冠军。每天早晨，他举杠铃，练气功，晚上用冷水擦身。他自豪地指着身上一块块隆起的肌肉——这些肌肉就是举重运动员也要刮目相看的——

说：“看看，我将成为大力士，我要为国家工作 50 年！”

因为他会画画，所以常被拉差去搞展览会、搞壁报、搞宣传。有时忙完了回来，他也叹息：“唉，这太占时间了！”但转而他又自言自语：“不过这些也是党的工作，总得有人干呀！”于是，他又觉得占时间也值得，而且下次还照样高高兴兴地去，尽心竭力地干。

有一天，他上街钉鞋，那个孤独而穷困的老鞋匠向他诉苦：年老眼花了，生意不好。他听后去布店买了一块白布，花一个半小时画了一幅钉鞋广告，第二天，专程送给那个老头：“把它挂起来吧，生意会好一点的。”十年动乱中，“造反战士”们逼他交代“动机”。天啊，这类事情他随做随忘，何谈“动机”？

他的生命，有一小丁点儿属于花草与小动物，这就是他的娱乐。他曾把亭亭玉立的竹节海棠、肥厚碧翠的仙人掌、娇嫩艳美的紫罗兰杂种在一个大花盆里，然后自得其乐地打趣说：“看，这是我的西双版纳！”那一年，他回山东老家探亲，进门后，向久别重逢的老黄猫问好，还拉着它的两只前爪跳舞，哦，这个外表温文尔雅、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的学者，既爱他的讲义，也爱大黄猫；既醉心于探索知识圣殿的奥秘，也不忘情于领略西双版纳的诗情画意。

1977 年底，栾萐去山西大学联系工作，跌了一跤，第二天左膀就红肿起来。但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妻子，当时都没有在意。因为栾萐的身体是那样壮实，精力是那样充沛，而且他又刚刚被借调到省化工厅担任了实际上的副总工程师，煤炭代替讲义，迷住了他的心，他渴望在山西的土地上尽快立起焦化炉，铺设煤气管道，把热和光输送到全国各地。在这种时刻，他哪里还会理会什么扭伤呢？

过了几个月，膀关节的红肿有增无减。

一天早晨，栾萐推着车从楼道里出来。他想上车，但右腿不

听使唤，两次都没举起来。第三次他咬着牙，使劲一举，膝盖碰在书包架上，车把一歪，连人带车跌倒了。他把车推到墙边，先扶着墙坐上车，再一蹬，车往前走了。车轱辘在旋转，从西郊的太原工学院转到北郊的太钢，从太钢转到了南郊的山西大学。又从山西大学转到了煤炭化学研究所。晚上九点一刻，车轱辘转回宿舍楼，下车后的栾蓆扶着墙，左腿疼得钻心彻骨，右腿像灌满了铅，他简直连站也站不住了。

邻居的小孩敲着三楼二单元的門：“魏阿姨，快开门，栾叔叔在下面上不来了……”

妻子和孩子一左一右架着栾蓆，艰难地拾级而上。

夜晚，魏蕴瑜拿热毛巾敷在他的左膀上：“老栾，不能再拖了，明天一定要去医院看病。”

栾蓆正聚精会神地阅读《德国的煤炭综合利用》，魏蕴瑜伸手取走了书。他搔着卷发，抱歉地笑了：“对不起，明天恰恰没有时间，省里领导找我有事。”

在省委办公室。省委书记王大任对栾蓆说：“你前些时起草的《山西省煤炭综合利用刍议提纲》里，提到要创办一所煤炭化工大学，省委已经批准，你尽快起草一个建校实施方案。”

“什么时候要？”栾蓆的双眼闪闪发光。

“一星期之内，越快越好。”

栾蓆一回家就铺开了摊子，他案头的灯一直亮到天明。魏蕴瑜起床后一看，长达14页的建校方案已经誊写装订完毕，栾蓆正用红笔给封面加上精致的花边。

画完最后一笔，他兴奋地站了起来。但一阵痉挛性的疼痛像放电一样，从左膀射向下肢，他不由自主地跪倒在地上。

儿子和妻子轮流为他按摩左腿，平躺在床上的栾蓆双目紧闭，冷汗淋漓。

魏蕴瑜断然地说：“老栾，今天无论如何得去看病！”

栾蓆睁开眼睛：“不行啊，我得赶快把建校方案送到省委去。”他撑着床沿艰难地坐起来，下了地。

“呃，已经不疼了。不信？看我给你表演表演！”说着，他缩起左腿，竟然用一条右腿，跳了起来，从床边一直跳到门口。

7月，栾蓆的行动已经非常艰难了，但他还咬着牙，上北京向国家科委、煤炭部、化工部汇报建校事项，临走时，他竭力安慰忧心忡忡的妻子：“不要担心，这次汇报回来，我一定去看病。”

但谁能料到，他回来的第二天就躺倒了，从此就再也没有站起来……

把最白最亮的丝留给人间

一条春蚕，一生中最大的事情就是吐丝，吐完了丝，结完茧，它就安安静静地进入了长眠，而把柔软的、洁白的、光亮的丝留给人间。如果丝还没有吐完，就要被迫离开这个世界，它，一定会感到“此恨绵绵无尽期”。

不是吗？就为了有朝一日，能为生养自己的母亲——亲爱的祖国吐出最白、最亮、最细软的丝，栾蓆曾咬着牙熬过了昨天。

这里记述的就是“史无前例”的昨天发生的故事。

夜，台灯映照着脸盆里的水，水渐渐地由清变红。魏蕴瑜用手巾蘸着水，替趴在桌上的栾蓆揩洗颈脖上的血迹。原来，这天下午，“大特务”、“大洋奴”栾蓆，脖子上用细铁丝挂着暖气片，被棍棒驱赶着跑步，细铁丝深深地嵌进了皮肉。

换上了干净衬衣的栾蓆，替妻子擦去泪花。他从地下拾起撕成一页一页的手稿，找出针线，仔细地装订着；拾起散乱的科技略语卡片，重新分放到一个个木箱子里。

手稿、卡片、木箱，一齐在魏蕴瑜眼前跳动着，她的思绪却

坠入往事的回忆，耳边响起了栾蓓的声音：

“我想编一本科技略语词典，为科技工作者提供一个工具。”在汾河岸边的槐树林里，年轻的工学院助教拉着新婚妻子的手一边漫步，一边轻声细语地叙说自己的计划。

“略语词典？”魏蕴瑜眨着眼。

“是呀，我国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词典，可人们一翻开外国科技文献，就感到非它不可。”

“可编词典要有渊博的常识，你能胜任吗？”这个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生的声音是温柔的、甜美的。

栾蓓的脚步放慢了。“试试看吗。”他突然转过身含情脉脉地望着妻子的明眸：

“你帮着我——我们一起搞，好吗？”

“我能行吗？”她想，但话到嘴边，却变成了“试试看吧。”

两人拉着手相视而笑了。

为了收集科技略语，他们真可谓读破万卷书！一个又一个节日、星期日、寒暑假，都毫不吝惜地贡献给了图书馆。为节省来回奔波的时间，栾蓓常常带上冷馒头和萝卜条，中午就央求管理员把他反锁在阅览室里，看书一直看到晚上。每次出差回来，他首先要做的，也就是从提包里取出包扎得里三层、外三层的略语卡片。当然，这些卡片一如他的书稿和讲义，端正、清晰、准确，就像印刷出来的一样。

卡片越积越多，从抽屉转到木箱，又从一个木箱分装到几个木箱。

一次，栾蓓带了一部分卡片到某出版社，出版社的编辑简直抱住箱子不肯放了：

“您稍加整理，就可出版了！据我所知，还没有人收集得这样全的！”

但他还迟迟不肯出手，他还要努力收集，希望奉献给科技工

作者一本最好、最完整的科技略语词典。

可现在呢？木箱子被当做“四旧”踢翻了，卡片遭到践踏，收集卡片的人被打成了“特务”、“洋奴”……

其实，栾蓁心里，此刻也在经历着九级风暴。

下午，“造反派”逼问他，“你为什么不去美国留学，要回山西来啃窝窝头？”

他该怎样回答？

是呀，他当时可以有很多选择。高才生，又通晓英、德、日三国文字，如果去美国留学，凭着他的刻苦好学、坚韧不拔的精神，也许已经在某一门学科上取得了成就，鲜花和荣誉会在他面前铺开一条个人幸福之路。

但是，人要有人格，国要有国格。为了使外国人不再像观察牲口一样看他的同胞，为了使他们也用平等的、友好的、尊敬的口吻谈论他的祖国，他回来了。他的最大心愿就是为她贡献自己的知识和才能。

“特务”？可笑！他是一个穷学生，父亲是个小职员，家庭生活的拮据使他过早地学会了自立，中学毕业的他，曾经在美国驻台湾新闻处当过三个月临时代理编辑，这就是“特务嫌疑”的全部根据吗？

审查吧，批斗吧，他只有一句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他不相信党会嫌弃一个从台湾归来的赤子。

尽管白天被批被斗，已经精疲力竭了，而深夜回到家里的时候，仍然是夫妻俩最忙碌的时刻。栾蓁在书桌、书柜与床之间拉起密密麻麻的铁丝，挂上他心爱的卡片，一面翻阅资料，一面不断地往里补充；坐在一旁的魏蕴瑜，专心地在外文打字机上替他打各种书稿。

.....

可是谁能料到，这条吐丝的春蚕已经在作最后的贡献了。

虔诚的“遗愿”坚强的信心

接到栾蓓病危的电报，太原工学院党委作出了两项决定：第一，立即向山西省委有关领导汇报，向各方面呼救；第二，委派化工系总支书记王玲赶往北京，探望栾蓓。

此时此刻，这个垂危的病人在想些什么？会说些什么？作为党组织的代表，见面后该如何去安慰他？鼓励他？王玲思绪万千，恨不得一步跨到栾蓓面前。

看来，栾蓓对王玲的到来期待已久，一见面，他黯淡的眸子突然焕发出光彩，苍白的面颊也激起淡淡红晕。

“老栾，党委派我来看望你。”王玲的眼圈红了。

“谢谢党组织。”栾蓓低声回答。

“同志们都很想念你。”

“谢谢同志们。”

.....

突然，栾蓓用冰凉而颤抖的手抓住了王玲的手腕，嘴唇抖动，语音呜咽：

“老王，来不及了。”

“什么来不及了”

“我活着，来不及做一个党员了。我要求过多次，党说要接受长期考验。来不及了，再考验也只有两个月了。”

“.....”

“是党，给了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以理想和信仰，我多么希望能在国旗下宣誓。我死后，请求组织上审查我的历史和全部工作，我总算追随共产党 30 年……”

这个虔诚的“遗愿”，像一团烈火，烘烤着同志们的胸膛，多少平凡而动人的往事像潮水一样从同志们眼前涌过。

化工系的教师们怎能忘记，在“牛棚”里关了四年的栾萐，上午刚宣布“解脱”，晚上就给党支部送来了第六份入党申请书。

第二天，他又接受任务，高高兴兴地到北庄农场当食堂管理员去了。为了给大家办好伙食，栾萐经常推着自行车，翻过一道陡坡，到20多里外的屠宰场买猪下水。他挽着袖子，帮工人们宰猪、刮毛、剔骨。于是他受到优待，满载而归。

他给大伙熬骨头汤，撇出浮油炒菜，把猪下水做成五香肠、猪头肉。这一来，大伙碗里的内容大为丰富，原来要求调到山下的同志也舍不得走了。

一天晚上，一个同志走过栾萐住的库房，只听见里面有个小孩哭得声嘶力竭，他进去一看，原来是栾萐刚接来的儿子，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他陪着孩子焦灼地等着，快到一点了，栾萐还没有回来。

终于，门外有了自行车的响声。他急忙迎出去，果然是栾萐。好家伙，栾萐的车把上挂着盛猪血的洋铁桶，书包架上横一根木棍，挂着两大堆猪头、猪肝、猪骨头，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少说也有百把斤！

等车推进房里，那个同志更发愣了，只见这个学者的衣服上粘满了猪血、猪毛，脸上由汗土和泥水画出了一道道“蚯蚓”。

但栾萐却微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

那个同志本来已准备好一连串责备的话，现在，他什么都明白了：这个关了四年“牛棚”的“特务”，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

煤大教师张正端的书桌上有几封信，他反复地看着、读着，耳边回荡着老师亲切的声音：

“知道你们这些年无论是在科室还是在车间，都能坚持学习，使我很受鼓舞。”“你们要编《换热器及其计算基础知识》一书，方向是正确的，也符合客观需要，我鼓励你们踏实地前进，我愿

与诸位一道学习。”“希望你们这个可贵的青年集体，有所建树！”

栾萐的这些信写于 1973 年。当时，还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编科技书是有罪的。在编书的困难中，这几个年轻人想起了母校的老师栾萐。于是，就去信请教，很快收到了栾萐热情洋溢的回信，还收到一些资料摘录手稿和《换热器的计算》这本俄文书。

过了几天，张正端去栾萐家，一老一少，就换热器问题接连谈了 7 个半小时。

夜 10 点 3 刻，张正端向老师告别，栾萐把他送到门外。

“对了，关于换热器的分类，我还要说几句。”他拉住张正端，在家门口又滔滔不绝地说了一个小时。

他把张正端送到楼下，刚要握手告别，忽然又想起了：“你们注意，书要写得实用、通俗，让工人们一看就懂……”想要打断他的话是不可能的，张正端站在楼梯口，又听他讲了半个多小时。

这一次，他们真的握手告别了，互相道了“再见”。但张正端刚走了几步，栾萐又追了上来：“等一等，关于换热器的计算，我还要谈五点。”

午夜一点半。在空旷的马路上，在幽静的路灯下，栾萐在起劲地讲着，张正端在认真聆听，并掏出本子用心地记着。

现在，书已经出版了，但支持过、扶植过这本书的人却倒下了。在张正端的心中，栾萐永远是他们的良师益友，做人的榜样。

1970 年，工学院迁回太原，当栾萐得知太原工学院的老院长赵宗复跳楼身亡，遗下孤儿寡妇生活艰难的情况后，悲愤交加。他私下里对有的同志说：“赵院长不是自杀，是殉节！应该在他死的地方立一块碑！”他说，说赵院长是叛徒，打死我也不信，他德高望重，平易近人；他学识渊博，不耻下问；他知人善

任，爱惜人才，难道会有这样的“叛徒”吗？难道能这样对待一个曾经为革命事业流过鲜血的老同志吗？

在那封建法西斯专政的年月，竟冒天下之大不韪，栾蓐每月挤出 10 元生活费，寄给这个“叛徒”的家属。

1971 年的大年初一，漫天大雪，赵家老老小小都瑟缩在冷冰冰的家中，闭门不出。自从老院长出了事，这个家庭好几年没来一个“拜年”的客人，他们自然也不敢把“晦气”带给别人。

突然，门开了，进来了一个披着满身雪花、冻得嘴唇发紫的人，就是栾蓐，他特意从 20 里外赶来。

“你……”老太太的嗓子哽塞了。”

“我来接小禾禾去我家过年。”栾蓐亲切地把已故老院长的小女儿拉到身边，抚摸着她的头发，巡视着这间破烂、阴暗的屋子。

老太太说不出话来，只有用一串串的泪水接待这位客人，不，不是客人，是亲人！是一个久别归来的亲人。

等老太太安静下来，栾蓐告诉她，自己已经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反映赵家的困难，信寄的是挂号，还署了姓名，周总理一定会收到的。

“这样要连累你的！”赵宗复的老伴大惊失色。

“不写，我们也连在一起了。”栾蓐淡淡地一笑：“不是说‘叛徒’、‘特务’是一丘之貉吗？”

信，由国务院办公厅批转太原工学院。因为信里写的都是事实，加上上头有批示，栾蓐没有遭祸。同志们每当讲起这件事，都要翘起大拇指，说：“他，是这个！”

听了太原工学院的同志对栾蓐情况的汇报，一贯沉静稳重的山西省委书记王大任，显出了少有的激动。他轻轻地，像是对自己，也像对别的同志说：“如果我们每个党员，都像栾蓐同志那样……”

过了几天，副省长王中青亲自给工学院党委送去了王大任的信。信中建议工学院党组织讨论吸收栾萋入党的问题，要在生前解决，不要在死后追认，“他现在最需要的是组织的温暖”。

“我还能对党做些什么呢？”

明天就要开支部大会了。下午，党支部把入党志愿书送到栾萋手中。此时，他已从北京医院转回太原，躺在家中。

晚饭后，他让魏蕴瑜扶自己坐在书桌旁。左膀是“禁区”，只有右半个臀部可勉强靠着椅子，他就那么半蹲半坐地趴在桌上，填写入党志愿书。

看他实在吃力，魏蕴瑜说：“让我来替你填，我会跟你一样认真的。”但他毫不迟疑地拒绝：“不用，这是我一生中的大事，我要自己填。”

就像小学生临摹正楷，每一点、每一勾都那样认真；又像在雕刻一块洁白的玉石，要把自己的感情全部灌注到这件珍品中去。

坐在一旁的魏蕴瑜时时停下手里的织针，凝视着这个熟悉的侧影。不知为什么，泪珠总在她的眼眶里打转。

随着小闹钟的滴答声，时针指到11点、12点。“睡吧，明天发病可了不得！同志们都知道情况，填不完，不会责怪你的。”

时针指到了午夜一点半，栾萋搁下了笔。他搓揉着双手，苍白的脸上，漾起了满意的笑容。

第二天漱洗完毕，他指着身上的旧衣服说：“今天这个日子，我不能就穿这个吧？”魏蕴瑜理解他的心情，从箱子里取出了一套簇新的中山服。他把风纪扣扣好，衣领拉平，然后就端端正正地靠在躺椅上，等待着同志们的到来。

这时，才刚刚7点。

8点1刻，支部的同志们到齐了。

入党志愿书从一双手传到另一双手，党员们默默地交换着深沉的目光。

支部会开了很久，直到11点57分，卧室的门才又打开了。魏蕴瑜进去时，大家正一一跟栾萑握手告别。每个同志握手时间都很长、很长。最后，栾萑提出了一个要求：

“新党员都要宣誓的吧？到时候，你们一定要把我抬去，拄着拐杖，我还能站一会儿的。”

把客人们送走，魏蕴瑜冲到丈夫跟前：“老栾！”

栾萑颤颤巍巍地把七页记得满满的纸送到妻子手里，他的声音也因激动而变得沙哑了：

“同志们对我的评价太高了！我很惭愧，很惭愧！”他拉过妻子温暖的手掌贴到自己的面颊上，轻轻地抚摸着：“蕴瑜，我还能对党干些什么呢？”

垂危中，他给王大任同志写了关于山西省工业体制改革的建议书，给煤大起草了长达一万多字的《煤大办学思想》，给煤大的领导干部写了煤炭化工方面的科普知识，给……

医生、护士常常立在栾萑的床前，久久地凝视着一幅幅难以想象的情景：

熬干了生命之油的躯体，大面积的溃疡，十几处癌肿，但他还在不停地写着，写着……

胸水引起的喘息和咳嗽，任何止痛药都止不住的剧痛，但他还在写着，写着……

纸夹子在刀刃般突起的肋骨上抖动，铅笔在手指间打滑，不时地滑落到被褥上，但他还在写着，写着……

他，是个多么坚强的人啊！他哪来这样的毅力？人们由惊异转为崇敬，一个个含着眼泪离开。

一个朋友来看他，他从枕边取出一张前些时画的《煤大校舍

鸟瞰图》，请朋友提意见。

在花木葱茏的校园里，除了教学楼、图书馆等建筑外，还有室内体育馆和游泳池，还有外籍教师和学生的宿舍，还有一个庄严的纪念馆。

朋友的手指停在纪念馆上，眼睛里显露出疑惑不解的神色。

栾蓆如数家珍地叙说着：这里要陈列历届学生的毕业论文与毕业设计，以及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创造的成绩，它们可以激励在校的学生奋发学习，为国争光！山西不仅要成为国家的能源基地，而且要为国家输送第一流的煤炭化工专家。到时候，国际煤炭化工学术讨论会将在中国召开，这里将吸引各国的专家和学者

栾蓆的声音越来越微弱，嘴角却挂着动人的微笑。看看这幅生气勃勃的“鸟瞰图”，再看看奄奄一息的栾蓆，那个朋友只觉得一股热浪涌上喉头：老栾啊，这是你毕生追求的理想，一个多么可贵的理想！

喘过一口气，栾蓆把目光移向药柜，那上面放着一封他的长子、北京化工学院学生东东的来信。

他的嘴唇款动着：“东东，东东……”

妻子把信拿到他眼前：“你想看这封信吗？”

他摇了摇头。

“想叫东东回来看看你吗？”朋友急切地揣摩着他的心思。

栾蓆还是摇头。他睁大眼睛，吃力地吐出几个字：

“叫他……毕业后回山西工作，不要……留恋大城市……”

魏蕴瑜吞咽着眼泪，用力点点头。朋友倒了一杯开水，端到他嘴边：“老栾，你不要再说话了，你……”

栾蓆用颤抖的手推开了杯子。“我的遗体，”他喘息着，“交中华医学会，让医务人员作科学研究吧，这……也是我对国家的最后……一点心意了。”说完，他合上了眼皮，咳着，喘着，但

再也不说什么了。

1981年1月23日，这是一个阴冷的日子。经过十几小时的昏迷之后，祖国的忠贞儿子、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栾蓐，终于停止了心脏的跳动。

当同志们把哭得昏迷的魏蕴瑜从栾蓐的遗体上拉开时，‘他们自己也泣不成声了。

噩耗传到太原工学院化工系，师生们中断了学习，驱车赶到医院。在医院后门口，载着栾蓐遗体的灵车已经启动，正要驶向中华医学会山西分会。经要求，灵车停了下来，人们排着队向尊敬的战友作最后的告别。

人们的泪眼凝视着栾蓐形销骨立的遗体，凝视着他安详严肃的遗容，只见他永远思索的眼睛还微微张开着。

老栾啊老栾，是什么使你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是因为你还没有编完科技略语词典？是因为山西人民还没有用上煤气？是因为山西还没有为国家提供更多的能源？还是因为你没有看到煤大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人才？

悲恸像翻滚的波涛，汹涌在同志们的胸间，他们脱下帽子，向战友深深地鞠躬，再鞠躬。

灵车徐徐启动。寒风吹过，路边的白杨树摇曳着枝干，发出金属般的响声。

（原载 1981年3月26日《光明日报》）

评析：

揭示模范人物的人性之美

汪凯

通讯《追求》向人们展现了一位优秀知识分子的人物形象。

栾蓐的材料很丰富而且是关于他不同方面的，因此驾驭起来有相当难度。对这一点，作者是这样处理的：通过五个小标题将材料分成不同的侧面来展现栾蓐的性格和精神境界，但同时又紧扣主题“追求”。整篇作品一以贯之，一气呵成。

就通讯的写作技巧而言，本文还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注意：第一，用最能代表人物个性的言行来刻画人物。譬如“行”的方面，文章写到了栾蓐编辞典、与来求教的学生“十八相送”、接老院长的女儿回家过年等事情，分别表现了他作为知识分子对祖国的奉献精神；作为老师对年轻一代科技人员的关怀与支持；作为同事和作为朋友的金子般的真诚、正直和人性之美。再看“言”的方面，对栾蓐的最后时刻，作品有段感人至深的描写：栾蓐正在填写入党志愿书。看他实在吃力，魏蕴瑜说：“让我来代你填，我会跟你一样认真的。”但他毫不迟疑地拒绝：“不行，这是我一生中的大事，我要自己填。”所谓言为心声——正是通过极具个性的语言，作品充分展现了栾蓐的内心世界。第二个特点是作品善于在矛盾中表现人物的性格。“英雄人物的性格总是从斗争中间发展的。没有斗争，也就不会产生英雄”（茅盾语）栾蓐与恶劣环境（“文革”）的抗争，与病魔的抗争，成为栾蓐性格的最佳展示——无论如何，他从不忘记自己的追求。通讯的第三个特点是大量的细节描写，例如文中的一段“……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还在写着……纸夹子在刀刃般突起的肋骨上抖动，铅笔在手指间下滑，不时地滑到被褥上，但他还在写着写着

一个不屈不挠的形象跃然纸上。细节描写使人物更显血肉丰满，大大增加了作品的感染力。

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

何平 朱幼棣 陈雁 陈维伟 魏武 王世亮

也许，岁月能改变山河，但历史将不断证明，有一种精神永远不会失落。崇高、忠诚和无私，将超越时空，成为人类永恒的追求。

也许，时间会冲淡记忆，但人们绝不会忘记，20世纪90年代，有这样一位共产党员，他的理想，他的信念，他的人格，他的情操，使千万人的心灵为之震撼。

他，就是原中共阿里地委书记孔繁森。他把自己的一腔热血洒在西藏高原。

两次进藏，历时十载。 在党的召唤面前，在人生的选择中， 他的精神境界一次次得到升华

1993年4月4日，孔繁森告别拉萨赴阿里上任。

越野车载着他，向西急驶而去。车窗外，油画般的高原景色一幕幕掠过：清澈的拉萨河，奔腾的雅鲁藏布江，高耸的雪山，明镜般的湖水……孔繁森热爱西藏的山山水水，但此时却顾不上欣赏这高原美景。伸向远方的莽莽苍苍的路，多么像人生之路。回顾过去的路，思谋未来的路，他的心早已飞向了阿里。

孔繁森先后两次进藏，这时已在高原工作6年。按说，他现

在应该东进返乡。然而，他却接受了一项更艰巨的任务，驱车向西，奔赴自然条件更恶劣的地区，挑起阿里地委书记的重担。

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高寒缺氧，气候恶劣，而阿里又是西藏最艰苦的地区。那里平均海拔 4500 米，空气中的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一半，最低气温摄氏零下 40 多度。民主改革前，野蛮的封建农奴制严重束缚了当地生产力的发展，藏族群众的生产与生活长期处于原始状态。民主改革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阿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当地的经济的发展仍比其他地区缓慢，群众生活仍比较贫困。那里更需要像孔繁森这样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自治区领导同志征求孔繁森的意见时，他坚决而干脆地回答：“我是党的干部，服从组织安排。”

像这样的工作调动，孔繁森经历过多次。每一次，他都把党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的惟一选择。

孔繁森 1944 年出生在山东聊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他参军、入党，后来转业到地方工作。1979 年，国家要从内地抽调一批干部到西藏工作，当时担任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孔繁森欣然赴藏。他并非不知道西藏天高地远，并非不知道那里生活艰苦，并非不知道远离家乡和亲人意味着什么。但他更清楚地知道，这是祖国和人民的需要，这是党的召唤。

从踏上青藏高原那天起，孔繁森就暗下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祖国这块神圣的土地，献给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孔繁森进藏本来是作为日喀则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选调的，报到后，区党委见他年轻体壮、意气风发，决定改派他到海拔 4700 多米的岗巴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征询他的意见，回答仍很痛快：“我年纪轻，没问题，大不了多喘几口粗气。”那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为了在农牧区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领群众

脱贫致富，他亲自到一个乡试点，又把经验在全县推广。在岗巴3年，他几乎跑遍了全县的乡村牧区，每到一地就访贫问苦，宣传党的政策，和群众一起收割、打场、挖泥塘，与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有一次，他骑马下乡，从马背上摔下来，昏迷不醒。当地的藏族群众抬着他走了30里山路，把他送到医院抢救。当他从昏迷中醒来时，看到很多藏族群众守护在身边。1981年，孔繁森奉调回山东离开岗巴时，藏族同胞依依不舍地含泪为他送行。

在西藏工作3年，孔繁森深深爱上了这片壮丽、神奇的高原，深深爱上了这里的藏族人民。同时，他也深深感受到当地群众要求改变贫穷面貌的迫切愿望。回到山东后，他曾表示：“我这条命，是藏族老百姓给捡回来的。如果有机会，我愿再次踏上那片令人终生难忘的土地，去工作，去奋斗！”

光阴似箭。1988年，工作几经调动的孔繁森已担任聊城地区行署副专员。这时，又一次严峻的考验摆在他面前。

这一年，山东省在选派进藏干部时，认为孔繁森政治上成熟，又有在西藏工作的经验，便准备让他带队。组织上问他有什么困难，他还是那句话：“我是党的干部，服从组织安排。”其实，孔繁森心里很清楚，家里确有不少困难：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如从前了；年近九旬的老母，生活已不能自理；3个孩子尚未成年，需要有人照看；妻子动过几次大手术，体弱多病。自己一走，全家的生活重担又要压在妻子一人肩上。他不会忘记第一次进藏时家里的情景，里里外外都是妻子操劳。有一次，她去刨地瓜，5岁的儿子没人照着，掉进地窖里爬不上来……孔繁森觉得对不起妻子，对不起孩子。

一天，孔繁森对妻子王庆芝说：“我带你和孩子们到北京玩几天吧！”妻子感到很奇怪：别说是去北京，就是在聊城，繁森也从来没闲空陪自己和孩子们出过门，这一次是怎么了？带着疑

惑的心情，王庆芝和孩子们跟着他到了北京，游览了天安门和长城。途中，孔繁森话里有话地对妻子说：“到了北京，就等于走遍了全国。以后我无论走到哪里就像到北京一样，你和孩子们别牵挂。”听了这番话，王庆芝似乎有了某种预感。从北京回到聊城后，孔繁森一直在想怎样对妻子开口。一天夜里，他终于鼓起勇气说：“庆芝，组织上又安排我进藏了……”话还没说完，王庆芝的眼泪已像断了线的珠子滚落下来，看着妻子难过的样子，孔繁森的心里也一阵阵发酸。他动情地说：

“庆芝，我欠你的太多太多了！等从西藏回来，我一定会加倍地补偿。”

“你就放心去吧”，王庆芝抽泣着说，“一个人出门在外，好好保重身子。”那些日子里，王庆芝一边为丈夫收拾行装，一边悄悄地抹泪。

要走了，孔繁森默默地站在母亲面前，用手轻轻梳理着母亲那稀疏的白发，然后贴在老人的耳朵旁，声音颤抖地说：

“娘，儿又要出远门了，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要翻好几座山，过好多条河。”

“不去不行吗？”年迈的母亲抚摸着他的头舍不得地问。

“不行啊，娘，咱是党的人。”孔繁森的声音哽咽了。

“那就去吧，公家的事误了不行。多带些衣服、干粮，路上可别喝冷水……”

想到也许这是同年迈多病的老母亲的最后一面，孔繁森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情，“扑通”跪在母亲面前；“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娘，您要多保重！”说完，流着眼泪给母亲深深磕了一个头。

无情未必真豪杰。为了党的事业，孔繁森把对家乡、对亲人的爱深深地埋在心底，把博大无私的爱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1988年，孔繁森第二次进藏后任拉萨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和民政工作。任职期间，他跑遍了全市8个县区的所有公办

学校和一半以上乡办、村办小学，为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殚精竭虑。1991年，一次车祸把他摔成了严重的脑震荡，颅骨骨折，高烧昏迷。住院治疗期间，一天，他得知一所学校发生了问题时，便不顾高烧未退、眼睛充血。骑着自行车赶到学校现场处理。在他和全市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拉萨的适龄儿童入学率从45%提高到80%。

这一次，听说孔繁森要延长在藏时间到阿里工作，有的同志劝他：你是山东的干部，已经先后两次进藏，该吃的苦也吃了。凭你的政绩和能力，回去一定可以干得更好、进步得更快。听了这话，孔繁森的神情顿时严肃起来：“怎么能说我是山东的干部呢？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哪里工作都是党的干部。越是边远贫穷的地方，越需要我们为之去拼搏、奋斗、付出，否则，就有愧于党，有愧于群众。”

从拉萨到阿里地委、行署所在地狮泉河镇，将近2000公里坎坷不平的路程。孔繁森离开拉萨两天后，进入阿里地区措勤县境。藏北大草原那雄浑、壮美的景色展现在他面前：远方，绵延起伏的雪山在蓝天的映衬下格外壮丽，广袤无垠的草原一直伸展到遥远的天际。近旁，一座座用石块垒成的玛尼堆披挂着祈祷吉祥的五彩经幡，一堆堆高寒地带特有的红柳丛在阳光下像火一样耀眼。天空，时而白云朵朵，时而乌云密布；原野，时而大雪纷飞，时而风沙弥漫……

孔繁森是一个感情丰富、兴趣广泛的人，喜爱读书、写诗和摄影。眼前这一切，使他激动不已。为了祖国西南边陲这神圣的土地，多少先辈曾在这里奋斗拼搏、流血牺牲。如今，党把自己派到这里，这是多么光荣而又艰巨的使命。一种崇高的责任感和神圣的使命感在他心中油然而生。

进入阿里地界，孔繁森的调查研究也开始了。当天夜里，他风尘仆仆地到达措勤县委所在地。第二天上午，他不顾旅途劳

累，召集县委、县政府的干部开会，听取汇报，并结合贯彻党的十四大会议精神，商讨如何发挥当地优势，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途径。随后，他又去看望和慰问驻当地的武警部队官兵。

经过对沿途措勤、改则和革吉三个县的实地调查，孔繁森透过这些地方贫困落后的现状，看到了当地蕴藏的巨大优势，即：丰富的畜产品和矿产品资源。他兴奋地对同行的同志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的经济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时期，对原材料的需求将进一步增长。这对有着丰富资源的阿里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发展契机。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加快阿里经济发展的步伐。”

为了寻找阿里的发展优势，全地区 106 个乡，他跑了 98 个，雪域高原上留下了他的深深足迹。风雪中，他把自己的毛衣脱给一位藏族老阿妈……

孔繁森到阿里后，40 多封请求调离的报告摆在了他面前。这对人才奇缺的阿里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重重心事加上高山反应，使孔繁森彻夜难眠。他索性把住在近旁的地委秘书长叫了过来。没有电，两人就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亮聊了起来。

孔繁森说：“要求调走的那些同志在阿里工作了多年，这本身就是一种奉献。现在，他们申请调离，主要是对阿里的前途缺乏信心。我看，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阿里发展的突破口。小平同志说过，发展是硬道理。只要我们用发展这个硬道理来凝聚人心，调动干部们的积极性，为他们提供施展才干的舞台，就一定能把阿里的经济和各项事业搞上去。”

这一夜，他俩谈地区的工作，谈当地的优势，谈阿里的未

来，越谈越兴奋。电池用完了再换上一节，炉火不旺了再添上几块焦炭，一直到曙光初露。

4月25日，孔繁森主持召开地委、行署联席会议。他给大家布置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寻找阿里发展的优势，从困难中寻找光明的前途。

会后，孔繁森和地委、行署其他领导成员分头带队到基层调查研究。

到阿里赴任前，孔繁森已把自治区的各有关部门跑了个遍，将阿里地区的自然概况和历年来经济统计数字都抄在笔记本上。为了进一步摸清阿里的情况，他一个县、一个区、一个乡地跑。从措勤到札达，从普兰到日土，实地考察，求计问策，寻找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路子。在阿里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从南方的边境口岸到藏北大草原，从斑公湖到喜马拉雅山谷地，全地区106个乡，他跑了98个，行程8万多公里。

阿里地广人稀，面积30.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山东省，而人口只有6万多。有时，开着越野车在空旷的荒野上奔波一天也看不到一户人家、一顶帐篷。饿了，他们就吃口风干的牛羊肉；渴了，就喝口山上流下来的雪水。旅途虽然艰苦，但孔繁森却风趣地对随行的同志说：“高原上的水绝对没有污染，是世界上最优质的矿泉水，等开发出来得用美元来买呢！”他那乐观的情绪，常常感染着周围的同志。

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在高原生活，一场严重的感冒有时也会夺去一个人的生命。而孔繁森恰恰一到阿里就感冒了，咳嗽不止。为了不耽误工作，他就大剂量地服药。病情重了，就一边输液，一边工作。一个多月下来，体重减轻了14公斤，由于过度劳累，他的直肠纤维瘤复发，鲜血浸透内裤，可他一直瞒着别人。等大家都入睡后，他才把内裤换下，悄悄洗干净。

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阿里经济发展的思路在孔繁

森的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在地委、行署联席会议上，孔繁森列举了阿里发展的六大优势：畜产品优势、矿产品优势、旅游优势、边贸优势、政策优势、人口少的优势。

“率领群众致富，是我们的天职。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应当与人民同甘苦、共命运。这样，我们党才有威信，国家才有希望。阿里虽说偏僻落后，但发展潜力也很大。关键是要带领群众真抓实干。我有信心和全地区人民同舟共济、艰苦创业，共同建设一个文明、富裕的新阿里。”

孔繁森激情满怀的讲话，使在场的干部热血沸腾。

艰难困苦，对于弱者来说是可怕的，而对于坚强的共产党人来说，则往往是一种无声的召唤。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1994年初，正当孔繁森带领全地区人民为实现阿里发展的宏伟蓝图而奋斗时，一场罕见的特大暴风雪席卷了阿里高原。

漫天大雪，吞没了农田、牧场和村庄。凛冽的寒风，把各县受灾的消息传到狮泉河。

“立即行动起来！到灾区去，到群众中去，组织抗灾，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在孔繁森的带领下，地委、行署迅速组织了十多个工作组分赴各灾区。厚厚的积雪封死了道路，他们就用铁锹挖，用汽车碾。大家只有一个信念：尽快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灾区。

在革吉县和改则县，孔繁森目睹了暴风雪给牧民造成的严重危害：大片大片的牧草被冰雪覆盖，成群成群的牲畜因冻饿而死，许多群众陷入缺衣少粮的困境。

孔繁森的心在颤抖！

他挨家挨户地走访灾民，分发救济粮和救济款。风雪中，他高声地鼓励大家：“有党和政府在，再大的灾害也压不垮我们。我们一定能帮助大家渡过难关！”

2月26日，孔繁森来到受灾最严重的革吉县亚热区曲仓乡。

这里海拔 5800 米，是阿里最高的一个牧业点。乡党委书记嘎玛钦尧愁眉不展地说：“大雪连续下了一个星期，最深的地方没到膝盖。全乡有 8 人被冻伤，牲畜大部分死亡。”

孔繁森心情沉重地把全乡每户牧民的损失情况一一记在笔记本上，然后用坚定的语气对嘎玛钦尧说：“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保护人。先保人，再保畜，一定要把群众的情绪稳住，团结起来同灾害作斗争，尽量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雪花在凛冽的寒风中狂飞乱舞。一会儿功夫，大家都变成了雪人。人们穿着大衣，还是感到阵阵发冷。脸、手和脚都被冻得失去了知觉。孔繁森看到一位藏族老阿妈把外衣脱给了在风雪中哀嚎的小羊羔，自己却在摄氏零下 20 多度的严寒中冻得瑟瑟发抖，他的眼睛湿润了。他用手捂住脸，强忍着不让泪水流出来，猛地转身回到越野车上脱下自己的一套毛衣毛裤，递给那位老阿妈，老阿妈伸出已经冻僵的双手，接过那还带着体温的毛衣，嘴唇颤抖着久久说不出一句话。

顶风冒雪，孔繁森背着他每次下乡都随身携带的小药箱，走村串户，慰问受灾群众，给被冻伤的牧民们看病。他早年在部队医院当过兵，粗通医术。来西藏工作后，为了解决当地缺医少药的困难，他做了大量工作。每次下乡前，他都要买上几百块钱的药，为农牧民看病治病。一次，有位 70 多岁的藏族老人肺病发作，浓痰堵塞了咽喉，危在旦夕。当时，没有其他医疗器械可用，孔繁森就将听诊器的胶管伸进老人嘴里，又对着胶管将痰一口一口地吸出来，然后又为老人打针服药，直到转危为安。

雪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紧。长时间的高山反应，持续不断的超负荷工作，使孔繁森本来就带病的身体更加虚弱：他感到眼前阵阵发黑，身上不住地冒虚汗，但还是坚持着给冻伤的牧民一一做了检查。尔后，又把解决曲仓乡受灾牧民的搬迁、转场和买牛的资金及口粮、油料等问题一一研究落实，直忙到凌晨 2 点多

钟，才躺下休息。

夜，很深很深了。狂风仍在不停地呼啸。奔波劳累了一天的孔繁森躺在帐篷里，剧烈的头疼使他怎么也睡不着。凌晨3时许，他感到心跳加快，胸闷气短，天旋地转。有高原生活经验和医学常识的孔繁森，预感到死神正向自己逼近……

对孔繁森来说，生与死早已置之度外。在赴藏前，他就请人写过“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鬼雄死不还乡”的条幅。进西藏后，他又写下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豪迈誓言。让他放心不下的，是那远在家乡的老母亲和妻子、儿女。昏昏沉沉中，他默念着亲人的名字……想着，想着，泪水挂满了脸颊。他强支起虚弱的身体，打开手电筒，在笔记本上给同行的小梁写下了这样的交代：

小梁：

不知为什么我头痛得怎么也睡不着。人有旦夕祸福。万一我发生了不幸，千万不能让我母亲和家属、孩子知道。请你每月以我的名义给我家写一封平安信。我在哪里发生不幸，就把我埋在哪里……

这一夜，孔繁森终于挺过来了。他，没有倒下。

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战，阿里地区的各族干部群众在地委和行署的领导下，终于战胜了雪灾，全地区没有冻死、饿死一个人。但这场雪灾毕竟也给阿里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雪灾和连续几年的旱灾、风灾，使孔繁森深深感到：光靠救济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自然灾害的威胁，只有尽快建立起抗灾防灾基地，才能使群众具有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他在地委、行署联席会议上提出了这一想法，得到大家一致赞同。

这一年7月，孔繁森在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后，没有立即返回，他要利用这个机会当面向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陈述想法，争取支持。当时，他母亲正卧病在床，水

米不进，家里几次催他回去，可为了阿里地区 6 万多群众，他只好在心里默默地为母亲祈祷、祝福。

七八月份的北京，正是酷暑季节，孔繁森顶着似火的烈日，一个部委一个部委地汇报灾情。中午实在热得不行，就到有空调的商店里避一避。饿了，就在附近的小摊上吃碗面条。次数多了，随行的同志难免有些抱怨；在摊上吃，既不卫生，也太简单，而且有失地委书记的身份。孔繁森很动感情地说：“想想灾区那些还在饿肚子的群众，大鱼大肉咱能吃得下吗！”

在北京的 20 多天里，孔繁森先后跑了十多个部门，每到一处，他都把记录阿里灾情的录像带放给有关同志看，一边放一边讲灾区群众的困难，说那里条件的艰苦，谈建设防灾抗灾基地对阿里的特殊意义，人们无不为他的一片赤诚所感动。

阿里的灾情引起有关负责同志的重视，破例为阿里解决了一大笔救灾款和项目资金。资金落实后，孔繁森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他知道，西藏和平解放 40 多年来，中央对西藏的财政补贴和基本建设投资累计达 200 多亿元。这次西藏工作会议上，又确定了总投资 23.8 亿元的 62 个援藏项目。他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中央对西藏这样关心和支持，如果自己做不好工作，怎能对得起党，对得起藏族群众？

返回阿里后，孔繁森向地委和行署干部迅速传达了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和自治区党委四届六次全会精神。他说：“中央关心西藏，全国人民支援西藏，我们怎么办？”他和地委、行署一班人提出，要以“新的精神面貌，新的思维方式，新的工作思路，新的行动姿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努力开创阿里工作新局面”。

在孔繁森等地委、行署一班人的带领下，阿里的经济有了较快发展。1994 年，全地区国民生产总值超过 1.8 亿元，比 1993 年增长 37.5%；国民收入超过 1.1 亿元，比上年增长 6.87%。

幅全面振兴阿里经济的宏伟蓝图，正在这雪域高原上成为现实：

——2000 千瓦的朗久地热电厂重新发电，高原的夜晚不再漆黑，明亮的灯光同天上的星星交相辉映；

——年产值可达上亿元的山羊绒梳绒厂和鱼骨粉加工厂、硼矿脱水厂、水泥厂等相继在空旷的荒原上拔地而起，隆隆的机器轰鸣声打破了千年的沉寂；

——随着普兰、什布奇口岸的开通，至边境强拉山口公路的竣工，阿里高原向世界进一步敞开了开放的大门……

三个藏族孤儿，900 毫升鲜血。 他向人民奉献的是比血还浓的炽热情感， 是博大、深沉和无私的爱

摆在记者面前的，是解放军西藏军区总医院血库一张献血证明，上面写着：

兹有孔繁森同志于1993 年曾先后三次来我库自愿献血 900 毫升，已按医院规定付给献血营养费 900 元整。

在这张献血证明的背后，是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

1992 年，拉萨市墨竹工卡等县发生地震。当时在拉萨任副市长的孔繁森立即赶赴灾区。在羊日岗乡的地震废墟上，三个失去父母、无家可归的藏族孤儿曲尼、曲印和贡桑哭喊着扑到他的怀里。孔繁森抚摸着三个孩子：党，就是你们的亲人。一定会让你们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还要送你们上学。他嘱咐当地干部务必要安置好这三个孩子。孔繁森紧张地忙于救灾，也一直牵挂着三个孩子。不久，他再次来到羊日岗乡，决定亲自承担起抚养这三个孤儿的责任。

一个人孤身在外，又要工作，又要带孩子，辛苦和劳累可想而知。晚上，工作了一天的孔繁森回到家，先要给孩子们做好饭

菜，然后再教他们读书认字。夜里，就和孩子们挤在同一张床上，那时，曲尼 12 岁，曲印 7 岁，贡桑只有 5 岁，睡觉时经常把尿撒在床上，他就不厌其烦地换洗床单。节假日，只要有空，他总要带孩子们去商店，逛公园，给他们买衣物，陪他们玩，就像对待他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

一天深夜，曲印突然肚子疼得“唉哟，唉哟”叫个不停。孔繁森从睡梦中被吵醒，他爬起来给曲印吃了药，可还是不行。孔繁森着急了，背起孩子直奔医院，整整忙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疲惫不堪地回来。

看到孔繁森一人抚养三个孩子负担太重，拉萨市市长洛桑顿珠领走了曲尼。

生活条件变了，曲印和贡桑吃东西也开始挑剔起来。孔繁森觉察到孩子的这一细微变化，就对办公室的小崔说：

“我想请你把孩子们带回羊日岗乡去看一看。”

“他们的父母都不在了，看个啥呀？”小崔不解地问。

“让孩子们走一走家乡的土路，看一看家乡的山水，再过几天家乡父老乡亲的生活。”说着，孔繁森把曲印和贡桑喊了过来，他抚摸着兄妹俩的头语重心长地说：“记住，永远别忘了自己的家乡，将来长大了，好好建设自己的家乡。”

兄妹俩回家乡生活了 5 天，回来后好像长大了许多。

尽管孔繁森自己的家庭负担比较重，但每次下乡，他总要带钱分给那些生活贫困的藏族群众，往往刚过半个月，工资就花得所剩无几，有时连交伙食费的钱都不够了。收养孤儿后，经济上更加拮据。过去他一个人，生活上能凑合就凑合，可他不能让孩子们受委屈。

1993 年春的一天，孔繁森悄悄来到西藏军区总医院血库，要求献血，护士看着他那已经斑白的鬓角，婉言劝道：“您这么大年纪了，不适合献血。”

孔繁森连忙恳求道：“我家里孩子多，负担重，急需要钱。请帮个忙吧！”

护士见孔繁森如此恳切，只好同意他的请求。

殷红的鲜血，从孔繁森的体内缓缓流进针管。这是一位共产党员的鲜血，是从一位日夜操劳的领导干部的血管里流出来的血！

孔繁森生活极其节俭，经常吃的是白饭就榨菜，工作一忙，开水泡馒头和方便面也是常有的事。他穿的许多内衣打着补丁，连块香皂都舍不得买。每次去拉萨回阿里，他总要买上一些价格低廉的生活日用品，因为有地区差价，这样可以省点钱。孔繁森对自己，就是这样节俭、吝啬，而对他人、对藏族同胞，却是那么慷慨大方。在西藏工作的近 10 年时间，他几乎没有往家里寄过钱，省下的工资，大部分花在藏族群众身上。为此，他曾多次流露出对家人的内疚之情。但为了帮助那些有困难的藏族同胞，他只好委屈自己的家人。

孔繁森是清贫的，同时也是富有的。他拥有人世间最美好的心灵，最丰富的情感，最高尚的精神境界^[1]。

“太阳和月亮有着同一个母亲，她的名字叫光明；汉族和藏族拥有同一个母亲，她的名字叫中国”——这是孔繁森非常喜爱的一首歌。他曾多次对人这样讲，每当看到藏族的老人，就会想到自己的父母；每当看到藏族的孩子，就仿佛见到自己的儿女。在拉萨当副市长期间，全市 56 所敬老院和社会福利院，他走访过 48 所，把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送到孤寡老人和孩子们的心田。

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县桑达乡敬老院里，有个叫琼宗的老人，至今保存着孔繁森送给她的一双棉鞋。老人永远不会忘记那个隆冬的早晨，孔繁森副市长冒着寒风来到敬老院，发现老人的鞋子破了，脚被冻得又红又肿，便心疼地把老人的双脚抱在自己的怀

里。第二天，他又托人给老人送去了一双新棉鞋。不久，他又给敬老院的老人们送去了半导体收音机。接过孔繁森自己掏钱买的收音机，老人们的眼睛湿润了。一个叫旺姆的老人激动地对孔繁森说：“还是新社会好哇！要是在解放前，像您这样的崩布拉（当官的）连见都见不到呀！”离开敬老院时，老人们自动站成一排，依依不舍地为他送行。

有一次，孔繁森到拉萨市林周县阿朗乡敬老院看望孤寡老人。走进一个房间，他看到一位藏族老阿爸的脚因烫伤溃烂发炎了。便打开随身携带的药箱，为老人擦洗涂药，然后用纱布把脚裹好，还把自己穿的灰色风衣脱下来披在老人身上。临走时，他又掏出身上仅有的 30 多块钱塞到老人手里。老人感动得直掉眼泪，口中不住地念叨：“活菩萨，活菩萨！”

孔繁森在阿里工作时，一天，他到噶尔县门士区检查工作，看到草滩上有几间土坯房，听说那儿住着两位孤寡老人，便走了过去。他推开门，借着火塘的光亮，看见一位藏族老阿妈有气无力地靠在墙上。“阿妈啦，党派我看您老人家来了！”说着，他随手摸了摸放在地上的口袋，糌粑不多了；又摇了摇一旁的酥油茶壶，也快空了。原来，政府给老人的这个月的生活费已经花光了。孔繁森马上掏出 200 元钱给随行的同志：“快去给老人买些茶叶、食盐、酥油和大米来。”说着，他又转身走进另一位孤寡老人的家，只见老人病着躺在一张破羊皮上，孔繁森心情沉重地对区里的干部说：“马上请医生来给老人看看病，另外再买块床垫来，要厚，要暖和。”从那以后，只要有人去噶尔县，孔繁森必定要托人给这两位孤寡老人捎些钱、粮食和衣物。

没人能说得清，像这样的事孔繁森做了多少件。有人说，他做的好事就像盛开的邦锦花，洒满草原，也许在有些人看来，这些事太普通，太平凡了。然而，就像那奔腾浩荡的雅鲁藏布江，最初的源头不过是阿里高原上的一条小溪，正是这点点滴滴的平

凡小事，铸就了一个共产党员品格的崇高和伟大。

“冰山愈冷情愈热，耿耿忠心照雪山。”正如孔繁森在一首诗中所写，他把自己一颗火热的心献给了西藏高原，献给了党的事业。他对藏族同胞的爱、对祖国人民的爱，就像高原上的蓝天一样，那样的纯洁，那样的深沉，那样的博大。他始终在努力实践着自己最喜爱的那句名言：“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 ※ ※ ※ ※ ※ ※

令人痛惜的意外事情发生了。

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在去新疆塔城考察边贸的途中，在一场车祸中不幸殉职，时年50岁，噩耗传到阿里，传到拉萨，传到山东，人们简直不敢相信。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人们在料理孔繁森的后事时，看到两件令人心碎的遗物：一是他仅有的钱款——八元六角；一是他的“绝笔”——去世前4天写的关于发展阿里经济的12条建议。

这就是孔繁森留下的遗产，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怀！

雪山含悲，江河呜咽。

许多人站在孔繁森的遗像前泣不成声，泪如雨下。数不清的哈达敬献在他的灵前，堆得像洁白的雪山。

在阿里，在拉萨，在聊城……成千上万的人在呼唤着同一个名字——孔繁森。

“波拉，波拉（爷爷）！您不能走，我们舍不得您哪！”孔繁森收养的两个藏族孤儿，捧着他的遗像哭干了眼泪，哭哑了喉咙。

“孔书记，我的好书记，让我替您去死吧！”孔繁森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双膝跪地，两手深深插进墓穴的黄土，嚎啕大哭，悲

痛欲绝。

一位藏族老人匍匐在孔繁森的灵前，大声哭喊：“孔书记，您不该去呀！您对阿里恩重如山，我们不能没有您啊！”

阿里的一个画家虔诚地跪在孔繁森的遗像前，一边落泪，一边为他画像，画了一夜，也哭了一夜。当画稿完成后，他将画笔折成两截……

“一尘不染，两袖清风，视名利安危淡似狮泉河水。二离桑梓，独恋雪域，置民族团结重如冈底斯山。”

——一幅幅低垂的挽联，诉说着人们的巨大悲痛，倾吐着人们的无限哀思和崇敬之情。

就像那许许多多把自己的青春、热血和生命都献给了西藏高原的先辈那样，党和人民的好儿子孔繁森，也把他那高大的身躯融入这片壮丽、神奇的土地，在无数人的心中树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新华社 1995 年 4 月 6 日电）

评析：

润物细无声

李宁

在领导干部贪污腐化行为屡见报端、人民对部分干部失去信心之际，《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一作的出现，就像是一股清新的风，使人们看到了新时期共产党员干部的光辉形象，对那些只为自己考虑、自私狭隘的领导干部来说，这也是生动的一课。可以说，本文最大的成功就在于起到了正确、良好的舆论引导作用。

这篇人物通讯对描写对象——孔繁森的刻画极为立体、丰

满，他是一个“崇高、忠诚和无私”的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同时又是牵挂着家人的儿子、丈夫、父亲。文中多次提到他对家人的愧疚之情，如第二次赴藏前，他觉得“对不起妻子，对不起孩子”，特意将妻儿带到北京玩了几天，最后才鼓起勇气说起“组织上又安排我进藏了”，临走前“流着泪给母亲深深磕了一个头”……正所谓“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这些细节并没有损害孔繁森作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的形象，避免了对先进人物的“神化”，使读者感到可亲、可信。

除了亲情与共产党员责任的冲突外，作品中还提到许多矛盾：高原的恶劣环境与孔繁森多病的矛盾、孔繁森经济拮据却要援助藏民、抚养孤儿的矛盾……在矛盾冲突中展现人物性格，更能鲜明地展现人物特点，也更能反映出孔繁森每一次选择背后高尚的思想。

作品所叙述的孔繁森的“政绩”，大多是点点滴滴的“小事”，如大雪中脱下毛衣给藏族老阿妈、为 70 多岁的老人吸痰、为抚养孤儿去献血……用文中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就像那奔腾浩荡的雅鲁藏布江，最初的源头不过是阿里高原上的一条小溪”，正是这点点滴滴的平凡小事，铸就了一个共产党员品格的崇高和伟大”。与那种对典型拔高、夸大的僵化模式相比，这篇通讯的“润物细无声”，更具震撼人心的力量。

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

——记全国劳动模范、水电修理工徐虎

季进成 殷教佗

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们享受着水电带来的便利和文明。然而，哪一户人家又不曾遭遇过水电故障带来的尴尬和焦虑？大热天突然冰箱、空调停转，宾客盈门饭菜下锅却自来水断流，自己无从着手而修理工却姗姗来迟，人们的怨气、牢骚往往由此而生

在上海西北面一片陈旧的居民区——普陀区的中山、石泉街道，自从有了一位叫徐虎的水电修理工，6000多户居民多年来几乎忘记了这种城市人的苦恼。他们心里有数，只要徐虎在，就绝不会让他们因断水断电而洗不成澡、做不成饭、看不成电视、绝不会因下水道堵塞而受“水漫金山”之苦，更不会因为这些火烧眉毛的事使他们陡生烦恼，抱怨政府。这一带的居民虽然有不少仍然住着设计陈旧、设施落后的简易公房，但因为有了徐虎，他们觉得自己特别“有福气”！

徐虎，他是那么平凡，就像他摆弄的水和电，悄无声息地钻进千家万户的家居日月，用自己最平凡不过的劳动，融合着政府和百姓之间的感情，传送着党的温暖和光明。

**群众遇到困难，想到的是党和政府。
我们共产党就应该用自己的工作，
将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千家万户**

徐虎出生在上海市郊一位菜农之家，1975年因征地进了城，成为普陀区房管局中山北路房管所的水电修理工。就凭着这份成天与粪水污秽打交道的工作，徐虎获得从上海房管系统到上海市、建设部乃至国家级的荣誉称号25项，1989年、1995年两次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然而最让徐虎认识到自己价值的，是一次居民的自发评选。那是1984年末，上海新闻单位发动市民选举“上海市优秀社会服务工作者”。家住普陀区石泉、光新、农林、棉纺等新村的居民自发地把选票投给了徐虎。许多在徐虎看来很平常、很自然的事，群众都一一记在心上，这会儿都一件一件地有口皆碑——

一次春节，石泉路75弄的一户居民正喜气洋洋地宴请亲朋，突然家中抽水马桶堵塞，顿时异味扑鼻，主人十分狼狈。徐虎及时赶到，关上厕所门独自在里面施工。当主人发现下水道疏通，厕所已打扫干净，回头去谢徐虎时，他早已悄悄离开。

一天快下班的时候，石泉幼儿园的教师报修：幼儿园的厕所堵塞了，若不当天修好，第二天就没法上课了。徐虎和两位同事立即赶到幼儿园。徐虎他们用长竹片一段一段地疏通管道，身上溅了多处粪水，干了两个多小时，才将管道全部疏通，随后又把厕所冲洗干净。这时已是夜幕降临，万家灯火。

一户居民抽水马桶堵塞，积了满满一马桶的污水，好长时间找不到堵塞的原因。徐虎干脆跪在溅有粪水的地板上，卷起袖子裸手就往马桶里摸。原来在马桶的拐弯处塞着一件主人洗衣时不慎掉下去的背心。这家居民很不好意思，更为他这种敬业精神感

慨不已。

一位退休的女职工前几年一直张罗调房子，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处各方面都比较理想的住房。但是临到办手续她却突然变卦，说什么也不肯调换了。原来她舍不得徐虎的优质服务。她说：“只要徐虎在，我就不走了。”

这一次由群众自发投票的选举，徐虎荣获“上海市优秀社会服务工作者”一等奖。徐虎感到十分不安：自己只是尽了一个水电修理工的本分，为什么群众这样感激呢？他感到了自己工作的分量：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群众生活中还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而群众遇到困难，有了问题，想到的是党，是政府。共产党员就应该用自己尽心竭力的工作，让群众具体地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

从此，他更加兢兢业业，生怕有负于群众的信任，有负作为共产党员的崇高使命。他的工作超出了管区，超出了 8 小时工作时间，有时还超出了他的本行。

有一次，他收到静安区一对老年夫妇的来信，说是家中水表坏了，长时间漏水，希望他能上门修理。老人住的地方远离徐虎的管辖范围，而且是私房，不属房管部门修理的对象。但徐虎不辜负两位老人的信赖和企盼，应约前往。老人家中的水表被冻裂，已没法修复。徐虎扭头走上大街，买了一个新水表给老人换上。老太太颤巍巍地将他送到门口说：我拿不出钱来谢你，就让我给你磕个头吧！徐虎一把拉住老太太，泪水刷地流了下来。

光新一村 246 号 104 室住着一户特殊家庭——四口全是残疾人。自徐虎上门服务后，这家人的情况就一直记在他的心里。不论大事小事，逢年过节，喜事丧事，都少不了徐虎的帮助……

就这样，凡有来信来电向徐虎求援的，只要可能，徐虎都一一上门服务。全市 14 个区，徐虎已为 12 个区的居民服务过。他的足迹，几乎遍布上海的大街小巷。

房修水电工脏累而烦琐，技术级别最高只到 5 级。但徐虎却把它当成神圣事业来钻研、琢磨，自制了许多“徐虎牌”的异型工具，创造了一套“徐虎式”的工作方法。许多过去要大拆大卸才能修理的，现在只要用这些灵巧的工具就手到病除；过去要几个小时才能修好的，现在往往只要十几分钟，大大节省了用户的时间和开支。

大家下班我下班，老百姓有困难找谁去？ 徐虎挂出了三只小信箱，十年如一日地 实行夜间服务，被誉为“19 点钟的太阳”

10 年前的一天上午，一位住户匆匆忙忙闯进房管所，气喘吁吁地说：“我家昨晚 6 点多钟因电线烧坏而断电，大热天电扇、冰箱不能用事小，孩子复习迎考只好点蜡烛照明，到管养段报修又找不到人，真是急煞人！我们双职工白天要上班，今天来报修还是请了半天假来的！”

当时，刚刚被居民评为优秀社会工作者的徐虎顿时感到异常惭愧：下班以后正是用水用电高峰，也是事故高峰。而我们这时却下班休息，这给群众造成多大的不便啊！在此之前，徐虎还走访过 300 多户家庭，印发过 500 多份意见征询单也有不少用户提出过这个问题，只是谁也提不出解决的办法。水电修理工也要下班休息，总不能全天候服务吧？

为什么不能全天候呢？徐虎想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他把自己的想法和妻子商量，又向所领导汇报，得到了一致的支持。于是，1985 年 6 月 23 日，在徐虎管辖的地区居委会、电话间、弄堂口，出现了三只十分醒目的“水电急修特约报修箱”，上书：“凡附近公房居民遇到夜间水电急修，请写清地址，将纸条投入箱内，本人将随时为您提供热情服务 开箱时间：19 时。徐虎。”

19 时开箱，当即投入修理，一般故障都能在晚上 10 时以前排除，既保证居民的使用，又不会影响用户休息。徐虎就以这样的拳拳之心，给了自己一个铁一般的约束，给了群众一个金子般的承诺。晚上 7 时，成为徐虎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时间概念。

每天晚上 7 时，不管刮风下雨，酷暑严寒，徐虎准时背上工具包，骑上“老坦克”（上海人对使用时间长的陈旧自行车的戏称），直奔这三个报修箱，按照报修单上的地址，走了一家又一家。

有一次，徐虎随上海劳模团赴厦门疗养。回沪时，因交通事故误了火车。重新签票时，快车改成了慢车，卧铺变成了站位。旅途 12 小时，徐虎顾不上疲劳，心里只惦记着两件大事：一件是第二天上午去义务献血，另一件就是晚 7 时的例行开箱。回到上海，徐虎放下包就去献血。下午 5 时许，房管所工会主席来慰问献血后的徐虎。聊了一阵，徐虎抬头看钟，时间快到了，马上打住话头，背着工具包就出了门。工会主席劝说无效，只好紧跟其后，权当保驾。

徐虎已是人届中年，深度近视，还患有高血压、脂肪肝等疾病。1992 年冬天，特大寒潮使大批室外水管爆裂，住宅楼成片断水。连续几天的抢修，徐虎病倒了。老母亲心痛地说：“虎子，听娘的话，今天就不要去开箱了。”徐虎硬撑着起来，说：“7 点开箱是我自己订的，报修的人都在家里等着呢，我怎么好失信呢？”

1985 年 6 月 23 日到 1996 年 2 月底的 10 年多中，他除了外出开会、住院开刀等不可抗拒的原因外，从没有失信过住户。10 年辛苦不寻常，徐虎累计开箱服务 3718 天，一般一天有一两张报修单，多时有五六张，共花费 7400 多个小时，解决夜间水电急修项目 2146 个。

晚上 7 点以后，是家庭生活的“黄金时间”，“温馨时刻”。

自从挂出了“特约报修箱”，徐虎就把这一“黄金时间”送给了他的服务对象。人们送给他各种各样的称谓：老百姓称他为“夜行天使”，前往采访的记者称他为“一颗璀璨的夜明珠”，一位作家送他一个诗意的名字：“19点钟的太阳”。

除夕夜，团圆桌上总是少他一人。 他牺牲了很多天伦之乐和个人爱好， 但他和家人却感到充实和欢愉

与许许多多中年汉子一样，徐虎也是上有老下有小。一天，他对家人欠下了还不清的感情债。

一天傍晚，徐虎幼小的女儿徐洋突然发高烧，而徐虎又要出门为居民服务了。他为难地望着妻子：我答应群众的话一定要做到，请你先和姐姐带洋洋去医院。

屋漏偏遇当夜雨。洋洋高烧不退住院了，徐虎的母亲也因病住进了医院，徐虎和妻子一商量，狠狠心将小洋洋抱回了家，白天由 70 高龄的老父亲照看，中午他们轮流利用吃饭时间回家给小孩喂药。晚上，妻子下班后先去看婆婆。而当徐虎干完当天的活时，早过了医院规定的探视时间，他只能望着母亲病房的窗口，心中暗暗祈祷老人家早日康复。

洋洋上小学时天资聪颖，富有艺术禀赋，先考取了上海小天鹅芭蕾舞艺术班，由于路途远，又要每周两个晚上授课，徐虎和妻子都没有时间接送，只得放弃。洋洋四年级时，又被上海音乐学院附属学校录取，成为一位领唱队员，但接送又要占用父母的“黄金时间”，不久也只好休学。

上海中小学生的家长，历来视学校召开的家长会为“重要会议”。洋洋从小学起，家长会不知开过多少次，可徐虎只去过一次。因为家长会都在晚上召开，正好与徐虎的晚上服务有冲突。

徐虎出名后，老师指名要他去开一次家长会，让大家见见这位“劳模家长”。徐虎推辞不过，只好到学校与老师见了个面，将近7时，又匆匆骑上车穿街走巷去了。

为了万千居民的“大家”，徐虎的“小家”逢年过节也极难团圆。1985年以来的10个除夕之夜，团圆餐桌上几乎没见过徐虎的影子。因为越是节日，用电用水量，水电的故障也多，徐虎最忙——

1985年大年三十，光新路人民浴室水阀爆裂，他去了；1986年大年三十，一家石油公司断水，他去了；1987年大年三十，3户居民前来报修，他去了；1990年大年三十，石岚三村48号居民家断水，他去了；1991年大年三十，潘家湾123弄29号水箱无水，他去了；1992年大年三十，管弄路61弄29号水管冻裂漏水，他去了；1993年大年三十，一家居民断水，他也去了……

那是1988年除夕，徐虎7时出去开箱，3只箱子没有一张报修单，便安安稳稳回家吃年夜饭，还答应女儿“12点时一起放鞭炮”。没有想到，10时又有人来敲门，说是信义新村的18户居民家都断了水。徐虎抄起工具箱就出门。妻子和女儿在家里等到外面爆竹齐鸣，仍不见徐虎回来。小洋洋更是提着“800响”含着眼泪等，一直等到凌晨1时多，终于等回了已经精疲力尽的爸爸。徐虎不顾劳累，亲了亲女儿，到阳台上点燃了迟响的鞭炮。小洋洋终于破涕为笑。后来，女儿在一篇作文中谈及此事时写道：“虽然爸爸没有和我们一起好好过节，但在充满爱心的世界里，我始终感受到父亲伟大的爱！”

徐虎的父母如今已是80高龄了，他们通情达理地说：“只要徐虎为群众做好事，我们就支持。”在他们身体尚健时，每当徐虎不能在预定的时间回来，他们还会拿起钥匙，走向一幢幢住宅楼，代徐虎开启水泵为大楼送水。

女儿理解父亲，父母理解儿子，在同一个系统工作、同是共

产党员的妻子侯梅英，更是全力支持着徐虎。每到晚上 7 时，徐虎出去为居民排忧解难，她就准备丰盛的热饭热菜，给徐虎做点心，尔后把两位老人安排就寝，再检查女儿的功课，天天忙得不亦乐乎。

为了让徐虎能看上他喜爱的电视节目，她又特意买回了录像机。女儿两次失去艺术培养的机会后，她便买来许多音乐舞蹈教材和其他学习材料，教女儿在家中自学。有一年，她曾独自一人到医院做人流手术，徐虎不在身边，又被人误解，委屈得她泪流满面，但看到万家灯火，她又感到欣慰：徐虎在为千家万户服务，我应该为他骄傲，为他分忧。她用行动实践着“支持丈夫为民服务到白头”的诺言。

徐虎全家人有一个特别而神圣的节日——6 月 23 日“挂箱节”。每逢这一天，全家肯定“大团圆”。在侯梅英“主持”下，老少三代翻看关于徐虎的新闻报道，女儿高声阅读居民的表扬信，徐虎也畅谈为民服务的情况。全家分享徐虎的喜悦，欢声笑语不断。

一个充满温馨和理解之情的“小家”，也支撑徐虎安安心心又忙忙碌碌服务着“大家”。

**一次次婉拒额外的金钱和物品，
他心里装着一个大道理：你不奉献我不奉献
谁来奉献，你也索取我也索取向谁索取？**

生活在现代都市，徐虎一样知道金钱的重要。但对待金钱，他别有信条。家中饭桌的玻璃板下，便压着他的自训：“钱可以买到房屋，但买不到家；钱可以买到珠宝，但买不到美；钱可以买到小人的心，但买不到君子之志……”

一年夏天，徐虎修好一处遭台风袭击的低压电网，几十户居

民家恢复了光明。居民们主动凑了一笔钱，送给他表示谢意。徐虎再三婉拒：“这是我应该做的，怎么好收钱呢？”某新村有位女士，去美国女儿处生活了 10 多年。回到上海，她家的马桶被杂物和粪便堵塞了。看着徐虎连抠带掏费了好大劲才把马桶疏通，她取出钱包要付小费，徐虎礼貌地拒绝了。这位女士大为感慨：“在美国，请人服务是一定要给小费的，脏活累活，小费更要多给。想不到徐虎分文不收，这种风尚，只有中国工人才会有。”

“徐虎这个人守规矩，有纪律。”一位居民说，“有一次他到我家修东西，完工后我敬他一根烟，他回答说你不要客气了，我还要到别人家去修。我小孙子趁他不注意，将一包烟放在他的工具包里，他下楼骑自行车时发现了，结果又爬上楼，硬是还给了我们。”

在义务服务中，徐虎有时还要往外贴钱。有户居民新装了浴缸，因施工不合理，造成楼下居民家漏水。要解决漏水，必须重新拆装浴缸。但楼上那家怕损坏浴缸和再付工钱而不肯，两家因此闹到了居委会。徐虎知道后，耐心地做通了楼上那户居民的工作，免费为其拆装浴缸，并且自己掏钱买来瓷砖，修补好损坏的装饰面。在徐虎精神的感动下，两家人握手言好。

金钱与物质宛如一面明镜，透视和折射着人的灵魂。徐虎在这面镜子中的投影，如水一样清纯透明。凭着他的知名度和精湛的技术，发财的良机接踵而来，然而却被他一次次放弃。因为自己不能陪家人共度夜晚，徐虎产生了买一套音响设备，为家人添一份热闹欢乐的念头，但苦于钱不够，这个愿望难以实现。恰在这时，一位朋友把挣钱的机会送到徐虎面前：郊县某镇有一项 30 万元的水电安装工程，只要徐虎肯一块包下来，大家可以赚一笔。徐虎对朋友笑笑说：“我是党员，不能光顾自己赚钱。我走了，这里的居民水电急修怎么办？”那位朋友左劝右劝，见徐虎不为所动，只好另去找人。

还有一次，另一位朋友兴冲冲地告诉徐虎一个信息：有家筹建中的物业公司，正在以每月 2000 元的高薪聘调水电修理工。2000 元，虽比徐虎当时的月薪高一倍多，但他依然没有动心。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徐虎还这么傻？”有人百思不得其解。徐虎认真地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每个人仍然应该多捧给社会一份奉献和责任。你不奉献我不奉献，谁来奉献；你也索取我也索取，向谁索取？”朴实又富有哲理的话语，仿佛一曲新时代的雷锋之歌！徐虎的高尚言行，赢得了人们的高度褒扬和认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将发生深刻的变化，但无论何时，徐虎那牢记党员职责、造福千家万户的精神，都将受到全社会的敬仰和推崇。

一人辛苦，方便千家万户；一人垂范，带出先进成行！徐虎出名以后，在他的工作单位，目前已经出现了 6 位学习徐虎的标兵；在上海市房管系统，万名青工纷纷争当“小徐虎”，为居民提供优质服务。今年 2 月 22 日，用现代通讯工具武装的“徐虎网络”语音信箱，在上海正式开通。干部、商贸职工、科技人员、大学生等社会各界人士，也纷纷向徐虎看齐。学徐虎精神、做徐虎式的好党员、好员工，在上海市蔚成风尚。

（原载 1996 年 4 月 17 日《中国建设报》）

评析：

“分镜头”剪辑、组合与浓缩时空

李兆丰

新闻通讯，最忌泛泛之论，生动新鲜的事实应该是它作为新闻报道体裁的基础和灵魂，“看上去从头到尾都在讲事实，用直观形象的生动事实，潜移默化地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或传播一

种思想、观念、精神风貌。”（彭朝丞）《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可以说很好地体现了其作为人物通讯的体裁特性和社会功能特性，具体地说，其写作手法上的成功是其成功的关键所在。

这种写作手法即蒙太奇。夏衍认为“所谓蒙太奇就是依照情节的发展和观众注意力和关心的程序，把一个个镜头合乎逻辑地，有节奏地连接起来，使观众得到一个明确的印象和感觉，从而使他们正确地了解一件事情的发展的一种技法”。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讯作品将新闻事实采用“分镜头”剪辑、组合以达到浓缩时空的目的，有机而又自然流畅地表达一定的内容和思想，就是一种蒙太奇手法的巧妙运用。

从 1975 年成为水电修理工到 1996 年 4 月 17 日记者发稿时止，通讯的主角徐虎的工龄已逾 20 载，这么长的时间跨度内，事实林林总总、丰富之极。因此，深入的采访是写好这篇人物通讯的第一步，居民、领导、家人、社会……凡是与徐虎工作有关的点点滴滴，特别是“动情点”，都成为好素材，甚至还要进行数字统计。这些都是“平凡”的徐虎的“不平凡”之处，但关键是如何表现这“不平凡”。作者充分利用了通讯的体裁空间，结合蒙太奇的手法，灵活调动事实材料，将其按需要分门别类嵌进当今社会崇高的四大情感主题中，以四组由最具表现力的话构成的小标题统领，使在时间长河中零碎的事实变成了有机联系的整体，达到了情感积累的效果，烘托了时代风尚的大主题：作为一名党员，要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

该作在语言的运用上也有其可圈可点之处。语句通俗、顺畅，对事实叙述明白适度不温不火；对通讯内涵的提炼颇见功力，善于把握人物的个性语言来反映其真实的思想境界，因其生活化而可信，因其平凡而可信。

北京有个李素丽

——21 路公共汽车 1333 号车跟车记

郭萍 吴晓向

(一)

雨点如断线的珠子砸在雨伞上，她的脸上、胳膊上都溅上了雨水。她招呼乘客们上车。

拥挤的人群变得有序了：他们一个个在雨伞下跺脚，脱下雨衣，折好雨伞，抖去雨水，依次上车……

她就是李素丽。中等身材，30 多岁，海蓝色的套装整洁可体，淡妆轻抹的脸上，闪动着一双笑眼。

(二)

汽车启动了。李素丽折起雨伞，擦去脸上的雨水，理理自己的头发。随即，车厢里响起了甜润的声音：

“乘客同志们，您可能来自祖国的大江南北，四面八方。不管您来自何方，我都将用热情、友好、主动的态度为您提供周到的服务。您在途中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我会尽力帮助您！”

这声音吸引了所有乘客的目光。站在她面前的几个进京打工的人下意识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

这声音，引出了车厢一番议论：

“这售票员像在宾馆里工作。”

“可不。”另一位乘客的声音，“她的仪表和声音我看特像空中小姐。”

一位乘客动情地说：“售票员给上车的人打伞，不多见了。”

“她的车我常坐，”一位乘客接过话茬，“冬天下雪，她捧着炉灰往脚踏板上撒，怕人上车时滑倒，心眼多好！”

.....

(三)

车厢外，雨还在下，车厢里，显得十分拥挤。

李素丽：“乘客同志们，下面，请您准备好零钱，我将到您的身边售票……”

话音刚落，乘客们纷纷将钱递过来，你传给我，我传给她，小小车厢里，充满融洽的气氛。

一位 50 多岁的妇女把钱举过头顶，冲着李素丽喊：“我买两张，一张我的，一张行李。”

李素丽接过钱，还给这位妇女甜甜地一笑。

(四)

三里河站。

雨还在下。汽车进站。门口依然遮着那把花格雨伞。

李素丽招呼旅客们上下车：“大爷、大娘，您慢走，穿好雨衣，别淋着了……”

汽车缓缓启动。李素丽突然发现有一位大娘急匆匆地朝汽车赶来，她拿起话筒：“大娘别着急，司机和全体乘客都在等您呢！”等老人走近，李素丽走下车搀扶老人上车。

(五)

车厢里挤满了人。

李素丽：“现在车上人比较多，不知年老的乘客都有座位没有？如果有我没看到的，请互相关照一下。”于是人们纷纷给老人让座，有六七位老人都落座了。李素丽发现有两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还站着。

她挤到两位年轻人面前，细语轻声地说：“请给老人让个座好吗？”

年轻人应声站起。两位老人也坐下了。

李素丽露出欣慰的笑容。

记者顺着李素丽的耳际向前望去，司机背后的档板上，“乘客之家”4个大字赫然映入眼帘。

“社会是一面镜子，你首先对它笑，它也就会对你笑。”

——李素丽

(六)

汽车穿街走巷，商店、树林、行人不时从窗外闪过。

车公庄站。一位胖胖的女士，用手捂着右腮，样子很痛苦。她上车后便找个座位坐下，两只眼目不转睛地盯着李素丽。

这个女士刚下去不久，怎么又上来了。记者主动招呼：

“哟，您也来了。”

“我闹牙呢，专门来坐她的车。”女士指指自己的右腮，同时又向李素丽亲昵地瞥了一眼。

“坐她的车能治牙痛？”我们颇为不解。

“可不。”女士认真地说，“这两天憋闷得慌，我一上火就牙

痛，牙痛时就上她的车。听她说话，看她做事，心里特快活，一舒畅，就把痛给忘了。刚才坐了几站，感觉好多了。”这位性格外向的女士还自我介绍起来：“我就在三里河菜场上班，也是做服务工作的，像她这样把服务工作做到这份儿上真不易。”

（七）

21 路，经委会站。

一位中年妇女扶着车门吃力地上了车，靠着车门不动了。李素丽转脸发现了她，立即走到靠近车门的一位乘客面前耳语几句，那位乘客点点头站起来。座位空了。

李素丽扶着那位中年妇女来到空位前，让她坐下。

原来，这是一位残疾人……

说到残疾人，记者当晚采访了李素丽另一个故事。

（八）

普渡寺西巷 11 号。

这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四合院。一间 10 多平方米的小屋。屋里除了床和桌子外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我们就坐在了床上。小屋的主人叫张志忠。

“我们是工人日报记者，跟你随便聊聊。”

“是谈李大姐的事吗？”

小张还未开口，眼泪便流了下来：“每逢我上下班乘车，李大姐和司机说好，把车停在我面前，一开门我就能上车。我手脚不方便，视力也不好，她扶我上下车，帮我找座位，帮我打消残疾人的自卑感。前年我被单位辞掉了工作，心里很苦闷，我在绝望的时候，去找李大姐。见到她，我忍不住抱着她哭了。我觉得

她就是我的亲姐姐，是她鼓起了我生活下去的勇气……”

泪珠从他的脸上滚落下来。

“给乘客下个台阶，我的服务就上个台阶。”

——李素丽

(九)

车厢里。人头攒动。

一位戴墨镜的乘客摸着朝售票台挤去。

她从挎包里掏出一个纸包，放在售票台上。

“同志，你……”李素丽莫明其妙。

“姑娘，我就爱听你说话。这几天，我觉得你的嗓音有点哑，这点胖大海是我专门给你买的，泡着喝吧。”

车到站，乘客被扶着下车了。原来她是盲人。

(十)

车厢里。

一位中年妇女走到李素丽身边：“姑娘，你太累了。我看你的脸色不太好。”

李素丽莞尔一笑：“大嫂，我挺好的。”

“可要保重身体呀。”大嫂说着把一大把鲜荔枝塞进李素丽手里，说，“这是新鲜荔枝，听说吃了补身子。”

李素丽难为情了：“大嫂，这怎么行呢？”

“怎么不行！”大嫂说，“吃吧，我看着你吃。”

李素丽被逼无奈，吃了一颗。

大嫂爽朗地笑了，笑得那么开心。

(十一)

月坛车站。

一位行动蹒跚的大娘被李素丽搀扶上车。然后又给老人找座位坐下。

“姑娘，你真好。”老人拉住李素丽的手心事重重地说：“前两天我也坐公共汽车，没座位就靠售票台站着。谁知那个售票员说：‘齁热的，你还鼓着我，一边去！’硬把我轰走了。”

李素丽俯身宽慰说：“大娘，别往心里去，以后会好的。”

汽车在运行，几站过去了。李素丽的服务让大娘激动不已。她蓦地站起身来，大声说：“乘客同志们，你们看这个售票员的服务有多好，咱们为她鼓鼓掌吧！”

话音刚落，车厢里响起一片热烈掌声。

这掌声让李素丽愣神了，她眼含热泪连声说：“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车到军博站，大娘要下车了。她走到车门口又转过身来，用颤抖的声音说：“让我们再给售票员鼓个掌吧！”

说着，她又鼓起掌来。车厢里掌声一片。

李素丽哭了。

司机也哭了。

(十二)

西直门站。

乘客从车里鱼贯而出。

“那三位同志，看看你们的票好吗？”李素丽的声音集中了所有乘客的目光，车头前一两米处立着三个小伙子，其中一个不情

愿地慢慢挪过来说：“当然可以，我们有票。”可是，他翻遍了所有的衣服口袋，仍没有掏出票来。

“再好好找找。”李素丽依然面带微笑。

“没钱就别坐车，年纪轻轻的就逃票，多丢人！”车厢里，有的乘客数落起来。

“别这么说，他一准儿是丢了。”李素丽没有半点责怪的意思。

小伙子不好意思了，掏出 1.5 元钱递给李素丽。李素丽脸上仍带着微笑：“下车买票就不是 5 毛钱钱了，按规定要加倍的。”

小伙子又递给李素丽 1.5 元。同时还留给她一句话：“冲你，以后这样的事不会发生了。”

(十三)

车在运行。

一位留着长头发的年轻人上了车，摆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

“啪”一口痰顺口而出，唾在地板上。小伙子抖着腿若无其事地看着窗外。

“同志，请你把痰蹭掉。”有人劝道。

小伙子鼻子里哼了一声，理也不理。

乘客们不满了：真不像话！

小伙子轻蔑地扬扬脑袋扫视一下众人，一副玩世不恭的神态，这一切李素丽看在眼里。

她走到小伙子身边，面带笑容地说：“这是公共场所，随地吐痰，污染环境，对您的健康也不利啊！”

没等李素丽把话讲完，小伙子冷冷地瞪了她一眼，示威似的又在洁净的地板上吐了一口痰。

车厢里乘客气愤了。

人们一齐把目光投向李素丽。

李素丽心里咯噔一下子，有股怒火直冲脑门，满脸憋得通红，她理了理头发，微笑又出现在她的脸上，她转身回到售票台，从自己的挎包里取出一团卫生纸，走到小伙子跟前，俯下身子，默默地擦去地板上的两块痰迹。

此刻，车厢里静极了，没有一点声响。

人们给她闪开一条回到售票台的通道。

谴责的目光一齐射向小伙子。

小伙子低下了“高贵”的头，再也没有抬起来。

到站下车了，小伙子拿着月票特意走近售票台，低声对李素丽说：“大姐，对不起。”

“能使大家都快乐，我更快乐。”

——李素丽

(十四)

儿童医院站。

一位 40 多岁的男乘客上车后径直朝挂着意见本的座位走去，摘下本子便埋头写起来。

意见本上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从此窗口体现了北京人民的文明礼貌，希望其它车也能如此。”

“请问您贵姓？”记者走上前去问。

“我姓王，在石家庄电力部门工作。”他抬起头来并不介意地望着我们。

“怎么刚上车还没感受一下就往意见本上写呢？”我们不解地问。

“我是来北京办事主要靠公共汽车，这趟车我坐过很多次了，服务就是不一样。”他指指正在售票的李素丽，感慨地说，“就说她吧，说的话、做的事，让人心里热乎乎的。我每一次上车都想

写写自己的感受，可人多，不能如愿，这回，就是冲着意见本来的。”

（十五）

西客站。

车到终点站，乘客们从车上鱼贯而下。

李素丽搀老人，扶小孩，嘴里不停地说：“请慢点走。”“欢迎再来乘我们的车。”

人们朝她微笑，向她招手，有的依依不舍。

最后下车的是位精神矍铄的老人。他走到李素丽跟前，激动地拉住李素丽的手：“听说过你的名字，我是特意来看看的，不虚此行啊，不虚此行。”

李素丽脸上泛起红晕：“谢谢您的鼓励，我做得还远远不够。”

“不，你做得很好！”老人感情真挚地说，“你在身体力行，播洒文明。现在，许多人抱怨社会风气不好，其实，良好的社会风气要靠每一个社会成员去创造，去维护。姑娘啊，你没有抱怨，而是在用行动教育大家，感染大家，让大家都做文明人，我们应当感谢你！”

老人的话，留在了记者的采访本上。

采访本上也留下了他的期盼：“我们的社会需要她这样的人，应该好好宣传！”

（十六）

西客站。21路车队队部。

车队党支部书记梁良热情地接待了记者。

他抱来一摞意见本，还有许多表扬信：“李素丽是年初从 60

路调到我们的车队的，8个月里我们共收到了277封表扬意见和表扬信。”

读这些信，记者感到春风拂面：

车子一进站，我就感觉到有股莫名其妙的暖流迎面而来，烦躁的心情顿时清爽了许多，整洁的车辆给人一种欲乘之而后快的愿望，一路上乘务员小姐的服务更加春风拂面，一言一行，一颦一笑，显然是一位春天的使者，与此同时，我们乘客也仿佛走进了神圣高雅的殿堂，每个人都有了绅士的风度，礼貌待人，尊老爱幼，以身作则，有问必答，急他人所急，想他人所想，这不就是人们这些年所期盼却很难得到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理解吗？有幸的是我们在21路1333公交车上目睹体会了这一切，回到驻地，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感慨之余，情感的思绪迫使我坐下来记下自己的所想所感，记下这难忘的一天。

通县 39760 部队 5 分队 金伯勤

1996年4月12日

乘坐21路1333号车心情舒畅，真有上车如到家之感。我对这位售票员的工作态度深表钦佩。

北京西四大院胡同9号 张茂林

1996年3月

依依不舍下了车，我望着远去消失的汽车，感慨很多。如果说售票是平凡的工作，那么，这位售票员已把它升华了，艺术化了，她把50年代到90年代的服务方法、服务水平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乘客在享受其热情服务的同时，又得到了语言等方面的艺术享受。

乘客 烜炆

1996年2月27日

我从这个乘务员身上看到了北京市风气变好的希望，如果有一半的服务员能像这位乘务员一样，北京该有多好。

华北电力大学 王金兰

1996 年 4 月 26 日

(十七)

下午 4 时许，空车驶离西客站。

李素丽下班了。

太阳西斜，她骑自行车，踏上了回家的路。

笔直的大路向远处延伸，沿着这条路，她消失在人群中……

(原载 1996 年 10 月 4 日《工人日报》)

评析：

深入细致与真实丰满

石晓燕

1996 年，李素丽是全国各大媒介关注的焦点。这篇作品在众多报道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七届中国新闻奖特别奖。

原因在哪里呢？就在于通过记者深入细致的采访，向人们报道了真实的血肉丰满的李素丽。

为了写出这篇报道，《工人日报》记者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跟车 13 趟进行现场采访，先后与 20 多位乘客交谈，几次下到李素丽工作过的两个车队与几十位司售人员座谈，从而获得了大量珍贵的一手材料。

“给乘客下个台阶，我的服务就上个台阶。”“社会是一面镜

子，你首先对它笑，它也就会对你笑。”这些话语，出自于李素丽的口。但为人所知，却离不开记者细致的观察和准确的提炼。

报道选择的 17 个片断，展示了李素丽工作态度、工作方式、工作热情乃至人生观的各个侧面。

李素丽的形象，就由此跃然纸上。这是一位在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工作的平凡人；一位执着、勤恳，令人钦佩的新时代劳动者。

没有深入细致的采访，人们就不可能看到这些真实的片断，就不可能看到这个真实丰满的李素丽。

勋章背面的未了情

——记黄河水利委员会
绥德水保站总工程师徐乃民

金振蓉

这几年，黄河水利委员会绥德水保站总工程师徐乃民怕出差，尤其怕去大城市出差，因为每一次的启程，都会勾起他伤痛的回忆——那一段绵绵的未了情。

他觉得他和她的命运，有些像文学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那是 50 年代，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年月，刚满 20 的徐乃民，和伙伴们一起，怀着创业的激情，按着毕业分配通知上的路线找到了黄河管理委员会绥德水保站。他是学水土保持专业的，想在治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方面大干一番。放下行囊一看。傻眼了，这是“站”吗？一个 5 平方米的破庙就是站址，更没有什么仪器设备，出门是望不到边的黄土荒沟。当地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因为没衣穿而出不了门……

她来了，扎两条大辫，一脸纯真浪漫的学生气。她是学师范的，正幻想做个苏联电影中瓦尔瓦娜式的乡村女教师。来这儿一看，哪有学校的影子，有的只是遍地荒芜，满目凄凉。她哭了，她要走，还要他一起走。见他不说话，她一气之下自己扛着行李翻山越岭到了长途汽车站。就在她最后告别黄土地时，远远地见他跑来，四目相对，她哭着央求：“一起走吧！”他也满眼噙泪。良久，他痛苦地摇摇头：“你走吧，走得远远的，我只是想来送你。”从这时起，她就意识到，他已铁了心，他的事业、他的

生命都已属于脚下这片黄土地。她扑过去，两人紧紧抱在一起。

徐乃民有了家。从此，她用瘦弱的双肩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又用关心和体贴支撑起他事业的精神支柱。

徐乃民常年在黄土沟里滚打，他不知道妻子是怎样安排日常生活的，也不知道儿女们是怎样长大的。但是，他还记得那一个寒冷的春节，他在离驻地几十里外的山沟里搞试验，干冷的风飕飕地刮着，她带着过节才舍得吃的白面馍，领着孩子去和他团圆，可没走多远就被黄沙迷了路，直到两天后，冻僵的娘儿俩才被一位牧羊人发现送回了家。

他总是忙，难得有时间和妻子、孩子一起享受天伦之乐。他常常愧疚自己是个不称职的丈夫和父亲。有一次，他深情地对妻子说：“等我退了休，我们一定要好好清闲一下，到外面的大城市去看看。”他看见，妻子的眼里闪着兴奋的光。他知道，那是妻子想了很久的事。

时光飞快流逝，一晃 30 年过去了。经过徐乃民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他们开辟的水土流失治理的试验地——无定河畔韭园沟，如今已是泥不下山，水不出沟，成为全国治理水土流失的十大样板之一。昔日的荒山沟已成为当地有名的“花果山”，梯田绕山腰，果树满山坡，满目青翠欲滴。为此，徐乃民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工作者。

徐乃民明白，没有妻子的帮助，他就不可能取得这些成绩。他在心里盘算着，再过几年就该退休了，他要满足妻子的最大愿望，带她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然而，命运对他们俩似乎过于残酷，几年前的一天，正当他奔波在外搞试验的时候，妻子突然病危，当他得到消息赶回来时，跟他 20 多年进了山沟再没出过山沟的妻子已经离开了人间。他欲哭无泪，只是拉着她的手，喃喃地说：“你为什么走得这么急，我们不是说好再过几年……”妻子已经听不见，她带着永远无法实现的梦去了，却将终身的遗憾

留给了徐乃民。

去年，当水利部把一枚镶嵌着“功在禹上”四个大字的勋章授给他时，他默默地将它放在“花果山”边妻子的坟前，他在心里轻轻地和妻子交谈着：“这几十年我对不起你，让你受苦了，但我知道，你是能够理解我的，我是心里急啊，恨不能一天当两天用，早日让黄土高原变绿洲。”

风轻轻吹动他发白的双鬓，像妻子温柔的抚摸，又像她的低诉，他又听见她说：“这辈子嫁给你虽苦无怨。”

他擦擦眼泪转身离去，又要去着手制定下一个治理目标，像平时的每一次出门一样，他觉得妻子又在目送他远行。

（原载 1991 年 8 月 8 日《光明日报》）

评析：

迂回曲折 独辟蹊径

胡 茵 茵

尽管说“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但在报章杂志上却鲜见真正报道模范人物“另一半”的作品。从这一角度讲，《勋章背面的未了情》的出现就具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

作品不长，但却紧扣一个“未了情”展开，余味悠长，打动人心。

一开头，作品就写到“徐乃民怕出差，尤其怕去大城市出差，因为每一次启程都会勾起他伤痛的回忆——那一段绵绵未了情”。这是开宗明义，也是一个“伏笔”。

什么样的“未了情”？

仅仅是徐乃民夫妻间的爱情吗？不是。徐乃民对妻子的思念内疚之情、妻子对徐乃民的“虽苦无怨”的牺牲之情，徐乃民对

水利事业的奉献之情……都统一在“未了情”上，其力量足以令读者动容。

为了表现“未了情”，作品的报道技巧也是值得称道的。从细节的选取到语言的充沛感情，作品的写作显然处于一种精心构制的氛围之中。

可以说，作品是“另辟蹊径”中的佳作。

马永顺：无愧于大森林

徐晓海 王宏波 王柏成

今年4月28日，小兴安岭冰消雪融、大欧根河水开始流淌，82岁的马永顺老人又乘上公交客车，来到了他曾经战斗过的铁力林业局卫东林场，与这里的职工一起起苗、植树。迎着和煦的春风，他栽下了一株又一株幼苗。5天时间里，他植树150多棵。

营林所张主任新过门的儿媳妇，看到这个身材魁梧、紫红色脸膛的老汉与众人一道干得热火朝天，好奇地问周围的人，“这老爷子是谁？”

“他是老劳模马永顺！”

“这么大岁数咋还来山上栽树？”

“他在‘还账’”

“还账？”

“对，给大山‘还账’。”

马永顺要向青山偿还一笔什么“账”呢？那还得从头说起。

马永顺，新中国第一代林业工人，他曾靠弯把子锯一个冬天采伐木材1200立方米，一人完成6人的工作量，创全国手工伐木产量之最，创造出的“安全伐木法”、“四季铤锯法”在林业战线推广。马永顺得过无数荣誉，并14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接见。

岁月流逝，各式各样的荣誉马永顺渐渐淡忘了，可心中却牢

牢记住 1959 年全国群英会上，周总理对他的教诲：“永顺同志，林业工人不但要多生产木材，支援国家建设，还要多栽树，实现青山常在，永续利用。”

夜深人静时，老伴和孩子们都睡熟了，总理的话语在耳畔回荡，如何完成总理的嘱托？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渐渐的，朦胧变得清晰，一个想法跳了出来：向大山还账，自己砍了多少棵，就栽它多少棵。他估算一下，他为共和国建设采伐原木大约有 36500 多棵，从此，栽树“还账”成了他生命旋律中崭新的一章。

拿惯了大斧，用惯了弯把锯，喊惯了“顺山倒”的马永顺，开始时不懂造林技术，业余时间，来到苗圃，边帮人家拔草、施肥、撒药、浇水，边虚心求教，以保证栽一棵苗活一棵树，造一片林成一片绿。

从此，每年春季，不论春风料峭，还是春雨袭人，马永顺都忙碌在一片片过伐林地之中……

这年的 8 月 11 日，他乘车从铁力去西北河营林所，途经建设所东坡时，马永顺叫司机停一下车，他大步流星地往山坡上走，脸由晴转阴，气呼呼地说：“这是怎么搞的，谁挖土把树苗给毁了！”

同车的人上山一看，林地被挖了一个大坑，马永顺自言自语道：50 多棵幼树毁得多可惜呀！

第二天，吃过早饭，他直奔局长室。一时门，就亮开嗓门：“局长，你说过去重采轻育，山上造成‘暴花秃’，今天大伙儿积极造林，可又不认真保护，你说这事咋办？”接着马永顺一五一十地把被毁树苗之事说了一遍。

局长被激怒了：“一定认真处理。”最后查明，是个别人义务修路时图省事，就近取土造成的。局里就此做出决定，今后无论干啥用土，都不能毁林。

一时间，马永顺义务植树护苗的事在铁力林区传为佳话，每年春季造林时节一群群身影便随着马永顺一道出现在铁力林区的20万公顷山地上，认真而虔诚地播种着绿色。

经老人坚持不懈的努力，绿色在他手下一年年扩展，林子在一年年长高，斗转星移，岁月如流，一晃23年过去了。

1982年，年事已高的他要退休了，一些单位闻讯，要以高薪聘请这位技术高强的老劳模，他却一一回绝，说：“我砍伐的树，还有8000多棵没栽上，不还上欠大山的这笔账，我死不瞑目。”局领导担心他的身体，担心他的静脉曲张等病，一次次劝他，“算了吧，你已经栽了几万棵树了，别再上山了。”他却望着大山，亮开了嗓门：“这笔‘账’没还完，就不能呆在家里吃闲饭。”

上山植树，对年轻人都不是一件轻松的活计，何况马永顺是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一次，他在上山造林，路过一座独木桥，不小心掉到河里，弄得衣服全湿透了，人们又心疼又着急，都劝他回去，可他却说：“没关系，风吹吹衣服就干了。”坚持把这个山坡上的树苗全栽完了。

又一次，马永顺背着工具和树苗去植树。刚刚爬上山坡，一阵山风吹来，“哗哗”下起了大雨，雨水淋得他睁不开眼，浑身又冷又湿，可下雨正是造林的好时机，他硬是顶着大雨翻过泥泞的山坡，栽下了100多棵幼苗。

1991年，已是近80高龄的马永顺算了一下，欠账的树还差近千棵没栽下，他原打算用两三年时间把“账”还完，但子女们怕他累坏了，纷纷表示，今年造林全家齐上山，帮他一年内把“账”还清。马永顺一想，这样也好，不仅自己的“欠账”能尽快还上，全家都能为青山常绿做点贡献。那年5月5日，马永顺率领孙男弟女15口人来到离局20多公里远的一个荒山坡，栽种落叶松树苗。一到山坡上，他就亮开嗓门说：“我给你们讲讲造

林方法，要刨大坑，栽当中，培好土，踩实成。”并亲手栽了几棵树苗给大伙儿做了示范。

造林开始了，马永顺前面栽，5对夫妻和孩子组成造林对子，在后边比着干。奋战一天，共栽下1500棵树苗。不光帮马老汉还完了欠“账”，几个晚辈人也为荒山坡抹上了几点新绿。

夕阳余辉下，马永顺站在北关的山头上，向大山发出了深情的长叹，“大山，我欠你的账总算还上了。”

多年的“欠账”还清了，马永顺的宿愿实现了；有人劝他，这回该歇口气，享享清福吧。”

马永顺却笑着说：“‘账’还上了，可造林不能停”。1992年至1994年，连续3年，每到植树的季节，他依然走向大山……

（原载1994年7月14日《黑龙江日报》）

评析：

挖掘人物的时代精神

胡菡菡

曾是伐木劳模，今又变成育林老英雄。马永顺的身上刻着观念转变的烙印。报道从这一角度出发，使人物的时代精神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当今呼唤环保呼唤绿色的大背景下，马永顺作为优秀工人的代表，无疑能发挥鼓舞人心的良好作用。

记者的写作颇具匠心。结构上采取前后呼应与对比的手法。“砍伐了3万多棵树……又栽上了3万多棵树”，马永顺的决心和形象就在这两个“3万多”中间定了位。

细节上，记者注意撷取能够使人物饱满生动起来的片断。批评毁林人，表现的是怒；退休后还坚持种树，表现的是执着；掉到河里还要工作，表现的是奉献。几个侧面一组合，使马永顺这

个对国家建设一片赤心的老人，真实而自然地站到了读者面前。

报道的结尾采取了散文化的方式，不仅使通讯本身令人回味，更使马永顺的精神得到了升华。

这篇报道成为优秀作品的关键就在于挖掘出了人物的时代精神。

珍贵的财富

——王树理离任小记

佟化文

12月21日，庆云县委书记王树理卸任离开庆云时，小心翼翼地一个把一个装有1700封人民来信的箱子搬到车上。在他看来，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1992年9月，王树理出任庆云县委书记。上任两个月后，他在写给全县人民的一封公开信中，恳切希望大家对自己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5年过去了，王树理共收到批评、建议甚至骂娘的信1700件，这对他正确决策、警示自我起了很大作用。

今年8月中旬，东辛店乡农民张林海给王树理写信，反映自己在乡里收提留款时受到粗暴对待，要求他抓一下干部作风。8月19日，王树理把张林海请到自己家中，向他道歉，并表示要加强干部作风教育。县里处分了负有责任的干部，并以此为戒，建立制度促进干部作风转变，赢得了群众好评。几年来这个县建水库、修公路、种枣树等大的决策，都是倾听群众呼声后做出的。

12月中旬，王树理得知自己将要离任到省里工作，如数家珍般把这些人民来信逐一整理，剔除表扬性信件，把批评、建议性信件分类编号，装入上任时带来的盛方便面的纸箱里离任时，他谢绝了一切宴请、馈赠、旗匾，留下所有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惟独这箱信件，他决定随身带走。

与同志们道别时，王树理充满感情地说：“庆云的父老乡亲

和同志们在我任职期间提出的批评和建议，是对我的爱护和支持，我终生难忘。以后我将经常翻看带走的这些来信，时刻铭记群众喜欢什么、拥护什么，厌恶什么、反对什么，反思过去，鞭策自己，更好地为党为人民工作。”

（原载 1997 年 12 月 23 日《大众日报》）

评析：

小中见大有新意

周健平

县委书记卸任离别时带走了一个装有 1700 封人民来信的箱子，乍一看这算不得什么新闻。然而细细品味起来，却让人体会到小事情蕴含的异乎寻常的意义。

县委书记把人民来信看做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这体现出他对自己工作认真负责，时刻不忘用群众监督提醒自己的自觉态度。倾听群众呼声是为官者应该做却又不容易做到的。真正能深入群众，想人民所想，念人民所念，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从这 1700 封被县委书记王树理精心保存的人民来信中，我们看到了他的一片爱民之心。

记者从小处落笔，写的是人民来信，揭示的却是干部不忘百姓疾苦，为大家多办实事的深刻主题。由此可见，现实生活中并不缺乏新闻，关键是自已如何去发掘普通小事中蕴含的新意，这样才有可能写出更富新闻价值的报道。

北京最后的粪桶

王伟群

这是北京仅存的几名背粪工人。

他们是老知青，在北大荒生活了多年。回到故乡后，他们却背起了时传祥的粪桶。

在靓女如云的橱窗里，在豪华亮丽的大饭店玻璃墙上，极不相称地反射着他们的影子。

跟着他们出车

早晨 6 时 30 分，我的闹钟响了，天还是黑的。7 时 15 分出门，气象预报说今天最低温度零下 8 度。

东直门外斜街，沿东北方向往前，不多会儿就到了环卫局的清洁队。进大门，院里的地面上结了一层冰。清洁车喷着热气，整装待发。进门找背班，门口的人往后努努嘴，见一门挂企管组的牌子，进屋自我介绍完即有人伸过手来，说是背班班长，姓樊。他 40 多岁的样子，穿一件破大衣，劳动布面的，像是有一段历史了。

樊问我：“先跟我们领导谈谈吗？”

“不，先跟你们出车。”

上车，照顾我，让我坐驾驶室，剩下五六人爬上车，斜倚在后面的车罐上，旁边放了 4 个粪桶。

第一站在东四南大街的少儿出版社宿舍，这条大街是北京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再往南，被称为“银街”。

清洁车停在街沿上，边上停着几辆奥迪、蓝鸟、桑塔纳什么的，闪着缎子般的光。几个人从车上卸下粪桶，那粪桶上宽下窄，差不多有一米高，木桶四周用铁片箍得紧紧的，瓷瓷实实。谁也没有理会周围人的诧异的目光，他们一人背一桶穿过窄道进楼群里去了。

化粪池的盖子冻上了，樊用石头砸了半天，再用铁杆把井盖挑开，上面一层是黑色的硬块，用铁杆捅半天，把硬块捣碎，然后用粪杓把它们舀到粪桶里，背桶的人下蹲，把背带背上肩，右脚一使劲站起来，桶就上肩了。粪杓有点长，难免把粪泼到桶的外面，他们的衣服头发上就都溅上一些黄的黑的污点，鞋子上就更免不了。他们穿着一一种已经不多见的大头棉鞋。樊说，就这还是争取了半天才争取到的，我们的工作服一年就一身。我问为什么没有口罩，他说原来有，后来就不发了，不戴口罩还喘粗气，戴上就别呼吸了。

每个人背了十几桶后，第一车装满了，司机马师傅去卸粪。樊班长就带我到附近的大杂院看看那里的公共厕所。每进一个院就跟走迷宫似的，绕过各种煤堆、板房，到了院子尽头，对着一个铁皮钉上的破门，樊大喊一声：“里面有人吗？”没人答应，他就径直推开门，让我进去瞧瞧。

我已经作好了各种思想准备，甚至准备好了要屏住呼吸，但仍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繁华现代的北京城，居然还有这样落后的厕所，地面上只有一个浅浅的坑，坑里的粪便快溢出来了，没有下水道，坑外一滩滩说不清是什么东西，四周是一个到处透风的简易房。樊班长和他的背班每星期必须来清扫一次，否则那院里十几户人家几十口人简直没法过日子。那天，我走了五六个院子。樊告诉我，这条街上，差不多有十几个院子都是这样的厕

所。

我们回到少儿出版社的宿舍院的时候，那里的活已经干完了，清洁车拉着我们又到了东四十字路口东边的一个大杂院，车进不去，停在大街边上。

院里厕所的粪池堵了，樊班长说，要是堵得严重就得下去了。我瞅着黄乎乎的粪便，臭味刺鼻，不敢想“下去”是怎么回事，胃里一阵难受。

见我们进院，居民赶紧招呼孩子回家，关紧了门。

一桶粪约 110 斤，每天每人需要背数十桶。而且这些年要干的活越来越多了。就说刚才去过的少儿出版社宿舍，原来清洁车完全可以径直开进去，后来那条通道成了存车场。还有的通道上盖个铁皮房卖百货，他们就得背几十米甚至几百米。

他们一桶桶往外背，我也跟着一趟趟来回走，见他们把桶卡在一个圆环里，然后摇动手柄，桶就被抬高，等抬到一定高度，一摇把，桶向前倾斜，哗——一桶粪倒进车里了。一位师傅说，站远点，当心溅你一身。

——能溅出来吗？

——当然，我经常被浇得满头满脸。

我往后挪了挪，回头忽然发现。我们的车正停在一家豪华美容厅边上，橱窗里美人头像，潇洒飘逸。价格表上面写着：皮肤护理 200 元，文眉 140 元，文眼线 160 元。

——“樊师傅，背一车粪你们能拿多少钱？”

——“没钱，我们每月开支，多少车都拿一样的钱，现在比过去强点，全加起来差不多能有五六百。要是下粪池可以提成 15%。150 块钱的 15% 是多少？哥儿几个分。”

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五六百块钱？这甚至不够大款们一顿普通的饭费。

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是北京人吗？他们为什么要来干

这样的工作？

樊宝发、殷健康、蔡三中，我记住了这三人的名字。他们说一口道地的北京土话，经常把一句话的最后一个字吃掉，可走在北京的大街上，进出北京的大饭店，谁也不认为他们是北京人。就连外地进京打工的农民，也经常斜着眼瞧他们，见他们过来，赶紧让开，生怕蹭着自己。而这三个名字打从他们诞生，就记在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户籍登记簿上，直到 26 年前。

当年曾居北大荒

26 年前，8 月的北京，上山下乡的热潮远比秋老虎更热。17 岁的樊宝发和哥哥拎着自己简单的行李卷挤进了北京站月台。同行的人中，大概没有比他们更少的行李了。母亲望着儿子，一阵心酸。家里孩子多，实在没能力给去北大荒的儿子们准备棉衣，听人说北大荒冬天零下 40 度，儿子要受委屈了。哥俩安慰母亲：我们是去兵团，部队会想着的。

火车徐徐开动，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殷健康、蔡三中也先后离开了故乡。

还回来吗？他们盯着缓缓驶过的东便门城楼子，突然心里一阵茫然。

10 月，北大荒下了第一场雪。好大的雪啊，漫山遍野，一片白茫茫，每年打着雪仗过冬的樊宝发看呆了，这就是北大荒。30 连的 6000 多亩大豆被大雪盖住了，天还没亮，樊宝发拿着镰刀下地干活，曾是神气活现的康拜因被冷落在一边。为了自觉磨炼意志，颗粒归仓，兵团提出的口号是：“小镰刀万岁！”到了中午，雪开始化了，一脚踩下去，冰碴雪水顺着鞋帮进到鞋里去了。不一会儿，两脚就失去了知觉。

北大荒的地一垄有两千米，从这头望不到那头。樊宝发一天

割6垄，四五亩地，晚上收工的时候，腰都直不起来了。

26年后，殷健康坐在北京东城一条小胡同自家窄小的房里，回忆起当年的那一幕幕，眼睛凝视着远方说：“我们那时候是小镰刀胜过大机器，人手一把镰，战天斗地，人定胜天。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

一晃就这么过了9年。这9年中，他们当了班长或者排长，成了五好战士，年年有各种证书寄回家。9年，光滑的下巴上长出了胡须，他们分别娶了当地的姑娘，生下了北大荒的儿女。

然而，1978年，知识青年大返城开始了。

领导找樊宝发，塞给他一张表，说，把表填了，“婚否”那一栏写未婚，回头我们给开个证明，你就能走了。媳妇不相信他会走，每天下地喂鸡，什么也不耽误。“咱是爷们，不能把媳妇搁那儿。”正赶上妻子要临产，偏又是难产，连里的、团里的卫生员走光了，樊宝发急得火烧眉毛，这时他才真正意识到，战友们走了，兵团没了，他真的成了北大荒人。

他一如既往地干着战友们留下来的农活，每天三四点下地，天黑收工。在一望无际的北大荒里，红旗没有了，歌声没有了，樊宝发格外怀念红红火火的兵团生活。兵团改为农场，他成了康拜因手。16年后冬天的一个下午，在他北京的家中，樊宝发从床底下翻出一个用旧了的小箱子，从箱底抖落出一堆荣誉证书，他在中间翻了老半天，一边翻一边念叨：“我的三等功证书哪儿去了？在东北我年年儿（先进）”。

终于找到了他要找到东西，因为年代久了，这个原本质地粗陋的立功证书显得有些破旧，打开它我发现里面用钢笔写的字也已经模糊了。我的录音机正开着，于是我就对着录音机磕磕绊绊地念了起来：“4号康拜因手樊宝发工作积极肯干，能吃苦，起早贪黑，对车的使用比较熟练，对车的……”我卡壳了。“对车的保养检查精心，麦收排除故障，遇到一些较大的故障，为了不

影响第二天麦收，连夜修复。”樊毫不犹豫地接了下去。我惊讶地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他披着一件老棉袄，站着离我二尺远，脸上闪着光。

他心底珍藏着这昔日的光荣。

1978年那个难忘的冬天，殷健康为战友们送行，望着那些急匆匆的背影，他对自己说：“赶明儿，等孩子大点，带他们回北京瞧上一眼，这心愿就了了。”

那是1985年，洪水席卷了北大荒，农场成了一片汪洋，殷健康承包的135亩田里几乎颗粒无收。干了一年，临过年了，手里总得有点买肉的钱吧。殷健康进了深山老林替人扛木头。整整一个冬天，白毛风刮了一场又一场，他想着家里的妻子和女儿，咬牙挺着。3个月过去了，总算熬到了结账的时候，万万没想到包工头跑了，3个月的辛苦全部被风刮走。殷健康流着泪走上了回家的路，在雪地里走了3天3夜，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兜里没有一分钱，回去怎么见妻子女儿？已经是年三十晚上，远远地看见农场的灯光，家家户户挂起了灯笼，孩子们在场上点燃了爆竹，饺子准备下锅了吧？殷健康恨自己无能，过年了，不能让孩子吃一口肉馅的饺子。一推门，他愣住了，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冒着热气，饺子正准备下锅，桌上还摆着肉。妻子女儿争相告诉他，北京来人了，来慰问老知青，给了200块钱……殷健康的眼泪唰地流了下来：“北京没有忘记我！我还是北京人！”

在这片莽莽荒原上，如果不是有特殊的压力或特殊的机遇，他们将永远是北大荒人，他们的儿子女儿将是北大荒的第二代，还会有第三代第四代。事实上，孩子中最大的已经18岁了，比他们当年下乡的时候还大一些，他们自己的脊背却有些弯曲了

回来没我们的位置了

1984年，樊宝发说什么也不打算在北大荒继续呆下去了。农场为了挽留他，把康拜因优先卖给他，还给了他一套新房子。这一年，黑龙江的国营农场实行改革，将农场全部承包给个人，樊宝发是农场中最看好的致富能手，也是最看好的家庭农场场主。可两个月后，他把地退了，带着一家人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北京。

“为什么要回来，那么苦的日子都过来了，希望就在前头，你却放弃了？”1994年岁末，在他北京家中那间无比窘迫的小屋子里，我不解地问他。

“没人给开支啊！”他瞪大眼睛。

开支？我也睁大了眼睛。只一刹那，我明白了一切。

眼前这位中年男人额头爬满了皱纹，那不仅仅是岁月的烙印，更是时代的烙印。在那个时代，没有个人，只有集体、国家。个人是属于国家的，是集体的一分子，国家为每一个劳动者支付报酬。樊宝发喜欢这种活法儿，喜欢与国家、与集体总是以“开支”联系在一起的那种感觉。现在承包到户了，每个人只为个人干活，再也感受不到崇高，没有光荣，也没有牺牲。樊宝发忍受不了这种只为自己活着的生产方式。“咱这思想跟不上形势，一承包，当农民了，没人管了。我可不乐意单干，就想跟着集体干。”他终于离开了北大荒，回到北京来找“集体”。

殷健康和蔡三中也回来了。

可是，北京还有他们的位置吗？

殷健康没敢带妻子女儿一块回来，因为没有地方住。北京的家只有一间12平方米的小房子，母亲死后姐姐一家人住在里面，自己再带一大家子过来怎么住啊？直到一年后姐姐终于找到自己

的房子，才把这间小屋让给了殷健康一家。

蔡三中的不幸也总是跟房子有关系。当年在北京的小妹妹为了给哥哥留出一间房，跟后妈吵了一架后把原来家中的房子换成了两处，谁知换的是一间私房，落实私房政策的时候，房东执意要收回这间屋子，好说歹说，给换成了一间 8 米的小屋。还是不得安生，只好去郊区租农民的房，一月房租要 150 元。

樊宝发算是最幸运的了，跟父母弟妹住在一套三居室里，热热闹闹一大家子差不多有 10 口人。

他们发现，北京不光是没有他们栖身的地方，更没有他们挣饭吃的位置。他们站在北京的街头上，有时茫然问自己：“我回家了吗？”

他们觉得在北京甚至不如在北大荒活得踏实，心里没底，空落落的。可无论如何得活下去，还有四口人得养活呢。扛大件，看大门，卖菜，做工，凡能找到的活他们全干过了。

转了一圈，蔡三中在北京终于没能找到挣饭食的地方，无可奈何地到了平谷县，在一家乡镇企业当电镀工人。算他走运，一位北京来的师傅把自己的电镀技术毫无保留地教给了他，他从此成了这家工厂惟一的技术员。妻子女儿也在平谷住了下来，工作读书各得其所。此时在北京市，蔡三中的姐姐几乎每礼拜都要去一趟劳动局知青科，希望能为弟弟找到一个更好的机会，找一个铁饭碗。

樊宝发没有找到“集体”。他给人蹬三轮，从通县拉铜版纸拉到王府井，那纸卷重 600 多斤，去 70 里，回来 70 里，每次挣 9.13 元。还有一次，货主让他拉古董，那是两个花瓶和几个缸，值好几千块钱。临走，货主叫住他叮嘱一句：当心点，别给碎了。樊宝发不敢骑着走，他推着车，一直走了 3 个小时，一路小心翼翼地护着车上的宝贝，嘴里不断吆喝着，劳驾，看车！这 3 个小时高度紧张的劳动只挣了 3.75 元。

干这活不能养家。樊宝发辞了工作，买了一辆板车，开始卖菜了。他每天早上两点起床骑着车到北京南端的南苑批发一车菜，下午回来和母亲一起在家门口的街上摆摊。每天下午三四点钟，他的菜摊前就围满了人，娘儿俩卖的菜特干净，秤又高，分量足足的，人也和气。樊宝发的名气一下子传开了，一车菜用不了俩小时就卖完了。干了两三年，樊宝发挣了两万多块钱，这在当时是一笔大钱，樊宝发俨然也是一个万元户了。可他还在期待着什么。

1989年秋天，一个街坊的孩子找到樊宝发，悄悄地问他，环卫局招人，招背粪的，去不去？去，当然去！樊宝发一阵兴奋。

头些年北京环卫局的背粪工人大都雇的是外地临时工，惹了不少麻烦。到了1989年，最后一批老知青要回来了，不好安置，环卫局提出愿意来背粪就给老婆、孩子办户口。最后，劳动局选了14个人给了环卫局，6个人留在了背班。半年试工期，一天6块钱，先交500元钱押金。樊宝发、殷健康、蔡三中和另外三位老知青就这样当了背粪工。

每月有单位给开支心里踏实

30多年前，身为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同志亲自走到背粪工人中间，背起了这100多斤重的粪桶，还让儿子也来背粪，也来体察一下背粪工人的甘苦。那张刘少奇主席和背粪工人握手的照片成了共和国历史上珍贵的一页。那时候的人仅仅有歧视背粪工人的念头就会受到良心的谴责。然而在今天的北京，人们经过他们身旁时，无不掩鼻而过。

“为什么放着万元户不当，非要去背粪不可？”

“我有单位，每天上班，下班，到月初就开支，心里踏实。”

.....

1985年春节的那个风雪之夜，一直铭刻在殷健康心底里，就冲这个，他说他要为政府好好干。“咱也是人，干这活看了也恶心。刚开始老吐，现在也吐，吃一口东西全吐，早起不敢吃饭。也就是习惯成自然，5年了。”后来他终于有一次机会离开了背粪班，队里调他去当木工，他去干了一礼拜，死活要回来。他觉得背班的人义气。

这个感觉蔡三中最强烈了。背班的6个人中他最瘦，两眼深凹，体重还不到100斤，身体也不好。都是老知青，班上的人能帮就帮他一把，别人的粪桶盛三杓，只给他装两杓。

蔡三中有一个聪明任性的女儿，自打爸爸干上了背粪工，说什么也不让他再和面蒸馒头包饺子了。爸爸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让他赶紧洗手，洗了一遍又一遍。家里的馒头必须到粮店里去买，要不就自己到外面买早点吃。粮店的馒头1.5元一斤，对蔡家来说这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我不计较这事，孩子也不容易。”蔡三中说。

曾经有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叫“理解万岁”，在采访的时候我提起这个话题。他们给我讲了一堆故事，然后说：“无所谓！”

“那次上港澳中心，化粪池堵了，我下到底下去抠，底下特窄，得弯着腰干，那些污水脏东西全顺着袖子进衣服里面去了。那底下有沼气，说把人摞那儿就摞那儿。化粪池通了，还得把粪背上来，那池子在饭店地下室的最底层。那天我们晚上去的，直到早上8点多钟才出来，胳膊腿已经不听使唤了。可早上还得出车，要不出车费就没了，奖金也得扣。给这些大饭店干活最麻烦，收了他们的钱，就跟把我们卖了似的，怎么干也不满意，张口闭口就是我们给钱了呀。我们就不爱听这个，其实我们还是照样每个月拿工资。”

“前些日子在外馆（斜街），干完活，人家给了 250 元，说 100 块钱你们自己留着，150 交上去，发票只开 150 元。那不行，咱是工人，车是公家的，一分钱我们也不能要。”

“您瞅见了没有，大街上就有这样的人，指着我们教育孩子说，臭不臭，再不好好学习，赶明儿你也得背粪去。其实这都无所谓，我们也不朝心里去了。我们自个儿还挺看重自己的。”

那天在樊宝发家，看见一张集体的合影，是 20 多年前兵团的那个集体在今天又一次的集合。照片是一群 40 多岁的人，都在笑着，笑得很灿烂，比之于他们下乡前那张照片上的严肃表情，仿佛这 20 多年他们没有受苦，而是每人捡了一块金子。

樊宝发坐在这群人的最中间，他非常自豪。“我自己觉得比较幸福。你甭说这工作不好，是工作就得有人干，我不干，别人不是也得干吗。有这行我就干，组织上把老婆孩子户口办回来了，我就踏踏实实给北京市干活！”

都以为他们挣得很多

跟背班的清洁车采访，他们对我提起上电视的事，说北京电视台拍了一个电视系列剧，叫《真情曲》，第一集就是拍的他们自己。让我播出的时候别忘了看。

蔡三中挨个给姐姐妹妹打电话，通知他们播出的时间。三姐埋怨他，说别再打电话了，都快臭遍北京城了。他不在乎，连街坊邻居都通知一遍。

殷健康家的那台黑白电视机被冷落了好些日子了，不让女儿看，怕影响功课。可是那天晚上例外。12 月 7 日，北京电视台播出《真情曲》第一集——“时传祥新传”，一家人早早地就守在电视机边上了。

那是他们自个儿演的电视剧，演的都是每天发生过的事。第

一次看见自己出现在屏幕上，全家人都觉得新鲜还有些激动。殷家两个女儿是爸爸的骄傲，殷健康不想让孩子在人前抬不起头，从不在家提班上的事。女儿只知道爸爸是掏粪工人，却从没去仔细想过掏粪工意味着什么。看着看着女儿哭了，爸爸太不容易了。

他们听说电视台原打算找演员来演，后来说是钱给不起，只好还用生活中真实的人物自己来演。半个小时的片子，他们每人拿到了 100 元钱的报酬。

“人家说了，请演员简直不敢想，谁演啊。”殷健康说这话的时候表情挺复杂的。

蔡三中在电视中的台词最多，戏也最多。人家问他：“哥儿们，干这活挣多少钱？”

“两千。”说的跟真的似的。

“台词这么写的，现在谁见谁骂我，队里的人气得都关电视了。其实平常我就这么说，两千。总还得壮门面吧，免得跟人家抬扛。我们那儿一工地都是农民工干活，那厕所根本就脏得没地儿下脚。我们去掏粪，人家问我挣多少，我张口就是两千，人家不信，两千？给我五千我都不干。还有一次，一个换啤酒的问我挣多少钱，我问他背一桶给你 20 干不干？人家说给 50 也不干，四五百块钱就干这个，还北京人呢！”

电视剧播完了，环卫局宣传科的同志到区委走访，想听听反应。区里干部说：“瞎编的吧，这年头哪还有背粪工？”听说是真的，接着又问：“就算有，那每月还不得挣两千？”

.....

蔡三中的女儿 16 岁，在北京一所市属重点中学读初三。好多孩子交足了赞助费，找遍了关系才能进这所学校，自己的孩子完全是凭真本事考进来的，这是蔡三中最大的欣慰。

跟他一样，樊宝发、殷健康都有着令人自豪的女儿们。在吃

了 20 多年的苦之后，这些出生在北大荒的孩子们成了他们的希望所在，他们觉得苦没白吃。

樊宝发说，什么是强者？强者就是什么都能忍，在别人面前挺得直腰板！

他们忍受着，忍受着生活上的窘迫、工作中的重负和心灵上的委屈。因为他们虽然还背着时传祥的粪桶，而时传祥的时代氛围已不会再现。他们也许是粪桶最后的北京传人。可他们挺直了腰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早在 26 年前，他们就开始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为国家分担灾难，分担忧愁，分担痛苦。这是一代人独有的活法儿。

他们还将这样走下去。

（原载《中国青年报》）

评析：

叙说普通人的平凡故事

胡茵茵

这是一篇刊于《中国青年报》《冰点》专栏的作品。它突破了新闻不写普通人普通事的框框，把新闻界的关注和爱心留给了一群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物——背粪工。

报道的篇幅很长，如果把握不当，就容易令人乏味。但记者看似平淡的笔触，却紧紧扣住了人们的心弦。背粪工的形象与豪华都市的反差；背粪工 20 年的知青生涯；背粪工对“开支”的执着；背粪工对他人眼光的细腻的心理体验。作品在写作上深入细致，环环相扣。

还不止于此。记者的采访写作从一开始就带着对普通人的理解和崇敬。那个粪水四溅的镜头，那个女儿不让爸爸做馒头的细

节，那个背奖状의片断……没有深入接触，没有大量细致的工作，没有打开相互沟通的心灵之门，它们是不会被人轻易知晓的。

长久以来，新闻界都忙于寻找典型，树立典型。《北京最后的粪桶》却走了另一条路。它告诉人们，普通人平凡人的故事常常也是真实感人的。报道显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在它之后，更多的来自新闻界的报道，都在把关注和爱心留给普通人。

在大海中永生

——邓小平同志骨灰撒放记

何平 刘思扬

一位以自己的一生书写中华民族崭新历史的伟人，今天完成了他人生的最后一个篇章。

1997年3月2日上午。

银色的专机，离开西郊机场，在首都上空低低地、缓缓地绕飞一周，然后穿过云层，飞向祖国的辽阔大地……

机舱内安放的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邓小平同志的骨灰。

一面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在骨灰盒上。

这是党和人民给予一位93岁的老共产党员的最高荣誉。

捐献角膜、解剖遗体，不留骨灰、撒入大海——这是把毕生毫无保留地献给祖国和人民的邓小平同志的遗愿，也是他留给党和人民的一份珍贵遗产，表现了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高尚情怀。

今天，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夫人卓琳等亲属一起，以最朴素、最庄严的方式完成邓小平同志生前的这一嘱托。

穿云破雾，专机向大海上空飞去，飞向这位一生波澜壮阔的伟人最迷恋的地方。

也许是苍天为之动容，当专机飞临大海时，天空出现一道绚丽的彩虹。

11时25分，专机飞至1800米高空。强忍着悲痛，81岁的卓琳眼含热泪，用颤巍巍的双手捧起邓小平同志的骨灰久久不忍松开。她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小平同志的名字，许久才将骨灰和五彩缤纷的花瓣缓缓撒向大海。

骨灰撒大海，鲜花送伟人。

1939年8月，在延安陕北公学学习的卓琳与邓小平相识相爱并结为革命伴侣。那年，邓小平35岁，卓琳23岁。两人共同走过了58年的人生历程。如今，面对自己深爱的丈夫的骨灰，她怎能不肝肠寸断，悲痛欲绝。

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时刻。

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胡锦涛同志缓缓地将骨灰和花瓣撒入大海。

随后，邓小平同志的子女邓林、邓朴方、邓楠、邓榕、邓质方和孙辈眠子、萌子、羊羊、小弟，悲痛地跪在机舱里，撒放骨灰与花瓣，完成他们敬爱的父亲、爷爷的遗愿。邓榕哽咽道：“爸爸，您回归大海，回归大自然，您的遗愿得到了实现，您安息吧！”

跟随邓小平同志多年的卫士孙勇、张宝忠一身戎装，忠实地守卫在他的骨灰盒前。

泪水涟涟，哀思绵绵。

第一次见到海洋，邓小平还是一个16岁的少年。那是1920年，他远渡重洋，到欧洲大陆勤工俭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那些日子里，美丽而苦难的祖国，时常越过海洋，沉入他的梦中……

大海，是他革命生涯的起点。1922年，18岁的邓小平在法国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从此，他走上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大海，磨炼了他坚强的意志。从百色起义到浴血太行，从挺进中原到决战淮海，从横渡长江到挥师西南，他出生入死，南征北战，为共和国的创建立下了不朽功勋。

大海，坚定了他革命的信念。早在莫斯科学习时，他就“**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60多年后，他在退休之前，依然深情地说：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

飞机盘旋，鲜花伴着骨灰，撒向无垠的大海；

大海呜咽，寒风卷着浪花，痛悼伟人的离去……

邓小平一生迷恋大海，与波峰浪谷有着不解之缘。一下海，他就舒展双臂，游向深处。无论海多深，风多急，浪多大，他都劈波斩浪，勇往直前。

大海的无垠，开阔了他博大的胸襟。

浪涛的汹涌，塑造了他顽强的性格。

潮涨潮落，大海沉浮，就像他人生的三落三起。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虽历经风险，但他始终百折不挠，总是能一次次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挽狂澜于即倒，在沧海横流中显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无畏的英雄本色。

历史不会忘记，1978年12月，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揭开一场新的伟大革命的序幕，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在他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改革大潮汹涌澎湃。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改革，以神奇般的魔力，使古老的中华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正如一首歌颂小平同志的诗所写：“于是才有了凤阳花鼓，

敲响农民走向市场的节拍；才有了深圳神话，十年完成一个世纪的跨越……”

1992 年的春天，邓小平再次来到海边，像一位舵手，又一次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指明了航程。

——改革开放胆子要更大一点，思想更解放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

——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被称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以他大海般的气魄，又一次在中国大地掀起改革开放的巨澜。

飞机盘旋，鲜花伴着骨灰，撒向无垠的大海；

大海呜咽，寒风卷着浪花，痛悼伟人的离去……

历史不会忘记，1979 年大年初一，邓小平最后一次越洋过海访问美国。这次出国距他少年时飘洋过海勤工俭学，整整 59 年。

风风雨雨，沧海桑田。饱经忧患的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磨砺，太多的坎坷，太多的苦难。闭关自守，必然带来停滞、贫穷、愚昧和落后。

——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

——太平洋再也不应该是隔开我们的障碍，而应该是联系我们的纽带。

邓小平以巨人之手，将封闭的国门打开。

位于南海边上的深圳、珠海，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道风景线。1979 年 4 月，他提出了兴办经济特区的大胆设想，鼓励创业者“杀出一条血路来”。国门打开了！沿海、沿江、沿边，全

方位开放的大格局已经形成、古老的中国终于向世界敞开了博大的胸怀。

飞机盘旋，鲜花伴着骨灰，撒向无垠的大海；
大海呜咽，寒风卷着浪花，痛悼伟人的离去……
海天相接，碧波相连。

小平同志心系各族人民，心系港澳台同胞，心系海外侨胞

……

也许，奔腾不息的浪花会把他的骨灰送向祖国的万里海疆。小平回眸应笑慰。他开创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处处气象万千，后继有人，大有希望。

也许，奔腾不息的浪花会把他的骨灰送向香港、澳门。小平回眸应笑慰。他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即将成为现实。香港回归即在眼前，澳门回归指日可待。

也许，奔腾不息的浪花会把他的骨灰送回台湾。小平回眸应笑慰。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他也是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共同心愿，骨肉同胞终有一天会团圆。

也许，奔腾不息的浪花会把他的骨灰送向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小平回眸应笑慰。海外侨胞为祖国在改革开放中腾飞而骄傲；各国政要和人民盛赞小平：“20世纪罕见的杰出人物”、“本世纪公认的世界级领袖”、“邓小平的影响超时代超国界”……邓小平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

骨灰撒大海，鲜花送伟人。

11时50分，专机盘旋着向大海告别。

透过舷窗望去，水天一色，波翻浪涌。从那永不停息的涛声中，人们仿佛又听到了震撼过无数人灵魂的声音。

“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

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人民的事业是永恒的。

如同一朵浪花，他从故乡的山溪流入嘉陵江、长江，然后穿云雾，过三峡，奔腾而下，经过九曲十八折，最终汇入浩瀚的大海……漫长的征程，昭示着一个朴素的真理：敢向时代潮头立，沧海一粟也永恒。

邓——小——平

——一个铭刻在亿万人民心中不朽的名字， 他在大海中得到永生！

（原载 1997 年 3 月 3 日 《人民日报》）

评析：

笔锋常带感情

李宁

这是一篇中国新闻奖的获奖通讯，不仅因其题材重大，更因其写作手法的突破创新，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一代伟人邓小平，在其 93 年的人生路途中历尽艰险曲折。从青少年时代去欧洲勤工俭学，到领导百色起义、浴血太行、挺进中原、决战淮海、解放全国，再到新时期领导全国人民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提出一国两制构想，这样丰富的经历，要浓缩在数千字的通讯中，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如果满足于罗列邓小平一生的丰功伟绩，这篇通讯很容易写成泛泛而谈的平庸之作。

出人意料的是，新华社记者何平、刘思扬，巧妙地用了一个概念——“大海”，将这些“散珠”串成了一篇完整、跌宕、流畅、大气的佳作。

作品的由头和明线是“邓小平同志骨灰撒入大海”这一新闻事件。“骨灰撒大海，鲜花送伟人”和“飞机盘旋，鲜花伴着骨灰，撒向无垠的大海；大海呜咽，寒风卷着浪花，痛悼伟人的离去……”这两段话出现在每层表述的转换之处，起到了贯穿全文、聚零为整的作用。

文中将邓小平的经历、思想与“大海”巧妙而自然地联系起来，如“第一次见到海洋，邓小平还是一个16岁的少年。那是1920年，他远渡重洋，到欧洲大陆勤工俭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潮起潮落，大海沉浮，就像他人生的三落三起。”“1992年春天，邓小平再次来到海边，像一位舵手，又一次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指明了航程。”“也许，奔腾不息的浪花会把他的骨灰送回祖国的万里海疆。小平回眸应笑慰。他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即将成为现实。”一切材料围绕“大海”展开，使得整篇通讯凝而不散，舒卷有致，在谋篇布局上堪称典范。

另外，这篇通讯的诗化语言也值得一提。例：“如同一朵浪花，他从故乡的山溪流入嘉陵江、长江，然后穿云雾，过三峡，奔腾而下，经过九曲十八折，最终汇入浩瀚的大海……漫长的征程，昭示着一个朴素的真理：敢向时代潮头立，沧海一粟也永恒。”梁启超曾提倡写报刊文章要“笔锋常带感情”，通讯尤其要具备这种感染力。

为了 61 个阶级弟兄

中国青年报记者

1960 年 2 月 3 日，农历正月初七；

现在，整整是下午 4 点钟

在首都王府井大街，车水马龙，热闹繁忙，商店穿戴着节日的盛装，人们满面春风地东来西往。就在这王府井北口八面槽的路东，有一家门市很小的国营特种药品商店。这时候，营业员们在笑盈盈地答对顾客，办公室里，算珠响个不停，快下班了，正忙着结账。忽然，有人兴致勃勃地拿来一大把红红绿绿的票子：

“同志们，今晚政协礼堂有精彩晚会，首都商业职工春节大联欢！”

“好哇！”大伙乐得嘴都合不上了。

原来，在春节放假的日子里，我们大家都休息，可商业职工却还忙在柜台上，为了让我们在假日里买到称心的东西，可真是忙得脚不沾地。所以，这个由首都著名艺术家表演、内容十分精彩的大联欢，只好推到正月初七才举行。大家分到票子，更是欢喜地忙工作，只等下班以后，带上全家老少，去尽兴欢度 60 年代的第一个春节……

陡然，办公桌上的电话，响起了十分急促的铃声，戴近视眼镜的业务员老胡，一把抓起听筒：

“喂，哪里？”

“长途！我是中共山西平陆县委，我们这里有 61 名民工发生食物中毒，急需 1000 支‘二巯基丙醇’，越快越好，越快越好！”听筒里的声音十分响亮而焦灼。

“我们立刻准备药品！”很怕对方听不清楚，老胡几乎喊起来了：“我们马上设法把药发到太原！”

“不行！太原距平陆尚有 1000 余里，而且要翻山越岭，交通极为不便，请设法空运……空运！！”

61 个同志的生命，危在旦夕！1000 支注射剂，非得空运！……每一个字，都好似一颗钉，颗颗钉在人们的心上！就在老胡抓耳搔腮地和对方通话时，大家已经都围上来了。商店里好一阵紧张，人们的心里，早已把“精彩晚会”丢得无影无踪。党支部立即召集紧急会议研究，决定全力以赴办好这件事。发动大家想办法，立刻请示领导。于是，全商店的人，把心拧成一股绳，把精力全都集中在这一连串的悬念，一连串的困难上了……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亿万劳动人民是一个亲密无间的整体。一根红线贯穿，颗颗红心相连，大家同呼吸，共甘苦……

事情原来是这样发生的：

2 月 2 日，在山西省平陆县

一座新落成的红色大楼里，灯火辉煌，中共平陆县委扩大会议，照常进行着，与会者心神振奋，讨论的是 1960 年规划。

7 点钟时，县人民委员会燕局长匆匆奔进会议室，找到县人民医院王院长说：

“一小时前，风南公路张沟段有 61 名民工，发生食物中毒，请立刻组织医务人员抢救……”

他们的话还没说完，坐在主席位置上的中共平陆县委第一书记

记郝世山同志，也已晓得了这紧急情况。这位 50 来岁的老书记，立刻站了起来，目光炯炯地把会场扫视了一遍，然后，果决地说：

“同志们，现在要全力处理一件急事，会议暂停！”

说完，郝书记一甩手，披起那件旧棉大衣，立即召集县委常委会议研究，当机立断，全力抢救。片刻，大卡车就载着负责同志，载着县医院全部最好的医生，在茫茫的黑夜里，翻山越岭，向我们的 61 个阶级弟兄身边奔去！

这平陆县与河南省的三门峡市，只隔一条黄河，县北 50 里外张村一带，正在修建一条从芮城风陵渡到平陆南沟的省级公路，这条公路是山西全省支援黄河三门峡伟大建设工程的交通命脉。筑路民工侯永胜一个人一天就挑了几百担土。他们展开了对手赛，改革了一系列工具，工效步步提高。甚至春节期间，自愿少休息，打了个开门红的大胜仗。谁想竟发生了这偶然的不幸！这是 61 个多么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他们的生命有危险，我们能不心疼吗？

县里的汽车来到张沟工地以前，张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薛忠令，亲率公社医院 20 多名医护人员，早已来到。他们正在忙着给病人洗身、洗脚、消毒。县里的医生跳下汽车，立即插手诊断，立即治疗！

他们使用了各种办法：

给患者喝下了绿豆甘草水解毒，无效！

给患者又注射了吗啡，仍然无效！

……无效！无效！

紧张，无比的紧张！空气窒人，医生、护士挥汗如雨。县人民医院负责医生解克勤等同志，经过紧张详细的会诊后，断定：

“非用特效药‘二巯基丙醇’不可！必须在 4 日黎明前给病人注射这种药，否则无效！赶快派人去找！”

就在同一个时间内

县委会里，不安之夜。

我们的郝书记，不停地吸着烟，守在电话机旁，他嘴角上的皱纹，更加深陷了。参加革命 20 多年来，他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自个生病（他现在还患着关节炎），好像没那么回事，可乡亲们一有个头痛脑热，他就记着放不下，非想个法帮你治好心里才舒坦。何况，现在这 61 个同志，有的是生命危险！郝书记更加坐卧不安了……这时候，他们接到了患者急需“二巯基丙醇”的电话，马上就派人去找。县人民医院的司药王文明和张寅虎，这两个小伙连厚衣服也没顾得穿，两步并做一步走，跳过一道道深沟险壑，到三门峡市去找药。你看，这才叫真正的“司药员”，药房里没有的，他愿意经历千辛万苦，跑遍天涯海角，也要给你找到！

他们来到了黄河茅津渡口，在微微的星光底下，只见那黄河翻滚着巨浪，只听那河水拍打岸头，声声震人心碎。这两个小青年，明明知道夜渡黄河容易翻船落水，极其危险，但是，为了挽救 61 位同志的生命，在这重要的时刻，就是天大的险，他们也心甘情愿去冒！他们毫不犹豫地去敲船工的门。船工从鼾睡中醒来：

“敲门干什么？”

“请摆我们渡河！”

“黄河渡口，自古以来，夜不行船，等天亮吧！”

“不能等！为了救人今夜非过河不可！”

当船工们听说是为了挽救 61 个祖国建设者，老艄公王希坚，不顾今晚正发喘，猛然从热乎乎的被窝里跳了起来，系上搭裤，吆喝一声“伙计们，走！”后面王云堂等几个人紧跟上。来到

边，二话不说，驾起船，直奔河心。凭着与黄河巨浪搏斗了几十年的经验，凭着一颗颗赤诚的心，终于打破了黄河不夜渡的老例，把取药人安全送到了对岸。

可是，三门峡市没有这种特效药！

这已经是 2 月 3 日的中午了。时间啊，你停滞一会吧！你为什么老是从人们的身边嗖嗖地急驰而过，想挽也挽不住你……

郝书记急切而坚定地指示：“我们还是应该就地解决。向运城县去找！向临汾县去找！向附近各地去找！”

就在这时，张村公社医院又来了电话：“如果明晨以前拿不到‘二巯基丙醇’，14 名重患者，将会有死亡！”

找药的电话，不断头地回来了。

运城县没这种药！

临汾县没这种药！

附近各地都没这种药！

郝书记斩钉截铁地说：“为了 61 位同志的生命，现在我们只好麻烦中央，向首都求援，向中央卫生部挂特急电话！向特药商店挂特急电话！”

于是，这场紧张的抢救战，在 2000 里外的首都，接续着开始了……

人心向北京，北京的心立刻和平陆的心一起跳动

2 月 3 日，下午 4 时多，在卫生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的一所四合院里，药政管理局的许多同志，都停下了别的工作，忙办这件刻不容缓的事，药品器材处长江冰同志，在接到平陆县委打来的电话后，就一面叫人通知八面槽特种药品商店赶快准备药品，一面跑去请示局长和正在开党组会议的几位部长，徐运北副部长指示：一定要把这件事负责

办好，立刻找民航局或请空军支援送药！

现在，处里胖胖的老吴同志，头上汗水津津，正在紧张地向特种药品商店催药，共青团员冀钟昌正在与民航局联系；电话里传来的是不匀称的呼吸。显然对方也在焦急：

“明天早晨，才有班机去太原，那太迟了，太迟了！……对啦，请求空军支援！”

真急人，电话一个劲占线。当小冀接通空军领导机关的电话时，空军已晓得了这件事。原来民航先一步为此事打来了电话。这时，值班主任向小冀又进一步了解了卫生部的要求，立即跑去请示首长。首长指示：全力支援。要办得又快又好！于是，像开始一场战斗一样，有关人员各就各位，研究航线，研究空投，向部队发出命令……这一切都办得十分神速，这一切都贯注着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都贯注着对人民极其深沉的爱！

阶级友爱，情深似海，在我们中间，一个人发生困难，就有上百、上千、上万个素不相识的人，热切地向你伸出手，不遗余力地帮助你……

现在，已经是下午 5 点多了

从首都广安门外到八面槽的遥远路途，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穿过川流不息的车辆，走过大街走小巷，一位 30 来岁的工人，正冒着数九天的寒风，拼命地蹬着一辆载货自行车飞驰。

“同志们，闪道，闪闪道！”

他不断地向行人呼喊。这车上拉的就是“二巯基丙醇”。骑车的叫王英浦，是位先进工作者。你看，他把车轮蹬得飞转，30 华里的路程，一个小时多就赶来了。干嘛要从 30 里外运药来？这其中还有段小故事：

这‘二巯基丙醇’，原本是由国外进口的，算是一种稀有药

品，可是去年，我们的国营上海第一制药厂的工人，创造性地揭开了它的秘密，现在已能大量生产供应了。它再也不是什么稀罕玩艺，它的身价，已经从特种药品降为普通药品，所以特药商店刚刚把它送到库房去，准备发往各地普通医药公司经营。谁知道现在又突然需要它，因此又拉了它回来。

且说王英浦这时正喘吁吁地把药品搬进屋来，大家忽地围住他：

“老王，你真是两条神仙腿啊！”

就在同一个时间内

我们的特种药品商店里，党支部书记田忱和共产党员何思鲁，正拿着电筒，伏在地图上，照啊，找啊，他们干什么呢？屋里明明亮着太阳灯，往常，针掉地上都可以找到，可是今天却怎么也不够亮，噢，他们在找：平陆在哪？他们在想；到底如何运送？这些，迄今还都是悬案！

正在这急死人的节骨眼上，卫生部又来了电话：

“空军已热情支援，保证今夜把药品空投到平陆县城！请你们快把 1000 支药品装进木箱，箱外要装上发光设备……”

有飞机啦！人们的心眼里，真像是久旱逢甘雨，兴奋得都跳起来了！但紧跟着又是一个困难：这发光设备可怎么解决呢？

就在同一个时间内

时间，一秒，一分……一闪而过，现在距离 4 日清晨已经没几个小时了。

在张村公社医院里，空气仍然异常紧张！张村公社的社员们，给自己的弟兄送来了大量豆腐、粉条、蔬菜、糖、细粮……

这些东西堆在那里，有谁能吃呢？我们的弟兄还在危险中！山西省人民医院，临汾人民医院在听到这项紧急消息后，也都迅速派来了医生。现在，40多位医护人员，头上冒着一串串的汗珠，他们已经20来个小时没合眼，为了延续这61条生命，土法、洋方，各式各样的招，都使尽了，可是病人还不见有何好转！

突然有人报告，“同志们，县委来电话说，中央已决定今晚派飞机送药来！”

这是真的么？是真的！病人们那绝望的眼神，忽地亮了，人人的眼里，都饱含着无限感激的热泪……

现在，时间将近晚上7点

特药商店里，药品箱都快装好了，可是发光设备却还没个着落。这时，一个戴眼镜的姑娘，猛地把辫子一甩说：

“我找五洲电料行去！”这人名叫李玉桥。

她飞也似地来到了五光十色的五洲电料行。吓，这里真是顾客盈门，共青团员贺宜安在忙着给顾客拿这拿那。李玉桥简短地把情况跟小贺说完，问他：

“给你30分钟，能不能办好？”

“放心吧，李大姐，坚决保证！”

李玉桥帮他搞营业，小贺抬腿就去找人。半路上正好碰见了王明德，小王是北京市的先进工作者，更是一位热心肠的小伙子。他俩急中生智，连跑带研究，真是一个踉跄一个智慧，他们想用4节电池焊在一起，装上灯泡，可亮半个多小时；又研究出用16节电池，4个灯泡，把药箱的四面都装上灯，空投落地时，这一面的摔灭了，保险那几面的还亮着，说着说着，他们就干起来了。这时，正好门市部主任老杨从外面开会回来，一听说这是急事，也帮他们忙活起来。过了一会，李玉桥又来催：

“时间紧迫，不能超过 30 分钟啦！”

“我们保证两分半钟就弄好！”

果真，李玉桥头脚走回商店，小王就带着焊好的发光设备，一溜风地也钻了进来，真是 2 分半钟啊！

现在，是 7 点半钟以后

一辆胜利牌小轿车，从卫生部大门里急驰出来，奔向特药商店。

车子来了。这时候，正像老何事后所描绘的：也不知那一箱子药品，到底是怎么拿出来的，只见大家一拥而上，生怕误了一分一秒的时间，生怕有个拿不住摔到地上，许多只手擎着这 1000 支“二巯基丙醇”，挤出商店的那狭小的门，轻轻地把它放在胜利牌小轿车最好的席位上！

胜利牌轿车载着 1000 支“二巯基丙醇”，正在灯火辉煌的大街上，在静谧的京郊林荫大道上，响着喇叭，箭也似地向机场疾驰。

就在同一个时间内

平陆县邮政局的电话铃声一阵疾响。从下午 3 点开始，平陆——北京的长途电话已经成为一条极为敏捷的专线，这电话又是空军领导机关打来的。亲自守护在电话机旁的邮政局长董鸿亮同志，忙把电话接到县委会。郝书记接过电话，只听见：

“请赶快物色一块平坦地带，要离河道远些，准备 4 堆柴草。飞机一到，马上点火，做为空投标志！”

“好 立即准备！”

于是，书记、县长亲自指挥，有线广播站里传出了最洪亮声

音，向县城附近的机关、学校、人民公社，发出了县委、县人民委员会最紧急的号召。声音所到之处，正在学习拼音文字的干部们，撂下了书本跑出来，学生们从温课的教室里涌出来，老人们拄着拐杖走出来，新婚夫妇从温暖的新房中走出来，建设局的工人们，拖着废木碎柴往城外空地上跑；圣人涧那面的山坡上，又有一大群红旗公社的男女社员，抱着大捆大捆的棉柴芦苇，向这块平坦地势上奔来……

眨眼间，岗尖岗尖的 4 大堆柴草已经准备好了！

几千人林立在这块名叫圣人涧的空地上。人们满怀急不可耐的激动心情，向茫茫的夜空，向东北方向，不，向我们伟大的首都，了望着，了望着；人们的心早已经穿过了云层！曾经在部队上做过通讯工作的孙治勤同志，站在高高的山岗上，凭着他的经验，凭着他一双能听出十里以外的耳朵，倾听着飞机的动静……

这是一场共产主义风格大发扬的胜利战斗。舍己为人、友爱互助精神万岁！

现在，是夜里 9 点 03 分

北京，繁星满天，一架军用运输机，满载着首都人民的深情厚谊，冲向银光闪闪的夜空，向西南方向风驰电掣地飞去。卫生部的陈寅卿同志随机前往。

这是一次十分困难的飞行。夜间空投，在平陆空投场没有地面指挥和对空联络的情况下，加上地形复杂，山峦重重，空投的又是水剂药品，而且要保证做到万无一失……部队领导对这次空投任务极为重视，政委、大队长、参谋长亲自研究，特别选派了最有经验的机长、领航长、通讯长和机械师，并且是一架飞机派了两个机组同时前往。就在起飞之前，他们还选择了最好的降落伞，把药箱加了重，一切都筹划得最有把握大家满怀信心。

一个飞行员十分激动地请求机长：“为了使药箱确保及时送到，我请求批准我跟着药箱一起下去！”

机长说：“首长已经指示，人不要下去，我们要保证把药品准确投到！”

现在，我们的雄鹰正在高速航行。下面是茫茫大地，祖国到处是不夜城，繁星与万家灯火交相辉映，这时候，有多少人，还在辛勤地为祖国劳动着！

现在，是夜里 11 点 23 分

“请平陆准备！准备！飞机再有 7 分钟就到你县，马上点火！”

董局长把这空军领导机关的电话通知，立刻传给守候飞机的人群，不知是谁，向每堆柴草上泼了一些煤油，火苗冲天而起，大火把天空和大地都照红了！

这时，飞机已越过黄河，来到平陆上空。现在飞机的高度是 2700 米，为了空投得准确，必须降低，越低越准！机长周连珊压了压操纵杆，飞机迅速下降，2000、1500、1000……500 米，巍巍的山影从机身旁掠过，好危险哪！这是一场勇敢加技术的搏斗。

飞机上全部人员，双眼睁得彪圆，心情极不平静！机长突然兴奋地命令：

“准备空投！”

保伞员、机械师还有小陈，早就把药箱上的电灯接亮了，只听电铃一响，他们嗖地一声准确地把药箱推出机舱，1000 支“二巯基丙醇”带着降落伞，向预定空投地点坠下去，坠下去！……由县委打电话向北京求援，到神药从天而降，这其中牵动了多少单位，牵动了多少人，可是这全部复杂辗转的过程，却只用了 8 个多小时，这是多么惊人的高速度！

我们不是常说：“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意重”么，这一箱从天而降的神药啊，盛满了首都无数人的最美好的感情，它比泰山还重！

就在同一个时间内

在平陆县城外的圣人涧，4大堆火越烧越旺。人流如春潮，数不清的手电光点缀着夜空，活像国庆夜首都天安门的探照灯光。郝书记、郭县长等都亲赴现场来了。

“看，天上有个亮灯下来了！”突然谁叫。

“那是降落伞，那是神药！”

几千双手高高地举起来，谁都想把这一箱药擎住！人们向飞机、向降落伞此起彼伏地欢呼！

降落伞带着闪闪的亮灯向下飘落，人流追踪着降落伞飘落，跑啊！跑啊！郭逢恒县长向降落伞跑去，劈面碰见了蒲剧演员杨果娃，这是个16岁的女孩，唱小旦的。她的脸上还抹着红红的粉，戏装也没卸，全是舞台上那个打扮呢？

“果娃！你怎么也跑来啦？”郭县长问她。

“看戏的人都来啦，我怎么不来？！”说着她又赶忙向降落伞跑去。

降落伞带着药箱安全地着陆了，安在药箱四角的电灯闪闪地亮着，寨头管理区的社员最先抱住了药箱！几千人簇拥着这一箱药，你刚扛了两步，他抢过去又扛在肩上……

交通局派来的一辆最好的汽车，最好的司机沈宽亮，早已等在县委门口，药箱放在车上，车就大开油门，向50里外的张村医院飞奔。俗话说：平陆不平沟三千，这里的山路狭窄崎岖，极端难行，汽车随时都可能发生故障抛锚。沈宽亮早把汽车做了最好的检修，可是他还在想：

“万一出了毛病,我就扛着它送去!”

2月3日,深夜

盼!盼!——在张村公社医院的大门口,社员们、医护人员们正焦急地盼望着……

汽车开来了!——好!

马上拿下药箱,

马上注射。

注射剂十分灵效,立竿见影,病人立时止住了疼痛,恢复了神智。医生原来规定,药品不能迟于4日黎明找到,但这药品却在黎明之前送到。我们的61个阶级弟兄化险为夷了。他们新的更强壮的生命,是党给予的,是同志们用友爱救活的。狂喜从人们的心底里迸发出来……

不仅仅是这61个死而复生的人,不,我们每个人都有两次生命。党用它思想的阳光,抚育我们成为全新的人

2月5日

红日高照,春光灿烂。

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县长郭逢恒及县里其它几位领导同志,代表县委会和全县人民,率领着县文工团,携带着慰问品,来到了张村公社医院,他们亲自到床边抚慰病人。郭县长见病人已恢复了健康,打心眼里高兴。民工们紧紧地拉住了郭县长的手,不知说啥是好。

民工周满禄,眼眶里噙满滚热的泪,他说:

“万恶的日本鬼子打瞎了咱一只眼,没人管;国民党阎老西

杀了咱多少人，苦水往肚里咽！今天，咱这些普通民工闹点病，中央就派飞机救咱们，党和毛主席真是咱贴心的人啊！”

张店公社的老汉吴进喜，从 80 里外赶来看他的儿子吴广新。这时他激动得浑身抖动，拉着儿子：

“小子，在咱这偏僻山沟子里，我想你是没救啦！谁想毛主席在北京比咱老汉还关心我儿！小子，毛主席才真是你的亲爹娘！”

当场，大家都再也躺不住，纷纷爬起来，向郭县长请求：

“为了感谢党和毛主席，感谢首都人民的支援，我们明天就上工！”

郭县长慰抚他们说：“你们要听党的话，好好休息几天！”

第一连连长怎么也按不住心里的那股冲劲，攥着两只粗大的拳头，代表全连的民工向郭县长表示：

“我们一连全体向党和毛主席保证：鼓起最大干劲，把第三连的工全部包下来！”

紧跟着，大家在公社医院的里里外外，在工地上，贴出了几百张决心书；写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信，更像雪片般飞来……

民工们真是说到做到，他们一上工，就由过去每天挖 15 方土，增加到挖 30 方，工效提高一倍。有的人，更是一天干了 3 天的活！大家决心提前 3 个月修好这条支援三门峡伟大建设工程的公路！无数的奇迹在创造着……

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些筑路民工，不， 12 万平陆人，不， 6 亿 5 千万中国人，人人心里都燃着一团烈火，这团烈火越烧越旺；对党和毛主席的深沉热爱，化作无穷无尽的力量，人们正在用它加速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这是咱们的靠山，这是咱们永远幸福的保证！

（原载 1960 年 2 月 29 日《人民日报》）

评析：

游刃有余地驾驭复杂事件

李宁

阅读《为了 61 个阶级弟兄》，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希区柯克的电影：运用到极致的蒙太奇手法、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节奏、扣人心弦直到最后才解开的悬念。所有这一切都是抓住受众的“砝码”，《为了 61 个阶级弟兄》显然深得其精髓。

先看作品的小标题：“1960 年 2 月 3 日，农历正月初七；现在，整整是下午 4 点钟”；“2 月 3 日，下午 4 时多，在卫生部”；“现在，已经是下午 5 点多了”；“现在，时间将近晚上 7 点”；“现在，是 7 点半以后”；“现在，是夜里 9 点 03 分”；“现在，是夜里 11 点 23 分”……药品必须在 2 月 4 日凌晨送到食物中毒事发地点。时间一分一秒地逼近，读者的心也一步步提到了嗓子眼，最后食物中毒者全部获救。作品的叙事节奏也缓和下来，可谓有张有弛。

事件通讯大多头绪繁杂，而《为了 61 个阶级弟兄》所描写的事件更是在首都特种药品商店、中共山西平陆县委、张村公社、卫生部、黄河渡口等多个地点同时展开，如何使整篇通讯变而不乱，是写作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难题。

本文作者采用的是一种顺叙中穿插倒叙、同一时间不同地点的活动分头展现的手法，即旧小说中常提到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时间的推移是情节展开的纵线，空间的跳跃为横线，拎出了主要线索、典型情节，作品的脉络也就清晰地展现出来了。

抢 财 神

——河南农村见闻之六

穆青 周原

我们听说，扶沟县曾发生抢“财神”的事，情节非常生动。这次我们到了扶沟，就专门去访问了这个“财神”。

豫东地区像扶沟这样的地方，过去种棉花都是亩产几十斤，种植技术一直过不了关，棉花不是落铃，就是虫害，结桃结得也不好。实行责任制以后，大家都要求技术员去指导。所以技术员身价百倍。扶沟县有这么一个技术员，他名叫刘凤理，是正规农业大学毕业的，过去很长时间说他走白专道路，批的够呛，实行责任制以来，他变成最吃得开的人了，到处去抢他，他到哪个队，哪个队的棉花就增产，而且一倍二倍地往上翻，社员很快就富起来了。农民们把他的植棉技术传的很神，干脆不叫他技术员，叫他“活财神”。有一阵子农民抢得他不敢出门，只好到处躲。农民抢不到人就抢他的被子，说“我把你的铺的盖的抢走，看你上哪儿去睡觉！”于是在队与队之间又发生了被子的争夺战。从抢被子发展到抢“财神婆——抢他老婆”。农民说，有了“财神婆”，就不愁“财神”不回来。结果一两年间“财神婆”就搬了4次家。抢到“财神”的队，为了怕“财神”或“财神婆”跑掉，竟派上民兵站岗放哨。只要“财神爷”一起床，就把他的被子卷起来，放在箱子里锁上，晚上回来，再给开锁、铺好睡觉。那么多队抢一个“财神”，有的抢不到，于是又发展到抢他的徒弟，没有多久，他的一二十个徒弟，全部抢光了。最后有一个队

实在抢不到了，社员不答应，说队长是窝囊废，没能耐，别人都抢到了，你为什么抢不到？支部书记、队长被逼得没办法，就去找“活财神”央求：“不管怎样也得给我一个技术员”。让他想想看，他还有什么同学，还有什么徒弟，哪怕路再远跑上一两天，他们也要把他请来。缠得“活财神”实在没办法了。说：“这样吧，我还有一个徒弟名叫高大套，就看你们要不要。”他们说：“只要有，我们就要！”他说：“这个人瘫痪，在家躺着，不能动，讲本事、讲能力都不差，你把他弄去还是能帮助你增产的。”“中，瘫子我也要。”于是他们就弄辆架子车硬是把个瘫子从床上拉走了。每天用车子推着他到地里来回看，指导社员侍弄棉花，好多人还跟着他学。一年后，这个队的棉花飞一样地上去了。农民高兴极了，开了一个大会，庆祝棉花丰收，奖励这个瘫痪的“活财神”。那一天，队上奖给他一身“的卡”，用红纸包了800块钱，作为他的工资，并说了许多感谢的话。秋收后，快过年了，就用车送他回家过年。刚送走，社员就问支书和队长，跟他说定了没有，明年还得请他到我们这里来，别叫人家给抢走了呀！支部书记和队长说，跟他说定了，他说“中吧！”农民说，这不行，这话是活的，要定死合同，保证一定要来。结果支部书记和大队长只好又跑回去，跟高大套说：“我们得跟你订合同，不然社员不放心。我们心里也不安。”这样就订了合同。但回去后，有的社员想，这还不行，订了合同，要是别的队不管那些，把他抢走了，合同有什么用？怎么办呢？干脆，再开上拖拉机，把人给接来，结果也没让人家在家好好过个囫囵年；又把高大套给接回来了。

刘凤理在大李庄公社培养了20个农民技术员，如今这些技术员都成了农民的宝贝。也是被经常抢来抢去。抢的最紧张的时候，有一名农业技术员。竟被锁在生产队的仓库内，这种抢“财神”的矛盾怎么解决呢？现在有了一个好办法，就是每个农民技

技术员同一个或几个队订立技术承包合同，保证每亩棉花生产 150 斤到 200 斤皮棉，超产部分要抽成百分之一二算作奖励。刘凤理现在到了韭园公社，他正在那里同一个大队订立为期 3 年的粮棉技术承包合同。他保证 3 年后，这个大队亩产皮棉 150 斤，按人平均每人生产粮食 800 斤。

这几年，各生产队跟着刘凤理这位“活财神”，在植棉技术上学了几手的约有二三百人，如今这些人都被周围县的农民，作为“小财神”请了去。他们的足迹已遍布 45 个县市。

看样子，农村几千年来保留的传统耕作经验，正在被新的科学技术所代替。我国的农村继实行责任制以后，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技术改革的进程。广大农民在辽阔田野上发动的科学进军，必将对我国四化建设带来强大的推动力。

（新华社 1982 年 11 月 18 日电）

评析：

立意新鲜 趣味盎然

孙喆喆

《抢财神》是穆青、周原河南农村系列报道之一，也是写得极为精彩、广受好评的一篇关于农村、农民的报道。文章角度新颖，材料鲜活，是一篇立意新鲜的散文式通讯。

一篇通讯既要立意深刻、主旨明确，又要角度新颖、另辟蹊径，选取最佳切入点。本文就是这样的一篇佳作。文章选择了一个充满趣味、富有戏剧性的故事：曾经被当做走白专道路典型挨批的农业技术员刘凤理，在实行责任制后，被农民当做“财神”到处抢，连他的妻子和带出来的一二十个徒弟也被“抢光”了。由“批”到“抢”，反映了农民意识的变化，说明科学意识已深

入农民心中，科技人员成为农民心中的“活财神”。小角度大主题，不落俗套，独具特色。

通讯把农民迫切需要技术员的现实，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如“农民们把他的植棉技术传得很神，干脆不叫他技术员，叫他‘活财神’”。“神”字含义丰富，既反映了刘凤理植棉技术的高超，有“神奇”的意思，又反映了农民对他的高度信任和欢迎，有“神往”之意。从抢“活财神”的被子到抢“财神婆”，再到抢“活财神”的徒弟；由抢到后怕来年落空，最后到把瘫子“高大套”又抬回来，不让他在家过“囫囵年”，农民的想法、农民的追求在生动传神的描写下呼之欲出。通篇文字流畅，一气呵成，如流水般一泻而下，畅通无阻。语言通俗易懂，朴实自然，读来亲切熟悉，有一种清新的感觉。文章写得趣味盎然，轻松动人，流露出的是深深喜悦，感觉到的是盈盈笑意。

在被告席上

郭超人

新华社记者今天目击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 10 名主犯被押上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被告席的现场情景。

记者在特别法庭指定的旁听席上，清楚地看到审判台下 1 米左右的地方，竖立着一排低矮的灰白色铁栏，上面挂着一块写着“被告人”3 个黑字的木牌。铁栏里摆着为被告人准备的 10 把高背木椅。

北京时间下午 3 时整。在一阵急促的电铃声响过之后，耀眼的强光灯把法庭上下照得通明。坐在审判台正中的特别法庭庭长江华，下令传被告人到庭受审。这时，场内的照相机、录像机、电视电影摄像机都不约而同地转向法庭一侧的门口，准备记录这个人民盼望已久的场景。

在两名身穿蓝色制服的女法警押送下，一心想当“女皇”的野心家江青走进了法庭。今天，她身穿黑色上衣，脚着黑绒棉鞋，头发照旧梳得溜光，鼻梁上架着一副深色宽边眼镜，一举一动还保留着她惯有的那种矫揉造作的姿势。她还运用了当电影演员时的一点表演技巧，在众目睽睽之下，故意抬着头，把脚步放得很慢，做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她的座位排在被告席中间的一个铁栏里。在宣读《起诉书》的过程中，她有时摇头晃脑，有时左顾右盼，以掩饰自己心头的不安。正像 10 天以前，当法庭送达员让她在收到《起诉书》副本的“送达证”上签字时，她也

曾故作姿态地发出过冷笑，但同时她那拿笔的手却异常慌乱，竟把“十一月”写成“一十月”。送达员几次向她指出写错了，但她想了好久才恍然大悟改正过来。

在十年动乱中诡计多端的张春桥，今天在法庭上一直歪着脑袋，不是歪到这边，就是歪到那边，始终没有摆正。他的两个嘴角向下撇着，两只眼睛左右斜视，还是群众形容的那副“奸臣相”。他坐的是被告席左侧的第一个座位。他多次把身子歪靠在椅背上，呆若木鸡。记者发现他虽然只穿着一件薄薄的中式棉袄，还敞开着领口，但他的脸上一直在不停地冒汗。

姚文元坐在被告席上，哭丧着脸，发呆地望着自己面前的审判台，始终是一副忧心忡忡的神态。本来，在前一段时间，他一直能吃能睡。可是 10 天前他收到《起诉书》副本以后，饭量大减，夜不成眠，血压上升了 10 到 20 毫米水银柱。退庭的时候，他故意仰着脸想尽量打起精神，装模作样，结果却使人感到特别可笑。

从上海滩上“一步登天”的武斗司令王洪文，今天形容憔悴，明显地消瘦了，看上去身材也好像比过去矮小一些。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两只眼眨个不停，神情异常沮丧。

显得特别苍老的黄永胜慢慢吞吞地走向法警给他指定的座位。他神色慌张，但仍要装得坦然和镇静。可是，在法庭正义凛然的气氛中，终于像一具散了架的泥胎，无力地瘫在椅子上。

现在，满脸愁容的陈伯达，脸色阴沉的李作鹏，垂头丧气的吴法宪，神情呆滞的邱会作，满脸横肉的江腾蛟都一一押上了他们各自受审的座位。

3 时 20 分，扬声器里响起了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宣读《起诉书》的声音，10 亿中国人民对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正义审判开始了……

（新华社 1980 年 11 月 21 日电）

评析：

另立新意 细致入微

孙喆喆

1980 年对“四人帮”的历史审判引人注目，大快人心，意义深刻。如果说，《历史的审判》一文，高屋建瓴、气势恢宏、纵横捭阖地记载了激动人心的重要时刻的话，那么《在被告席上》则是另立新意，从细微处着眼，独辟蹊径，刻画了被告席上曾经不可一世、飞扬跋扈的被告人的丑态，别有一番意味。独特的角度，使之与众不同，细致入微的描写更是为文章增添魅力。

作品主要采用了描写的手法，对人物神态、动作、表情生动逼真的刻画构成其主体。语言通俗朴素，极其生动传神；简洁的笔墨恰到好处地将人物的神情、心态勾勒得入木三分；精彩的细节描写，将被告内心的恐惧与慌张展现得淋漓尽致。将“十一月”写成“一十月”，在几经提醒之后，江青仍过了好久才恍然大悟改正过来。这一细节可谓神来之笔，深刻揭示了江青的极度紧张的内心世界。描写中还采用了对比的手法。张春桥“虽然只穿了一件薄薄的中式棉袄，还敞着领口，但他的脸上一直在冒汗”，姚文元“故意仰着脸想尽量打起精神装模作样，结果却使人感到特别可笑”……寥寥数语，被告的慌张与恐惧一览无余。

精彩的描写尤其是细节描写，有赖于敏锐仔细的观察。记者的视线是串起全文的红线，可以说，这篇作品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记者敏锐的观察力，没有记者非同一般的观察力，也就不会有这样一篇优秀的作品。

“小机”斗“大机”

——记发生在大连市的“三师出走”风波

李天斌 詹国枢

鸡年大连出新闻，“小机”咄咄斗“大机”。

“小机”者，成立刚两月、人数不满百的村办乡镇企业——大连渤海机床厂也。

“大机”者，成立 50 余年、职工 6000 多人的大型国有企业——大连机床厂也。

市场竞争，企业较劲，本不足为奇。奇就奇在“小机”厂从厂长、副厂长、总工程师、技术部主任、生产部主任到几十名技术骨干，全都来自“大机”。

用“大机”厂长周魁的话说：“简直是用刀子一块一块从我们身上挖走的！”

事情，还得从去年秋天说起。

1992 年 9 月，大连机床厂总经济师李福喜、总设计师李毅、总会计师助理张黎 3 人同时出走，到甘井子区红旗镇一家村办企业“落户”，创办大连机电设备制造销售公司，并筹建渤海机床厂。

“三师”都是机床厂高层管理干部。李福喜来厂已 30 余年，当过组长、科长、经营部主任，长期从事组合机床设计、研究和经营主管工作；总设计师李毅，原任厂总工程师，是组合机床设计、研究方面公认的专家；张黎原任厂财务处副处长，调整班子后，升任总会计师助理。

“三师”出走，全厂波动。工厂设计部门、经营部门以及装

配车间的近 50 名骨干，也相继投奔而去。短短两个多月，由李福喜牵头出任厂长的大连渤海机床厂在鞭炮声中挂牌成立。又是短短两个多月，设计部门已设计出新产品图纸；经营部门已拿到大量订单；生产部门正密锣紧鼓加班加点，计划再用 2 个月时间，拿出第一批产品……

与“小机”厂红红火火形成对比的是“大机”厂因骨干出走而元气大伤，人心浮动。这家国内最大的组合机床生产厂有职工近 7000 人，固定资产原值 2 亿元，主要生产为汽车制造业配套的专用组合机床。我国一汽、二汽、北京吉普等大型汽车厂，90% 以上精密组合机床都由“大机”厂提供，为适应我国汽车工业发展，国家先后把工厂技术改造列入“七五”和“八五”计划，共投资 1.2 亿元用于发展数控柔性组合机床。

“三师”出走，骨干流失，在“大机”厂职工中引起极大反响，成了职工每天上班后议论纷纷的话题。有的部门已是人心思走，不少人向厂领导递交辞职报告；有的部门根据去“小机”厂人员的收入及住房待遇，也要求厂里“水涨船高”，比照办理，否则就要一走了之。厂领导几个月来一方面要抓生产经营，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抽出更多精力安抚人心，深感心力交瘁，压力重重。

“大机”厂长周魁忧心忡忡地对记者说，李福喜等人的出走，是极不正当的行为，已经给工厂带来严重后果：

一是严重影响了今年生产经营任务的完成。“大机”厂组合机床装配专业骨干仅有 60 人，现已挖走 5 人，尚有十几人正酝酿出走。这些人的出走将导致关键设备全部或部分停台，加工处于瘫痪状态。

二是严重影响组合机床产前技术准备，导致工厂 1994 年出现巨额亏损。“大机”厂组合设计人员 120 余人，其中主管设计人员仅 30 余人，承担 1994 年 1.35 亿元的设计产值任务，现室主任和主管设计人员被挖走 22 人，预测因短缺主要设计人员使设

计能力下降一倍，今年设计产值将由此减少 6000 万元，因组合机床产量下跌，这家 1992 年产值 1.6 亿元、利税 1600 万元的国家大型一级企业 1994 年可能出现巨额亏损。

三是造成人心浮动，增加企业内部不稳定因素。“三师”出走风波，已波及科研、工艺、锻冶、经营、销售等专业技术人员和一线工人队伍。一些职工要求按“渤海”价码提高待遇，而厂里又因包袱沉重条件限制而无能为力。工厂担心由此而产生“多米诺”效应，人心涣散，人员流失，直到企业被搞垮。

记者前往“小机”厂所属大连市甘井子区红旗镇了解情况。“小机”厂的上属单位乡镇企业渤海建筑装修公司经理孙萌环认为：人才流动是符合历史潮流的行动，无可非议。既然要搞市场经济，就应该允许竞争。人往高处走嘛！人才当然要往最能发挥自己价值的地方流。至于高薪、住房，并不像人们传言那样每年几万十几万。即使出高薪，给住房，这也是人才所应有的待遇。国有企业缺乏活力，没有吸引力，人家到乡镇企业来，有什么不可以呢？

“小机”厂长李福喜也向记者谈了他“出走”的原因。他说，之所以要离开“大机”建“小机”，是为了更好地干一番事业。来这里才短短不到半年，已经干出了在“大机”厂几十年干不成的事情，投资 4000 多万已经落实，新厂已经奠基，两三年内产值可以上亿，今后再由组合机床发展到综合机械企业集团，单是上 30 万台汽车变速箱，产值就可达 9 亿。都是在中国的版图上，干出一番大事业，不也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吗？

“小机”斗“大机”事件已成为鸡年大连市民街谈巷议的新闻。记者在同一些企业领导和职工座谈时，他们说：人才流动，竞争纠纷，过去也发生过不少，但像这样典型、这样突出的事件，还没有过。它牵涉到大中企业怎样才能搞活、究竟能不能搞活？市场竞争是否需要一定的秩序，究竟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秩序？乡镇企业机制与国有企业机制究竟有何不同？为什么国有企业基础很强却往往竞争

不过乡镇企业？……解剖这个麻雀，大有益处。

（原载 1993 年 2 月 7 日《经济日报》）

评析：

抓住人们关注的焦点

孙喆喆

这是一篇优秀的经济报道。报道通过大连机床厂“三师出走”风波这一事件，反映了处于改革时期的中国经济中的敏感问题，事件典型，主题深刻，写作上也有可圈可点之处。

“三师出走”风波具有典型性和特殊性，特就特在“小机”——大连渤海机床厂从厂长、副厂长、总工程师、技术部主任、生产部主任到几十名技术骨干，全部来自“大机”——大连机床厂，可以说，“小机”是从“大机”中分离出来的。“三师出走”风波现象同时在全国又具有普遍性。通过“小机”斗“大机”这一经济事件，报道反映了经济改革中普遍存在的现象、问题和矛盾：人才流动问题；市场竞争问题；国有大中型企业搞活问题……立意深刻，引人深思。正是因为事件典型，抓住了经济生活中的焦点，抓住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文章才有了分量。

经济报道容易写得枯燥无味，变成数字与材料的堆砌，这篇报道却写得有声有色。结构上，开篇几段设置悬念，点明事件“奇”之所在，充满吸引力；最后一段升华主题，点明解剖这一麻雀的益处；报道中采用了对比手法：“小机”小，底子薄，“大机”大，底子厚；“小机”红红火火，“大机”人心浮动……对比中，问题浮出水面。语言上，简洁有力，颇具特色。如第一段“鸡年大连出新闻，‘小机’咄咄斗‘大机’”，流畅而有趣味。紧接着两段，则采用了文言句式，上下对称，整齐利落。

红场易旗纪实

周象光

公元 1991 年 12 月 25 日晚 7 时许。莫斯科。隆冬中的红场。

由于莫斯科电视台头天就预报了戈尔巴乔夫将在今晚 7 时发表辞职演说，许多人便预料克里姆林宫顶上将要更换旗帜。莫斯科市民，还有许多外地人冒着凛冽的寒风赶来观看这一历史性场面。一些人带着半导体收音机来到红场，一面等，一面收听戈氏的辞职讲话；电视和摄影记者在选择拍摄角度；人们在谈论着自己的看法，并不时抬起头来，眺望着在暮色中飘动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国旗。人群中，有的举着苏联国旗，有的举着过去加盟共和国的国旗。

看得出来，此时此刻，人们的感情是十分复杂的，对联盟的解体态度也很不一致。有人在高声呼喊口号：“苏联万岁！”一对来自乌克兰的老年夫妇说：“怎么能没有联盟呢？苏联分裂成 15 个国家，就不再是一个大国了。”一位来自雅罗斯拉夫尔的工人说：“这标志着俄罗斯又复兴了，现在就看叶利钦有没有办法防止饥民造反啦！”几名女青年说：“换旗是自然的，因为苏联已经不存在了。”来自格鲁吉亚的一个俄罗斯人反对易旗，这时，人群中开始争论起来。他们的观点各异，有的甚至截然对立，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评价也不尽一致。有一位中年妇女插进来无可奈何地说：“挂什么旗都可以，只要让人们有吃的就行，因为我有 6 个孩子。”一位来自萨拉托夫的青年工人说：“这么大的事

件应当举行一个仪式，现在的作法未免太简单了。要知道我们几代人生活在这面旗帜下，我从小就知道我是苏联人，没想到这么突然就改变了祖国。”另一个人说：“举行不举行仪式无所谓，重要的是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说空话不干实事。”

7时25分，戈尔巴乔夫电视讲话结束了，苏联总统府的屋顶上出现了一个身影。人们屏住了呼吸。7时32分，那面为几代苏联人熟睹的镰刀锤子旗开始徐徐下落、下落……7时45分，一面3色的俄罗斯联邦国旗取而代之，升上了克里姆林宫上空。此时此刻，广场上的人们意识到，克里姆林宫已成为俄罗斯的总统府，苏联从地图中消失了。

莫斯科的夜空开始飘起雪花，气温明显下降。但仍有不少人陆续来到红场。人们还在红旗落地的地方发表自己的看法，还在那里争论……

（《人民日报》莫斯科1991年12月25日电）

评析：

新闻：历史时刻的真实记录

周健平

运用干脆而又简练的白描手法，是《红场易旗纪实》这一篇幅不长的通讯的一个特色。短短700来字的描述既勾勒出“红场易旗”之时的周围环境，又细致入微地描绘出当年苏联各界群众对苏联解体这一重大政治事件的反映。

在报道的第二段中，作者巧妙地穿插了各类普通大众的对话：有对“苏联解体”一事无可奈何的，有对“红场易旗”表现出失落怅惘之情的，还有对未来充满希望的……记者以冷静的笔调，撷取了一个个生动画面，客观地展示出“易旗”的现场情

景。

新闻被称为“正在发生的历史”，我们都必须以尊重事实的严肃态度对待历史。记者在采录下新闻事实的同时，一直提醒自己不只是纪实，也在记史，因此对时间的记录贯穿全文各个部分。作品开头以公元纪年起笔，易旗仪式正式进行之中又交代具体、精确的时间，以求让人感到历史在步步推进的效果。统观全文，读者自始至终被一种沉郁的历史氛围笼罩。

苏联解体是 20 世纪末的一件重大政治事件，记录此事的新闻价值在于各个事件本身具备的重大历史价值。对历史事件的记录需要冷静的头脑，公正的立场，让读者自己去品味，去思考，而这篇通讯的过人之处也正在于此。

难忘的时刻

——小平同志会见最后一批外宾侧记

孙毅

还是这间透着八闽风情的大厅，还是上午 10 点这一时刻，背景依然是那幅日光岩巨画，茶几上照例摆放着两盆鲜花……

接见现场的一切似乎都和往常一样，但是今天这里熟悉的一切，却又给人以不同于过去的感觉。

1989 年 11 月 13 日，邓小平同志于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外宾。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小平同志身着深灰色中山装，站在屏风旁边，容光焕发，同来访的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的日本客人一一握手。当着几十位日本客人、几十位中外记者，小平同志向他们、也是向中国、向全世界宣布：“日中经济协会代表团将是我会见的最后一个正式的代表团，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

短短几句话，像以往那样说得明快、平和，几十位在场的中外记者却由此得到一条重要信息：今天，敬爱的小平同志将正式告别他 60 多年的政治生涯。

“退就要真退，这次我就要百分之百地退下来。我退下来，也是想让党、政府、军队的领导人能够放手工作。我相信他们能够把工作做好。”

记者注意到，当小平同志说这句话时，深邃的目光中透露出的神情是坚定的，是自信的。

整个会见充满亲切、友好的气氛。从斋藤英四郎先生向小平同志问候开始：“看到您满面红光我很高兴”，到最后道别时斋藤先生双手紧握小平同志的手，深情地说：“为了中国的繁荣、亚洲的繁荣，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希望您健康长寿！”近 70 分钟的会见，竟像一瞬间那么快地过去了。

以往会见结束时，在场的工作人员深知小平同志时间宝贵，虽然都想和他说上几句话，但谁都不忍心去占用他的时间。然而今天，几位经常采访小平同志会见外宾的记者再也按捺不住对小平同志的崇敬之情，异口同声地请求：“邓主席，与我们这几位中国记者合个影吧！”“好，和记者们合影要轻松多了。”小平同志答应得这么痛快，引起一片欢笑，连几位大会堂工作人员也挤了过来，说：“我们也要和邓主席合个影。”小平同志愉快地满足了大家的要求。

小平同志告别了他光辉的政治生涯，但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原载 1989 年 11 月 14 日《人民日报》）

评析：

细节描写：真实和传神

李兆丰

《难忘的时刻》，一篇不足千字的通讯（严格地说属于通讯类当中的“新闻特写”），将一个平易近人的伟大形象生动地凸现在我们面前。

邓小平同志作为新中国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其告别政治生涯本身就是重要的历史性事件，用新闻报道表现好这一不平凡的历史时刻和伟人形象并非易事。《难忘的时刻》巧妙地选取几个细

节片断描写，真实而传神，给人以举重若轻之感。鲁迅先生认为：细节描写可以起到“借一斑略知全貌，以一目尽传精神”的作用。本篇报道可为印证。首先，场景的细节刻画，简洁明了地将历史定格在特定的历史时刻：1989年11月13日上午10时的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其次，精当地细节选择。从小平同志的着装、举止到几句关键性的充满人物个性的话语到国际友人的真挚祝福……以点带面，独辟蹊径地刻画出一个曾叱咤风云的伟人的高瞻远瞩和深受的爱戴。再次，在细节的处理上做到生动自然，不刻意渲染，显出冲淡柔和之美。如记者对小平同志“明快、平和”的语言、“深邃的目光中透露出的神情”的捕捉，衬托伟人话语，使得人物的形象、性格倍显丰满、真实可信。

总的来说，这是一篇以细节刻画见长的通讯，它选取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的几个最富典型意义的横断面，在场面、时间、选材上高度集中、细腻地记录了一个伟大的光辉形象，字里行间浸润了记者对小平同志的热爱之情，增强了整篇报道的可读性。如果说，细节的准确取决于记者的观察力，那么，其生动的特征则取决于记者的表现力。

汉城决战的最后 40 秒

——男子 4 × 100 米决赛画外音

刘蔚

1986 年 10 月 5 日，汉城时间 14 点 20 分（北京时间 13 点 20 分）。汉城奥林匹克体育场。

发令台上裁判员枪指蓝天，起跑器前选手们面地而蹲——相持半月之久的亚运会金牌大战就要在这之后的 40 秒见分晓。

4 日晚上，南朝鲜同中国队以 92 比 92 金牌数持平。当地报界哗然：“韩国成为亚洲第一体育大国”、“中国万里长城被摧毁”。

此时，中国女子 4 × 100 米已取胜，南朝鲜有把握用足球金牌来抵消它，使金牌总数保持平局。对中国队来说，出路只一条——男子 4 × 100 米接力夺得第一，拿到取胜的惟一王牌。

枪声颤栗着在体育场上空炸开，最后争夺开始了。

中国队打头阵的是苏州小伙子蔡建明。

我是中国队最后一炮的头一发炮弹，我要是卡了壳，后边哥们就没戏了，尽管我在 200 米预赛、复赛均处前 5 名，但我还是决定放弃决赛，力保接力。

蔡建明在第一个弯道上已追上前边的对手，进入第一接力区。这时，后面选手也蜂拥而至，两拨选手挤做一团。

忽然一人冲出人丛，狂奔而去，他就是中国队第二棒、北京选手李丰。

头天晚上做了一夜噩梦，总担心自己有伤的左腿不争气。来

汉城前，我妈妈（我国著名短跑名将姜玉民）说：“好好比，拿块金牌回来。”我憋足了劲儿，这可不光是还我妈的愿，这是还祖国人民的愿啊！

李丰身后，南朝鲜选手张在根（200米冠军）正拼命追赶，企图打乱中国队阵脚。

南朝鲜给他们的田径选手打了“强心剂”：拿一个冠军 7.5 万美元，并享有终身月薪 600 美元。

这时李丰一马当先，风驰电掣，狂奔在最前。

我一进场就相信我们赢定了。我只管玩命跑，只要别失手把棒甩到观众席上就行！

李丰以两米的优势完成了他的使命，接棒的是广东名将余壮辉。

这次南朝鲜想吃掉我们，所以把我们安排在第 6 跑道，日本第 5 跑道，他们自己在第 4 跑道，形成我们前边跑，他们后边追的局面，显然，这种安排也有利于他们追不上我们时，让日本队来干掉我们。

沿着跑道线，余壮辉像飞逝的流星，划向最后的直道，领先 3 米多。

我们是破釜沉舟，日本队没有这种压力，但我们不能当“舞台上的运动员”，平常比赛挺能“表演”，强手一来动真家伙就腿软。

就在胜利的曙光已依稀可见时，中国第四棒选手起动稍早，不得不减速等棒，交接成功时，还差两三步就跑出接力区了，此刻，日本选手将差距缩小到只亏一步。

这时，由十几名中国田径运动员、教练员组成的拉拉队，竟然在和满场南朝鲜观众的“对抗”中占了上风——中国队——加油——加油——郑晨。

我是浙江金华人，“金华火腿”长盛不衰，只是我的腿今年

却不争气，从 8 月 30 日右腿拉伤到参加亚运会比赛，我最长只跑过 30 米，来汉城前大夫才把我的腿治得听了使唤。

离终点还有 30 米，郑晨放松了两步，穷追不舍的日本选手不破弘树伺机要上，他在百米比赛中赢了郑晨，日本队指望他拼掉中国队。

我的右腿抽筋了，这会儿是关键时刻，只要能动，我就拼到底。

郑晨奋力向前，率先冲向终点，25 米、20 米、15 米……还差最后 5 米，郑晨挥起手来，胜利在握！

这一瞬间，多少人泪眼朦胧、喉头哽咽，多少人手舞足蹈、紧紧拥抱……中国选手以 39 秒 17 的新亚洲纪录，换得了最后一块宝贵的金牌。

94 块金牌分量是一样的，但祖国人民不会忘记第 94 枚金牌是怎样得到的。

——这难忘的 39 秒 17。

（原载 1986 年 10 月 11 日《体育报》）

评析：

耳目一新的报道方法

孙喆喆

这是一篇体育现场特写，跳跃式的报道方法将汉城决战最后 40 秒的紧张赛事和运动员的心理活动交织穿插，熔为一炉，将运动员的雄姿英发和他们在紧张赛事刹那间的思想状态同时呈现在读者面前。令人耳目一新的跳跃式写法，简洁而有节奏的文字，将短短的 40 秒写得扣人心弦，精彩纷呈。

这篇新闻特写的主体围绕两条线展开：一条是对参赛运动员

赛场竞技情况的交代和场上紧张气氛的描绘：一条是对参赛者当时心理活动的记叙。这两条线互相映衬，互相补充：前者是明线，后者是暗线；前者是有形的，后者是无形的；前者是行动，后者是思想；前者是结果，后者是原因。两者交替出现，报道内容错落有致，明暗交叉，富有跳跃感和节奏感，读来盎然有趣，激动人心，打破了沉闷感。报道通过对有形事实（赛场状况）与无形事实（运动员心理活动）的灵活安排和巧妙组接，使内容和结构出现跳跃，波澜起伏，富有生动感。

优秀的报道源于细致深入的采访，这篇跳跃式的现场报道尤其是如此。既要报道明的事实，又要报道赛场上看不见的事实，而且现场仅仅 40 秒的瞬间：既要掌握大量直接的新闻事实性材料，还要掌握丰富的背景性事实材料和人物的思想活动。这篇报道的成功还在于记者敏锐细致的观察和深入仔细的采访与资料准备。

商业部长买鞋上当记

陈 芸

商业部长胡平买了双皮鞋，穿上脚不到 24 小时，后跟就掉了一块。这件事最近在商业部机关大楼里广为流传，成为人们痛斥伪劣商品的话题。

7 月 12 日下午，胡平在湖北省调查研究，逛了逛武汉百货商场。在皮鞋柜台前，胡平看中了一双带网眼的棕色牛皮鞋，试了一双，号不合适；又试了一双，正好；于是付款 49.5 元，买下了这双鞋，并当场穿上新鞋，继续参观。

之后，胡平穿着这双鞋走访了粮库、肉联厂和服装学院，13 日下午回到北京，谁知到家一脱鞋，就发现右脚一只鞋的后跟已掉了一块。翻过来、调过去，细看才发现这双鞋既没有商标，也没标明产地和生产厂家，只是鞋底上有“上海”两个字。

17 日，在 11 城市一商局长会上，胡平不点名地讲了这件事，又深有感触地说：劣质产品泛滥，太可恶了。这个问题，生产者有责任，商业企业进货把关不严，也有责任。

会后，武汉市商委的同志主动向胡平要回了那双鞋，经查：鞋底是上海的，鞋是武汉制作的。

21 日，轻工部长曾宪林约见胡平，听说胡平买了双“一日鞋”，便说：“鞋的质量问题是当前消费者反映最强烈的问题，轻工部已打算专门举办一个假冒伪劣鞋的展览会。”

胡平当即表示：“我支持，如果你搞这个展览会，我希望我

买的那双鞋也能作为一件展品，曝曝光。”

如今，胡平已经穿上了武汉百货商场为他换的新鞋，可是他的心情并没有轻松。他说：“我是一个部长，买了劣质鞋能及时退换。但要是普通消费者呢？”

（新华社北京 1990 年 9 月 11 日电）

评析：

一则精巧的新闻故事

周健平

《商业部长买鞋上当记》这则通讯，单从题目上就不难体会出“巧”在该篇报道中的地位。普通老百姓买鞋受骗也许不一定构成新闻，可专管产品销售的商业部长竟买了双“一日鞋”，这一巧事被发掘出来，构成了一则精巧的新闻故事。

报道中记者把故事经过写得生动有趣，一波三折。先是商业部长买了双劣质鞋，穿上一天后鞋跟便掉了一块。由此引出商业部长点名批评劣质产品泛滥，生产厂家和商业企业对消费者不负责任的事实。接着，轻工部长与商业部长就假冒伪劣鞋一事展开对话，决心合办一个“劣质鞋展览会”。作品的结尾，则以商业部长换到新鞋，发出“我是一个部长，买了劣质鞋能及时退换。但要是普通消费者呢？”的感慨而告终。

作品最后的这句发人深思的话成了这篇通讯的点睛之笔，深刻揭示出普通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未能得到维护的普遍社会现象，从而深化了报道主题。

千载难逢的 1 分 50 秒

——漠河日全食与彗星同现奇观目击记

邢路续 陈凯星

这是一个“千年等一回”的神奇瞬间。

3月9日9时7分40秒，被称为我国北极的黑龙江省漠河县，霎时天昏地暗，本世界最后一次日全食此时正笼罩着这里。

这时，月球的身影已将太阳完全遮蔽，平日无法直视的太阳，变成圆圆的大黑球，挂在幽蓝的天幕上。

瞬间过后，它的左上边缘出现了3个璀璨的亮点，似珍珠，如钻石。这就是天文学上所讲的贝利珠，是月球上的环形山缺口偷偷地泄出的太阳光华。

此时，在主观测点漠河县三中操场上，原来被严寒冻得不住跺脚、呵气的数千观众，个个都屏住呼吸凝神观看。一只只望远镜、照相机同时聚焦一点。

数秒之后，贝利珠消失，太阳散发出团状光雾，亮亮的，像戴上一顶帽子，这就是日冕。它在向两边扯动，呈梭子状包裹着太阳，就像一只硕大的眼睛，俯视人间万物。

“我看见了！我看见海尔-波普彗星了！”许多人仰头指着天顶，兴奋地叫喊。更多的盯久了日全食的人们，一时无法适应黑暗，焦急地翘首搜寻。与神女般若隐若现的海尔-波普彗星相比，清晰的水星亮晶晶地伴在“黑日”的旁边，金星、木星也同现天宇。

日全食即将结束时，在太阳左下方，又一次出现了光芒夺目

的贝利珠。两秒钟过后，太阳终于挣脱黑暗，光芒复归大地。

在这短短的 1 分 50 秒钟内，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南京大学天文系的科学工作者，利用计算机分别得到了太阳活动的完整图形和曲线。

北京天文台课题组刘玉英对记者说：“为了这一瞬间，我们准备了 180 多个日日夜夜。这一刻虽然短暂，但我们对自然的热爱、对宇宙的探索却是永恒的”。

（新华社哈尔滨 1997 年 3 月 9 日电）

评析：

人与自然的和谐乐章

李兆丰

漠河日全食与海尔 - 波普慧星同现，当真是“千载难逢”！为报道好这一旷世奇观，各种新闻媒介均采用了其最具竞争力的先进手段，央视在这次报道中第一次运用了多点直播报道，影响较大。然而，新华社 1997 年 3 月 9 日仅数百字的新闻稿《千载难逢的 1 分 50 秒》被中央及地方 20 多家报刊采用的事实，却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电子媒介难以比拟的直观快捷的优势，文字印刷媒介在这场较量中充分展示了其较强的生命力：运用简洁优美的描述性文字的魅力演奏了一曲人与自然的和谐乐章。

该作是记者在我国最北端漠河日全食观测现场用眼、心、手急就的一篇新闻特写。新闻特写是一种短小精悍、现场感强的报道体裁，极适宜于报道这种转瞬即逝、精彩而优美的自然景观。该作基本上采用了白描的手法，却是一种精细、自然、纯熟的刻画，逼真地再现了新闻现场的具体情景。人在这篇报道中看似着墨不多，却显得尤为重要。不仅由于人的存在，使得自然景观具

有了某种意义，而且因写活了人与自然的对话和互动，如把日全食过程中天空光影的变化和地面数千观测者的情绪变化写得绘声绘色，使得整篇作品读来极富情趣，自然也因有人而变得生动起来，甚而至于拟人化了，如描述日冕“就像一只硕大的眼睛，俯视人间万物”；最后，再次引入了人——一位天文工作者的话：“……我们对自然的热爱、对宇宙的探索却是永恒的”，进一步深化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主题。

另外，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功因素：记者对天文学知识和天文现象的相对熟稔程度及寓解释于描绘的较强的表达能力，使得这篇极易流于枯燥的报道得以熠熠生辉。

新唐山扫描

费伟伟

仅仅 15 年。

15 年前化为废墟的唐山，今年 9 月将以东道主的身份，迎接前来参加第二届全国城市运动会的体育健儿。唐山的电视台、报纸、广播每天告诉人们：“距城运会开幕还有 $\times \times$ 天。”在占地 25 万平方米的唐山市体育场内，工人们正顶着炎炎烈日扩展着绿色的草坪……

有人预言“将从地图上被抹掉”的唐山，如今那整齐的楼群间、棋盘式的交通干道两侧，震后栽下的幼树才向外扩展第 15 圈年轮，唐山可容纳 3 万观众的体育活动中心，就将回响起全国运动健儿的笑声。

“15 年前大地震，15 年后办城运。”这句话成为唐山时下最响的口号。它把人们的目光再次引向这个地震后新生的凤凰城。

美哉，凤凰城

1986 年 7 月，英、美、德、日、苏等 8 个国家的 20 名记者采访唐山。他们惊奇地发现，这座被地震夺走了 24 万人生命的城市，人口已超过震前。唐山市市长对此解释道，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新唐山以其迷人的魅力吸引不少从四面八方来支援唐山建设的人们留了下来。

联合国副秘书长、人居中心执行主任阿考特·拉马昌德兰称赞唐山是“科学而热忱地解决住房、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杰出典范”。

81岁的张瑞智老人用满意的微笑表达了与拉马昌德兰相同的感受。这位家住曙光小区的老人告诉记者，震前，他家8口人住房面积不到30平方米，现在全家5口住房面积近50平方米，做饭有煤气，冬天有暖气，抬腿一出门，满眼是绿荫，过条马路就是住宅小区配套的中心公园。

这是唐山最普通的一个家庭。到去年底，唐山人均居住面积达8.07平方米，名列全国大中城市前茅。

旧唐山是1878年后，随着开滦煤矿的发展而形成的，布局混乱，污染严重，住房矮旧，交通不畅。“旧的唐山毁灭了，却给了人民一次新的选择机会。”有人在震后这样说。

唐山把握住了这一历史的契机。

新唐山，不仅市区面积比原来扩大了2/5，而且具有现代的气质：

——功能分区明确，布局合理。在震后的废墟上复建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老市区和东面以开滦煤矿为主的采矿工业区，又将原来老市区布局紊乱的工业企业迁出，在北面辟建工业新区；三区各距25公里，如三星相互辉映，整个城市闹静分开，生产、生活各自有序。

——居民住宅统一规划、施工，环境舒适优美。孩子们不用过马路就能上学，与工业区之间有足够的防护林带，雨水、污水分流排放系统完备。唐山的人均绿地面积是震前的2.66倍，已达2.05平方米。

——市政设施配套，在国内堪称一流，集中供热率居全国首位……

1990年11月13日，联合国授予唐山“人民荣誉奖”。新唐

山当之无愧。

“中国近代工业摇篮”的新篇

厂房栉比，高炉巍峨。震后 28 天就炼出第一炉钢的唐山钢铁公司，如今已跨入全国 10 大钢铁企业的行列。

震后一个月就生产出第一批陶瓷制品的唐山市第一瓷厂，如今已旧貌变新颜。一条投资 4000 万元新建的国际公认的高档瓷——骨灰瓷生产线已正式投产。穿着翠绿色工装的女工，全神贯注地检查着从流水线上走过的每一件洁白细腻的胎瓷……

唐山，是我国第一座现代化煤矿、第一家铁路工厂、第一家机械化水泥厂的诞生地，素有“中国近代工业摇篮”之称。

今天，在奔流不息的陡河岸边回响着全国最大电厂之一唐山发电总厂的隆隆机声；

在全部地面建筑都毁于地震的开滦煤矿，全国最大的范各庄洗煤厂昂然崛起；

还有全国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冀东水泥厂，全国最大的生产卫生陶瓷的唐山陶瓷厂……

截至去年底，唐山 14 年来已向国家上交利税 200 亿元，相当于重建唐山投资的 4 倍。

壮哉“大三角”

如果说，地震后，唐山形成老市区、矿区、新工业区这样一个“新三角”的话，那么，现在它又在形成一个“大三角”格局。

王滩，在唐山市区东南 95 公里。72 年前，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认为这里应建“北方大港”。

1989年8月，三艘大型挖泥船开进这里，咆哮轰鸣起来。时间仅过去1年零10个月，码头、疏港铁路、公路、水电等主体工程已基本竣工。今年底，7号、8号两个泊位就要启用。

满头白发、年过花甲的王指挥告诉记者，这里的宜港海岸长达6公里，而近期仅需开发1/3。王滩港是“大三角”的一角。

一片片苇荡，一片片海滩，南堡依旧荒凉。但是，展示着这块土地美好前景之一的唐山碱厂已从芦苇荡里拔地而起。“我们在芦苇荡里打下了7000根分别高28米、20米的水泥桩，用36个月的时间建成了这座年产纯碱60万吨的、远东最大的现代化制碱企业之一。”在制碱车间里，厂长邸维章自豪地说。

碱厂并不寂寞，与巍峨的碳化塔相伴的，还有冀东油田的上百座井架，还有许多即将走下蓝图的美丽构想。南堡，这是“大三角”的又一角。

一个王滩，一个南堡，加上风华正茂、从震后废墟上崛起的“小三角”，这个“大三角”，将支撑起更加魁梧的新唐山。

唐山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正满怀信心，走向未来。

（原载1991年7月26日《人民日报》）

评析：

高屋建瓴 大笔勾勒

李兆丰

我们说，新闻写作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写作的目的和体裁。如果写作方式不顾及其决定因素，则新闻作品的最终表达效果将与预期的效果相去甚远，甚至会适得其反。

《新唐山扫描》，从标题判断，记者的意图显然是要展现唐山大地震后15年来唐山人的建设成就，以体现党、政府和人民改

革开放以来的高度建设热情和决心。展现一座城市 15 年来的建设成就，让人觉得有些茫然不知所措，而让一篇通讯独立承担这样的重任，更似有难以胜任之感。这就对新闻写作方式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该作巧用“粗笔”解决了这一难题。那么什么是“粗笔”呢？记者费伟伟在写作体会中用中国画作比：“粗笔”如泼墨写意，“细笔”如工笔细描。工笔难在初学，泼墨则学来容易学好难。就该作来看，记者首先从新唐山即将举行“第二届城运会”这一极富典型意义的事件切入，随即以“美哉，凤凰城”、“‘中国近代工业摇篮’的新篇”、“壮哉，大三角”三个文中小标题导引，分别从城建、工业建设、远景规划等不同角度大笔勾勒出了一个新唐山的概貌，展现了新唐山的诱人前景和唐山人的乐观精神。诚如艾丰所言：“学‘粗笔’不仅是学笔法，更重要的是要把握那种站在历史高度高屋建瓴、大笔勾勒的气势、力度。”个中要义，一语道破。

《新唐山扫描》不仅贵在善用“粗笔”，还贵在适当的粗细结合，丰富了通讯的内涵。如对 81 岁的张瑞智老人的细笔刻画，以唐山人个体的主观感受描绘了唐山的宏观变化，以细笔代粗笔，颇巨匠心。

旧新闻里看变化

贺晓林

自从电视机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进入百姓家，我便同它结了缘，10年间写了好些有关电视机的新闻。国庆前夕，我翻着不同时候写的“电视机新闻”，仿佛嚼着橄榄，虽有一丝苦涩，却品出一股甘甜的回味。

第一次写电视，是1978年。那年末，在巴金名著《家》中露过面的成都商业场附近，一家电器商店出售日产14英寸黑白电视机，每台520元。那会儿，大多数职工每月拿40多元，看的人多，买的人少。一年下来，1亿人口的四川一共卖出电视机5300多台。

谁知，才过了一年，先前门可罗雀的那家电器商店，深更半夜就排起了长队。这一年，四川省卖出电视机64500多台，比上年多10倍多，但仍然供不应求。于是乎，买电视要开后门、找关系、搭配其它商品，群众开始骂娘，上书市长，投诉报社。最后，市政府决定，当众公布货源，当场出售。于是我计划收集一些群众反映后写一消息，介绍成都市的做法。

殊不知，当我忙过手头的其它稿子来写电视机时，新闻性已经消失，黑白电视机到处可见，随意购买。一了解，人们的热情已经移向彩色电视机。这也难怪，1980年，四川职工人均收入已增加到789元，而且家庭就业人数也大大增加。唉，拙笔没能跟上电视机市场的变化速度，惭愧。

另一篇消息《成都市用赊销办法打开了电视机销路》，纪录了彩电潮的一次回落。1980年，四川电视机的销量猛增到15.85万台，比上年的6万台净增两倍多，这一年，我所在的新华社四川分社也买了一台彩电，放置在饭堂里。每天晚上，几乎全机关的男女老少都到齐了。我想，当时中国每台彩电的“观看率”绝对是全球第一。

大概是反馈信号太强烈，彩电产量从1981年开始暴增，连成都南郊一家不起眼的无线电厂，也魔术般地掌握了复杂的彩电生产技术。那时一台14英寸彩电卖1200元左右，相当于普通职工一年半的工资，似乎贵了些，因此彩电第一次出现积压。

成都商业部门办法多，想了一个赊销的主意，于是，我写了那条关于赊销的消息。

一搞赊销，左邻右舍纷纷进入彩电时代。我犹豫一阵子后，也赶紧抱了一台彩电回家。

事后一看，这条消息还发得及时，再晚几个月就会胎死腹中。赊销才搞半年，彩电又紧张起来。当我看着一些朋友拿着大把票子心急火燎到处找彩电的样子，暗暗庆幸亏得“赶了末班车。”

我自鸣得意的一篇报道是发表在《半月谈》的《成都小街夜听歌》。这是一篇见闻实况。一天晚上散步，从一条叫做染房街的小街穿过，街道两旁居民家中的电视机不断传出苏小明的歌声，就像街旁的路灯一样，走过一根电杆，把头上的灯光丢在后面，前面的灯又把光明送来。整个小街的上空，都有苏小明的歌声在回荡，散步之中，竟把苏小明的歌声听完。此情此景，便成了通讯的全部内容。

以后，国内建成彩色电视显象管厂，我国彩电开始出口到美国、加拿大等，都是以前匪夷所思的事情。买彩电，如同10年前买辆自行车那样简单。也不计较是国产还是进口，因为质量已

经十分接近。这些新闻，新闻界的同行都发过了。我也就没有写有关电视机的新闻了。

好几年以后，我同另一位记者刘远达受新华总社派遣，从1988年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市场调查，再次做起电视机的文章，并于同年6月发表在《经济参考》报上。这篇标题为《啊，中国市场的百慕大》的文章，透露了两个堪称世界第一的数字，1987年，我国彩电生产约600万台，而同期，约有1500万个家庭在盼望它的到来。而且，前些时候视为宝贝的14英寸彩电也遭冷遇，人们的热情普遍倾注给18英寸、20英寸甚至更大屏幕的彩电。如果联想到每个职工年均收入已达1700多元，比10年前增加了近两倍，而且每个职工家庭都有两个甚至三四个人就业这一事实，这些观念的变化也是有一些道理的。

眼下市场上又传出彩电滞销的信息，又听到来自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抱怨声。我想，这决不是在封闭着的圆圈里的简单重复。目前的经济现象中，说不定孕育着更深内涵的新闻。

我手头这些新闻纪录的年代里，交织着笑声和骂声，充满着希望和失望。我发现，我们的彩电工业，不就是在欢欢喜喜和骂骂咧咧并生之中，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的么？中国职工家庭里的电视机，不也就这样很快走过从黑白到彩电、从闻所未闻到相当程度的普及这段路么？尽管电视机的潮起潮落给宏观经济带来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但是，它确也当之无愧地作为一种标志而雄辩地说明，改革开放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是广大人民群众。

（原载 1988 年 9 月 21 日《经济参考》）

评析：

平平淡淡才是真

胡茵茵

巴金老人认为小说的最高境界，便是无“技巧”的境界。新闻写作其实也是如此。《旧新闻里看变化》这篇报道语言朴素，结构简单，却能够让人读来饶有兴味。其中的原因便是记者的写作，确实已经达到了一种无“技巧”的境界。

无“技巧”的真正含义是技巧运用得非常娴熟，令人看不出蛛丝马迹。这首先当然需要多年的磨炼。《旧新闻里看变化》的作者就是一位有多年积累的新闻工作者。从 1978 年到 1988 年，可以说记者目睹了我国彩电业的潮起潮落，并成为了忠实的记录者。没有这样的功底，是达不到无技巧的境界的。

“无技巧”实际上还是有技巧的。对于这篇报道来说，运用得最好的技巧是什么呢？就是记者独到的新闻眼。

不做生活的有心人，就看不出点滴小事其实就是经济发展的缩影。没有独到的新闻眼，就不可能想到从一系列的已经失去时效性的旧新闻中做出新文章、好文章来。

有深厚的功底，独到的新闻眼打基础，记者写起报道来自然能够信手拈来，水到渠成。

新闻性·神韵·感染力

——谈谈叙事记述型通讯的写作

胡素华

叙事记述型通讯,其报道内容涉及具有新闻价值的人、事、景、物,在报纸媒介的新闻体裁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这类通讯,除了要为读者提供有用的新闻信息,使其知情欲望得到满足以外,很重要的是还必须更多地对读者的心理层次发生相应的作用。这也许正是通讯比同题材的消息更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

撰写这一类通讯,应在增强新闻性、写出神韵、形成感染力上下功夫。

一、重视叙事记述型通讯的新闻性

具有新闻性,这是叙事记述型通讯作品有别于叙事记述型文学作品的地方。新闻必须及时地真实地反映新近发生的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或事实的变动。由新闻性所决定,此类通讯作品必须讲究时效(既无新闻事实又无新闻由头的作品,不能归属于通讯范畴),必须完全符合人、事、景、物的原貌(而不允许进行虚构性、变形性的加工),必须注意凸现报道对象的新闻价值(毫无新闻价值的东西不应当成为通讯作品报道的对象,未凸现报道对象的新闻价值的通讯作品不是好的通讯作品)。在这一点上,本书所选的属于此类作品,可以说是无一例外。

体现新闻性，前提是发现并抓住尚未有人报道的新闻，报深报透已有人报道的新闻。穆青、周原合写的《抢财神——河南农村见闻之六》，体现了通讯作者特有的新闻敏感。他们硬是从驻豫记者的眼皮底下抢走了价值极高的新闻。同样，具有新闻敏感的记者，可以从商业部长胡平买皮鞋上当的事实中发现新闻（《商业部长买鞋上当记》）。

二、写出报道对象的神韵来

写出报道对象的神韵，是对叙事记述型通讯所提出的比较高的要求。

神韵是报道对象所具有的一种精神韵致，是一种精髓。贯穿全篇的神韵，是主题。在通讯《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千万家——记全国劳动模范、水电修理工徐虎》中，将徐虎的精神与风范定格在“每天 19 点钟升起的太阳”上，着此一词而尽显其风流，可谓写出了神韵。作品关键之处或细部之处的神韵，是传神之笔。长篇通讯《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披露了张海迪思想曲折中的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她曾经有过自寻短见的念头，但最终被自己战胜了。这一笔，反而使张海迪更令人信服、更活生生地站立到了读者的面前。张海迪为瘸腿的小燕子治伤，在养好伤以后将它放飞，这些，似乎都并不起眼，然而却都是神来之笔。通讯《勋章背面的未了情——记黄河水利委员会绥德水保站总工程师徐乃民》，记述了这样一个情节：徐乃民获得了水利部授予的镶嵌着“功在禹上” 4 个大字的勋章，他默默地将它放在“花果山”边妻子的坟前。“风轻轻吹动他发白的双鬓，像妻子温柔的抚摸，又像她的低诉，他又听见她说：‘这辈子嫁给你虽苦无怨。’”，通讯将妻子平时说过的话放到这样一个场景中来处理，实在可说是巧妙地凸现了人物的神韵。

三、致力于形成作品的感染力

叙事记述型通讯的比较高的境界是形成较强的感染力。

为了形成较强的感染力，此类通讯常常从优秀的文学作品那里进行借鉴。应该说，叙事记述型通讯作品，是通讯以至整个新闻文体中摄取文学因子、借鉴文学手法最多的一种文体。文学作品中常常使用的有利于增强作品的可感性的一系列方法、手段，也为此类通讯所频繁使用。

通讯《在大海中永生——邓小平同志骨灰撒放记》，以充满深情的笔触，记述了一代伟人邓小平骨灰撒放的全过程。作者采用了慢镜头的方式，描写了骨灰撒放这一令人心碎的时刻。在作品中，“飞机盘旋，鲜花伴着骨灰，撒向无垠的大海；／大海呜咽，寒风卷着浪花，痛悼伟人的离去……”这样情景交融的语句，先后三次出现，可谓一唱三叹。这不由使人想起诗歌的长于抒情和工于咏叹。

长篇通讯《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有着与文学作品相比也毫不逊色的人物心理活动描写。当然，这种人物心理活动描写又是符合新闻写作的要求的。孔繁森在得知领导上决定派他二次进藏的消息以后，同每一个正常人一样，内心深处出现了一系列颇为复杂的想法（想到了自己的大不如前的身体状况，想到了第一次进藏后家中的窘境，想到了在妻子面前难于启齿），然后又采取了与此相应的、极具个性特点的做法（提议举家进京旅游，在旅游时话中有话地进行暗示，最后才艰难地“摊牌”）。上述富于层次感的描写，产生了极强的感染力。

历来被作为事件通讯名篇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在空间顺序频繁的、大跨度的转换上，可与结构恢宏的某些报告文学作品相媲美。该作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实行经纬交叉，

从而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示了围绕抢救食物中毒的民工而进行的突发事件的进程。时隔 40 年，现在读来，该作仍让人感动不已。

《汉城决战的最后 40 秒——男子 4 × 100 米决赛画外音》，在使用文学手法的大胆方面，可以说是罕见的。记者在赛场外（赛前或赛后）对 4 位运动员采访所得材料，有的被穿插到对比赛现场的描写之中，有的被融入对运动员的心理描写之中，有的则被巧妙地化作了画外音。有心的读者一定会感到，40 秒时间被故意拉长了，赛事紧张激烈的气氛明显地增强了。这篇通讯在文学因子、文学手法的运用方面，也许已经达到了极限。

为了形成较强的感染力，此类通讯常常对典型的细节展开着力描写。在通讯《北京有个李素丽》中，就有许多真实感人、耐人寻味的细节。李素丽在雨中探出身子上、下车的乘客打伞的细节，用躬身擦地的无声举动教育恶作剧的吐痰者的细节，巧妙地消除让座者心头不悦的细节，对逃票者既严格按规章办事又得理让人的细节，让人叹为观止。作品的巨大魅力和感染力，也就在无形之中形成了。

调查分析型通讯

“一厘钱”精神

李峰 余辉音

一厘钱，最勤俭的家庭也早已不放在眼里，可是却有手经百万元的厂长、会计、供销人员和长年给国家创造财富的工人，为少花一厘钱，给国家积攒一厘钱，算盘打了又打，潜力挖了又挖。

这儿写的，都是工业生产中的这类一鳞半爪，但是，它闪烁着社会主义建设真理的火花。

一 厘 钱

用过高级“北京墨水”的人，也许以为，制造这种第一流墨水的费用，会比包装费用大得多。其实相反，包装墨水的费用比制造墨水的费用大3倍。因此，要当好墨水厂这个家，给国家多积累资金，大头是降低包装材料的成本。可是墨水不能不用瓶装，商标不能不贴，纸盒不能不用。而且还要分量准，包得牢，外观美。更难的是，这些包装材料，墨水厂不产，全靠外厂加工。一个小小的墨水瓶盖，去年是由北京、太原和淮阴等地的11个工厂加工的，今年还要6个厂加工。墨水瓶盖里面的纸垫，也要由上海生产。如果北京墨水厂说自己无法降低包装成本，那也很奇怪它。可是这家工厂的包装成本，去年减少了，今年又减少了。

他们是用珍惜“一厘钱”的精神减少的。

那是在去年春天，厂长李健刚提请党支部委员会讨论他打算在全厂提出的一个口号：每件包装材料降低一厘钱。

为什么提降低一厘钱呢？我们将在最后回答。

厂长的提议被支委会通过了，接着在全厂职工大会上正式提出。于是，全厂行动起来了。

管瓶盖的供应人员，把 11 个制造瓶盖厂的代表请来，把 11 个厂造的瓶盖摆出来，把天津造、上海造、美国造、德国造的墨水瓶盖也摆出来，同各厂代表一起，比质量，称重量，算成本，评美观。他们把 11 个厂瓶盖的 17 项费用指标排成队，逐项比较，精密计算，彼此取长补短。这些似乎是“分外”工作，促使一些厂把瓶盖的成本降低了，全厂购买每个瓶盖就少花了 4 厘多钱。就在这小小的瓶盖上，去年节约了 10 万元！

管纸盒的孙树德，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摊开一大张纸，拿一个印好未糊的墨水盒，左比右量，他眼前出现了希望：几年来只裁 15 个盒的那种纸，有可能再多出一个。他抱着这种希望，到东家印纸盒的工厂，找工人商量；到西家印纸盒的工厂，向厂长“游说”。他的希望在 4 个月前终于变成了现实，原来每张纸裁 15 个盒，要废掉一小块。经过他和工人们研究改了裁纸方法，每个盒盖插进盒里的那个“舌头”，比原先短一韭菜叶，一张纸就多出了一个盒。这样，每个盒的纸张费用就减少了一厘钱，全厂 1 个月节省了 8 令纸。不！还有。裁盒方法一改，印盒效率也提高了，每个盒的印刷费用又因此从刀缝里减少了 1.5 厘钱，一年要用近两千万盒呢！

厂长也早在人们不注意的地方设了“关卡”。他告诉回收废瓶子的老人，发现废瓶中有好瓶，要立刻向他报告。一天，那老人果然在车间交回去的废瓶中发现有两个好瓶子，忙去报告了厂长。厂长立刻叫上班组长，叫上科室人员，来到现场。他拿起那

两个瓶子说：“丢一个瓶子国家损失 6 分钱，没人拣，为什么自己掉个 1 分钱的小‘钢镚’就赶紧拣起来呢？”这种爱护国家财产的教育真能打动人心，从此瓶子的损失率大大下降了。

工人和参加辅助工作的工人家属也行动起来了！常用北京墨水的人，你也许没有留意，在瓶盖同盖里涂有蜡和蓝漆的纸垫之间，还有个小小的黄纸片，每个纸片才值一厘一毫钱。过去垫这个纸垫的工人家属和管理纸垫的人员，领发无数，丢多少不知，计成本照例按 10% 的损失算账，现在，她们手缝里掉下一片，也要拣起来，遇到废片，也交回工厂。

“一厘钱”精神，使北京墨水厂改变了原来的亏本状况，为国家积累了大批资金，“一厘钱”精神，也在有关工厂发生了连锁反应，如果这种精神在全国每个企业都发生连锁反应，该能为国家积累多少资金啊！

一 分 钟

时间是财富中最贵重的财富。劝人们珍惜岁月的人，曾用古今中外伟人名家爱惜时间的范例和训导，写成过各种各样的“时间篇”。

我们在北京市制药二厂，看到了普通工人用社会主义的劳动热情写成的“时间篇”。这也可以说是利用工时的“一厘钱”精神。

这是一个原有 27 个人的包装组。如果说这些工人和最普通的工人也有点不同，那就是“罗索事”多。全组有 25 个是女工，她们之中有 21 人是 1 个至 7 个孩子的母亲。全组女工大部分是 1958 年前后参加工作的家庭妇女。她们的平均年龄是 36 岁，她们诙谐地自称是“老太婆”组。曾有一个时期，她们组的缺勤情况在全车间占优势。这算是这个“时间篇”的背景材料吧！

从去年 4 月开展创财富竞赛起，情况不同了，职工们算了个账，如果每人浪费一分钟，这一分钟不仅没有给国家创造财富，还给国家浪费 3 分钱（包括设备水电等各种消耗和工资开支）。这么一来，像一厘钱那样不被人放在眼里的一分钟，在工人们心里，同个人对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态度发生了联系。

全组为充分利用每一分钟而动员起来了。

那位组长共产党员赵玉珍，同工人们商量，建立了工时利用账。她们用这个观测全组工时潜力的“显微镜”一看，全组每天占用非生产时间的名目有十几种。赵玉珍根据这种观测，改进了生产的组织工作。工人生产的潜力常和思想、生活相连。星期天，她又常出现在家务事多的姊妹们家里，谈谈私下里话，帮助安排安排生活，巩固小组的“后方”。

那位做事不吭声的李庆珍，家离工厂远，坐汽车也得走 40 分钟。可是无论刮风下雨或奇冷天，她总是第一个到车间，把全组用的浆糊调拌好，把包装纸、说明书摆在每个人的工作台上，把地下扫干净，为的是每个人每天多利用几分钟。

那位 7 个孩子的妈妈江玉华，家庭收入少，家务事情多，可是她安排得巧，她每天也总是坐在工作岗位上听着上班的铃声响。

那位钉箱男工刘凤祥，任务是往装满药品的木箱上封口钉钉子。他钉完钉子，就给全组当义务服务员。这个要喝冷汽水，他去拿，那个要喝茶，他到茶炉上去冲，为的是让每个人多利用停工取水的三两分钟。印好字的药瓶供不上包装了，包装工人也不再等，主动给印字的人作辅助工。印字工人上厕所了，包装工人也赶紧接过机器，不让机器停。

一分钟长短对谁都一样，可是每人每分钟如何使用不相同，生产的产品数量和质量也不同，关键在劳动的态度和技能。从去年 4 月起，赵玉珍小组每月出勤率最低保持在 95%，全组多数

工人的技术也有了提高。今天，她们的每一分钟比过去的每一分钟就“长”多了。同样的设备同样多的任务，原来 27 个人干，现在 18 个人干，多数人月月还拿超额奖。

如果说社会主义的大厦归根结底要靠提高劳动生产率盖起来，那么像赵玉珍小组，领导者用一分钟这个时间概念去组织生产，劳动者用一分钟这个概念计算自己的劳动，这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起点。

一根火柴

北京火柴厂第一季度有一个奋斗目标：每盒火柴里减少一根废火柴。这件事又是“一厘钱”精神在提高产品质量领域里的再现。

一根废火柴（工厂叫废支）的标准有八条：无头、小头、破头、双头、半支、牙签，等等。在北京火柴厂，一根火柴从它的母胎大树干里脱生出来，要经过 3 个车间、40 多道工序，走将近一里长的路程。机械化程度不高，木材又不理想，它每移动一步，每经过一道工序，都有出废支的可能，去年上半年，每盒火柴的废支曾达到 10% 左右。

于是减少废支的严重斗争展开了。车间里，挂起了“为减少废支而奋斗”的大字标语，贴上了防止出废支的操作规程，时刻鼓舞和督促着工人。机器旁，增加了扫把，工人们不时地清扫脚下，以减少踩断的火柴梗。主要工序，设了关卡，警觉的质量检查员每小时都要抽查。下班了，工人们减少废支的心事还放不下，他们聚拢在一起，评比本班减少废支的成绩，检查生产中发生的问题。不利于减少废支的操作技术在改，不利于减少废支的设备也在革新。

减少废支的斗争并不只限于技术领域。排梗工段长陈凤林

说，他们干的活，是把火柴梗排立在一块块的加板上，排一块板，拿一块板的钱。在以往，有的加板上火柴梗倒一片也没人管，为的是多拿计件工资。现在，加板上那 3000 支火柴梗倒几根，工人们就宁肯不拿这份工资，也要把整块板当“废品”剔出来，防止在下一工段沾不上药头，出废支。100 多个装盒的女工也是“拿计件”。她们装一盒（100 支）火柴用 5 秒钟，剔出一根废支的时间同装一盒火柴的时间相比，当然就显得不太短。可是，每天下班时，她们手边那放废支的纸盒里，总是有五六百支，可以看出，党的思想工作在这场减少废支的斗争中发生了巨大的作用。

这场斗争从去年 7 月持续到今年 1 月，每盒火柴的废支由 10 根左右减到了 5 根。这同轻工业部规定的两根半这个指标还相差一大段。厂里的干部也承认，他们还有不少工作要抓紧干。

斗争在继续着。2 月中旬我们来厂访问的前两天，生产报表中统计每盒废支的那一格里写的数字，已接近 4 根。

斗争不能不继续。接待我们的副厂长说：“每盒火柴多一根废支，全厂一年等于把几百万盒废木棍卖给了人民，这就有个为人民服务的态度问题。拿国家的木材国家的钱，造出那么多废木棍，这又是个对国家资财的态度问题。”

何止是一根火柴！每个人生产的产品，每个人做的工作，何尝没有这个问题！

一个真理

平凡的事物常常包含着真理。正如北京墨水厂厂长李健刚所说：“一厘钱，是个精神，因为工厂家业大，产品多，所以更要从小处打算盘。”是的，这是一种非常讲实际的精神，是能够动员所有群众行动的精神。这种精神，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工厂、人

民公社、商店和机关的理财之道，也是做好一切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理。不是吗？要实现党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就要有这种“一厘钱”精神，从节省一厘钱做起，从提高每一分钟的劳动效率做起，从提高每一件产品、每一项工作的质量做起。

“一厘钱”精神显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伟大的事业要从最小的事情做起。

亲爱的读者，当你抱着雄心壮志要建设好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时候，你就从自己经营的一厘钱、一个产品和自己的每一分钟做起吧。

（原载 1963 年 3 月 24 日《人民日报》）

评析：

典型素材与理性升华

李宁

工作通讯（“一厘钱”精神）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强烈反响，即使在今天看来，它也并不过时。

本文打动人心的“力量”不是在于华美的文辞，而是详尽的第一手资料、令人信服的细致分析。“一厘钱”与一家工厂每年减少成本十几万元有什么关系？珍惜一分钟时间、减少一根废火柴意义何在？作品并没有空泛地谈大道理，板起面孔教育读者“节约要从小事做起”，而是通过抽丝剥茧的层层剖析，让人恍然大悟：原来在不经意的点点滴滴之中，能造成这么多的浪费，从而自觉地认同了作品中所说的：“一厘钱，是个精神，因为工厂家业大，产品多，所以更要从小处打算盘。”这样就起到了工作通讯“介绍和推广先进经验和先进方法，帮助和指导人们更好

地、更有效率地工作”的作用。

更为难得的是，本文并没有停留在单纯介绍经验的浅表层次上，而是在讲述了“一厘钱”、“一分钟”、“一根火柴”的故事后，上升到对“一个真理”的认识，提炼和深化了主题。由于前面三节有理有据，这个主题的出现显得水到渠成，并不突兀、空洞。

另外，作品在赞扬先进、推广经验的同时，并不回避问题，如“这场斗争从去年 7 月持续到今年 1 月，每盒火柴的废支由 10 根左右减到了 5 根。这同轻工业部规定的两根半这个指标还相差一大段。厂里的干部也承认，他们还有不少工作要抓紧干。”“先进典型不能有一点错误缺陷”的僵化思想观念被本文作者摒弃，客观的报道态度使这篇通讯更加真实可信。

菜价追踪

苏会志 王进业

近一个时期，京城菜价上涨，有些细菜比肉还贵。

为了搞清楚菜价上涨的原因，记者来到北京的大“菜园子”——山东寿光市，从源头开始，行程千余里，对蔬菜价格的变化作了一次全过程追踪。

产地菜价比去年没贵多少

4月2日凌晨，寿光蔬菜批发市场。

这是全国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每天早晨5时开秤交易，交易之前，这里就被运菜的车辆挤得水泄不通。记者抄录了当日每公斤蔬菜的批发价：菜花1.06元，小辣椒4.4元，洋白菜1.8元，韭菜0.6元，黄瓜2元，西葫芦2元，香菜1.3元。据介绍，上述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虽有提高，但涨幅不大。

长途贩运，一公斤净赚一两角

4月2日下午3时，记者搭乘寿光市云生蔬菜购销公司的一辆运菜卡车上了路。次日凌晨3时，当这辆卡车风尘仆仆地进入北京市的大钟寺时，这里已挤满来自各地的运菜车辆，菜贩开始讨价还价。

5点多钟，寿光云生蔬菜公司运进京城的9吨洋白菜、黄瓜等顺利成交，每公斤成交价比产地收购价高0.4元。

货主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车菜，扣除给购销公司的代购费180元钱，刨去1400元的租车费，一公斤菜也就赚一两角。

相距4公里，菜价陡涨80%以上

4月3日早7时，记者随一辆刚从大钟寺批发完菜的三轮车，来到北京西城区新文化街农贸市场。千里迢迢运进京城的各种新鲜蔬菜，到了这条小街上身价倍增：每公斤菜花2.2元，小辣椒9元，洋白菜4元，韭菜1.4元，黄瓜3.2元，西葫芦4元，香菜3.6元，一般涨幅在80%左右，最高涨幅达125%，而大钟寺和新文化街这两个市场相距仅4公里。

4日，记者跟着两辆三轮车，从大钟寺来到位于亚运村南侧的土城早市，两地相距也是4公里，但每公斤1.6元批发来的蘑菇卖到3.6元，每公斤2.2元批发来的洋白菜卖至3元。

6日，记者又到了盛产蔬菜的顺义县北务乡，随运菜车进城，发现水萝卜的产区与销区的价格差竟达250%。

五里一“炒”，十里一“倒”

记者追踪菜价，听到“炒菜”一说：从产地到菜摊，一般要经过三四道批发环节，有的要炒五六道。

在西直门农贸市场，记者遇到一位河南省光山县的贩菜农民。他自称是“三道贩子”。这位农民把从和平里批发来的蒜苗批发给他在大钟寺的老乡，他的老乡又批发给零售摊贩，几经倒卖，每公斤不到两元钱的蒜苗，到零售时价格就涨到六七元了。

来自四川的一个菜贩，不久前在大兴县前大营村以每公斤1

元钱的价格收购了 8 筐韭菜，他把菜运到石景山古城批发，每公斤 1.6 元；古城地区的菜贩又把韭菜零售价提到每公斤 2 元左右。也就是说，“二道贩子”、“三道贩子”联手把韭菜价格炒涨了一倍。

菜霸横行，农民进城直销难

郊区菜农直接进城卖菜，环节少，价格低，不仅菜农的收入可以增加，居民的开支也可以减少，两全齐美。记者同一些菜农谈起进城直销的问题时，他们诉说了一些苦衷：一是种菜费工，家里活儿忙，很难挤出时间进城卖菜；二是有些市场上的商贩结伙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农民惹不起；三是进城卖菜手续繁杂，这个税，那个费，名目繁多，到集市上找个摊位也很困难。

大兴县西芦村农民郭宝来对记者说：“我们这些种菜的，都想早点卖完，早点回家，也不想把价格抬得那么高，可市霸不让。”

在海淀区四季青乡小煤厂村的塑料大棚旁，一个正在收购洋白菜的青年对记者说：“我们在附近的西黄庄卖菜，市场上谁的洋白菜价格定得比我低，我就立刻把他们赶走。那些外地人，谁敢惹咱。”

记者采访商业行家时了解到，在市场机制较健全的国家，一般商品批发和零售环节的合理利润应是 10% 左右。蔬菜属于鲜货，损耗较大，差价在 20% 还算正常，30% 就算是高利润了。但目前北京蔬菜从第一次批发至零售，差价多在 100% 左右，这就成为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

（据新华社 1994 年 4 月 12 日电）

评析：

一则跑出来的好报道

李宁

《菜价追踪》最让人称道的倒不是两位记者的写作技巧，而是他们选材的敏锐眼光和深入细致的采访作风。

1994年春，北京市菜价上涨，老百姓对此颇有怨言。新华社记者没有放过这种生活“小事”，认认真真地追溯菜价上涨的源头，找出不合理环节，真正做到了贴近生活、贴近百姓，也给有关管理者提供了可靠的参考资料，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整篇作品的结构十分简单、清晰，即“顺藤摸瓜”式。记者从蔬菜的产地开始，行程千余里，对菜农、蔬菜购销公司、批发商、菜贩各个环节都进行了深入调查，掌握了翔实的第一手数据。在文中，记者尽可能让数字和采访对象说话，自己基本不发表议论，立场鲜明但文风客观、公正，是一篇成功的客观报道。

新闻报道有“三分写，七分跑”之说，如果闭门造车，两位记者绝对写不出《菜价追踪》这样有说服力的好通讯。从本文可以看出，优秀的新闻作品往往是“跑”出来而不单纯是“写”出来的，尤其是分析和揭露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时，一定要以事实为依据。当然，记者本身的理论素养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也很重要，缺乏这种能力，也难以写出《菜价追踪》这样思路清晰、分析透彻、不枝不蔓的调查性报道。

寻找时传祥

重访精神高原（之一）

孙德宏

一

36年前，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握了一次手。

26年前，另一个人连真名也不能说地去了；这一个人后来知道后，精神便有些失常，不久便也去了。

他们死于同一场名叫“文化”的“革命”。

这一个人是个北京掏粪工人，叫时传祥。

另一个人是共和国的主席，叫刘少奇。

二

今天，循着那渐被淡忘了的历史，记者去重访时传祥的足迹，探寻他的生前身后。

偌大京城，人海茫茫，人事沧桑。

问起时传祥，一些中学生便摇头，几位大学生也双眼漠然。在崇文门路边，遇到几位老师傅，“时传祥？！”惊讶中便有些激动，接着，就像是述说自己的光荣一样，“知道吗？那时咱这北京也有一种‘热’，那叫‘义务掏粪热’！”

“万里、崔月犁副市长跟时传祥背过粪，万里还说自己时传祥的‘第一大弟子’；当官的、大中学校师生、作家、记者、

演员都争着来时传样清洁队参加义务劳动，连到北京出差的人也以同时传祥一起背回粪为光荣……知道吗？那会儿来背粪得预约！”可是，很快，老人们就又有些愤愤地：“嘿！现如今儿叫什么？谁还理会个背粪的……”

在后来的采访中，大凡了解些时传祥的，谈话多是这么“转折”……

50年代，掏粪是纯体力活。背在肩上那半人多高的粪桶有10多公斤重，装满了粪便就有50多公斤。时传祥每天掏完了再背，一天的总重量得有5吨。解放后，他基本上没休过节假日地掏了十七八年粪，右肩磨出了巴掌大一块黑黑硬硬的老茧！

他觉得这没什么：“不干好，人家不方便。”

花市下四条胡同耿大爷家厕所墙倒了，砖块掉进厕坑。时传祥卷起袖子，用手把砖一块块捞出来，用水冲干净，再把墙头垒好，把厕所清扫干净。

1958年，运粪改用汽车了。时传祥说：“咱要人不等车、车不等人、加快周转、分秒必争。”在他的带动下，原来每人每天平均背粪50桶，一下子增加到93桶。刮风下雨也是一样。

……1959年10月26日，时传祥出席了“全国群英会”。这一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接见了代表们。刘少奇紧紧握着他的手：

“你们干劲可真足啊！再加把劲，把全市的清洁工人都带动起来嘛。”刘少奇从自己口袋里摘下一支“英雄”牌金笔，送给时传祥，“你当清洁工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

很快，一张国家主席与掏粪工诚挚握手交谈的照片传遍了大江南北。于是就有了“掏粪热”。

1964年12月，时传祥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6年国庆，时传祥被推选为北京市观礼团副团长，登上了天安门城

楼。

解放前也背了十几年粪，经常挨打挨骂吃不饱的时传祥动情了。至今，他的儿女们还清楚地记得爸爸当年给他们讲周恩来总理给他夹菜劝饭时的口气和眼神……

三

后来，便赶上了那个动荡的年月。

背了大半辈子粪的时传祥因与被污蔑为“工贼”的共和国主席握过手，便也成了“工贼”。

挨打、挨骂、吃不饱又成了时传祥的生活。1971年，他带着一身病痛被遣送回解放前他揣着7块糠饼子、步行13天来京的山东农村老家。

纯朴的乡亲不认为他是什么“工贼”。几十年后，老家的农民大爷还记忆犹新：“那才叫真正的好人啊！五六十年代，哪天早晨起来看到村里大道被扫得干干净净，乡亲们就知道，准是传祥回家了。”

可是，这次回家时传祥却扫不动了。

1972年10月26日，一直半昏迷的时传祥竟变得很激动。他让老伴把院门、屋门都插上，又让做几样“好菜”，翻箱倒柜找出半瓶薯干酒。他要敬13年前这一天握着他的手鼓励他的刘主席一杯：“就冲他能看得起俺这个掏大粪的，俺就到死也不信他是个坏人！”

正直、朴实的人格没能战胜那个劳动有罪、正直有罪的年代。

1973年春节，时传祥听到刘主席已逝世，便精神失常了。两年后的5月19日，他也走了，时年60岁。

四

若干年后，一个“文革”中曾踢打过时传祥的徒弟，带着妻儿在师傅的遗像前泪流满面……

又过了若干年，记者循着那渐被快节奏的人们淡忘了的历史，去寻访时传祥，寻找今天还动荡不定的精神家园。

在《工人日报》那已经发黄发脆了的两大本剪报资料中，在北京市和崇文区的环卫局，在时传祥清洁班，在时传祥家，在偶尔随便的路边……人们诉说了以上的历史，同时也说了如下的现实：

1990年，北京环卫系统招工，应招278名，实招181名；1991年又一次招工，办的是“专场”，计划招200名，只有67人报名，实招32人；1992年“专场”取消名额限制，多多益善，结果报名15人，实招3人！待到1994年，前两届招的213人走的走，调的调，只剩下24人……

某幼儿园老师指着一名环卫工人的孩子教育其他小朋友说：“你们若不听话，将来也得像他父母一样去扫大街、掏厕所！”

北京市环卫局一位干部给记者一大叠材料：“小伤不算，仅1994年，我们环卫工人被打事件就多达78起！”他的声音有些颤抖，“一天不搞卫生谁受得了？今天，人怎么这样？！”

今年65岁，曾与时传祥一同背过粪现已退休的任华亭老师傅对记者说了这样一句话：“大伙看不起老时那样的，受害的还是大伙！”

就是这个任华亭，5年前退休后，还背着粪桶蹬着板车去那些吸粪汽车进不去的胡同里，义务地掏了3年粪！如今，他孤身一人，家里一件电器也没有，只有两只许多年前的旧木箱和两把刚添置的木椅。然而却几年来向亚运会、希望工程捐了近万元

人民币。“我过得挺好。现在有的人比我过得差。能帮就帮一把。”他这么说。

因为“没有城市小姐肯嫁掏粪工”，娶了农村户口的妻子至今没有工作的现任时传样清洁班班长王立冬告诉记者，他所在的那个队，1978年在京城招了他们那一拨工人后，基本就再没来过新人——断了线了：干点什么不比这体面？

“预约”采访之外，记者几次在街上随机采访。一些人说，时传样是环卫系统的榜样，环卫工人们该好好地学。有的环卫工人则说，光让我们学能顶什么用？

……这世界，变化真大！

不过，时传样的儿女们却认这个理：“时代变是应该的，但干活做人的道理不能变。”今天，时传样的4个儿女全都工作在环卫系统：

长子时纯庭，在使馆清洁处当工人。

长女时俊英，在崇文区环卫3队当工人。

次子时纯利，在当了十几年清洁工后于1993年底当上了市环卫局纪检委书记。

次女时玉华，在市清洁一厂行政科当科员。

五

采访时传样老伴崔秀庭老人时是一天傍晚。住着挺宽敞的三居室的老人指着去年春节时73岁的王光美来家看她的合影，便说起了李瑞环、倪志福等时常来看她的事，然后就一定要记者在她家吃饭。家里除一台电视机外，再也看不出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这位解放前因老板不让时传样回家，便抱着大公鸡“拜堂”的老人头脑极清楚，但也说不出什么“闪光”的话，多是看着儿女们与记者谈。可儿女们也多是一味地让菜……当听到要写时传

祥时，老人就挺激动，同时也有些黯然：“现在实实在在干活，本本分分做人还时兴吗？你写劳模还有人看吗？”

记者默然。

几天前，记者与几位挺有身份的人士聊天。有人问“忙什么？”“在写时传祥。”大家就笑。后来其中一人单独对记者说：“现在赚钱再多的人内心深处也都有一种感慨——大家都能像时传祥那样正直、敬业、实在，该多好！”

（原载 1995 年 5 月 17 日《工人日报》）

评析：

用“共时”和“历时” 两条线索来组织材料

汪凯

本文名为“寻找时传祥”，实为寻找新时代人们的精神家园，是一篇颇具特色的通讯。作者通过“回访”展现了时传祥身上蕴含的精神，并与“我们的时代”加以比照以达到“重访精神高原”的目的。为此，他采用了“共时”和“历时”两条线索来组织材料。“历时”的叙述，主旨在刻画时传祥的人物形象和精神风貌：作为掏粪工，他与共和国主席有一段佳话；他没休节假日，背了十七八年的粪；被打成“工贼”的日子他还义务替村里扫大街；他的 4 个儿女也承父业……而“共时”的线索是寻访时传祥的过程，“共时”的材料则是在这一过程中，一连串的人和事：中学生的“摇头”，大学生的“漠然”，老师教导小朋友的名言：“你们若不听话，将来也得像他的父母（环卫工人）一样去扫大街，掏厕所”……“共时”与“历时”的对比，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某种精神缺失，而这一点通过任华亭师傅的言行和崔

秀庭老人的话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最后，作者通过一个“挺有身份的人”的话，道出了时传祥精神的实质——正直、敬业、实在，也道出了“我们的时代”对这种精神的渴望。全文分两个方面来写，却又以“寻访”之路为轴贯穿始终，结构紧密，行文流畅，语言文字也非常朴素而富于感染力。

醒来，铜陵！

——谨以此文参加“理思路、
抓落实、奔小康”大讨论

龚声

当历史的脚步匆匆跨入本世纪最后 10 年的时候，每一个铜陵人是否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必须重新审视我们自己。

十年磨“剑”锋自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铜陵人以“开山取宝、凿石求金”这一锲而不舍的精神，为铜陵生存、发展开拓出颇为辉煌的新天地：

——1990 年与 1978 年相比，全市社会总产值增长 3.5 倍，国民收入增长 2.6 倍，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2.7 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 3.3 倍。1990 年与 1985 年相比，在省辖 9 市中，我市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增长幅度分别居第 5 位、第 2 位和第 2 位，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也居第 3 位。统计数字证明了一个铁一般的事实：铜陵在前进；

——“铜陵特区”已早为人们所淡忘，而淡忘的又岂只是这一名称：工业持续 22 年“单打一”采冶铜已被有色、化工、纺织、电子、建材五业并举、齐头奋进所取代；农业也不再是传统的种植业，而是农、林、牧、渔、工、商、运、建综合发展的大农业；铜官山下、天井湖畔，水、电、气管线密如蛛网，成片的

厂房、住宅楼各呈风姿……这一切都寓示着一个新的工业港口城市正在孕育之中。

每一个铜陵人、每一个熟悉铜陵的四方宾客，都会为铜陵的飞速发展而自豪。人们知道，这十多年是铜陵建市以来最辉煌的时期，经济发展最快，城市居民受惠最多……

江南古铜都，地灵人杰多。雄风今乍起，英姿自成歌！

同处一江景不同

然而，当我们拿起理性的放大镜，回顾我们所走过的每一个履痕时，便会在辉煌中看到不足、看到令人震惊之处：

1990年与1985年相比，全市全民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产值增长了31.9%，但销售收入利税率却下降2.85个百分点，资金利税率下降2.28个百分点，固定资产产值率下降16.89个百分点，留利水平下降22%。无情的数字告诉了人们一个难以置信、却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即在“六五”末期效益水平已经很低的基础上，经过5年的艰苦努力，我市的主要经济指标不仅没有上升，反而惊人地下降了。

高速度为什么没有带来高效益？而就这令一些人自豪的经济发展速度，与沿江地市县相比，也是“略输文采，稍逊风骚”。与邻近的繁昌县作比较：1985年该县与铜陵县还处于同一个发展水平，而如今他们的工农业产值已超出铜陵县1倍。即使剔除一些不可比因素，我们也难以和他们平起平坐。一江春水向东流，同处一江景不同。这是为什么？！

我市是皖江开发开放4市之一，但与其它3市相比，差距又何等之大！1989年全民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产值利税率、资金利税率、销售收入利税率，芜湖分别是32.3%、33.4%和21.2%，马鞍山分别是34%、21.2%和19.8%，安庆分别是

21.1%、22.8% 和 14.1%，而铜陵分别是 14.5%、9.4% 和 9.2%。1989 年全民独立核算工业人均创利税，全国是 3851 元，全省是 2501 元，而铜陵仅有 1741 元。在全省 9 个地级市中，我们“铜老八”的帽子为什么长期摘不掉？

我们还常常为铜陵“七五”的高投入而沾沾自喜，但殊不知，投入像一根“魔棍”，变化多端，既可以变为“宁馨儿”，又能够化为“丑八怪”。截至 1990 年底，市属地方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债务总额已高达 8.23 亿元，其中外债 3058 万美元。这些债务的 61.2%（5.03 亿元）要在 1992 年以前还清。而 1990 年实际只还了 0.4 亿元，其中还有 0.15 亿元是靠免税还的。按照现有企业的盈利状况推算，我市每年的债务利息都难以全部偿还。高投入为什么没有带来高产出？

除此之外，不足和差距之处还有很多很多：产业结构仍不合理，产品的结构层次和质量档次仍然偏低；农业的保障体系相当脆弱，生产力水平亟待提高；各项事业的发展很不平衡……

对这些，一些有识之士心中充满了困惑与焦虑。铜陵为什么不能发展得更快一些？为什么不能解决别人已经解决或正在解决的问题？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当我们站在 21 世纪的门槛边，倾听着大江东去拍岸的涛声的时候，不能不深深地思索：怎样才能医治好我们身上的“疾患”，以健壮的体魄，去创造铜陵更辉煌的明天？！

剔肤见骨找病根

透视铜陵这个既健康又染疾的肌体，不同见识的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不同的“诊断”。但是，一个最准确的诊断，已经由历史老人作出了，这就是：思想还不够解放，观念未及时更新，精神

还不够振奋，商品经济意识淡薄。这些“病源”互相渗透，彼此诱发，产生了阻碍我们前进的一个又一个“病灶”——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念不强：有些部门和单位，以“自我”为中心，符合自身利益的事就办，不符合自身利益的事就推。外地进城劳动力的管理，与此沾点关系的部门都抢着伸手揽，而集资修路建桥等，有关单位就拼命往后退。企业兴旺的时候，各个部门都想去捞一把；企业困难的时候，不少部门都撒手不管。还有一些部门和单位，处理工作以文件为中心，以条条为标准。有个企业为了优化生产布局，曾经打算将企业的内部结构作适当调整，但有关部门却从条条出发，不给配套政策，使企业调整无法进行。一个外商很有兴趣的微波炉项目，本应在铜陵落户，但这个说资金不落实，不能批立项，那个说没有立项不能给资金。各用各的文件，各持各的道理，扯皮扯了一年半无结果，外商一气之下跑到大连，人家半天就立了项。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表现在其它工作与经济工作两张皮上。文化、教育、卫生、宣传、组织、统战等部门部署工作，有不少可以也应当与经济工作相结合而没有结合，就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影响了经济建设。某厂党委一位领导，在一次和主管部门干部交谈时，竟说：“生产上的事我们一概不管”。在这样的干部心中，哪还有“中心”的地位？

商品经济观念薄弱：在商品经济已占很大比重的今天，我们相当多的厂长和经理至今仍在迷恋产品经济的“温床”：争保护、要计划有门，闯市场、搞经营无术，全然没有效益观念。麻纺产品严重积压，就是不能进行有效地推销和处理。有些企业，舍得花钱搞基建、盖办公楼，却不愿花钱抓技改，与经济发达地区形成强烈的反差。就是抓技改，也是无头苍蝇瞎忙乎。某厂搞技改，投资几百万，试车几个月，产量上不去，成本下不来，报捷之声犹在耳边，却停止了生产。一查，原来是工艺、技术早已落后的项目。在农村，

则有相当一部分人“种树怕吃亏、养鱼怕偷、办工厂怕倒、做生意怕骗”。这怕那怕，就是不怕挨穷受苦。商品经济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而我们的一些企业，愿意花钱买轿车、搞装潢，就是不愿花钱培养人才，不愿接收大学生。现有的人才不敢用、不会用，外面的人才不给进，企业靠什么求生存、图发展？发展商品经济必须最大限度地占领市场，但我们的一些经济主管部门和企业，市场观念十分淡薄。今年5月，《经济消息报》提供专版，要免费为铜陵介绍一批企业和产品，但所涉及到的大多数部门和企业，并没有将此作为做广告、搞公关的好机会，反而草草应付，或避而远之，或胡乱凑合。且不说在中央、省级的广播、电视、报纸上，难见到铜陵的商品广告，就在全市街头、广告也属凤毛麟角，直至第三届花卉博览会前夕，市府用行政命令的办法，铜陵才竖起了第一批永久性广告牌。多数企业的销售工作十分薄弱，中央的政策不敢用，省里的政策不会用，市里的政策不知道用。市府（90）50号文件对处理积压产品等问题，规定得很宽、很明确，可就是有那么一些经营者不学习、不研究，任其产品涨库积压。我市拥有的销售队伍数量，不说与江浙比，就同桐城县的10万销售大军比，也相距甚远。

精神状态不振作：从机关到企业，都有那么一些人，特别是少数领导干部，目标不明，任务不清，得过且过，不思进取。对于本部门、本单位在今后3年应该实现什么目标，今后5年能达到什么水平，采取哪些办法和措施，存在哪些问题和困难，心中无数，却泰然处之。什么共产党人的理想，什么市委市政府的战略部署，都统统抛在脑后，束之高阁。一些干部“过糊涂日子当太平官”；坐机关的，不知道要研究哪些问题，搞好哪些服务；办企业的，不了解市场如何变幻，不懂得新品种怎样开发；搞农业的，讲不清粮食产量多少，水利设施如何，多少人温饱没解决。有一些干部，整天长吁短叹，畏首畏尾；处理积压产品怕亏损，开发新产品怕没市场，进行技改怕缺资金，处理不合格工人

怕遭报复。还有极少数干部，或浑浑噩噩，或谋私钻营，有的竟置党纪国法于不顾。

改革意识不浓：经济社会工作中的许多深层次问题，只有靠深化改革才能解决。但我们的不少同志，仅仅把改革叫在口中、写在纸上。大家都赞成住房制度改革，但适当提高房租、多住房子多拿钱，一些人就大叫大嚷受不了。公费医疗的漏洞众人有目共睹，但不少人又不愿承担改革的风险。在居民区进行安装有线电视的试点，受益者都说是件大好事，但一提要自己掏点钱，又说“这不能算是办好事”。都说分配不合理，但在企业实行质量工资制，又有人说技术低的工人吃了亏。“铁饭碗”都说要打破，但让违纪工人下岗，或作出处理，就有人四处说情。在他们的眼里，改革都必须对自己有利，个人不能作出任何一点牺牲。

对外开放观念差：铜陵位于长江黄金水道之旁，又是皖江开发开放四城市之一。可我们的一些部门单位的领导、职工又是怎样对待开发开放呢？今年初，当南京市一位副市长率团来铜陵考察时，在城外转了一个多小时方才摸进城，其原因就是本市入口处连个起码的标记也没有！一位外商结束访问离铜时，要用美钞兑换人民币去结账，但有关人员正在政治学习，还说：“对不起，业务暂不办理！”一位意大利商人来铜陵住旅馆，面对积满灰尘的窗户、掉了螺栓的马桶盖和污迹点点的被套，他责问道：“这像做生意的吗？”我市第一个较大的中外合资项目——金光延压加工有限公司，从立项到审查，从筹资到审批，前后费时近两年，盖了几十个公章，才得以上市。如果不是外商有耐心，这个项目早就告吹了。

以上形形色色的问题虽挂一漏万，却展露了相当一部分铜陵人的思想、观念、精神状态上的丑陋之处。可以这样说，正因为存在这些丑陋之处，而我们又没有及时正视它、解决它，才导致铜陵过去某些方面的落伍和现在某些事业发展上的裹足不前。

解放思想是先导

思想的解放常常是正确行动的先导。1978年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赢得了人们思想的大解放，赢得了全国十多年的大发展。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经济要开放，首先思想要解放。开展“理思路、抓落实、奔小康”的大讨论，意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对此，每一个铜陵人都应积极参与。当然，思想的解放往往需要进行痛苦的反省。鲁迅说过：“我常常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地解剖我自己。”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铜陵人，在大讨论中，都不应讳疾忌医，而应当勇敢地拿起时代的解剖刀，割除自己灵魂深处的一切毒瘤和病根。如果我们继续抱着僵化的思想、陈腐的观念、封闭的意识、萎靡的士气，那么，不是危言耸听，在迎接新世纪到来的10年接力赛中，我们铜陵将被别人抛得更远！

改革大潮澎湃，历史不允许我们再躺在产品经济上酣睡了。环顾神州，时不待人：沿海经济上去了，山东经济上去了，省内各地市也在你追我赶。每个有志的铜陵人都应该扪心自问：怎样才能无愧于脚下这块浸满烈士鲜血的土地？！

醒来，铜陵！

（原载1991年11月14日《铜陵报》）

评析：

思想的火花在笔端跳跃

李兆丰

（醒来，铜陵！）——一气呵成！即使是在发表近10年后的

今天读来，仍有痛快淋漓之感。以《醒来，铜陵》这一力作作为龙头的成组系列报道自 1991 年 11 月 14 日在《铜陵报》上陆续刊发以来，引发了全国范围的一场思想风暴，看来并非偶然。

该作作为一篇风貌通讯，其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其极具时代前瞻性和敏锐性的思想内涵。当时的中国正值改革开放新一轮高潮来临之前，旧的观念和体制的堤坝阻碍着改革大潮滚滚向前，在经济建设中各种因深层次问题引发的弊端开始大量涌现。该作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应运而生的。在深入考察、采访、比较的基础上，将新闻性、思想性、政策性熔为一炉，用极有说服力的统计数字和查有实据的事实教训对改革发展中的铜陵来了个“望闻问切”，震撼人心，发人深省。实际上，可以说，该作是在当时中国宏观“疾患”的大背景下对铜陵的一次经典案例式研究，它折射出的是改革开放中的大问题，反映出我国人民要加速经济发展、加快改革开放的迫切愿望。这正是其生命力之所在。该作因其完全符合邓小平同志 1992 年南巡重要谈话精神，充分发挥了巨大的舆论引导作用。

在写作手法上，该作有两点值得称道：其一，采用先扬后抑的对比手法导入，先成绩后问题，使得整篇通讯倍显广度和深度；其二，采用层层深入的分析模式，先表象后内核，靠事实讲道理，寓情于冷静的分析之中，以求最终达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目的。这篇通讯在语言上做到文笔生动、优美，抒情、议论恰到好处，增强了通讯的感染力。“醒来，铜陵！”饱蘸激情的呼唤、自然顺畅的结尾。

金牌不是名牌

刘欣欣 何大新

几年前还为金牌大省而洋洋自得的辽宁人，如今却受到了市场无情的嘲弄：目前，在全国各省、市、区中，辽宁产成品资金占用“三角债”全国第一……

然而，许多辽宁人尚不知道悲哀。

闪光的金牌没市场

金银牌一直青睐着辽宁。几十年来，国家每年评比金银牌，辽宁的得数都排在前3名，目前其获奖金银牌总数已达520块之多，占全国金银牌总数的近1/6。

然而，市场却不肯把她那媚人的秋波送向辽宁。

沈阳生产的沈乐满牌热水器与广东万家乐牌热水器同为国家银牌产品。论性能，“沈乐满”的安全可靠性和煤气燃烧率全国第一；看结构，“沈乐满”由500多个部件组成，属高档产品，而“万家乐”只有300多个零件，属中档货，二者的零售价又相差无几。然而，“万家乐”去年销售30万台，“沈乐满”只有8万台。

辽宁生产的雄狮牌美发器是全国第一家引进设备生产的，质量超过香港产品，国内称雄，可是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那群芳斗艳的美发用品柜台前，却难见沈阳的“雄狮”。

昔日在全国显赫一时辽宁引为自豪的丹东手表、金笔、营口幸福牌钢琴、友谊牌洗衣机、沈阳的机床等，如今都坠入市场萎缩的困境。

失去市场的直接后果是产品的大量积压；今年初，在沈阳市一轻局各工厂的仓库里，积压着 18 万辆自行车、72 万只手表、1.2 万台冰箱。流动资金压死了，生产难以为继。

机械行业是辽宁的支柱产业，光国家金牌就有 73 块，雄居全国首位。令人难堪的是，1990 年，辽宁省机械产品竟在全国夺得积压第一的“桂冠”。

有金牌无市场，金牌大省的处境着实可怜。今年 1 至 5 月，全省 60% 的国营企业亏损。除鞍山、本溪、盘锦三市因有鞍钢、本钢、辽河化肥厂 3 个“盈利大户”支撑外，沈阳、大连、抚顺、丹东、营口、锦州等 11 个城市的工业全部亏损。

金牌大省成了亏损大省。

“上帝”为何不买账？

金灿灿、银闪闪，一块块奖牌货真价实，为何难博“上帝”的宠爱？

究其背后的原因，辽宁的金银奖牌有 5 大缺憾：

一曰：“杨贵妃”型——“养在深闺人不识”。金牌并不等于名牌。辽宁人不善于把奖牌变为名牌。在电视广告节目中，人们看到 10 次“万家乐”，也难见“沈乐满”一面，前者已成为消费者倾慕的名牌，后者却鲜为人知。

二曰：“模特”型——不能形成批量生产。这样的金牌于企业有何用？

三曰：“铁拐李”型——生产腿长，销售腿短，销售渠道少，网点更少。获国家味精行业第一块金牌的沈阳红梅牌味精早就名

扬大江南北，而今却因销售乏术，在市场上不得不拱手称臣。

四曰：“皇帝女儿”型——价高无人攀。据介绍，辽宁省的名优产品价格普遍比外地高。功能过剩是价格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沈阳一家新型建筑材料厂生产的石棉瓦质量之好可用 50 年，因此荣获同行业惟一的一块银牌。可是时代进步了，现在人们只用石棉瓦盖暂设房。一家建筑单位表示：“能挺两年足矣，50 年不坏，有什么用呢？”于是用户都转而去买乡镇企业生产的寿命短但价格低的产品。

五曰：“老面孔”型——沈阳某大机床厂一种获得银牌的车床生产 20 多年，直到去年销售不出去了才大吃一惊。

曾使辽宁人引为自豪的金银牌产品，如今却又给人们带来苦涩的疑惑：这样下去，金银牌产品还会闪耀出当初那迷人的光彩吗？

市场呼唤“制造商”

记者在大连、沈阳时，发现不少企业的金银奖牌或奖杯不是摆在销售科、展销室，而是供奉在荣誉室、贵宾会客厅。有人曾问：金牌是什么？一些辽宁人答：是政府给的荣誉，是上级的褒奖！可一位南方厂长则说，它首先是市场通行证！

重生产、轻流通，这是金牌大省悲哀的症结所在。

目前，辽宁省一些领导部门最关心的自然是“产值”，每个月，不少企业都要收到以“必得产值”为首的生产调度令。一些地方、一些企业仍在积极扩大生产规模，然而，对其产品能否走上市场变为商品却不甚关心。辽宁的许多企业，精兵强将，优秀人才集中在生产上，销售人员过少，有的上万人大厂竟然没有开过订货会，且不知产品市场在何方。

行家说辽宁，感触最深的一点是这里的生产组织结构落后，

生产结构刚性化，调整适应性差，大批量生产单一品种容易，干那些小批量、多品种的产品难上加难。沈阳的标准件厂、铸造厂、低压开关厂等企业均号称亚洲最大，人才、技术、设备、资金都占优势，可面对市场的新变化、新需求却是“磨盘身子——转不动”，拿不出适应用户需要的产品来。沈阳某大机床厂生产的普通车床大量积压，而眼看着一叠叠轴承车床、管子车床的用户订单，连连叹气：咱这“母鸡”不会下这种“蛋”。

难怪有人出言入木三分：“辽宁多的是生产者，少的是制造商。”

事实最有说服力，向以豪爽著称的辽宁人在花钱做广告上显得格外小气。今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首届中国国际广告研讨会暨展览会设置的3000多个广告摊位中，多数是南方企业，其中福建省的3个市就占32个摊位。而偌大的东北三省只有3席。更使辽宁人丢面子的是，自己家门口的广告媒介也成了外地人的天下。1990年，沈阳共发布3.4万条广告，其中当地企业的只占1/3。据一位广告界权威人士介绍；沈阳市共有5400家企业，到目前，做过各种广告的只有540家，占1/10，而广东省轻工行业做过广告的企业则占总数的9/10。

难堪也罢，不服气也罢，现实无情地告诉人们：“金牌现象”是一面镜子，它从一个侧面映照出，面对新的市场格局，辽宁人无论在经济机制和思想观念上都是不适应的。

补上市场这一课已成为摆在辽宁人面前的重要课题。给人们希望的是，辽宁省许多有识之士已开始认真地思考，他们开始承认自己的不足和落后，他们开始探求新的出路。

（原载1991年8月24日《经济参考报》）

评析：

一篇富有启迪意义的新闻报道

周健平

《金牌不是名牌》是一篇获得第二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作品。整篇报道并不长，然而分析问题丝丝入扣，揭示出重金牌这一现象背后蕴含的不关注商品经济条件下市场动向的严重问题。

金牌产品在市场上原该是热销货，现实中却在厂家积压多年卖不出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报道在第一部分尖锐地提出辽宁这个产品金牌大省成了亏损大省的问题。在记者的笔下，问题的症结被一层层剖析开。原来辽宁的获奖产品都是以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它们并不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市场需求。通讯揭示出“金牌不是名牌”现象背后隐藏的原有产品经济观念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深刻主题。

报道的第三部分，记者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国营企业必须补上市场这一课。金牌大省重生产轻流通的产品生产观念将会在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被无情淘汰，要想继续生存应制造出符合市场需要的产品。

通讯提及的是辽宁省“金牌不是名牌”的现象，揭示的是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旧有经营观念不适应经济发展的的问题。不需找市长，只能找市场，在现今全国各大国营企业处于探索改革出路的关键时期，这篇报道对我们依旧有着启迪意义。

“斗鸡”上海滩

——这是一场意义在胜负之外的竞争

钱培坚 李浩明

这是一场令人兴奋，而又耐人寻味的竞争之战。交战双方为美国肯德基家乡鸡与上海荣华鸡，诙谐的上海人把两者之间的竞争，幽默地称之为“斗鸡”。

3年前，美国肯德基公司携在全球连创8000余家连锁店之威，挟北京战役大捷之勇，欣然振翅南下，在上海外滩东风饭店一隅，竖起了山德士颌首微笑的立体塑像。

一时间，“百鸡争鸣”的上海滩，被肯德基公司以风味独特的家乡鸡和国际快餐的先进经营模式独占鳌头，以至常熟叫化鸡、德州扒鸡、温州八珍鸡等失去了昔日风采，就连土生土长的上海小绍兴三黄鸡也受到了威胁。

然而，肯德基公司在上海独领风骚的喜悦维持仅一年，一只纯种的“中式家乡鸡”——荣华鸡扑翅闯进“斗鸡场”，向肯德基发起了有力挑战。

荣华鸡与肯德基家乡鸡同属以炸鸡为主味的快餐。为了培育这只“中式家乡鸡”，上海荣华楼经理李余才、副经理李耀震多次以顾客身份前往肯德基家乡鸡快餐厅“学习”。成功的借鉴，在于随之糅进创造性的成分。上海荣华楼在国内首创高压气炸烹调工艺，并使荣华鸡披上中国传统饮食特色的“羽毛”；酸辣菜针对色拉蔬菜、浓汤针对雪碧、咸菜毛豆针对土豆泥、米饭针对面包，更迎合了国人饮食口味，而价格低于肯德基的实惠更赢得顾客。

面对荣华鸡咄咄逼人的攻势，肯德基家乡鸡不得不被迫屈尊降价求客，屡屡“酬宾”。其实一向无往而不胜的肯德基家乡鸡岂会就此认输。经过一年多的筹划，肯德基家乡鸡在距荣华鸡仅数百米处行动了。今年5月，一座完全美国正宗肯德基风貌的新店，在人民公园北侧骑墙落成，350平方米的店堂里，摆下了233个座位，北观人流如潮的黄金闹市，南赏闹中取静的公园花草，好一块风水宝地。果然，开业数日，顾客盈门，“洋鸡”重振风采。孰料，荣华鸡迅捷反应。两个月后，第一家荣华鸡连锁店在热闹非凡的上海大世界附近开张了，尽管它的营业面积仅有40平方米，制作工场只有10平方米，然而，操作工人们说得好：“我们的空间虽小，但我们要让中国传统风味的荣华鸡占领广阔的国内外市场。”因此，他们第一天就创下了营业额近万元的佳绩。紧接着，第二家荣华鸡连锁店也已开张在即。这家上下两层的第二连锁店，将与荣华楼总店与第一连锁店，对肯德基形成犄角包围之势。

在竞争中日益壮大的荣华鸡，信心倍增，意欲飞出上海，飞向全国；老谋深算的肯德基公司也在紧锣密鼓，筹划着在上海乃至全中国谋取进一步发展的新招。两只分属大洋两岸的炸鸡在上海激战犹酣。

毋需预测这场斗鸡战谁胜谁负，因为这场竞争所带给我们的启示与思考远在胜负之上。

肯德基家乡鸡成功地进入我国市场，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几块以饕餮之欲的炸鸡，而是带来了以工业化、社会化为特征的国际快餐经营模式及先进的设备和制作工艺等。荣华鸡正是汲取了肯德基成功经验而展翅起飞的。

从学生到竞争对手，并在竞争中日益壮大，不正是我们所期待的结果吗？推而广之，当我们为荣华鸡叫好的同时，同样处于开放引进大潮中的我国各行各业又该如何去想，去做呢？

（原载1991年9月22日《工人日报》）

评析：

事、理、趣兼备的经济新闻

周健平

《“斗鸡”上海滩》是一则典型的经济新闻。众所周知，由于自身固有特点的限制，一般的经济新闻很难摆脱写作上拘谨、死板的窠臼。然而这篇报道中却找不到枯燥乏味的说教、论证，有的只是形象的比喻、生动的描写和简练的叙述。

新闻标题把中国荣华鸡与美国肯德基家乡鸡的激烈竞争比喻为“斗鸡”，让人耳目一新。接着作品又以幽默诙谐的语言描绘出肯德基公司在“百鸡争鸣”的上海滩上傲视群雄的壮观场景。面对“洋鸡”的挑战，荣华鸡扑翅闯进“斗鸡场”。作品通过对一件件具体事实的描绘写出了“斗鸡”的激烈场面。

在作品的最后三段中，记者用冷静中肯的议论点出了通讯的深刻内涵：竞争的意义在胜负之外，处在开放引进大潮中我国的各行各业能从中学会国际上先进的管理模式和经验才是竞争给我们带来的最宝贵的财富。这样，作品的主题升华到一个新高度，从而呼应了作品的副标题——这是一场意义在胜负之外的竞争。

深圳特区还能“特”下去吗？

詹国枢 度震 邹大虎

到深圳采访，记者不止一次感受到特区人的失落感和焦灼感。

失落，缘于从“一枝独秀”的昔日辉煌到“百花齐放”的今日平凡之间的心理反差。仿佛一位在前台引吭高歌的明星，忽然退居后排，与大伙儿唱起了差不多的旋律。

焦灼，则来自不再独领风骚后特区位势的微妙变化以及特区面临的日益严峻的考验。

考验之一——优惠政策弱化。

谁都明白，特区是靠优惠政策起家的。随着改革开放在全国的普遍推开和逐步深化，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城市”的逐渐增多，尤其是随着近年来遍及神州的“经济开放区”、“高新技术试验区”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什么“减二免三”，什么“地价优惠”，不但已经“普惠”全国，甚至有的地方为“后来居上”而优惠得“比特区还特区”了。没有优惠政策，特区靠啥吸引投资？没有特殊政策，特区还算不算特区？深圳人因此而议论、而焦灼。

考验之二——投资成本增大。

过去，特区以劳动力和土地这两大生产要素的低廉成本吸引了大量投资。如今，随着特区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工人工资升高了，劳动力已不再便宜；土地因级差地租而逐步“升值”，

房租、水、电等费用也因城市功能的完善配套而逐渐增加。一方面是投资环境设施的日益完善，另一方面则是投资成本的日益增大，这矛盾着的现象使深圳人既困惑又焦灼。

考验之三——办事效率降低。

伴随着“内地特区化”，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特区内地化”，过去以办事效率快著称并以“效率就是生命”为口号的深圳，如今办起事来也有些磨磨蹭蹭了。办事效率不高，已成为历届人代会代表们意见最多反映最强烈的话题。该3天办完的事也许要拖5天，3个章可以盖完的手续也许要再盖3个或者13个章，办事慢一点耐心等一等也就罢了，可怕的是在办事过程中或明或暗的伸手索要多起来了。作为投资“软”环境的办事效率降低倘若再与投资“硬”环境的成本增高结合起来，“投资环境退化”的结论便会在投资者心中明晰起来，由此引起的特区企业近年来纷纷外迁，也成为深圳人既焦灼而又无可奈何的话题。

考验之四——增长速度减缓。

深圳是以全国最有活力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城市而自豪的，自1980年建特区15年来，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35.9%，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57.4%，远高于全国水平。然而，这个增长势头正逐渐减缓，去年分别降至年均增长27.9%和31%，虽仍在全国名列前茅，增速却已大大放慢。令人不无忧虑的是，今年1季度，深圳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同期仅增长19.2%，不但低于广东省平均增速（19.9%），而且只比全国平均增速（17.5%）多不到2个百分点。深圳的增长势头真的就此到头了吗？深圳会从此衰落下去吗？当惯了“排头兵”的深圳人不能不感到焦灼和忧虑。

初夏时节，深圳特区成立15周年前夕，记者来到这个年轻的城市。我们深为特区15年的巨大成就所鼓舞，也为特区面临的考验和今后的走向而沉思和担忧。对于深圳面临的严峻现实，

记者听到了各种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意见。

怎样看“优惠政策弱化”？

有人认为，这是特区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特区特区，既然是以优惠政策先行一步，那么，它的作法在全国推广之后，其政策优势逐渐弱化，正是题中应有之义，说明大家都前进了，都“特”起来了，特区的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因此，特区不应该再“特”下去了。再给它优惠就不合适了。那样，特区和内地的差距岂不拉得更大了？也有人认为，特区好比试验田，第一茬种子种下去，收成不错，推广开来，效果很好。为什么不可以接着再给一些优惠政策，步子再迈大一些，再种它一茬呢？特区再“特”一步，再来一次“试验”，岂不可以进一步推动全国改革开放再前进一步吗？至于沿海和中西部的差距，依靠沿海进一步发展，进而推动中西部进一步发展，岂不比抑制沿海以照顾中西部更好吗？沿海发展得更快，中央岂不可以从沿海抽取更多物力财力以扶持中西部发展吗？

怎样看投资成本增大？

有人认为，投资成本增大，说明特区投资环境在恶化，特区优势将让位于内地。也有人认为，投资成本增大是特区成长的必然结果，也是特区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契机。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三来一补”企业向特区外迁移，符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特区理应因势利导，逐步建立起自己的以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为特征的电子、通讯等高新技术支柱产业。从历史看，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日本等发达国家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又由“四小龙”转移到我国沿海；目前再由沿海向内地转移，这很正常，应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不必过于担忧。

怎样看办事效率降低？

有人认为，特区办事效率的降低，说明特区的办事机构也在内地化、官僚化，特区将由此而失去生命力，失去优势，走向平

庸。南美一些国家曾因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而使外资大量撤离，深圳切莫重蹈覆辙。也有人认为，特区办事效率的降低，既有官僚主义习染的一面，也有办事逐渐法制化轨道化的一面。过去特区草创，市长副市长一拍板就可划出若干土地，引进若干项目；如今土地须层层审批，项目要层层把关，不健全手续不行，而要健全手续，“效率”当然就会降低了。

怎样看发展速度减缓？

有人认为，深圳发展速度减缓的深层原因是投资成本增大、办事效率降低等“投资环境退化”所引起的企业大量内迁。企业纷纷内迁，产值必然降低，速度必然减缓。也有人认为，深圳企业内迁，并非发展速度降低的根本原因，因为内迁企业大多是产值比重较小的一些中小企业，有的大企业，生产厂外迁，总部仍在深圳。从根本上说，深圳发展速度下降，是特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去年，深圳国内生产总值已达 560 亿元，如此大的基数，要想长期保持每年递增 35.9% 即三年“翻一番”，是不切实际的。近几年正值深圳产业结构调整期，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让出的空间，一时难以为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所填补，这也正是特区的阵痛期和低产出期，所以，发展速度下降不可遏制。

近些天来，记者在深圳机关、企业采访，深深感到，无论是市领导还是普通市民，无论是企业家还是职员干部，都在为深圳的前途和走向议论、操心。深圳所碰到的问题，据记者了解，在海南、厦门、汕头和珠海等其他特区，均有相当的普遍性。

人们在思索：

特区还能继续“特”下去吗？

特区究竟怎样“特”下去呢？

（原载 1995 年 7 月 2 日《经济日报》）

评析：

精辟分析与清醒认识

周健平

《深圳特区还能“特”下去吗？》，这是《经济日报》就“特区怎样特下去”的话题推出的一组报道中的头篇。综观全文，整篇报道都是围绕着标题中“还能”两字做的文章。

首先，记者以冷静的笔调写出在深圳采访时，不止一次感受到特区人的失落感和焦灼感。在作品接下来的几个段落中，记者层层剖析了深圳人的失落感与焦灼感的由来，现今的特区面临的不可回避的种种困难与考验。记者用精练的手法勾画了特区面临的四个考验：优惠政策弱化、投资成本增大、办事效率降低和增长速度减慢。

接着，在作品的第三部分中，记者就以上提及的四个挑战，概述了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应该说，写出这些截然不同甚至尖锐对立的意见，也正反映出记者对特区问题的清醒认识。推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其它问题，采取这样的办法也是有一定帮助的。面对困难，正确态度是认真对待，设法解决，单靠驳斥反面意见只会于事无补。

深圳特区还能“特”下去吗？这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新课题。这篇报道提出了问题，分析了困难，但并没有指出解决问题的最终方法。它给我们的启示在于：要想最终解决问题离不开对问题的精辟分析和清醒认识。

开封缘何不“开封”？

詹国枢 度震 刘海法

在开封采访，记者遇见一位复员军人。当问到如何看待市领导提出的“破釜沉舟，大干五年，深化改革，实现翻番”指导思想时，这位年轻人说：“但愿这次是真下了决心。以前，市里也多次跟市民表决心，可结果让人心由热变凉了。我参军前就听市领导说要三年变个样，复员回来一看，开封还是老样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话，说得很坦率，表达了开封人急于改变开封落后面貌的迫切愿望。但追根究底，开封落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领导班子换得太勤，是开封多年搞不上去的重要原因。”座谈会上，街头采访，人们几乎要谈到开封市的领导班子。

一个城市，在10年中，连续换5任市委书记，5任市长，平均两年就换班子，确属罕见。对此，开封市的干部群众心里憋了一肚子话。一位企业家说：改变落后面貌，每届领导都表示了极大的决心，每一届领导也都提出了加快经济发展的措施。但是，始终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一是没从思想解放、观念转变这个根本上“动手术”，旧框框还在，老习惯不改，光喊口号、发文件怎么行？二是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潜力加快经济发展的路子没找准，一会儿重点是农业为主，一会儿旅游业为主，一会儿是搞活流通。一届一个方针，一届一个说法，干部换得勤，经济如何稳定发展？

一位在开封工作多年的干部分析说：从了解的情况看，来开

封工作过的干部，大多数都有很强的事业心，都有能力，但不知为啥就在开封施展不开？在开封干不长？粗算了一下，这 10 年里，市委书记最短的只任职 20 个月，市长最短的只任职 12 个月，这么短时间，连情况也没熟悉，又调走了，有多大本事也表现不出来。可以说，有的领导同志调走时，群众很留恋，依依不舍。开封群众就盼有能力的领导好好干上一段，明确发展思路，一步一个脚印。每走一步，每取得一个成绩，都会使全市人民树立信心，看到希望！

记者曾采访一位个体户，他谈了不少有独到见解的想法。当记者问他姓名时，他说：“别问我姓甚名谁。开封这地方，思想观念落后，人情网、关系网复杂，不一定哪句话没说好得罪了谁。发展经济是硬道理，我真赞成。可要是思想观念落后，硬道理就硬不起来了。”这席话说得很实在，发人深思。

“思想观念落后、封闭，是开封多年落后的根本原因。”话是一句，但具体表现是什么呢？记者与开封干部群众一起摆事实，找根源。大家的话说得很尖锐，也很中肯。

——“开封的干部，也经常去先进地区参观，走广东，去山东。但往往是兴奋一番，感慨一番，议论一番，就是落实功夫差，结果兴奋归兴奋，感慨归感慨，议论归议论，声势不少，效果不好”；

——“开封有的干部只会算小账，不会算大账；只看眼前利益，不看长远利益；只想局部，不想宏观。这样，经济发展上就会‘拣了芝麻，丢了西瓜’，落后的大格局总变不过来，自己的优势也往往看不清楚。改革开放中，稍有困难，就往回走，一次又一次，丢失了一个又一个时不再来的机会”。

——“开封有的干部老是怕这怕那，具体说，是几个不敢干。一是上头没文件，不敢干，二是别人没干的不敢干，三是领导没点头的不敢干。怕的结果，该干的、合乎政策法规的事情也

不敢干了。改革开放事业，许多是前所未有的实践，缩手缩脚，怎么开拓前进？”

——“安于现状的小市民意识比较普遍，大家也知道外地经济发展快，可是过惯了平平静静、慢慢悠悠的古都生活，墙外的世界虽然很精彩，离市区也不远，可是很多人都不愿离开老区去过另一种现代生活。上班挤，住房挤，习惯了，无所谓了”；

——归总一句话，开封市一些干部总喜欢按计划经济的旧框框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在全国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自然就跟不上趟，就要落伍。重点项目为什么上得少？吸引外资为什么不多？非国有经济为什么发展不起来？都可以从这里去找到原因……

种种议论，议论种种，开封人在坦诚地反思过去，深刻地剖析自己。

通过接触开封的干部群众，记者有这么一种预感：开封摆脱落后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开封人开始明白了一个道理：思想观念落后，经济必然落后。

在经济发展上落后了一大截子之后，开封还有没有希望赶上去？这是开封人思索的又一个问题。

有的同志说：“当距离拉大之后，后进赶先进，比当初难度大了。”还有的同志说：“落后之后赶超别人困难很大，但是，落后之后的压力变了动力，思想观念真的转变过来，希望也很大。”

开封市常务副市长梁绪兴说：“开封的希望，在于人们已经意识到了落后，已经逐渐明白了不兴即衰的道理，现在正形成人心思变、人心思上的有利气氛。”

“不管这理由那理由，不干或干不上去就没有半点理由。”开封市领导已亮明了态度：“谁英雄，谁好汉，要在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上比比看？”

（原载 1994 年 3 月 4 日《经济日报》）

评析：

掐准时机 抓住问题关键

胡茵茵

批评报道怎样写是公认的难题。《开封缘何不“开封”？》却解决了这个难题，并获得了第五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首先，它掐准了时机。1994年中央提出“改革、发展、稳定”的方针。这篇报道就认准“发展”做文章。一开篇，报道就运用一位复员军人的话，引出主题：“话，说得很坦率，表达了开封人急于改变开封落后面貌的迫切愿望。但追根究底，开封落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这就表明报道意在找出问题，解决问题；表明批评是为了更好地进行舆论引导。

其次，它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报道没有直接摆明观点。它通过一位个体户的口，道出了开封缘何不“开封”的关键：“发展经济是硬道理，我真赞成。可要是思想观念落后，硬道理就硬不起来了。”报道并没有到此为止。“记者与开封干部群众一起摆事实，找根源”，列举出了五个大问题。另外，“领导班子换得太勤”也是“开封多年搞不上去的重要原因”。由于问题抓得准，报道在写作上就能放得开，就敢说。由于问题抓得准，报道就能说服人，就有感染力。

新闻界人士称这篇报道为“很有艺术性的批评报道”，原因就在这里。

中国市场：人人都想分享的蛋糕

吴 晓 东

1999年9月下旬的上海将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地方，《财富》杂志评出的全球500强企业的掌门人聚集这里，举行主题为“中国：未来50年”的富人论坛。

“欲独霸世界，先逐鹿中国”，这是《财富》提出的一个口号，也是'99财富论坛在中国上海召开的根本原因。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吸引如此多的资本和跨国公司来中国淘金。从1994年以来，中国成为全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资本输入国，同时又是发展中国家第一引资国，是世界上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1978~1998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累计超过4000亿美元，全球最大的500家企业中已经有289家投资中国。

在上海浦东新区，这个被《财富》杂志会议部总裁尼德姆称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98家名列500强的大公司的投资总额超过了80亿美元。

无疑，吸引这些资本和公司前来中国的是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看上去无比巨大的市场，就像那个在鸦片战争之前来中国卖睡帽的英国人一样，“如果每个中国人都买一顶我的睡帽，我就发大财了”。问题在于，是不是每个中国人都买得起而且会买一顶睡帽？

“中国有 12 亿人吗？我认为只有 3 亿。” —— 潜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

既然人人都看中了中国这个大市场，那么这个市场到底有多大？

经济学家樊纲认为：“市场指的是人民的购买力和消费能力，外商所看中的中国市场其实是中国潜在的未来的市场，因为中国目前的市场决没有传说中那样神奇。中国目前的人均 GDP 只有 800 美元，而发达国家高达 3 万美元。中国人除生活必需外的消费能力十分有限，收入制约了市场的容量。同时，中国的工业化程度只有 50% 左右，大量农民仍束缚在土地上，负担重收入低，有效需求只能在低水平徘徊，真正的市场规模十分有限。”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王强博士说：“中国有 12 亿人口吗？我认为只有 3 亿，这 3 亿人才有消费能力，其他的 9 亿人在市场中是看不见的。3 亿人只相当于美国的市场规模，但消费能力无法相比。像北京，尽管有些东西的价格非常高，但是很多人的实际消费能力很低。我在电视上看贵州扶贫，有一家 5 口人的全部家当加起来还不到 100 块钱，像这样的人有什么消费能力？所以有些以人口为基础推算的市场规模听起来很大，实际上不可能。比如说，现在中国的手机普及率大约是 2%，按人口比例推算，要达到 50% 的普及率，销售额将是一笔天文数字，实际上可能吗？农民一人一部手机？其他许多产品，汽车、家电、商品房、运输服务、保险，甚至食品饮料等等都是这样。尤其像人寿保险这样的行业，中国有 12 多亿人口，按照发达国家的比例，这是多大的一个市场，可实际开发起来非常难。”

中国人口研究所的杨学军博士甚至指出了人口对中国市场的负面影响，他说：“1998 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 12.48 亿，

农村人口 8.68 亿，在 15 ~ 45 岁的青壮年人口中，文盲率高达 7%，60 及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 9.7%，同时，全国有 6000 万左右的残疾人口并且每年还要新出生 100 万左右的残疾婴儿人口。因此，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极为贫乏，劳动力素质低下，人口结构不理想减缓了社会财富积累的速度，这些制约因素意味着中国不可能在短时期内高速形成一个成熟的市场体系。”

在消费能力之外，中国人的消费观念是否影响了市场的活跃程度，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所的李琨博士说：“目前国内消费市场难以启动，和中国人的消费观念没有关系。其实中国人并不节俭，也舍得消费，比如买手机、打的和更换家用电器，市场非常活跃，制约市场规模的，是人们的收入增长幅度偏低。比如汽车和房子，不是中国人不想买，而是买不起。”

那么，对于中国市场规模的估计，是不是《财富》及其评出的 500 强企业都看走了眼？他们来中国干什么？

其实，正如经济学家樊纲所说：“他们看重的是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和几乎是用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尽管中国目前的市场规模和市场化程度都还有限，但是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年均 8% 左右的增长速度，1998 年，中国的人均实际消费水平是 2973 元，这意味着 36000 亿人民币的消费能力。1998 年一年内，中国人消费了超过 3000 万台的彩电和超过 1000 万台的冰箱。根据国内贸易局的统计，1999 年 1 ~ 6 月，中国无线移动电话的销售量增加了 853%，寻呼机的销售量增加 635%，互联网用户增加了 100%。人均收入偏低实际上并没有影响中国成为一个诱人的市场。

和市场同样诱人的，是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中国目前有 7 亿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为 40% ~ 50%，如果有足够的资本和机会把中国劳动力的市场化程度提高到 80% 左右，中国能提供 2.1 亿 ~ 2.8 亿的自由廉价劳动力。这个数字接近美国的人口总数，超

过日本、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所有劳动力资源的总和，劳动力成本只相当于这些国家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甚至更低。如果这种资源得到开发，随之形成的市场规模确实十分巨大。

市场中的中国企业，与狼如何共舞

面对中国市场，《财富》公布的全球 500 强企业大部分都已经进入中国并且得到了实惠，通用在上海生产的别克轿车成为中国市场上被追逐的目标，柯达和富士占据了中国的 80% 的胶卷市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商品调查，移动电话、寻呼机、碳酸饮料、速溶咖啡、摄像机、照相机和巧克力等商品的国外品牌在中国市场占据了垄断地位。外国资本在中国带动的就业机会超过了 5000 万个。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如何提高市场占有率，如何在外国大公司的竞争压力下保持活力，成了令人关注的问题。

根据这次《财富》公布的全球 500 强排名，中国共有中国石化集团、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化工进出口集团、中国粮油进出口集团和怡和有限公司等 6 家企业榜上有名。但是，中国企业显然未能拥有与之相配的市场占有能力。

按照《财富》的计算，中国石化以 340 亿美元的销售额排名第 73 位，但是利润只有 19300 万美元，在 500 强中排名第 354 位，雇员人数 119 万，超过排名第四的沃尔玛的 91 万，是 500 强中雇员人数最多的。王强说：“衡量一个企业是否强大，要看企业的市场份额、技术领先程度、经营效率以及在本行业是否具有领导地位。中国石化的人均生产值很低。尽管它的市场份额很大，但依靠的是政策支持的垄断地位，而不是靠企业自身的竞争力。”

中国石化赢的是不允许别的对手参加的比赛。而现在和将来，在竞争中国市场的比赛中，对手无疑会越来越多，中国企业

无法指望依靠把对手排除在外的办法垄断市场，只能在与对手的对抗性竞争中发展自己。问题是：面对 500 强，我们应该培养什么样的实业集团？类似中国石化这样的模式是否适用？

王强认为：“外国的大企业进入中国以后，一些中国企业看到了大企业集团的竞争优势，为大而大，一个企业从电视到电脑什么样的产品都做，希望成为跨行业的巨型航空母舰，这样的公司一定不会有好的结果，明显的例子就是韩国的大宇要破产。对于中国企业，外国企业竞争的压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市场规则。没有规则的市场无法产生真正在市场上强大的企业，而相对客观公平的市场规则有助于中国企业建立一个靠竞争而不是靠垄断取得市场份额的发展环境。”

对于中国企业如何在同一规则下和外国企业竞争的问题，社科院的孙飞认为：“中国企业总是十分担心外国企业对国内市场的冲击，要求国家进行保护，其实，越保护的企业，发展越有问题。相反，在开放的市场，中国产生了一批相当有竞争力的企业，彩电行业是这样，冰箱行业是这样，微型计算机行业也是这样。另外，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会有利于市场规模的扩张，中国企业反而会从中受益。同时，外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在市场上公平竞争，可能会形成双方受益的局面，不见得一定就是你死我活。”

海尔还是搜狐

在很多中国企业为市场焦虑的时候，海尔的张瑞敏和搜狐的张朝阳应邀出席财富论坛。有人认为，这两个企业受到财富论坛的重视，说明它们分别代表了中国传统产业和新兴网络产业的发展模式。其实，不管是海尔还是搜狐，都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技术创新能力和产品创新经验不足。

海尔集团是中国市场这个小池塘中的一条大鱼，1998 年的销售总额达到了 23 亿美元，空调、冷柜、电冰箱和洗衣机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均高居榜首，彩电的市场份额居第四，拥有 50 家下属企业，产品销往 87 个国家。张瑞敏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跻身《财富》杂志全球公司 500 强之列。

从 1985 年到现在，海尔的收入增加了 5000 多倍，平均每年增长 83%，尽管如此，它的销售额仍不及《财富》全球公司排名榜第 500 名公司收入的 1/3。对于海尔未来的发展，王强显然不如张瑞敏乐观，他认为：“海尔走的路子完全是过去日本和韩国发展的模式，产品价格便宜，质量也不错，但核心技术绝对不是最先进的，同时，研发能力有限。尽管海尔拥有劳动力资源的优势，但一个公司的核心技术不能在本行业领先的话，很难说这个公司在市场的竞争中能走多远？我很怀疑海尔是否能够靠出售技术并不领先的家电产品进入全球 500 强企业的排名榜。”

和海尔相比，搜狐不过是网络时代网络这个庞大市场中的一条小狐狸，1998 年对外宣称的收入是 100 万美元，相当于 500 强最后一名公司收入的 1/8902，但是张朝阳对未来的信心却一点也不比张瑞敏差，他说：“搜狐的目标就是要让它变成中国人每天生活中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就像家电一样。”

在网络时代，搜狐这样的公司看起来或许会是中国最有希望和世界先进技术同步发展的企业，拥有美好的前景。因此，在搜狐的实际收入还微不足道的时候就吸引了足够的注意力。人们希望能够透过搜狐这样公司看到中国 yahoo 的影子。但是，IT 界的一位评论人士认为：“搜狐的问题不在于它目前小得可怜的市场规模和营业收入，而在于作为搜狐发展核心的中文搜索引擎不能在技术上取得公认的领先优势。网络时代市场规模扩大的速度很快，但是市场对产品的淘汰速度更快。不能取得技术上的优势或许就意味着永远丧失了竞争的条件和发展的机会。”

海尔和搜狐都是中国市场上表现活跃的企业，它们的问题也是绝大多数中国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时遇到的最大障碍。过去，日本的综合性大公司往往在《财富》排名榜上名次靠前；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专业公司占据了《财富》排名榜的前列位置。和它们相比，中国企业最缺乏的是在专业领域的专有技术优势。

对于中国企业的发展，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王强这样认为：“能不能进入《财富》杂志全球 500 强企业的排名，对于中国企业并不重要，关键是建立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竞争优势，我们见过很多规模不大、产品门类不多但是技术非常先进、产品市场占有率很高的中小型公司，发展非常好。有资本和资源没有技术也能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三联生活周刊》 1999 年第 17 期）

评析：

经济报道有赖于扎实的经济学功底

胡茵茵

没有扎实的经济学功底，这篇报道难以成文；没有良好的新闻素质，这篇报道也难以成文。

1999 年在上海举行的《财富》论坛是国人瞩目的焦点。对这样的大型会议的报道，记者的立足点要高。该文的作者分析了中国市场的实际规模，中国企业如何应对国际竞争以及面对的技术和经验难关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中既有专家的各种观点，又有翔实的数字和文字材料，逻辑推理丝丝入扣。显然，如果记者缺乏经济学专业知识，就不可能驾驭这样的题材。

但仅仅从专业角度出发，报道就可能等同于论文，流于枯燥的说理。此时，记者良好的新闻素质就发挥了作用。

几个小标题：“中国有 12 亿人吗？我认为只有 3 亿”；“市场中的中国企业，与狼如何共舞”，“海尔还是搜狐”，制作得十分新颖、活泼，引人注目。引用专家的论述，记者摘取的也都是一些浅显易懂的观点。

知识经济时代，新闻记者仅仅只拥有基础的采访写作能力已远远不够了。他应当成为某些方面的专家，同时更不能失去良好的新闻素质。这样才能够把握重大的题材，担当记录历史的职责。

事实·分析·深度

——谈谈调查分析型通讯的写作

胡素华

调查分析型通讯，是一种在文本中较多地展示对新闻事实的调查分析过程及其成果的通讯。《深圳特区还能‘特’下去吗？》《开封缘何不“开封”？》《醒来，铜陵！》《菜价跟踪》等，都是这类通讯中的典型个案。

调查分析型通讯，与叙事记述型通讯相比，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相同处在于：两者都建立在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和对此所进行的报道的基础上，都要对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进行较为详细的报道。不同处有三：一是在采访中关注点不一样。前者在采访时，并不十分关注人、事、景、物的能让人产生形象感的表象以及细枝末节，而注重于就事件或问题的历史和现状、原委或症结、经验或教训，进行深入调查和分析。它以探寻和揭示事物的本质为旨归，在采访中常常要顺藤摸瓜，追根究源，由果溯因，也常常会通过各种方法，去获取各种统计数据。而后者则常常要在掌握其他重要材料的同时，十分细致地观察与新闻事实密切相关的人、事、景、物的外部特征，并将此形象地表现出来。二是在写作上侧重点不一样。前者侧重于在深入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对事情的成败得失进行分析思考，在分析思考中直逼题旨。而后者则侧重于对人、事、景、物的具体叙写，通过具体叙写显现作品之旨。三是所产生的效果不一样。前者的效果是后人思，它更多地影响人们的理性层面。而后者效

果是感人心，当然也对受众产生理性的影响，但感人的因素（形象性因素，情感性因素）得到了更多的强调。

调查分析型通讯在写作上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将功夫下在发现问题和调查研究上

这里所说的的问题是广义的。

要写好调查分析型通讯，首先必须能敏锐地发现和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本书所收的 9 篇可以划归此类的通讯，几乎篇篇都体现了作者的发现问题的眼力，篇篇都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

《寻找时传祥》提出了当今时代时传祥精神的失落问题，作品的基调由此准确地定在“寻找时传祥”上。《金牌不是名牌》的作者，则发现了辽宁市场上的一种颇为普遍的现象（其实，这种现象不光辽宁存在），即：闪光的金牌没有市场，“上帝”对获得金牌的产品并不买账。通讯《深圳特区还能‘特’下去吗？》、《开封缘何不“开封”？》，标题即作品所要提出并希望受众认真思考的问题。

要写好调查分析型通讯，其次必须围绕问题展开调查研究。能否这样说，叙事记述型通讯主要是围绕人和事展开调查采访，而调查分析型通讯则主要是围绕问题展开调查研究。通讯《金牌不是名牌》所进行的调查分析也是极具说服力的。它寻找到了辽宁的金银奖牌的五大缺憾：一曰“杨贵妃”型——“养在深闺人不识”；二曰“模特”型——不能形成批量生产；三曰“铁拐李”型——生产腿长，销售腿短，销售渠道少，网点更少；四曰“皇帝女儿”型——价高无人攀；五曰“老面孔”型——产品多年不变。通讯《菜价跟踪》则是一篇关于菜价问题的调查报告，与一般调查报告不同的是，它写出了跟踪调查的全过程。而这样一个全过程，在作品的小标题中得到了明明白白的体现。

二、在作品中重分析议论

在调查分析型通讯中，议论这样一种表达方式占了很大的比重。此类通讯仍然负有报道新闻事实和提供新闻信息的重任，但对于事实本身的报道已经退居相对次要的地位。就此而言，它与新闻评论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新闻评论往往只是将新闻事实当做由头，将话题引向评论者所设定的论点，或推导出评论者从新闻事实隐含的意蕴中所悟出的道理。新闻评论的着力点，是以事实性论据和理论性论据证明论点的正确。而在调查分析型通讯中，作者并不在开篇之处先设定一个论点，然后调动事实来证明此论点；而是从事实出发，通过层层深入的解析，将新闻事实中隐含的道理展示出来，在此基础上最后得出结论。说调查分析型通讯中议论分析占的比重比较大，并不意味着叙述、描写等表达方式就被一概摒弃。事实上，为主的议论常常是与为辅的叙述、描写融合在一起的。

请看个案。通讯《醒来，铜陵！》其副题是“谨以此文参加‘理思路、抓落实、奔小康’大讨论”。这表明，该文是一篇带有讨论性质的特殊作品。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小标题为：“十年磨‘剑’，锋自出”，列述改革开放以后铜陵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短诗“江南古铜都，地灵人杰多，雄风今乍起，英姿自成歌！”作结。第二部分小标题为：“同处一江景不同”，揭示铜陵较之其他沿江地市县所表现出来的“略输文采，稍逊风骚”之处。第三部分的小标题为：“剔肤见骨找病根”，寻根探源，揭示“病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念不强，商品经济观念薄弱，精神状态不振作，改革意识不浓，对外开放观念差。第四部分小标题为：“解放思想是先导”，这是消除病根的带根本性质的药方。人们不难看出该作品的严谨清晰的逻辑结构：“列成绩”、“找差距”、

“寻病因”、“开药方”。其结构方式和表述方式，不仅与叙事记述型通讯迥然不同，而且也与新闻评论大相径庭。

三、在报道事实和分析事实中求理性深度

调查分析型通讯，无论是对成功的经验进行总结，还是对失误、教训进行反思，无论是提出、揭示问题，还是探寻药方、思考应对策略，都必须具有相当的理性深度。理性深度，首先体现在观点或结论的精辟上。通讯《斗鸡上海滩——这是一场意义在胜负之外的竞争》的作者，对美国肯德基家乡鸡与上海荣华鸡的“两鸡之争”，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看到了“两鸡之争”在胜负之外所体现的意义，即：肯德基家乡鸡成功地进入了我国市场，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几块以饕餮之欲的炸鸡，而且带来了以工业化、社会化为特征的国际快餐经营模式及先进的设备和制作工艺等；从学生到竞争对手，再到在竞争中取胜，这正是立足和发展的根本之道。作者对问题的思考，确有比一般人深刻之处。理性深度，最后体现在语言的精警、犀利、入木三分上。

谈话实录型通讯

大公司做人，小公司做事

——访联想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兼总裁柳传志

张曙光 李全伟

1、“贸”字当头说明了什么？

记者：在信息行业中生存的企业，掌握核心技术无疑是非常重要的。CPU 技术在美国人手里，使其在全世界始终保持着这个行业竞争的主动权。而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市场，民族工业企业除了自身的生存需要外，还要肩负起振兴民族计算机工业的重任。许多人都希望作为中国计算机行业龙头企业的联想集团也能够和技术方面形成优势，能够与外国大公司抗衡。但联想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了贸、工、技的发展道路，这也许与一些人对联想的期望有差距，但实践证明这是一条成功的道路，“贸”字当头给联想带来了什么？这是许多人想了解的问题，请您谈一谈。

柳传志：近来一些专家、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大家在一起对北大方正的技、工、贸道路和联想的贸、工、技道路进行了比较，到底哪个更适合中国国情？我们觉得，这里面确实蕴含着深刻的道理。这要从两个角度来考虑，一是从实践，二是从道理。从实践上看，联想在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曾有一个人数相当多的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出来的阶段性成果，可转化为产品的有几十项，其中最大的一项投资有 500 万元，叫多口汉卡，这个

产品还是比较有市场的，有的台湾厂家现在还在做。但是当时我们做起来就是成效不大，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市场开拓能力。一是产品本身没有在市场上反反复复地磨合过，产品的性能和质量还应该在市场上获得更多的意见；二是销售人员不知道在市场上应该如何卖。联想虽然是搞销售起家的，而且像我们这些创业的元老从计算机所里出来就搞销售，研究市场，但在 90 年代初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摸清如何形成规模销售，以及挖掘市场、运作新兴市场的规律。原来的销售人员只会销售联想汉卡和 IBM，当开拓新领域产品时，就不知从何做起了。最开始销售联想汉卡时，是全公司所有人员都扑在这上头，包括现在副总级的人员，虽然没有找到规律，但事情还是做起来了。打个比方，就像搞传销的，开始先要喊口号、宣誓，振奋精神。如果没有这些，只是坐在家里面等着，可能什么也卖不出去。可以说，在 90 年代初的时候，联想虽然有一定的销售能力，但还没有摸到规律。因此我们或是开发不出产品，或是开发出的产品卖不出去。

从道理上讲，中国还缺少行销商品的土壤。比如科技产品转化为商品，美国人为什么就行，中国人就不行呢？后来我们明白了，像微软、英特尔的技术人员搞市场销售时，他们是长期处于商业社会中，耳濡目染早就轻车熟路了，可中国的企业懂吗？只有像我们这样出来干了这些年，受了这份煎熬后才能懂，这是中国的特殊情况。中国长期在计划经济情况下，大的国有企业搞销售就是开个订货会，真正搞大规模销售则是外行，联想也只是在这几年才取得一定经验。

还有，我认为中国企业的成长应该在三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行业发展规律，比如搞电脑的，是往网络方面搞还是往硬件或软件方面走；二是企业管理规律，就是企业本身的规律；三是中国的一些特殊情况要研究。而在外国就不同，人家的市场基本上是相同的，没有必要研究特殊情况：国外的企业管理也是比较成

熟的，所以，他们可以集中精力研究行业规律，把精力放在“技”作为上，有了“技”之后，就有了这个势能，就有这个能力来推动市场，就像索罗斯那样，他就是有这个势能，换了别人能行吗？有的学者说：“技术能够推动用户，以技术引导市场需求”。这话没错，但要看谁来做。老实说，我们今天还不具备这个势能，无论是从资金还是技术都还不够，但又不能停步，还要向这个目标努力，怎么办？所以，我们搞的贸、工、技就是要用“技”作为引导市场的一个基本手段，“贸”对于联想这样的企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方正，方正是从“技”做起的，但他卖的是专业性产品，不是通用性产品。我相信方正今天如果卖电脑的话，也要摸索做贸易的经验，这是因为产品背景不同。如果是做排版业，有 20 多个人就能把全国的市场做起来，但要卖电脑呢？卖通用性的软件呢？就得组织大规模的宣传攻势，有大规模的市场开拓能力等等。因此，中国企业补上贸易这一课是必要的，我不敢说这是个规律，但对联想来说这条路是很实在的。如果更清楚地表述就是：先做贸易，然后再把大规模工业做清楚，最后通过技术引导市场。

1997 年以后，联想逐渐加大产品中的技术含量，比如我们的应用软件、外形设计、主板等。世界上真正用“技”来引导市场能有几家？也就是英特尔、微软，其它都是靠行销，靠贸易，要想用技术引导市场，企业要有实力。

2、联想怎样估计竞争对手？

记者：电脑产业是一个高速发展的产业，联想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中保持了十几年的高速发展是十分不易的。但从目前情况看，今后的竞争会更激烈，一方面国外大公司要吃这块市场，另一方面有国内同行的竞争，包括国内几家著名的家电企业

也要进军电脑市场，联想如何看待 IT 市场，又是怎样估计这些竞争对手的？

柳传志：中国的电脑企业主要对手还是国外企业。1990 年中国电脑市场销量才 8.5 万台，到 1997 年是 330 万台，发展这么快的主要原因是 1994 年前后外国电脑公司的大举进入，刺激了国内的电脑需求。因为不管怎么说，当时国外的电脑确实比国内的要好，这就使各行各业的人都敢大胆使用电脑。过去用户用国内电脑总是怕出问题，而国外电脑的大举进入改变了这种状态。那时国产电脑占国内市场的 50%，现在也占 50%，但现在的 50% 和过去的 50% 大不一样，那时是用文件和批文将国外电脑卡在外面，而现在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与强手竞争对企业发展有好处，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另外，要看竞争之前是个什么市场？如果这个市场是个不变化的市场，或者说是做不大的市场，竞争就会很残酷，是你多吃一口我就少吃一口的问题。我希望现在的电脑市场既有竞争又有联合，把这块饼做大，这对参与竞争者都有好处。

你看，1990 年国内的电脑市场只 8.5 万台，1997 年是 350 万台，到 2000 年可能是 1000 万台，也可能是 500 万台，这要看市场怎么做以及市场的变化。而市场的发展靠什么呢？取决于制约市场的瓶颈怎样解决。现在妨碍电脑市场发展的瓶颈是软件应用，那就要由中国和国外的软件企业一起把市场做大。像英特尔公司是做硬件的，但他非常关心中国的应用软件的发展，微软在这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功夫。联想与软件公司的合作不光是为了自己业务的发展，也是为了把饼做大，所以在市场竞争中首先是考虑怎样把市场做大，其次再考虑自己所占的份额。这就是在竞争中强强联合，根据市场情况找到 IT 行业的薄弱环节，把市场做大是我们共同的要求。因为做到 1000 万台对大家都有好处。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家电企业进入电脑行业也是有好处

的。家电企业有很多特点，比如他们的服务、销售方式等，对我们是有启发的。现在国内企业的竞争是练兵，将来还要向国外打。

记者：现在国内企业价格战打得很热闹，家电行业、电脑行业都存在，有的行业的价格战招致了有关部门的干预。联想是怎样看价格战的？

柳传志：1996 年联想率先 5 次降价，使得整个国内电脑的价格降了下来。我们觉得，联想的降价是对中国电脑行业发展有贡献的。怎么讲呢？有两点，一是那时的国内的电脑性能和价格还不如国外。当时外国用 486 时国内还用 386，而且国内价格还比他们贵。这是国外产品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后来国内企业上来了，有着各方面的优势，使情况一下倒了过来，现在国内最先进的机器几乎与国外同步，而且价格更便宜，这对中国的 IT 行业 and 用户都有好处。二是看你的价格是否还能盈利，如果是长期不能盈利，那就是自杀。对联想来说，电脑是联想四大产业中盈利最多的一块，占到 60%。因此，看毛巾能不能拧出水来，要看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的提高。

另外，联想还要与其他公司一起把电脑市场向健康的方向引导，比如说对软件方面的促动。我们是把软件当作一个经济增长点，向软件进军是 IT 行业的一个趋势，解决瓶颈就能把饼做大；而且公司在做软件的同时，对自身的硬件发展也有好处；同时，软件本身也是重要的盈利方面。现在软件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盗版，这使软件厂家很难收回应得的效益，因此再投资的力度就会减少，做不出软件精品，用户就不满意，形成了恶性循环。而联想有较大规模的硬件生产，可以与软件一起进行捆绑销售，这就从战略的高度越开了盗版行为，同时也可从战略的高度推动中国知识产权的发展。

记者：联想今后怎样搞捆绑式销售？

柳传志：联想今后要搞大规模的捆绑式销售，可以搞两套软件，一套商用的，一套家用的，可以捆绑式销售，也可配套式销售。

3、联想是国有企业吗？

记者：产权明晰，管理科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个基本要求。现在一些国家搞改革是走产权明晰化的道路，而发达国家的企业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产权又有模糊化的趋势。曾有人说：“联想是个谜”。大概其中一点就是对联想的产权结构没有搞清楚。产权问题对一个高科技企业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呢？

柳传志：从联想主体来讲，中科院电脑所是大股东，这个主体叫“联想控股”，当初创业时中科院的 20 万元就是投到了这里，在这里面中科院占 65%，员工持股会占 35%。联想控股控制着一个大公司，就是联想集团公司，这是家在香港上市的公司，我们的所有业务都在这里，我们在这里的股份占到 68%，其余 32%是社会资金，主要是国外的大基金。联想集团公司下面有许多业务，联想控股下面也有一些业务，联想控股的业务成熟后再卖给香港联想公司，以获取更多的股份。比如：今天我们以 3 元一股买了 1.5 亿股，其 5000 万股是大股东卖的，1 亿股是扩股，将来股价涨到 4 元一股，这时我们的持股比例从原来的 72% 降到 68%，但是我们大股东拿到了 1.5 亿现金，上市公司拿 3 亿资金，有钱就可以做事。现在香港股市不太好，等好转了可以卖掉股票。持股减少了，联想控股可以把好的资产再卖给上市公司，增加股份。比如激光打印仪（属于联想控股），它的利润每年有 1000 万元，卖它时要乘上市盈率，就是它的盈利能力，如果评估的结果是乘以 13 倍，那就变成了 1.3 亿元，如当时股票是 1.3 元一股，我们就可以换回 1 亿股，这就又把大股东的

股份增加了。这样来回做，资金就越来越多，联想控股就有实力把小鸡养成能下蛋的鸡再买出去。

总之，联想控股是一个纯国有企业，它控制着一个上市公司叫联想集团公司，它赚了钱，68%给大股东。

记者：那中科院当初投了20万元，后来的收益有多少？

柳传志：中科院到今年收益有6000万元。中科院得到这笔钱后把它再用到电脑所的配套改造上了。收回的资金都用到这方面来。

记者：那联想的员工持股会有35%的股份是怎么回事？

柳传志：我们管这叫有35%的权益，是中科院给员工持股会的股权，不是股份分到每个人头上。如果分股份的话公司就要散了。权益的意思是有35%的利润分到每个人头上，这样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就大大增强了。你在联想公司会发现，这里主要负责人都是30岁左右，怎么变成这样呢？因为跟我一起创业的老同志都退下来了，老同志们能从副总的岗位上顺利地退下来与这35%有直接关系。这35%中的35%是给16位创业老同志的，因为有了权益后能保障他们继续分享自己的创业果实，这样就不存在一般国有企业领导不干到退休那天不下来的情况，还有35%是给一般老同志的，剩下的权益是给后来新人的。这样老同志能愉快地退下来，新人能顺利地上去，保证了联想集团的事业发展。

联想也不存在一般国企经营者在位时把企业搞得红红火火，快到退休时发现自己下来后一无所有，而采取一些非法的手段牟取私利，即所谓“59岁现象”。所以，联想的所有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这对任何一个企业都是非常重要的。

4、联想能避免失误吗？

记者：中国改革开放 20 年了，其间有无数个企业或企业家兴起或衰落，有如过眼云烟，如沈阳飞龙、珠海巨人，都是在企业高速发展时出现决策失误，使企业出现剧烈震荡。而联想却一直平稳高速地发展，联想是怎样避免决策失误的？

柳传志：这个问题问得好，其实联想的失误也是不断的，但联想在发展中特别强调三个要素，就是建班子、定战略、带队伍。这是我们企业管理中最核心的部分。建班子是第一位的，有了好班子就能定出好的战略，贸、工、技就是我们的一个战略。联想的战略是五条战略路线：第一，坚持在信息产业领域内的多元化发展；第二，坚持以中国市场为主开展业务；第三，奠定工业基础，开展科研开发；第四，加强子公司在研发中的推进作用；第五，开辟股市融资渠道。有了战略能不能实施是又一回事，如同当年东北战役定下打锦州，如果部队打不下来还是不行，这就是带队伍的问题，与制定战略是两回事，带队伍分五个方面内容：一是组织结构；二是规章制度；三是激励方式；四是企业文化；五是培养人才。这些策略将有助于联想顺利实现 2000 年 30 亿美元的经营目标，成为真正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高科技企业。

刚才说的建班子很重要，这是避免决策失误的一个重要因素，这里有三个要考虑的因素：第一，有了班子以后才能形成领导威信。打个比方，一个人不可能把公司里的任何事情都做了，因为任何事情都会有反对者，一个人形不成力量。而有了班子就会形成领导威信。第二，有班子才能形成集体智慧，无论怎么讲，一个人的智慧总是有限的。第三，有了班子后，会对第一把手有个制约。没有制约是不行的，像沈阳飞龙这样的企业就是缺

少这方面的制约：一是个人考虑不全面；二是一个人的想做就做不到；三是做出决定后又推不动，这是威信不够。你看，凡是犯了重大失误的企业都是没有形成领导班子，或者说表面上有，但实际上没有形成班子。联想形成班子后，在各职能部门上设有一个企划办公室，主管各职能部门，如业务发展部、人力资源部、公关部等，它的作用除了具体操作外，还有公司智囊的作用，这个部门中有一些人经验很丰富，能引导公司决策层做出决策，帮助公司领导了解内外情况环境。这个部门不但能支持领导决策，还能推动决策的执行。联想的最高决策层有 6 个人，三个年龄大的，三个年轻的，企划办的负责人是执行董事。

当年我们没有进军房地产业也是经过冷静考虑做出的决定。所以，中国的企业还是要特别强调领导班子的建设，有了班子还要形成合力，有了合力还要有核心，有核心才能做出决断。

5、联想是理想吗？

记者：您对联想是有一个构想的，现在的联想是您理想中的联想吗？联想的用人标准是什么？

柳传志：现在的联想与我理想中的联想还差得非常远。我希望中的联想是长久的、有规模的、高技术的公司。长久的意思是短期行为我们不做，如炒卖股票，炒房地产，虽然也能赚钱，但不能锻炼我们的能力。所以我们通过贸、工、技的道路走到了今天，如今还要加大技术含量，通过技术含量获取利润是我非常关心的问题。

还有，我们目前的问题是怎么把员工的目标与企业的目标结合起来。现在这一点上与我的理想还有很大差距。我希望联想公司的骨干员工能形成一个主人集团，这样的企业才能干得好。一般的国企说是有人，但实际上没有主人，而一般民营企业则多

是个人管理、家族管理，这也限制了企业的发展。我们这种企业应该有一个更好的机制，能最充分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如能做到这点，员工的发展则不可限量。

我还认为，高层骨干应该是有事业心、有能力的同志。事业心不同于上进心。有上进心的人也会努力工作，但目的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事业则不同，有事业心的人努力工作是为了民族的事业，为了联想的事业。如果是有事业心的一群人在一起干事业才能做大。

记者：办企业离不开人，成也在人败也在人，企业风险最大的因素是人的管理，联想是怎样衡量人才的，德与才怎么权衡？

柳传志：在什么情况下使用人才以德为主？什么情况下以才为主？联想认为，对高级员工应是德才兼备，对德的方面不容失误。而一般员工只要有能力就行，当然也希望德才兼备。德的含义无非说是价值观或说是价值取向的问题。价值观来源于人的需求，如一个人是以事业为主还是以爱情为主，有先后顺序，这个顺序本身就形成了价值观，而且一个人价值观中的利他性决定德的标准，如果一个人干什么事都只是为自己，那他的德就不是很好的。作为人力资源部门就应该使这方面的工作尽可能地细化，然后再看他的合作精神、个人努力程度等等，最后给这个人总体打分。

记者：现在人们经常谈论“能人经济”，一个人可以创办一个企业，也可以毁掉一个企业，一个人的去留决定了一个企业的兴衰。您是怎样看“能人经济”的，您对自己的接班人是怎样考虑的？

柳传志：在企业的创业阶段，能人经济现象是在所难免的，但一个企业真正成熟后就不应该是这样。就像美国总统换了那么多，但没听说谁要改规矩变成连任三届的。美国的大企业也是这样，除了创业阶段有创始人外，谁还记得有哪些总裁？但他有一

套适合市场规律的制度和机制在里面，所以企业才会长久。联想的理想是要长久地发展，是靠一套完善的管理机制。人绝对是重要的，能人不光要在创业的阶段把事情做好，还要把机制完善，让有能力的人上来，再去创造新的事业。

对于我个人来说，如果说联想真的离开我不行了，那就是我的失败。我现在考虑更多的是人的层次问题，不是这个人行，那个人不行，大学生进入联想后就有个提高层次的问题。基层员工要提高层次，中层要提高层次，高层骨干也要提高层次。最高层次形成后自然就有了核心。最高层要属于事业型那类，一是要有事业心，而不是个人野心，要为联想的事业，要为中国的高科技事业奋斗；二是要善于总结，不但自己能把事情做好，还能举一反三，总结出做好这些事的主、客观环境是什么？这是指人的悟性；另外，这个层次的人要有全局观，要代表整个集团的利益，而不是某一个部门利益的代表。

6、中关村为什么没有成为硅谷？

记者：北京的中关村号称是中国的硅谷，但与美国的硅谷相比实际上差得很远。回想起来，当年中关村的许多公司创业时与美国的微软差不多同时起步，而现在与微软、英特尔等大公司相比不能望其项背，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什么？

柳传志：联想的成功是有其偶然因素的，在美国，如果大股东给一个雇员 20 万元，14 年不再追加投资，他能办成联想这样的大公司吗？在这中间有多少运作风险、政策风险？在中国办高科技企业有三个不利因素：第一点是机制的问题。像葛鲁夫和比尔·盖茨为什么发展那么快，因为他是企业的主人。在高科技领域里，创业者一定要是企业的主人。因此，在中国办高科技企业应该一开始就让创业者拥有企业的股份。当然有股份也不一定就

行，但没有股份肯定要差得多。还有一点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就是在中国高科技民营企业要比国有高科技企业发展快得多。但按理说国有企业的实力比民营企业大得多，这就与经营者是不是主人有关系。第二点是资金问题。美国硅谷守着证券市场，高科技一开始办时谁也没把握它两三年内能不能办成，银行不敢贷款。但风险基金愿意投资，风险基金投资十个企业，其中八个赔了，有两个成功了，风险基金把这两个企业包装上市所赚的钱远远高于那八个赔的钱。中国现在还没有形成风险基金，上市企业国家要求有一定的规模，没有高科技企业上市那么一说，所以与美国相比，没有风险基金盈利的方式。第三点是人才的问题。美国硅谷人才济济，我与台湾的高科技企业有不少接触，那里很多人都有在美国读书的经历，有在美国公司工作过的背景，中国内地则不一样，我们的企业付不起那么高的薪水，出国留学的人回国的也不多。联想的做法是与国外大公司合作办企业，通过合作来获取技术和管理经验，或是派人出去，或请外国人来当顾问。

最后我要说的一点是：中国很需要企业家和企业理念。怎样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中形成企业家和正确的企业理念？这从书本上学不到，在哈佛也学不到，从国有企业中也很难学到。这需要中国成功的企业家经常把自己的经验教训说出来，让人们受到熏陶，在中国形成一个企业家的社会。

（选自《与 100 名老板对话——〈中国经营报〉精彩文章集萃》，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9 年版）

评析：

“问”的艺术

胡茵茵

从幕后走到台前，是访谈写作对记者提出的要求。如何应对，那就需要把握好“问”的艺术。《大公司做人，小公司做事》一文给人们带来了以下几点启示。

首先，案前工作扎实。记者对联想集团，对柳传志本人，对中国乃至世界的电脑业情况都有相当深入的了解。这才使整个访谈有了进行下去的基础。比如作品开头的提问：“但联想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了贸、工、技的发展道路……‘贸’字当头给联想带来什么？”这就是基于记者对电脑行业以及联想集团的了解。

其次，目的明确，环环相扣。整个访谈录道出了联想的成功道路以及运行特点。这得益于记者问得清楚，问得明确。各个问题都由“联想的思路”这样一条主线贯穿，显得中心明确，丰富而不杂乱。从“‘贸’字当头说明了什么”到“联想怎样估计对手”，到“联想能避免失误吗”，都显示出记者采访的严密的逻辑性。

第三，深入细致，不流于表面。“问”的最终目标还是要让被采访者答得好。记者的提问越深入、越细致，被采访者就越能说出富于价值的话语。问题的切口要小，但还要给被采访者以足够的空间。“无数个企业兴起衰落……而联想却一直平稳高速地发展，联想是怎样避免决策失误的呢？”这样的问题就是很好的例子。

王维嘉 剪断 Internet 尾巴

郑雅心

Internet 让当代人疯狂，让当代梦最酣，可梦里的主角都是美国人；一位从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却想剪下 Internet 尾巴，他认为 Internet 自由之时，将是中国人近百年来第一次领导创建人类主流文明之际。这个留学生是谁？

人，被系在大地上，唱出来的歌就没有办法不悲伤；Internet，被系在大地上，唱出来的自由就没有办法不做作。

1999 年的圣诞节，上帝走到一位中国留学生的家门口，放下了两份礼物：一位女婴；一张 5600 万美元巨额风险金的支票。

这位幸运的得主就是从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王维嘉。这样的厚宠对硅谷里的中国留学生而言是破天荒第一次。

然而上帝是位势利鬼，他不会凭空赏赐某个人。王维嘉之所以获得恩宠是因为王维嘉手里掌握着一个“巴掌定律”，这个“巴掌定律”让王维嘉发现、并着力开发着一个巨大的金矿——移动无线互联网，该市场将在未来一二十年内有着 1 万亿美元的市场潜力，该市场将取代 PC 市场成为全球第一大产业。

王维嘉说：“1995 年爆发的有线互联网革命是 20 世纪最深刻的一次技术革命。然而有线互联网只能把人所需要的状态及知识锁定在固定点上及传到固定点上。这样人在互联的同时就失去了

活动的自由。这种互联是极不充分的互联。如果以人为中心，100%的互联度应是100%的人在100%的时间里都联接在网上。按着这个标准，今天有线互联网所造成的互联度还不到1%，这剩下的99%就要靠移动无线互联网来完成。”

只有剪去 Internet “尾巴”，互联网才能获得自由移动，人们也能随时随地在互联网上获取信息，这样的互联网被王维嘉叫做可移动的无线互联网。这种互联网一定不是由 PC 来操纵，而是由手机、掌上电脑、网机、BP 机或其他便宜的设置来操纵。为此，王维嘉推断出一个巴掌定律：凡是小于一个巴掌的信息器件必定使用无线互联网。

然而，最早触动王维嘉要做无线互联网念头的是 1992 年的回国之行。“我回国后，国内当时对我特别刺激的一个景象就是很多人都有寻呼机。我是学无线通信的，但我当时却不知道寻呼机是怎么工作的，我的一个同学就带我到一个寻呼台里看了看。我一看很简单：一台发射机、一台 PC 机，两个小姐坐在那里接电话，这就是一个寻呼台。当时 BP 机一个 4000 元，贵得不得了。我说这个市场非常大。我们当然不能做 BP 机，但我们能不能利用 Internet 把它做成双向寻呼机？这是我最早的一个想法。”

1994 年，王维嘉正式成立美通公司，公司成立伊始，便把焦点对准在无线互联网上。当时有线互联网才刚刚有些热度，手机也刚刚从模拟转向数字，还没有人去理会无线互联网。王维嘉在全球是第一个提出无线互联网概念的人。

“现在，我们是这个地球上几乎惟一的一支既懂无线又懂 Internet 的队伍。另外，我们的创新能力非常强，美国在工程方面尤其是计算机方面，最强的是 4 所大学，即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柏克利加州大学、伊利诺斯大学，我们公司的高层正好来自于这几个大学。我们掌握着无线互联网的最核心技术。”

“现在全世界没有一个公司能像我们对无线互联网理解得那

么深刻，从技术到未来的发展，到市场，到应用，到硬件，到芯片，到软件，我们的理解非常全面，也非常深刻。”

“无线互联网产业给了中国人一次特殊的机会。中国的手机用户将在未来一二年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中国的寻呼机用户已经接近美国的两倍。到 2007 年中国移动终端用户会超过美国的总人口，即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的由无线互联驱动的经济国家。在创造这个第一大经济的过程中，中国人可能创造出新的商务模式和网络生活方式，并影响西方。这将是中国人近百年来第一次领导创建人类主流文明。”

比尔·盖茨说：“由技术可以看到未来”。王维嘉也是从技术看到无线互联网的未来，但这个未来是一片荒野，没有人烟，没有公路，然而王维嘉说：“我要创造这个未来。”

“我对无线互联网未来最早是靠直觉寻觅到的，但这种直觉是在非常深刻的技术背景上产生的。”王维嘉的大学和研究生均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无线电系。“我从小就对无线电感兴趣，小学二年级我就开始装收音机，‘文化大革命’时我偷着安装了一个发射机，那时所有的大人都不敢教我，因为装发射机是反革命，当时找发射机电路也很难，我到处找，好不容易才找到。”

“我对 Internet 太熟悉了，1985 年我去美国时，用的就是 Internet。1986 年，我和我的三位同学，还想把 Internet 折腾到中国来，但最后我们没有做。我做的博士论文就是有关网络的。因此，我对 Internet 也有很深的理解。”

“当我看到 Internet 就要变成很大的事情时，我想在有线 Internet 热潮之后，应该是什么？我的直觉告诉我应该是无线 Internet。这种直觉非常强烈，虽然我当时并没有看到市场有多大，市场何时能起来，但我知道如果有一个无线数据网能把每一寸土

地都覆盖上，能做多少事情呀。无线数据加上便宜的终端，再加上 Internet 上的大量的信息，这三者就构成无线互联的概念”。

“虽然我们不知道无线互联网到来的时间，但我们不能坐着等市场，如果等市场我们就等死了。因为那样的话，主动权就不会在我们手里，我们一定要控制自己的命运，我们要创造市场！”

然而，要创造这个市场又谈何容易？因为这个市场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爱迪生为了让灯泡照亮人类，不仅要发明灯泡，还要发明发电机，最后连电线杆埋线如何拉到屋里，他都要管，因为他没有办法，那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大的基础设施。我们基本上做的就是这样一种事情。我们自己做了一整套基础设施，从基站到交换机到网机，都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因此，我们的工作量非常大，比如做网机，就有 600 多个零件，我们要自己设计芯片、设计外壳、设计软件、设计操作系统。这里面不仅仅是一个电脑，而且还是一个网络通信器，网络七层协议都在里面，然而还要有浏览器。因此，网机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东西，比掌上电脑要复杂多了，如果让我们现在做掌上电脑，我们闭着眼睛就能做出来。另外网机、无线电子邮件、无线网上交易，也都是我们在世界上第一个做出来的。”

“网机只是我们工程的一部分，我们还要自己建基站，基站既有硬件又有软件；而且还有网关、服务器、交换软件、服务器软件，等等。这些做完后，你还要联机调试，做大量试验。首先从小规模的技术试验做起，证明了基础参数以后，还要做大规模的技术试验，再做用户试验和商用试验，光是试验我们就在中国折腾了近三年。”

硅谷不惩罚失败，失败过的人反而受到重用；硅谷像个宽容的王国，接纳那些半疯半骗横冲直撞者。硅谷里的人很普通，哪怕是微软的创始人，哪怕是诺贝尔奖的得主们，但硅谷将他们造

就成为一代巨头，因为硅谷流出来的血是冒险，硅谷呼出来的气是创新。

1984年夏天，《人民日报》连载了一本书，叫《硅谷热》，这深深吸引了年仅 26 岁的王维嘉。当时，他还在中国科技大学读无线电专业硕士学位。“这是斯坦福大学一位教授写的一本有关硅谷人创业的书，里面有惠普公司的创业故事，也有苹果公司的创业故事。《人民日报》连载了大约一个月。我看了以后，特别激动，那个夏天，我有个在斯坦福大学读博士的大学同学回国来把那本书的原文也带了回来，我把原文整个又读了一遍。第二年我来到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系读博士学位。”

来到斯坦福大学，王维嘉先后师从于世界自适应信号处理及神经网络的鼻祖 Bernard Widrow 博士，卫星及移动通信的权威 Bruce Lusignan 博士和计算机局域网及 Internet 网络理论奠基人之一 Fouad Tobagi 博士等。王维嘉在斯坦福大学不仅学到很多知识和做学问的方法，更重要的是他被斯坦福大学的创业精神所感染。

“创业需要很多自信，你见得多了，神秘感就没有了。我觉得得到美国读书最大的好处就是长见识。斯坦福大学是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地方，有 27 个人。你在教授食堂吃饭时，也许你旁边坐着的一位干巴老头就是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教我的每一位教授都是某个领域里世界的权威和泰斗。你看多了以后，便会认为这些都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到保罗·艾伦（微软创始人之一）公司里打了两年工，那里有很多在世界上第一个发明这、发明那的人，和这些人接触多了以后，也没有觉得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

“办公司也是这样。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出去创业的人有很多：太阳公司的创办人是我们系的硕士生；网景公司的创办人

Jim Clark 是我们系的教授； Yahoo！的创办人杨致远也是我们系的学生；思科创始人——那对夫妻是我们系管计算机的。”

“斯坦福是硅谷最重要的源泉，这个学校最重要的系就是我们这个系，我们是斯坦福 Double E（指 Electric Engineering：电子工程）的学生。中国人创业最好的条件就是我们这些学生，如果我们这些人不走出来创业，就太对不起老天爷了。其实，出去创业也没有什么神秘感，你只是敢去做就行了。因此，我创业也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情了。”

“硅谷不惩罚失败，这里从来没有人会说，‘瞧，那小子公司没有办成功。’如果有人敢去办公司，大家就会对他很敬佩，哪怕他失败了，也会对他很敬佩。有些人因为失败过，去找钱时，反而更容易了。因为风险投资商认为你已经替他付过了学费。”

“硅谷创业的人很多，就像撒种子，100 个公司创业有 10 个做成功，有两三个做成像思科公司这样的，就不得了。美国社会非常鼓励创新。对中国来讲，鼓励创新其实是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不是说你希望大家创新大家就能创新。这要看社会能否做出很多平衡来。比如说你要想鼓励创新的话，你就要容忍那些半疯、甚至是半骗的人。你要是不容忍那些“边际人”的话，真正的创新就出不来。你要想让非常有创新的人能够脱颖而出的话，你必须容忍比创新的人做得更过火、过头的人。对社会而言，包容性一定要非常强才可以。假如你给人定下千篇一律的要求，这对创新就非常不利。这对一家公司也是这样。这对讲究控制的社会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硅谷根本不缺钱，腰里揣着绿花花钞票的风险资本家四处可见，但他们一个个老谋又深算，他们不看你的技术，不看你的产品，不看你的计划，只看你这个人。

“1993年初，我与几个伙伴准备开始折腾办公司，我们是在我家书房里开始筹办的这家公司。我们一开始做模型、写软件、搭硬件都是在我的书房里进行的。1993年11月我开始找钱，正好这个月的周末硅谷有个网络工程师学会举办一个风险投资的讲座，我也参加了，碰巧著名风险投资商、美籍华人陈健文也来做演讲。演讲完后，我跟他说我们现在有项目，他是否有兴趣，他只给了我一张名片，对我说，你给我打电话好了。”

“然而，我给他打了一个星期的电话，他没有在家，我就每天都给他留一条言，但他没有给我回。一个星期以后，他才给我回电话说，你过来谈吧。我过去与他交谈后，双方的感觉都很不错，以后就这么谈起来了。1994年7月，我们顺利地得到17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

“陈健文现在我们公司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此前，他曾创建了 Proxim 公司，该公司现在已是无线局域网行业中首屈一指的美国上市公司。我们俩人在一起工作了7年，我和他已是非常好的朋友。他后来跟我说，他之所以一个星期后才给我回电话，是想考验考验我，如果他不回电话我就放弃的话，我肯定做不成事。”

“风险投资就是看人。有的风险投资商做法更绝，你给他计划，他根本不看，他就是和你吃饭，了解你这个人，如果你人可行，他就给你投钱。有两个从哈佛大学毕业的人，有多年的工作经验，去寻找风险投资，当风险资本家把他俩的计划看完后，却对他们说，你们的计划是一个垃圾，不可能赚钱。但是你们这两个人非常不错，我给你们俩人另一份计划，你们来做，我来投资。”

“因此，在硅谷融资时，idea（想法）不重要，市场不重要，技术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人。原因很简单，因为靠风险投资创

业的就是‘敢死队’，前面根本没有路，你必须自己拿着镰刀和斧头披荆斩棘去开路。我朝东南方向走就可以发现金矿，但前面我碰上狼了，过两天我碰上一条河，我还得过河，再过两天我还得翻山，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每天都有危机，每天都有风险。这就跟长征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够坚持到胜利，说明你的素质好。所以风险投资商都要看人的素质，人的聪明程度，人的判断能力，人的反应灵敏度，人的知识能力，你能招到人和你能团结人的能力。”

“并不是说别的因素不重要，但人是最重要的，然后他们才看这个市场大不大，然后再看你的技术。这个世纪高科技的竞争，纯粹是人才的竞争。我们对此体会得特别深。在硅谷，idea（想法）满地都是，钱也非常容易找，但是你想找好人却很难。如果一家公司能把最好的人招进自己的公司来，做什么都会容易。”

“新世界集团对我们的投资也很简单，我与新世界集团总经理陈永德是通过别人介绍认识的。1999年11月的一天，我晚上7点在香港下的飞机，9点半与陈永德先生见面，我们谈到晚上12点半，他当时基本就决定投给我们3000万美元。他说你的时间够值钱的了，三个钟头得了这么多的钱，不久他又追加到5600万美元。”

“公司刚刚成立时不可能有很高的价值，只是一个概念和几个人，如果你融到很多钱就会把股权全部卖出去，你就成为纯粹的打工者。所以，一开始应只融一点钱，将这些钱花得差不多时，你已经又做了很多事情，公司的价值随之提升了很多，在这个基础上再去融资，然后再做事，然后再融资，一点点向前滚动。”

“当我们把公司规模做起来时，我们公司价值已经很高了，一般的风险投资商已经不愿意再向我们投钱。这时，我们就需要

吸引战略投资人，战略投资人不在乎你公司的价值有多高，只在乎对他的发展战略是否有利，因此，这时像英特尔、IDG 这样的大公司开始向我们投资。”

“为什么后来又找到新世界呢？因为我们现有的投资人都是美国背景，5 个风险投资都在硅谷，但我们下一步很大部分精力在中国，新世界在中国的关系非常深，他们投资的基础设施如公路、电厂等，我们这个网络将来可能能为他们服务；另外，新世界集团虽然主做房地产，但新世界机械主要做机械，其新方向是想做数码机械设施；第三，他们给 China.com 投资获得了巨大成功。因此，他们愿意投给像我们这样的公司。”

这三年来，就我们的整体业务而言，我们并没有赚钱，虽然我们销售额和人员每年在翻番增长，我们一直是靠风险资金来生存，在 2000 年中，我们准备在美国 Nasdaq 上市。

如果你有很多能量，最好尝试着去创业，王维嘉说：“我在一万人的公司干过，在 1000 人的公司干过，在 100 人的公司也干过。但我却有种力量使不出来之感。我出来创业后，发现最有刺激的是创业，创业会耗尽你所有方面的潜能。”

“我从斯坦福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就去了太平洋贝尔公司，太平洋贝尔有 7 万多员工，比国内还大锅饭，因为电话公司没有什么竞争，每年都是根据前一年的成本，再加上固定的利润，这就是当年的计划了。由于外界竞争不大，外界没有什么压力，因此所有的人开始把脑子动在公司内部上，开始打仗，开始玩政治。而且公司大了以后，你做的业务，与公司的业务好坏几乎看不出什么联系来，这会使你感到非常没有成就感。”

“我当时在技术部门，该部门是我们公司博士最集中的地方，我们开玩笑说，如果谁扔炸弹把我们部门的人全都炸死，我们公

司的股票不仅不会跌，反而会上涨，因为这不会影响我们公司的收入，只会减少我们的支出，增加公司的利润，因为不用给我们这些人发工资了。这样一想就觉得自己在这里做得特别没意思。另外，人没有了压力，长期呆下去，人也就呆傻了，以后想冲都冲不出去了。现在在美国像我们这样创业型公司的人进入大公司非常容易，但从大公司出来的人想进入小公司就太难了。”

“我在一万人的公司干过，在 1000 人的公司干过，在 100 人的公司也干过。在太平洋贝尔公司、蜂窝数据公司、英特威尔公司我都任过职。但我却有种力量使不出来之感。我出来创业后，发现最有刺激的是创业，创业会用尽或耗尽你所有方面的才能。没有一个人在创业时还会说自己某些才能没能发挥出来，即使你各方面的才能全部发挥出来都感到不够用，所以你永远觉得自己有大量东西要学。企业发展越快、发展越大，你就越有这种感觉。”“我们面临的挑战太多了，互联网发展太快、变化得令人头晕目眩，我们的大方向没有问题，团队也是久经考验的，资金上我们也不缺，市场也很大，所有的风险都在具体操作上。”

（原载 2000 年 1 月《计算机世界报》）

评析：

让别人讲好自己的故事

胡 茵 茵

如果说一般的通讯写作是记者在讲述别人的故事，那么谈话实录则是要求记者让别人讲好自己的故事。《王维嘉：剪断 INTERNET 的尾巴》一文就做到了这一点。

全文的五个部分，分别从专业素质、创造性思维、强烈的自信心、融资技巧和创业精神方面入手勾勒王维嘉，使得这位硅谷

精英的个性特征凸显纸上。

通常来说，谈话实录的写作优势在于：真实、自然、客观。但是它的难度也恰恰就在这里。记者没有权利站出来对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做出描述。这就要求记者必须掌握娴熟的采访技巧来获取大量有价值的谈话信息。

《王维嘉：剪断 INTERNET 的尾巴》一文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也在于此。

以王维嘉获取陈健文的风险投资一事为例。这一过程充满戏剧性，每个细节都有吸引人之处。它发掘出了王维嘉获取风险融资的成功经验。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记者敏锐的新闻眼光，“穷追猛打”的采访精神。这一事件的讲述就可能是平淡无奇的。

让他人讲好自己的故事，不是一部采访机就能解决的问题。它需要记者拥有不同一般的眼光和认识事物、提炼谈话精义的能力。

下辈子，我们还当母子

——一位痛失儿子的母亲自述

黄卓坚

记者的话 昨天，在广州市建设六马路小学，该校英语高级教师、广州市优秀教师许美云对记者讲述了一个关于她和她的儿子的真实故事。这是记者多年来最动感情的一次采访。许老师的叙述是记者流着眼泪记录下来的。记者觉得有一分责任将它告诉所有读者，告诉普天下身为父母的人们。记者相信，对于这样一个充满人间真情的故事，人们一定会想得很多，很多……

在今年年初七，当春天到来的时候，我的儿子张云峰却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和病魔拼搏了十几年，总算迈进了 16 岁花季的门槛，而我这个当母亲的感到安慰的是，儿子虽然身患绝症，心里却是健康的。

儿子两岁的时候患了“何杰金氏症”，这是一种恶性淋巴瘤，病魔真是来势汹汹，基本上是两年大发作一次，每次都得上医院作半年的化疗。因此，骑车送儿子上医院，成了我时常的“功课”，儿子也仿佛就是在自行车的后座上悄悄长大的。

儿子生性活泼，爱说爱动，但当他懂得将自己与别人相比的时候，阴影就不期而至了：“妈妈，为什么我那么瘦弱啊？为什么我总是感到辛苦呢？为什么……”

我说，因为你是个有病的孩子，我们还不能选择不生病。但

可以选择不示弱，只要努力，你照样可以生活得很快乐。有个叫张海迪的阿姨，虽然高位截瘫了，但还做了许多了不起的事情，你能蹦能跳，条件比海迪阿姨好多了，儿子，我们不能“执输”（失败）啊！

话虽然这么说，但生病的孩子很容易产生自卑自弃的心理，我和丈夫在这方面格外留神。有一次，学校组织学生去游泳，老师担心儿子的身体吃不消，没让他下水，儿子未免有点沮丧。回家之后一个劲地问我：“妈妈，游泳是不是要很勇敢啊？在水中是什么滋味呢？”望着儿子那充满渴求的眼神，我和丈夫一商量，决定带儿子闯一闯：全家游泳去。那天，套了个救生圈的儿子在水中手舞足蹈，笑哈哈地激起了串串水花，高兴极了。那一刹那，我也觉得自己俨然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妈妈。

从此之后，我们鼓励儿子尽量多参加集体活动，上初一的时候，他甚至随同学们去远足登山，回来见人就讲：“我登上西樵山啦！”这些有益的活动对培养儿子坚强的意志很有帮助。

儿子虽然身陷沉痾，但我们希望他不要做个特殊的学生，即使是化疗，也尽量安排在星期六下午，星期日休息一天，星期一照常上学，在升旗仪式上，儿子和同学们一样，庄严地敬队礼，谁也不知道，就在前一天，由于化疗的副作用，他还在家中呕得天翻地覆，连黄胆水也吐出来。

为了治病，儿子拉下了很多功课，成绩自然不会是拔尖的，为了给儿子鼓劲，我们刻意去发现他的闪光点，加以肯定。我衷心感谢儿子的各位老师，他们给了孩子许多自信和勇气，但凡他在学业上有一点点的进步，老师都给他颁发“学业进步奖”。有一次，儿子兴奋地告诉我：“老师讲，张云峰，你真了不起。”原来老师在讲授《三国演义》节选时，儿子把一个典故完整地叙述出来了，老师马上就表扬他。又有一次，儿子贴在我的耳旁悄悄说：“学校排名次，我不是最后，我后面还有 100 人呐！”

儿子特别喜欢小动物，他的理想是当一名生物老师，而第一个目标是考上 21 中。为此，他尽了自己所能刻苦学习。记得小学毕业考试的时候，他正发高烧，达 39.7°C ，我们劝他算了，但他坚持要考，硬是挺了过来。儿子上 21 中，高兴得不得了，他体验到了成功的喜悦。

现在的家长大都对孩子呵护备至，但有的孩子却根本不珍惜长辈的爱，他们缺乏一种爱的体验，很难指望他们会孝敬父母，而一个连父母都不爱的人，又怎么可能真正去爱周围的人，爱自己的祖国？

我认为爱的教育是培养孩子健康心理素质不可或缺的一环。倒不一定讲什么大道理，可以从身边最朴素的事情做起。记得儿子读小学的时候，有次对我说：“老师真锡（疼爱）我，又怕风吹我，又怕太阳晒我，又怕同学碰倒我，老是给我调换座位。”我就不失时机地给他讲“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故事。儿子很幸运，遇到了很多爱护他的老师和关心他的同学，感激之情经常溢满孩子的心田。

去年，新闻单位报道了儿子与病魔斗争的事，社会上关心他的人更多了，气功师、治癌专家纷纷找上门来，区长也登门慰问。去年 11 月 22 日，是儿子 15 岁的生日，也是他最后一个生日，市妇联在儿童活动中心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生日会，100 位小天使载歌载舞祝福云峰，儿子感动极了，回到家还自言自语：这么多人喜欢我，我一定治好病，好好报答他们。

至于对我和他的爸爸，儿子已经作了很好的报答。我们一旦有个头痛脑热的，儿子必定端水递药，嘘寒问暖，一如我们对他那样。平时我在家做饭，儿子总欢喜搬张椅子坐在厨房门口，给我讲他从书上看来的笑话。

儿子那么乐观，那么热爱生活，但病魔却不放过他，一口一口在吞噬着他的生命。去年冬天，他终于躺倒了。在病榻上，他

央求爸爸：“你背我回学校，我就看那么一眼……”

我对我的学生们说，小云峰多喜欢学校，多想读书啊！但永远也不可能了，你们千万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孩子们都哭了，想必是听懂了我的话。

在今年新春那个春寒料峭的清晨，是我们最痛苦最难忘的日子。由于肿瘤转移到脾脏引起破裂，儿子非常痛苦。我一边轻柔地抚摸着，一边掏出了我们最后的心里话：“孩子，爸爸妈妈要感谢你，感谢你那么懂事，感谢你给我们带来了永远回味无穷的欢乐，也感谢你让我们尽可能地完美——为了做你的榜样，我们从不敢怠惰，不敢游戏人生，谢谢你，亲爱的好儿子！”

我分明看见一颗晶莹的泪珠从儿子的眼中滚了出来……儿子安详地走完了他短暂的、但没有虚度的一生。我默默地对小云峰说，下辈子，我们还当母子！

（原载 1996 年 4 月 8 日《广州日报》）

评析：

动真情才能真动情

胡茵茵

一位身患绝症依然坚强乐观的少年，一位失去了爱子依然热爱生活的母亲。一个动人的故事在记者笔下展开了。

显然这是一次动真情的采访，一次动真情的写作。

记者从文章中消失了，他变成了那位痛失爱子的母亲。母亲的心，是最伟大最无私的心。没有深刻的体验，没有真情的投入，记者就不可能站在母亲的位置上。而了解到许许多多的生活细节，就会令人感到那么真实和自然。

一字字、一句句，都是母亲在深情地叙说。点点滴滴的小

事，丰富细腻的情感，都在叙说中流淌出来。既有对孩子离去万分的不舍；又有对孩子始终乐观向上的骄傲；既有对天下父母的忠告，又有对全社会奉献出爱心的人们的感激。记者完全地融入到了整个故事里面，整篇报道采用第一人称，并由此获得了成功。

在新闻写作中，只能是客观冷静吗？并不。叙说这样的故事，只有动真情才能让读者真动情。

夜宿车马店

刘云山

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右旗今年获得历史上最好的收成，粮食总产 2.2 亿多万斤，比去年增长二成；油料总产 4000 多万斤，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七十多。全旗 350 多个穷队，今年面貌都有很大变化。农村的繁荣，给集镇也带来了兴旺。不久前的一个晚上，记者来到这个旗萨拉齐古镇的车马店投宿，生动地感受到了社员们丰收的喜悦。

记者在暮色苍茫中来到车马店的时候，老远就听到里面传出庄户人爽朗的笑声和牲口的叫唤声。进店一看，宽敞的院子被进城来卖粮卖油的车辆挤得水泄不通。店堂里灯火通明，满屋子的人拉呱得挺热火。

车马店的老炊事员周二旦一边飞动着菜刀，一边乐呵呵地说：“俺在店里干了十多年，天天跟庄户人打交道。过去庄户人眉头上挽着疙瘩，如今，个个膘得脸上放光。那些年住店的，多数人拿的是红（高粱）黄（玉米）面窝头，舀两碗开水就着吃；现在可不一般了，拿着白面馒头还嫌不顺口，还要到街上买块豆腐割斤肉，打二两白干，人家就图那个美气哩！”

“那算啥美气！”坐在菜案旁的一位叫贾满贵的瘦高个老汉有点不服气地说，“上一次进城来卖公粮，俺把儿媳妇、小孙孙、老姑娘一齐拉了来，饭馆里的烧麦、馅饼、锅魁，娃娃们想吃的都尝遍了。服务员一算账，俺一次掏给他十几块。俺今年一家打

了1万斤粮食，8000斤油料，光卖给国家的粮食油料就是1万斤，进钱3500块，那场面才叫美气哩！”

“贾大个子，如今你肚圆了，兜鼓了，可前几年记得你进城拉返销粮时，在店里光吃点窝头。”车马店服务员丁大叔“揭底”了。

这时，来自黄河边上十六股村的青年后生高兴宽接上话茬：“过去队里年年不分红。有次俺爹进城，说要领俺去开开眼。到了街里，一不敢进商店，二不敢进饭馆，兜里空空，怕看了眼馋。这回俺进城，一次就卖了3000多斤油料。”说到这里，高兴宽拍拍自己鼓囊囊的上衣口袋。

“小伙子买啥好东西了，叫众人看看。”不知谁这么说。

高兴宽倒实在。他打开一个大大的包袱，里边全是衣服，有媳妇的，有妹妹的，有老父亲老母亲的，什么涤纶、涤卡、弹力呢，都是时兴货。青年后生说他还打算买台切面机，给村里人加工切面，让庄户人也能吃上城里人吃的饭。

满屋子的人好像都是老熟人，越谈越起劲，越拉越高兴。车马店的火炕似乎也烧得分外热，更显得店堂里温暖如春。

（新华社呼和浩特 1981 年 11 月 30 日电）

评析：

对话：传神之笔

汪凯

通讯《夜宿车马店》用以点带面、以小见大的手法，反映了农村政策落实带来的丰收喜悦。那真是一番人欢马嘶、热气腾腾的景象：“暮色苍茫”中的车马店，“店里灯火通明”。你看：车马店老炊事员飞动着菜刀迎接来客，瘦高个老汉自得其乐的谈

笑，来自黄河边的后生拍着鼓囊囊的上衣口袋高谈阔论的神情……像一幅充满乡土气息的画面，把人们带到了丰收后的欢乐气氛中，使读者有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感觉。

这篇通讯最主要是通过对话来展现事实的，文中共引述了四个人的对话，可以说都是传神之笔，把人物形象勾画得活灵活现（四个人是老炊事员周二旦、瘦高个老汉贾满贵、丁大叔、高兴宽）。作者竭力通过庄户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来反映现实，反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没有一句议论，也没有空洞的政治口号。这种手法十分可取。全文字数不多，用一个侧面和几个典型镜头勾画出土默特右旗获得丰收后的欢乐景象。读起来很轻松，但可以看出记者在选材和语言上还是费了一番功夫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深入实地、深入群众的采访作风也是应该提倡的。

讨债者说

谢金虎 蒋耀波

记者在牡丹江市一家工业公司采访，当问起这几年公司为什么能稳步发展时，王熙平经理说了一句大实话：一靠产品过硬，二靠讨债“有方”。

记者怦然心动。如今，“三角债”前清后欠，越清越多，仅黑龙江省就已达 180 亿元。多少好端端的企业被“三角债”所拖累而无计可施，我们有心报道他们的讨债经验，不料，王经理连连摆手：“不行，不行！那些东西，报不得，报不得。否则，谬种传开，误国误民，千秋罪名，我们可承担不起……不过，既然你们感兴趣，那就请我们办公室主任老尚跟你们聊聊。”

老尚说：“这个话题不轻松。给你们讲几个故事吧……”

讨债讨来个干女儿

省外一家企业欠我们 60 万元，几次派人讨，没讨回来，后来党委副书记老温亲自上阵，也不行，急得老温寝食不安，上街瞎遛达。

这天正遛达着，看到一个女人被汽车刮倒，人事不省。老温赶紧把她背到医院。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个少妇正好是那家欠债单位主管财务干部的妻子，那个干部正好出差，没人护理。于是，老温留在医院不走了，给少妇喂药喂饭，打水洗脸……

少妇感动得哭了，要认老温为干爹，说：“不知您老尊姓大名？家住何方？我和我爱人一定要好好报答您老！”

当那少妇得知，老温是到 XX 单位要笔货款没要着时，便喜上眉梢：“哎呀，太巧了，我爱人就是那个单位管财务的。温大叔，您就放心回去吧，我爱人一回来，我就让他给你们单位汇款。”

我们老温讨债讨来个干女儿。从那以后，我们同那个单位的债务往来笔笔清，一直没有发生过拖欠。

“讨债者”给“欠债者”扛活

去年，国家一个部的研究所欠我们的 10 万元，也是久催不还，最后轮到小伙子张洪志去讨。小张直奔那单位，人家一听是来讨债的，脸一拉没理他。

小张想了个招，第二天快上班时，他又来到那个单位，客客气气地给收发室老头敬上烟，然后就扫地、擦桌子、打开水，不声不响地干起了勤杂工。可是，干了一个多星期，除了人家的白眼和嗤笑，仍一无所获。

晚上，小张住在永安旅馆，心里憋得难受，眼泪唰唰往下淌。堂堂七尺男子汉，要不是为了公家，怎么忍得下这口窝囊气。

但是，这气不忍还不行，小张白天“上班”当勤杂工，整了一个多月，终于感动了“上帝”，讨回了债。

小张凯旋那天，王经理同小张的妻子、儿子一起到车站迎接。小张握住王经理的手，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打死我，也不去讨债了。”

今年正月十五晚上，王经理摆下酒席，为即将出征的讨债人员壮行，小张还在这支队伍中。王经理端起酒杯：“同志们，又

要委屈你们了，我代表全公司的职工，代表大伙的老婆、孩子，敬大家一杯。”说罢，连干三杯，接着，又向大家深深地三鞠躬。

热泪又一次涌上小张的眼眶。他和大伙“咣”地一碰杯，一饮而尽！

“情报”与“三包”

省外有个单位，欠我们 30 万元，用了不少办法，也讨不回来，我们要求驻在那里的办事处，赶快搜集那个单位有关干部及其亲朋好友的情报。

很快传来一个有价值的情报：那个单位的财务处长，有个姐姐住在牡丹江市。

于是，我们便在全市“大海捞针”，居然找到了。他的姐姐退休在家，姐弟俩已经多年没见面了。

接着，我们就登门拜访。第一次，人家很冷淡。第二次，我们动员她举家回老家探亲，我们实行“三包”：包路费包吃包住包礼品。结果她探亲刚回到牡丹江，30 万元欠款就汇来了。

“一听客人到，腿就哆嗦”

现在，我们一共掌握了 300 多名“有价值”的干部及其亲朋好友的情报。逢上婚丧嫁娶就送礼，有了困难就相助，有人生了疑难病，就千方百计地帮助寻医寻药，其中经我们联系到名医院就医的就有 30 多人。

一到盛夏，镜泊湖瀑布飞溅，景色秀丽，正是避暑观光的好时节，也正是我们向这些“在册人员”进行“感情投资”的好机会。

我们把他们请来，吃、喝、玩、乐，热情款待，让他们高兴

而来，尽兴而归。

送往迎来，把我这个办公室主任折腾得够呛，可累点不怕，最怕的是喝酒。要让客人喝得畅快，你这个陪客就不能含糊。有一回，我 7 天喝了 14 顿，自己是死是活都感觉不出来了。

如今，一听客人到，我的腿就打哆嗦！

可有啥办法呢？债务人比天皇老子还硬气。我们求合同，合同不灵；求法律，法律不管，只好求“感情”。

可那“感情”是假的。我们在酒桌上强颜欢笑，酒桌撤后直想哭。

老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呢？

（原载 1991 年 5 月 5 日《人民日报》）

评析：

丢了芝麻，捡了西瓜

李兆丰

在新闻学理论的经典教科书中，新闻具有多种功能，娱乐功能是其重要的功能之一。但人们常常将之狭隘地理解为感官倾向性需求，甚至作为黄色新闻泛滥的理论注脚。这是对新闻娱乐功能的误读。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发挥新闻娱乐功能，依赖于记者对事实本身审美情趣的挖掘。《讨债者说》可以看作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该作看起来是记者在不经意间“妙手偶得之”。失去了一篇四平八稳的工作通讯，倒多了一篇通讯精品。整篇通讯结构由四组小标题导引的四个妙趣横生的故事组成，用简洁而生动的文字将每个真实的故事的来龙去脉轻松地勾勒出来；单个的故事看起来情节感强，又极富完整性，便于阅读（但很显然，该作的目的

并非主要在于体现其娱乐功能)；同时把几个故事组合起来，又遵循内在逻辑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从形形色色的不同角度说明了同一个主题：在我国经济建设取得新的重大突破之前，因体制的不合理、法制的健全，造成的严重违反经济秩序和道德的“讨债”现象应引起人们高度重视。该作通篇都是借一个“业内人士”之口讲述了讨债的故事，有两点可取之处：一是真实可信，二是采用纯谈话实录方式，极少运用议论、抒情的表达方式，看上去像一碗颇有风味的“清汤挂面”，但诚如该报道记者所说：“我进一步悟出，记者的精明，表现在及时、准确地报道事实本身，而不在于代替读者评判事实。”

这种在写作手法上的可贵创新，当真是丢了芝麻，捡了西瓜。

网上风景无限

于卓

两年等于两百年

在上海的“第一号咖啡桌”，来的第一位朋友颇有领袖风度，此时只有我和他，他说：“hi，大家好！”“你好！”我立即回他，我很兴奋，这是我在电脑互联网络遇到的第一位采访对象，今晚，1997年3月14日19点整，我在北京魏公村，在流海威时空一位网员的协助下，鼠标一点，来到上海。

今晚的异地采访，没有汽车、火车、飞机运载，没用电话、传真预约，不用敲门，不用互相打量，也不用掏出采访本和录音机，采访就开始了。

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我们用手交谈，键盘敲得多快就能说多快，屏幕上飞快地跳出对话。“领袖”（以下简称D）开场就说：“网络将会改变人生，你的人生。”在我们互道职业之后，倒是D先发问：“你认为网络是何？”与此同时，我的问题也跳上屏幕：“你为什么自投罗网？”D说：“我喜欢带网的活动，两年等于两百年，在网络上！”

瞬间，“咖啡桌”边又来了几位新朋友，他们立即反应：“好像在采访谁某某？”我立即再报：“我是北京的一个记者。”还未容我表达问候，上海人已经说出：“不好。”还有的说“采访吧。”有的说“网络上没有时间。”有的说“可以单独谈吗？”等等。我

说：“我想尝试网上采访的乐趣。”D说：“我想尝试被采访的乐趣。”然后立即补充：“你还可以尝试其它乐趣，比如当总编。”这我听说过，眼下已经有人用网络上的信息编辑报纸了。我说：“在网上采访，在我，在许多报社记者是第一次。”D说：“你会有很多第一次，在网络上。”

几乎在同时，到场的几位命令我报出名字，我见网友们都是英文名字，于是用键盘敲出：“fishman，”渔夫的意思。有人立即反应的是直译：“鱼人，太含糊。”还是D高屋建瓴：“fishman，愿者上钩。”我想，是的，本渔夫今晚在网上作业定有大收获！

如果你看得那么大，就有那么大

今晚来到上海，与D的交谈最多，他入网已经两年，从事信息行业。

我问：“你前面说网络可以改变人生，请谈谈好吗？”

D说：“网人都是坦诚的，我更自由，比如说，可以接受你的采访，空间更大，就像女孩子想当演员，她们也想改变生活。”

“你每天在网上待多久？你获得过实用信息吗？”

“一小时，实用信息不多。我看好网的将来，不只是信息；我不愿出门，可以在家购物，订票，在家工作，出门旅游，打网球。”

“网络与你的事业是什么关系呢？”

“信息需要让人知道，最佳途径就是网络，它会渗透到每个地方。网络服务将是未来最大的产业，商机无限，最适合年轻人从事，靠头脑成功，不靠很多资本，同时发挥最大潜能。”

D问起我来：“有无网络方面的报道，北京的记者，多说一点吗！”我来不及回答，一个劲地发问：“网络与人生关系那么大小？”

“如果你看得那么大，就有那么大！1890年，人们在问，汽车这个怪物有用吗？”

“有用。”“有用！”在一旁的两位耐不住寂寞，开起玩笑了。

D说：“1895年，谁会用电话？”

“我，你呢？”还有人在胡乱插话。

D说：“1997年，网络有何用？比如，有好多人的第一次约会是在汽车上。”

“聊天”“用处太大了。”旁边的人开始回答D。

D终于急了：“后来的，打住！！”

我立即说话：“请朋友们尽情聊，这网上采访得到的就是不一样！”

D立即告我：“网上没有采访和被采访，完全交互式。”

我知道我此刻的角色一时令网上的这些人难以接受，但我不愿“偷采”，我必须道明身份，必须连续发问，机会难得。“网上最吸引人的是什么？”

“大家一起玩儿。”

“dongdong！一枪毙了你，一枪毙了他！”

“网上可以结交许多朋友。”

D说：“我不知其他人是谁，可以畅所欲言，不承担后果。”

此刻，我们这一“会场”出出进进已经有11个人了，“人多嘴杂。”D发出叹息。

在上海已经待了整整一小时，因为人声嘈杂，我决定暂时退出，便告再见，不速之客瞬间便撤回北京。

网上风景无限

晚上8点到9点，我从正在网上的名字里挑了一个“student”（学生，以下简称S），他呼之即来，我们谈了一小时。

初到网上，新鲜得很，感受层出不穷。

首先，网人多直率。我告诉 S，我今天第一次上网；他才上网半年就对我说，你有点落后了。——其次，你必须敲字快。他出三四句，你出一句，就会让对方受不了。我告诉他，我打得慢；他说，没关系，不过看来你确实有点慢。——在网上，彼此是隐身人，可感受对方性格，却看不见音容笑貌，也看不出性别。S 正在上大学二年级，学经济的，知道我比他大好多，立即说，我可以叫您大哥了！——在网上，是交互式的交流，你腰缠万贯也罢，宅子多深也罢，在这儿可狂不起来，网上居民是平等的，机会也均等。——在网上，你还得有钱，网络信用点一分钟一毛钱，网络时间用金钱换取，你得有一定的资金支持。S 入网没用爹妈的银子，完全靠自己勤工俭学。因而，他接受我的采访后，立即问，可以给我点信用点吗？我应允。——在网上，还有比金钱更重要的，是得有一定的境界。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不同凡响的人生规范，网人关系即是人格体现。

“大哥，你真的是记者吗？”S 跟我交谈老半天了，还是有点不敢相信。我说：“是的。”他说：“您是如何想到在网上采访的，佩服，中国第一人！”

网上采访是不是第一人我不清楚，此刻，我感受到，这么一个突然撞进来的居高临下连连提问的讨厌的家伙，他们没见过，他们不适应。这也是他们第一次。我告诉 S：“你是最早接受网上采访的人！”——后来，瀛海威公司一位总监助理对我说，报界以网上采访的形式进行报道的，你们《科技日报》是第一个！

我还在追击。“你是学生，为什么急切上网？”

“交朋友啊，提高境界，提高水平，尝试新的生活方式呀，要是有钱我就天天在网上待着。”

“网上风景如何？”

“网上风景无限！”紧接着，他又说：“不过你要学习领会。我有一个上网 16 字真言——提高境界，提高水平，办事认真，为人宽容。我现在上网主要是看一些资料，通过网查找国外的资料可方便啦。”

“你周围的同学上网的多吗？”

“还不是很多，不过网在学校里是个热门话题。”

“你准备在网上实现点什么？”

“我准备以后的生活都靠网来实现了，找工作呀，谈恋爱呀什么的。”

告别网友，我把所有谈话从网上“摘”下来，再用打印机打出，一份清晰的采访记录在握，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兴奋得难以入睡。S 说网上风景无限，我一时还领会不深，但有关网络的新闻曾略有耳闻。这个空中隧道已经成功地举办了第一次个人摄影展和第一次画展，召开过几十人参加的有关网络文化的学术研讨会议，还有书店开张，还有北京图书馆也搬上网络，网人足不出户即可迅速在上千万册图书中查阅书目及简介等等。接触网络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世界好像一下子变小了，许多传统方式立即被更新，它的冲击到底是什么我一时难以说清，今晚只是初次在网上张望了一下，还只是浮光掠影。明天还要继续。我想，只要我还去网上作业，就能获得又一个“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原载 1997 年 3 月 31 日《科技日报》）

评析：

“入水”才能抓“活鱼”

胡菡菡

“活鱼”怎么抓？这篇通讯告诉人们，“入水”才能抓“活鱼”。深入生活，才能写出好新闻。

1997年，网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新鲜事物。怎样从这里挖出新闻？怎样把网络的面貌生动地展现出来？记者独辟蹊径，上网采访。这样的“入水”抓“活鱼”，使得通讯的写成似乎不费吹灰之力。记者只是忠实地记录下采访的过程。

“我在北京魏公村……鼠标一点，来到上海。”一句叙述性的话，网络的便捷性便呼之欲出。

作品第二部分，通过几段简单的对话，勾勒出网人对网人的看法：“网人都是坦诚的”；表达出网人对网的预测：“网络服务将是未来最大的产业”。

上网的感受又是怎样的呢？记者很直率，因为此时他也是一名网人，完全有发言权。“网上居民是平等的，机会也均等。——在网上你还得有钱……还有比金钱更重要的，是得有一定的境界……”

为什么复杂的网络体系，记者写起来却游刃有余呢？只有一个前提，他“入水”了，深入到网络生活中去了。

闭门难以造车，“入水”才能抓“活鱼”

让谈话充当重要角色

——谈谈谈话实录型通讯的写作

胡素华

谈话实录型通讯,是一种由谈话充当重要角色的通讯。在叙事记述型通讯中,往往也会涉及人物之间、记者与被访者之间的对话,但它并不是以主要角色的身份出现的。

在谈话实录型通讯中,记者或记录人物之间的对白,或按原样保留自己与采访对象之间的对谈,或录下被访者的谈话并予以披露。如此看起来,谈话实录型通讯所录的谈话,无疑应以他人(当事人或被访者)的谈话为主。

而对象的谈话,又可以区分为两类:

一类是面对记者所作的谈话。被访者意识到自己的谈话将被公开传播,因此他们的谈话在趋避、用语、语言风格等方面会受到某种有形无形、或大或小的限制。《讨债者说》、《下辈子,我们还当母子——一位痛失儿子的母亲自述》、《王维嘉:剪断 INTERNET 的尾巴》、《大公司做人 小公司做事——访联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裁柳传志》,都可以归入这一类。在这一类通讯中,后两篇作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人物专访。《网上风景无限》,是一篇在网上采访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比较特殊的谈话实录型通讯(特殊在用手敲键盘、点鼠标进行交谈)。它让受众感受到了网上采访的奇异风景。

另一类是当事人在未觉察记者存在的状态中的谈话(包括与记者的谈话)。这类谈话体现出完全自然的形态。通讯《夜宿车

马店》，可算是此类通讯中颇有代表性的一篇。作品记录了四个人物相互之间的对话，通过对话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唉！十四岁的拖拉机手……》（载于 1988 年 9 月 30 日《大众日报》，本书未收），所录的是十四岁的拖拉机手与没有公开自己身份的记者之间的一番对话。除了对话以外，少有描写和叙述以及记者所发议论。

一般而言，上述两类中后一类谈话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生活中并不缺少有新闻价值的新闻事实（包括人物之间的谈话），而是缺少发现。记者必须随时随地地当有心人，留意周围人的有意义、有价值、有趣味的谈话，并及时地、准确地加以记录。在这过程中，对于谈话价值要进行准确的瞬间判断，判断失误可能会失去记录稍纵即逝的谈话内容的宝贵机会。

对前一类谈话进行实录，是很有讲究的。谈话的内容和质量如何，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最后形成的通讯的成败。因此，对于谈什么、找谁谈、怎么谈、在何处谈等等问题，事先都应有精心的考虑。

首先，“功夫在诗外”，记者要有备而前往。

记者在与采访对象谈话之前应作好充分的准备。这些准备工作包括：

一是选好谈话的题目、人选和场合。

话题的选择，是确保谈话本身的成功和谈话实录型通讯写作成功的关键。选择的标准应当是：较为新鲜，具有新颖性；有一定价值，具有重要性；能引起关注，具有相关性。谈老而又老的话题，往往只能是无功而返。谈无关紧要的话题，就会变成纯粹的闲聊。谈与受众不甚相关抑或毫不相关的话题，就不可能赢得广大受众。

谈话者的人选，应慎重确定。专访的谈话对象，是惟一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成败在此一人。谈话对象在谈话所涉及的

领域，应当有较高的地位，有相当的权威性，有精深的思考和见解。总之，要对受众确有启发。

谈话的场合，也应选好。公众场合有公众场合的好处，那就是现场感强。由此看来，有些谈话安排在公众场合进行，有它的必要性。但被访者在公众场合的谈话，不可能很长和很深。这似乎又是难以避免的不足。在对象的办公地点进行谈话，可体现一定的氛围，谈话可以从容不迫地进行，但气氛常常过于严肃。得到采访对象的同意，进入其家庭进行采访，谈话可以在一派家庭气氛中进行，也就多了一份轻松，有望谈得亲切自然，无拘无束。当然，其他通讯的采写，也有一个采访地点的选择问题，但在这一点上，谈话实录型通讯的要求无疑要高得多。

二是熟悉谈话所涉及的内容。

专访的谈话内容是“访者”与“谈者”事先约定的，而且人是专门的人，内容是专门的内容。《大公司做人 小公司做事》所记录的，是记者与柳传志之间的访谈内容。访谈的内容聚焦于“联想”：“联想”的成功之道、运行特点和发展思路。如果记者事先对中国和世界电脑业、联想集团和柳传志本身以及相关的背景材料缺乏足够的了解，那么，也就不可能以“访”导“谈”，不可能始终掌握谈话的主动权。

三是准备好质量较高的问题。

提问的总的要求是：具有较高的质量，不能有“走火”的问题，也不能有太多一般化的问题。在这一方面，央视的“新闻调查”有许多值得学习、借鉴之处。在访前应事先准备好的问题，大致为：开头所提的问题（要求像写文章那样做到起句不凡），关键处的问题，重要的问题，特别有价值的问题，受众感兴趣的问题，能使被访者充分体现个性特点和风格的问题，等等。

其次，让“访”和“谈”碰撞出“火花”来。

在谈话实录型通讯中，要处理好“访”和“谈”之间的矛

盾。要始终控制谈话的主动权，让“谈者”谈“访者”所需要的东西、感兴趣的東西。“访”应引出“谈”、利于“谈”，以“访者”的睿智激发“谈者”的睿智，使两者的智慧同时得到最佳发挥。应当说，央视的名牌栏目“实话实说”，是很值得谈话实录型通讯的作者认真揣摩的。不允许出现两种极端：一种极端是“访者”显得可有可无；另一种极端是“访者”处处喧宾夺主。无论出现哪一种倾向，都不可能实现“访”与“谈”的密切配合，都不可能使谈话达到很高的境界。

最后，实录谈话也应讲究技巧。

一是恰当地进行剪裁取舍。

除了纯粹的谈话记录，其他的谈话实录都有加工的必要和余地。这里所说的加工，一是指取舍。要取有价值的谈话，取体现鲜明个性特点的谈话，取具有独到的、深邃的见解的谈话，舍无价值的、大路货的谈话。

二是巧妙地插入现场描写。

一般而言，长篇大论式的大段谈话难免给人以沉闷之感。在行文时，常常要在某些地方临时中断，插入一些对现场（包括现场气氛）的描写，对“谈者”神态、语气、动作的描写。这是增强作品可读性的需要。

三是机智地进行记者点评。

谈话实录型通讯并不排除记者在行文时作点评、写感受。这种点评往往只是寥寥数语，却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网上风景无限》的结尾语是这样的：“我想，只要我还去网上作业，就能获得又一个‘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其实在记录人物之间处于自然状态的谈话时，也是完全可以这样做的。《唉！十四岁的拖拉机手……》，写到记者帮助十四岁的拖拉机手将抛锚的“小拖”重新发动，这位辍学少年用沾满油污的小手掏出一叠钞票给“我”作为酬金时，用了这样几句话：“看着他那矮小的身

躯，天真稚气的脸，我只觉得自己浑身的血液都在往上冲，心不断地下垂，并且越来越沉重。”记者在谈话以外安插的几句话，确实让人顿生沉甸甸的感觉。

后 记

要从几十年的历史长河中选择数十篇通讯范文并进行评介，且全书的篇幅必须控制在 25 万字以内，这实在是一件勉为其难的事情。

困难之一：篇幅十分有限，而佳作实在太多。本书的容量势必造成遗珠之憾。编者对许多本已打算选入的作品，迫于无奈，最后只能割爱。

困难之二：几十年（即使只是建国 50 年）来，通讯作品浩如烟海，从中选择佳作，也绝非易事。

困难之三：对通讯进行科学分类具有相当大的难度。通讯分类问题，在新闻界，在实际操作中，也许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甚至不作具体分类也无妨。但在编此书的时候，科学分类问题就不可回避。我和副主编反复讨论，试图探索性地对通讯进行较为科学的分类。要既能包容各种应该被包容于其中的文体，又不至于陷入分类标准相交叉或不统一的泥坑。本书提出了叙事记述型、调查分析型、谈话实录型这样一种通讯三分法。这可能是会有争议的。现在看来，第三类通讯相对较为薄弱，这当然有本书编者视野不够开阔的原因，更有这类通讯本身佳作数量偏少的原因。这种文体有待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本人、副主编以及本人的研究生，先是广为阅读大量通讯，撒下了“天罗地网”，然后是几番筛选。在筛选过程中坚持质量

标准，同时兼顾各个历史时期、各种报纸媒介、各类具体文体均保留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

我和我的同仁虽然尽了努力，但由于水平所限，缺憾和不足仍在所难免。期望着得到专家们和读者们的批评指正。

丁柏铨

2000年6月25日

版 权 声 明

由于选编时间仓促和通信联络困难，本书所选作品中，有一部分没有得到版权人的授权。在此，特声明如下：

一、本书整体版权属于编者，专有出版权属新华出版社。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二、本书单篇作品的版权仍归原版权人所有；

三、请各版权人按以下地址和我们联系，以便我们支付报酬。

邮编：100803

地址：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新华出版社新闻图书编辑室

编 者

2001 年 1 月